黑夜的奴仆



黑夜的奴仆

［法］米歇尔·奥斯特 著

徐家顺 戴明沛 译



北京出版社

MICHEL HOST

VALET DE NUIT

Aux Editions Grasset et Fasquelle

(根据格拉塞法兹格勒 出版社出版)

黑 夜 的 奴 仆

Heiye de Nupu

〔法〕米歇尔·奥斯特著

徐家顺 戴明沛 译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广 益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625张印 164,000字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200—00468—5/I·89

定价:3.10元 印数 1～3,520

第一章

塞纳河浑浊的黄水裹挟着两岸的破碎物品、枯枝败叶滚滚流去。最近几年，城市上游建成的河道整治工程还不足以改变河水的流速。那些工程只不过使河水的流速平缓了一些，汛期里，河水淹没了阿尔马桥身上[①]朱阿夫兵的脚、膝盖、胸、下巴和小圆帽。市政建设部门的人员站在齐腿肚子深的水里紧急疏导左岸滨河路上阻塞的车辆。右岸早已改建成高速公路。人们忙着牵引被人抛弃的汽车，或被漫不经心的主人随处停放的汽车。看热闹的人靠在桥栏杆上出神地看那些人辛苦地干活。

十月的夜晚。转瞬就是十一月的夜晚。塞纳河入梦了。我的思想和它结成一体。它由东向西流过城市。一些支流注入塞纳河，使它变成一条大河。那些支流本来可以把它们的名字加给它的。还是塞纳河占上风了。它为什么占上风？上帝的旨意。塞纳河一直很谦逊。它不如奥里诺科河，也不如亚马逊河。它从贝西尔门流入巴黎，奇怪地从黎明门流出巴黎。它在那儿绕了一个相当完美的弧形、一个令人放心的、母性的弧形。我们房屋窗外就是它的码头；在寂静的夜里，我听见河水哗哗地流淌。

① 桥拱上的雕像，身着轻步兵军服，巴黎市民习惯用它说明水位的高度。——译者注

我十分熟悉石头堤岸中间、一个接一个桥拱下面流着塞纳河。我想谈谈我和它之间的亲密关系。塞纳河对人没有兴趣，但是人们却为它建造了白垩和钢的摇篮，一座座束腰的桥。人们为它写了书、画了画：文字的丰碑，忧伤的巴黎圣母院，激动人心的圣·夏佩尔教堂，还有一些阿摩耳雕像①的卢浮宫。德扎尔桥的桥面受到河水浸蚀岌岌可危，人们把桥面修复了。同样的路面，同样的栏杆。人们仅仅提高了桥拱的跨度，以便拆除那个碍事的桥墩。笨重的船只常常撞在上面。

我和它秘密约会的地点不是新桥，也不在维尔·加兰花园广场。晨曦初露的时候，那儿聚集着三五成群的人，有尖膝盖的丑姑娘，弹吉他的人和摄影爱好者。我在两个确定的地方等它。我在那儿从不同的角度、按我的方式看它。

我和它约会的第一个地点是在阿尔赛纳站前方，列车到达拉佩滨河路的地方。列车停稳之前向左优美地转一个弯，绕过法医学院那幢几乎不透光的大楼。那时我看见法医学院淡紫色的砖墙从我右边掠过。需要扬起头才能看见镶着厚玻璃、只能透进去一点光线的窗子。日落之前，大楼里亮着摇曳不定的玻璃闪光。不管白天还是夜晚，那光总是亮着。地铁列车停下来时，我禁不住想像那些躺在肮脏的墙后面的身体。他们在滚动的冷冻槽里等待着未必会是友好或爱怜的目光，警察局的检查，法医或医科学生的手术刀，殡仪馆员用手熟练地整理。地铁列车哐啷哐啷地开动起来；别的线路都改为高架线路、橡胶轮胎，听不见这种响声了。列车以正常速度向奥尔良——奥斯特里茨车站行驶，穿过奥斯特里茨桥。

---

① 即爱神厄洛斯的雕像：一个长着翅膀、张弓搭箭的少年或儿童。——译者注

列车行驶到架空轨道上，车厢的声音骤然变了。我们进入塞纳河上空。我们飞越塞纳河。留在玻璃房子和甲醛气味里的可怜的兄弟离我们越来越远了。眼前出现明亮的河水，风在水面吹起变化不定的、柔软的涟漪。讨厌、可怜的死亡只不过是一个恶梦。灿烂、强大的生活在前进，在旧城及圣路易岛脚下缓慢地确立起来。地铁列车驶进奥斯特里茨站以前，我匆匆看一眼环绕教堂回廊的巨大撑架及苏里、图尔内尔、阿斯维塞三座桥。河对岸贝尔西方向露出里昂火车站，车站两边各有一座绿色变形玻璃塔。云彩会消失在里面。一列列载着沙子、煤炭的驳船在河上行驶。有时，驳船的甲板是封闭的，上面有一间舱房。一个船员在舱里用手握着星形舵柄。一个女人在船舱和船头中间的甲板上晾衣服，像农妇在地里晾衣服一样。水上船队沿着港口行驶，码头被风吹得干干净净，高楼的假窗户经日晒雨淋颜色发白。好像是在不时悄悄提醒注意对面阴郁的法学院。然后，列车重新驶入地下，眼前闪过暗绿色的墙，墙上渗出的模糊水渍和无尽无休的、飘忽不定的迪——迪波——迪波奈①。

地铁车站有许多优点。可以架设空中平台停车站。地铁车站好比城市书本的章节。它是各区的图案、栏目。要深入了解这座城市，恐怕没有比逐行逐字阅读地下“书本”的所有章节更好的办法哩？主从句，有时是独立句（一小段线路），插入句和派生词②；地铁的线路相互衔接：民族广场站（我从奥德翁剧院去那里，在夏特莱换车）、庇克布斯、拜莱尔、多美尼尔、杜戈米埃尔、站前路、斯瓦勒雷、民族

① 迪波奈是酒的广告，在地铁车厢里看墙上的广告是逐渐看清楚的。——译者注

② 指地铁线路。——译者注

路、意大利广场、哥维查尔、格拉西埃尔、登费尔·罗什卢、拉斯帕伊、埃德加·吉奈、蒙帕纳斯比恩芙努、巴斯德、赛弗尔·勒孔贝、拉莫特·比盖·格勒奈尔、杜普莱克斯、比·阿凯姆桥（我在这里下车）、帕西、特洛卡岱罗、波依西埃尔、克莱贝尔、戴高乐星形广场等站。民族广场——星形广场线横贯首都南半城。北半城有一条对应的线路，地下运行线路更深、不大和谐。我可以乘地铁到我和塞纳河约会的第二个地点。气候宜人的季节的约会地点。

格勒奈尔站是我最喜欢的车站。我穿过大桥向右边看，可以看见艾菲尔铁塔，好像只要一伸手就能摸着它；还可以看见玛尔斯战神广场附近一带地方，那石头光滑、草木葱郁的特罗卡岱罗山及山顶上的夏乐宫。阿尔伯尼街几乎见不着太阳。在这条通向豪华街区的狭长入口处，人们在两个水平面上通行：并不拥挤的车行道和相当于两岸建筑物三层楼高的架空线路。在帕西站以前，乘客用探究的目光透过双层帘子的间隙或者杜鹃花苍白的叶簇，竭力看那转瞬即逝或有损名誉的秘密。然而，地铁列车到站时，除了大白天亮着的一个发黄的大纸板灯罩、一张矮桌子、几张笨重的齐本德尔式① 扶手椅之外，他们什么也没有看见。至于有生命的东西么，只有一个穿围裙的女仆拿抹布和喷雾器用力擦拭主人客厅油污的房门。

阿尔伯尼街口像门禁森严的大理石建筑的瑞士银行。也许我有点夸张。需要多加小心。您进去，切勿抱什么希望……从下面，在车行道上看，架空线路左右两边供乘客进出帕西站的扶梯增加了恐怖的印象。

因此，乘客有种种理由放过前方这一站，走右岸肯尼迪

① 英国家具设计师。——译者注

总统大道（从前的帕西滨河路），然后走路易·布莱里奥滨河路和黎明滨河路。要消磨宝贵的时间，要无目的地逛马路，这段路是很适宜的。因为过了黎明门便什么也看不到了，什么东西也没有了。在阳光明媚的春天，这里撒满了阳光。冬天，这段路像坩埚似的盛接暗淡的阳光。因为这段路是东北向西南，它在寒冷季节和太阳在地平线轨道的移动方向几乎完全一致，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从温度和舒适的角度看，今天在巴黎几乎没有比这儿更好的地方了。这个看法似乎是小资产阶级怯懦思想的标志。小资产阶级和怯懦思想是共存的。我乐意承认我是这个阶级（有时，我打心眼里厌恶这个阶级）的一个极其特殊的成员。

乘客一进入右岸就有一种强烈的印象：除了塞纳河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看。林荫大道两旁是巍峨的楼房，瘦小的花园、尽人皆知的钱的秘密把它们和外界隔绝开来。本区的人，通常是女人带着不同种的大大小小的狗，不知疲倦地挨着房屋和瘦弱的灌木边上一条狭窄的人行道上散步。这里找不到一家服饰商店，也找不着老式帽店，既没有咖啡馆，也没有隐蔽的酒吧。这里是这座城市中最像沙漠的地方。这正是这地方绚丽和无可比拟的魅力之所在。像在沙漠里一样，人们可以极目远眺，可以看见对岸安德烈·西特隆滨河路和格勒奈尔滨河路的美景，黄、蓝色摩天大厦、大饭店、办公楼的海市蜃楼。那仿佛是另一座城市的景象：紧张、忙碌、充满戏剧性、盖着纸板、修修补补，有巨大的起重机和轰鸣的拖拉机铁臂在运转，被低租金房屋切割得支离破碎，被建房热潮推动、塑化的，披着我们这个城市虚假豪华外衣的城市。这地方和时代的矛盾十分尖锐，只要迈出一步就能有所发现。滨河路上来来往往的几辆汽车似乎迷失方向了。

幸亏是单行线，才能径直朝市中心驶去。也许有一天，这几辆车会朝相反方向行驶，朝黎明滨河路外虚无的边界驶去。

那位行人朝西走。他沿着无精打采的河水向前走。上游还没有完全融化的雪把河水搅浑了。从勒阿弗尔，鲁昂飞来的海鸥……振动翅膀从一座桥飞到另一座桥。有时候，海鸥停在灰色的镜面上随波漂流，然后突然躲开双桨小艇或无舵手小船(运动员都穿着赛艇俱乐部的服装)。成群的绿头鸭挨着天鹅路——河中间狭长的绿色小岛——两边行进。浅黄褐色羽毛的母鸭、羽毛丰满的公鸭领着春天孵出的毛绒绒的小鸭(睁着惊奇的眼睛)顺流而下，向停靠在岸边的水上人家游去。有南方之星号、马提尼克号、土阿莫土号、斯匹次卑尔根号、布干维尔号……有人从船舱的窗子里把吃剩的早点扔给鸭子。鸭群从一户水上人家游到另一户水上人家，沿途乞讨吃剩的食品。一些孩子骑着自行车在码头上穿来穿去。一个只穿一条蓝色三角裤的年轻女人全身沐浴在早晨清新的阳光下。

人们只有在早晨静静地观赏这一幅幅田园风光。人们观察那些各具特色的驳船。一条船的客厅里陈设着桃花心木家具，和从前横渡大西洋客轮的豪华房间相比毫不逊色，只是小一些罢了（指长期行驶在勒阿弗尔——纽约线上的尚普兰号）。另一条船上有玻璃天棚，是一个水上花房：船上到处是常春藤、百日草、纸莎草。连甲板上也堆放着一桶桶栗树、一盆盆三色堇、旱金莲。可是船上一个人影也没有，花匠似乎不在船上。

另一条驳船形状像一个长长的废铁盒，一个空船壳。船身漆成血红色。舷窗是用焊枪在厚铁皮舱上开出来的，长满了铁锈。好像一条死船。可是仿佛随时会有工人带着木板和

落地灯来整修这条船。这条船的内壁上还留着从前装载过煤炭的污痕。阳光反射在舱壁上，映出横七竖八的、晃动的浅色条痕。一条通体发黑、肚皮发亮的肥雅罗鱼在红色船壳和河岸间的水面上游来游去。行人走近时才从容不迫地游开，沉入混浊的河水里。

在房屋高台和河岸人行道之间设有信筒；一个陡坡上有一片草地，长了锈的锚、破车胎；还有阶梯，刚刚刷过漆的跳板，以绳子当扶手的简易木板桥。外桥墩是一个水泥底座，整个冬天浸在水里。几根铰接的钢杆、直径很大的空心管子把每一条船拴在岸上的固定桩上。这样，船只不会互相碰撞。不论水位上升还是下降，船只可以随着水位自由升降。

河水的缓缓流淌，阳光对水面的抚摸，水栖鸟的迁徙，驳船，走路中看见人们或人们的活动足以在我心里触发机械时间向内在时间的转移。这内在时间是我的生命的节奏，是我的生命的搏动。有时，我在假期里和妈妈在中等山上和高山上旅行时有过这样的感觉，因为这确实是感觉，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孤独，山梁上的锐利山脊上刮着几乎听不见的风啸，云彩疾速或缓慢地飘过，积雪的山峰像在空中汹涌澎湃的波浪，使我恢复了我这个有生命的人的独特的搏动，也恢复了我这个年轻人、梦想家的搏动。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生活在远离喧嚣尘世的地方。塞纳河对我是不可缺少的忠实伙伴，萦回在我耳边的音乐，已经成为我愤世嫉俗的装饰。当我沿着它岸边行走，当我看着它时，我便重又获得受到威胁或失去的平衡。

可以说，我和妈妈再不离开我们在格朗·奥古斯丁滨河路的住所了。这正合我的心意。塞纳河在我窗外流过。我们最后一次假期同前几次假期一样，也是在山上度过的。妈

妈喜欢在山上度假，胜过在其他任何地方。我们去过采尔马特、卢加诺。我们熟悉费尔德基希，熟悉福拉尔贝格山脉望不到头的石级。最近，我们之间的关系亲密些了。不过我们在圣·莫里斯堡逗留的那些日子令人失望极了，妈妈打算去看看思加迪纳高山牧场。我们经济上十分宽裕，我也许再陪她去玩一次。说也是，我们一起在巴黎的住所度过了十个月，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再熬一个夏天。确实，在我的生活中除了妈妈，几乎没有人占据值得一提的位置。我父亲很久以前就不知去向了。妈妈的朋友托尼·索昂在他需要和对他有利的那些年代里像父亲那样待我。还有波拉·霍真。她是我两年前遇见的一个女人。她住在巴黎。我们尽量找时间会面。妈妈好不容易最近才同意接待她。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人了。

很多天以来，妈妈始终一言不发。她紧闭着嘴唇，从一张靠椅走到另一张靠椅，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她那发黄的脸色说明她缺乏睡眠。一到下午三点钟，所有的烟灰缸都盛满了烟头。波拉·霍真早就提醒我注意，连我的衣服上都有一股黑猫牌香烟的甜味。

最近这些日子，即使我的眼睛盯着妈妈时，我还是没有看见她。这使她十分恼怒，她开始盘问起来：

“你是打扑克输钱了，还是买赛马票输钱了？……”

“你知道我已经不赌钱了。”

“那么你是在谈恋爱。是那个姑娘吧？”

“是的，你说得对，是那个姑娘。”

“恋爱！我恋爱过吗？只要你有地位……波拉是一个可爱的姑娘，你知道我是这样看的。但是她却写起诗来了，

哼，今天谁还写诗呀？多么可笑！”

她的灰头发在走廊尽头飘动。她砰地一声把门关上了。她发火、撒气，我并不放在心上。我倒想起电影里的武士们，相互对骂好久才用纸板做的宝剑刺穿对手的身体。妈妈终于消气了，她从厨房或者从她卧室里出来，用比较平淡的口气提出新的要求，如：

“你没去过工厂吧。你应该去看看。托尼·索昂和我说过，是关于新机器的事。”

我回答说行。我不能违背托尼·索昂的意思，我说我会尽早去工厂的。

我知道她指的是美国制造的电子织布机的事。上星期货已经到了。看来真实情况是托尼·索昂在谈话中说过，如果我对新机器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厂里看看，他可以带我参观机器，不会有别的事情。她为什么禁不住添油加醋呢？

要是有一个观察家新近来到我和妈妈住的不好客的小天地，大概会对我们这种冷漠的母子关系感到诧异的。那是一种隐蔽、持续的战斗，一场争斗双方谁也不愿意首先发难的暗斗。她是出于对礼仪的尊重，不是因为爱我。我呢，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知道我有点神经过敏，容易冲动，控制不住自己的火暴性子。我发起火来就砸东西撒气。越是稀罕、贵重的物品，我越使劲砸、往墙上扔。就在前不久，我抄起一个心爱的瓶子——一件加莱[①]的料器，差一点砸伤看门人雷娜太太的孩子。几个孩子正在大楼的天井里玩游戏，玻璃瓶子落在他们脚边。瓶子是穿过玻璃窗落在院子里的。阴暗的

① 埃米尔加莱（1846—1904）法国著名设计家，所有他制作的料器和家具上都有他的签名。——译者注

天井里传来一阵可怕的喧闹声。雷娜太太的丈夫，一个矮小粗鲁的人，要去警察局告我。

这一切显得很遥远。我记得我小时候用水彩笔画冬天森林上的落日。当我一时找不着画笔、颜料盒时……马上就发起神经来在地上打滚。我大哭大叫直到筋疲力尽才肯罢休。后来有一次我发现我的抽屉被人翻过，我顺手抄起一把叉子对付妈妈。我曾经给一个女同学写过一首情诗。妈妈把那首诗搜走了，骂我坏蛋。事情几乎闹到流血的地步。我在气极了的时候，仿佛感觉撞在一堵墙上，同时又有一种冰冷愉快的感觉。我知道我这些怒气是怎么回事，一定是发怒能使我获得那种快感。最近几年这种发怒的情况明显地有所缓和。尽管我对素描、绘画的兴趣很快就淡薄了。至于诗，我一首也没有写过。

从大多数人理解的意义上说，我不认为我是一个正常的人。我懂得要是一个艺术家，一个学者，某学科的创始人得了神经病，被看成疯子或怪人，他们可以用艺术和创作作为托词。于是他们的荒谬行为注入了合理的因素，让人放心了。对于我，从来找不到这样的托词。我任何东西也想象不出来。我的思想，我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的感情贫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欣赏一副画要耗尽我的脑力，这是何苦来呢？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莫过于听听音乐，从中得到一些乐趣。从我碰见波拉·霍真时起，我就以此自娱。谈恋爱，我还是可以的，妈妈不大理解：

“可怜的菲立普，你在谈恋爱？你知道你的肚子开始大了吗？我不知道小波拉对你是怎么看的。”

前面谈到的那位观察家对我们母子二人的奇怪举止会揣摸不透的。这母子二人终于躲到荒凉的地方，摆脱一切物质束缚，保持沉默，捆住手脚无法解开那理不清的线团。我们从

来不能深入到事物的本质。是的，缄默不语是我们这所“修道院”的第一条规律。对一切事物保持缄默，有事无事皆缄默。原则的缄默，也许是自卫的缄默。妈妈从来没有对我说任何事情。我从来不觉得有权利问她。一切都是我暗中打听出来的。

我快要到四十岁了。我在想比我大二十多岁的妈妈会有什么感受。她的生日是十二月三十一日，所以她是十足的年龄。她仍然爱打扮，她从来不随便放置她的身份证。不过有一天，她的身份证从手提包里掉出来，我看见过。我知道她确切的岁数是65岁，她只说60岁。她是在25岁时有的我。到了这个岁数，她还有什么东西好追求的呢？她姐姐早已嫁人，她大多数朋友大概也都成家了。当然，这一切和我无关，这不是我的事情。可以肯定的是，我只在妈妈肚子里呆了七个月就出世了。我是个早产儿。这不光彩的秘密一直严守着。据说，医生们费了很多气力才保住我的性命。这近乎于奇迹。我在暖箱里一直呆到我的生命完全没有问题的时候。从几张我还记得的照片来看，那时候妈妈好像很爱我。

战争结束前，我父亲以英雄的面貌离开我们时，一切都变糟了。用妈妈的话说：“他像扔粪土似的把我们扔掉了。”她还说他，“跺跺脚就走了。”她总是这样责备他。她也这样责备我，她用憎恨的目光瞪我，以发泄对他的怨恨。

那是我们生活中最可怕的一个时期，比战争时期还可怕。她老是想死，我设法拦阻她。我们只吃到发霉的面包。然而已经用不着定量配给券了。面包房、食品店重新开始充分供应食物。她连酒也不喝了。她步履艰难，走不到自来水龙头跟前。我给她端去一杯杯水，她呷一小口歇一会儿。我又从她手里接过杯子。

那是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巴黎街头，人们砰砰地射击。圣·米歇尔滨河路码头和警察局之间射击声持续不断。有一些人举起双手从我们阳台下面走过。另一些人大概要洗雪五年的卑躬屈节和默默的通敌行为，唱着马赛曲游行。每条街上都有人唱歌。那时正是八月酷暑。天热得可怕，宇宙在膨胀。然而我们房间里阴暗、冰冷。妈妈还希望他会回来。她一直等着他。家里人不许我探头朝街上看，怕我中流弹。盖世太保仍然统治着人们的大脑，还有法奸，德军司令部的命令，第五纵队……总而言之，有数不清的理由禁止我走出大门。谢天谢地，我们有时能收到巴黎竞赛画报。我在这些杂志的照片上看见成堆的尸体和残肢断臂，所以明白情况远比我从客厅窗户隐约看见大街上的闹剧糟糕得多。巴黎解放后，家里人出于我说不清楚的某种害怕心理，仍然把我关在屋里。因为学校早就开学复课，我要跟不上班了。家里人请来一位绿眼睛女士贝尔丹小姐，她每天到我家来。她的任务是教我基础知识。她和蔼可亲极了。她除了教我读书、写字、演算之外，还教我用圆规画球、勾勒水仙花的精美轮廓，在花瓣上涂颜色。

英雄并不是突然间消失的。最艰苦的时期，即巷战之前的那些漫长、阴郁的日子里，他通常一走就是几个星期才回家。妈妈常对我说："他走了半个月了，下星期我们又能见着他了。"她很少有估计错误的时候。他从来不空着手回家。他给我们带回来黄油、蒜肠。很久以来，这些食品再没有从前那样的味道了。食品的味道一定和缺乏食品的恐慌有某种联系。妈妈估计落空的时候，我们只好等待。我们的食品橱空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肯定不会挨饿的，因为他安排好了，有陌生人给我们送食品来，足够我们吃到他回家。我们知道他始终关心我们。我们十分放心。他按照通常可以接受的

方式在暗中战斗。他在我们家庭里留下的空缺并不很显眼。他是我们头顶上的房梁。勒克莱尔师[1]和美军开进巴黎之前一个星期，他派人来告诉我们他永远不回来了。我们艰难的生活仿佛又遭到雷击。他果真再没有回过家。几个月里，他只给家里寄回几封长信。妈妈读信时泣不成声。他在信里给妈妈写了些什么话呢？那些信找不着了。我不问她，这事不便打听。

今天是星期六早上，妈妈还在她房里睡觉。我知道她没有拉起窗帘。我想象得出她睁着眼睛躺在昏暗之中的样子。昨天晚上托尼·索昂来家里作客。因为诸圣瞻礼节的关系，妈妈提前二十四小时请他一起小酌。托尼·索昂要到旺代什么地方去探望他年迈的母亲，要到他父亲安息的墓地蓝花岗石碑前献三株大丽菊。当然，他既不信神，也不信鬼。实际上，他在为他自己准备后路。他要回到故乡去退休。这是他应该得到的退休，他不愿给别人留下话柄。他讨好教士，捐助慈善事业。他渐渐变成了一个显要人物。在这儿巴黎人中间，他很不显眼。在他家乡，人们会把他看成一个正直、公道的人，一个有成就的人。对他来说，这倒并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这坏蛋靠阿歇尔工厂才得到这一切。他靠妈妈和我过着优裕的生活。

我对托尼·索昂是不公平的。他是我们家庭故事的一个组成部分。父亲离开我们时，把维尔纳夫勒罗瓦工厂留给妈妈了。我们厂过去、现在一直生产领带。收入足以维持生活。在战后两年中，我们的生活过得还很富裕。我们厂大批量生产三色领带，销路很广。妈妈曾经试图亲自管理阿歇尔

---

[1] 勒克莱尔（1902—1947）法国将军、战斗英雄，1944.8.26日随戴高乐胜利进入巴黎。——译者注

工厂。但当她因为悲伤过度身体受到损害时，便无力挑这个担子了。这时爸爸给我们派来一个得力的助手，就是托尼·索昂。"一个精通业务，值得信赖的年轻人，"这是爸爸写给妈妈的话。

爸爸没有看错人。托尼·索昂确实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他先帮我们巧妙地摆脱了税务部门的纠缠。因为，妈妈奇特的帐目引来多种捐税稽查员，就像糖招苍蝇一样。其次，我应该承认他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商人。多亏他，阿歇尔工厂引起国内外广泛的关注。我们向好几个阿拉伯酋长国、四个英国团体供应领带、衬衣、饰带及各色花边。总而言之，托尼·索昂已经成为我们不可缺少的帮手。

我并不是一直对托尼·索昂怀有敌意的。由于客观情况需要，他到我们家里时，大家都说他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他合乎时代标准。他高高的个儿（这一条标准什么时代都适用），褐色头发，稍胖一点。他脸庞宽厚，但是还算不上臃肿。他在街上走路时，女人都转身看他。她们平静、天真、随便地转身看他，也许她们感到惊奇，三十多岁的年轻人竟然胖得不成比例。那时候人们吃得很差，身体强壮的任何迹像都表明物质生活丰富，女人对此特别敏感。除此以外，他善于与人周旋、沉着坚定。他的自信、辩才使我折服。因为，除了在冲动的时候，我实际上是一个腼腆、谨慎的孩子。妈妈出外看病或治牙的时候，总是把我托付给托尼照管。他带我去维尔纳夫工场，那时候还不叫工厂。他常带着我穿过卢森堡公园。我们走到离大水池最近的售货亭时，他常给我买一样小礼物：一个赛璐璐小风车，一架小飞机，一个泡沫橡皮球。他和那女商贩说话时，她眼睛发亮。这种掩饰不住的赞赏之情使我以有他陪伴感到快活、自豪。说实

话，那时候，我很爱他。我记得有一次那女商贩问他跟他一起的漂亮小男孩是不是他的孩子。他回答她说不是他的孩子，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用我听不懂的暗示语气说的），也可以说是他的孩子。他们两人都笑了。我觉得很窘，同时也很得意。因为把托尼•索昂看成是我的父亲，我并不生气。我把一个孩子心里藏着的敬和爱的需要转移到他身上。我和他穿过公园，到瓦万街一个车库里乘坐他的汽车。有时候，我们乘坐出租汽车去维尔纳夫勒罗瓦。因为卢森堡公园站的地铁只通到马西——帕莱索。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好地聊天。

我还和他一起去视察工厂的车间。妈妈要求他让我了解企业领导的工作。我感兴趣的却是当我们走过女工一排排座位时，她们对我抚爱和给我糖果。

托尼•索昂在女工中间的名声很好，俨然是一个热忱、和蔼的企业家。他看着她们干活，收集她们的所有意见。根据他的命令，某台机器变换一下位置，或被更换掉。只要发现任何一点异常情况就要检查或者检修安全装置。大家爱戴他。他有巨大的影响。这可以从女工们脸红、羞答答的表情，或亲热大胆的举动中得到证实。他待人接物和蔼可亲、文质彬彬，只要他和她们说一句话、对她们微微一笑，她们就高兴得不得了。为了企业的顺利发展，他把这个起协调作用的角色演得出色极了。她们称乎他“经理先生”。谁也没有授予他这个职务。也许是他的秘书莱莉蒂埃小姐办公室门上有经理室几个大铜字，大家才用这个称呼的。女工之间用心照不宣的口气互相说“托尼先生”，或者甚至说“漂亮的褐发青年”。托尼用这种办法维持女工之间的竞赛，用同样的办法维持纺纱车间和缝纫车间之间的竞争。女工们都希望得

到托尼先生的垂青。某些女工甚至希望得到他本人的宠爱。因为漂亮的托尼在工场里确实会适当地使用他的魅力。虽然她们心里不平静，工场里却呈现出一派安宁的气氛以及生产率明显提高的效果。

确实，托尼身上并非一切都是伪装。女工在日常生活中碰到的任何一点困难，他都不容许下属掩饰或者掉以轻心。企业的内部规章要求每个女工向他详细陈述妨碍她专心完成任务的烦恼。他的聪明、才智都用在妥善解决工厂和女工利益的问题上。由于实行这些父道主义的方法，阿歇尔工厂的职工迄今没有举行过罢工。尽管工会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是没有取得任何效果。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之交，托尼·索昂召开过几次季度会议，厂领导和职工参加了会议。妈妈认为他走得太远了。企业的管理用得着职工参加吗？可能会出现权限混同的危险。照他的看法，权力问题是次要的，首要的是信任问题。只有职工在给企业干活能得到好处时，企业才能从中获利。他的主张是对的。经验每天都在证明这一点（经验仍在证明）。生产维持在形势要求的水平上。如果要提高生产，工人无不乐于效力。如果需要缩减生产，工人接受调整工资，变更工作时间。在这些季度会议上，企业的财务盈亏状况、市场前景、产品销路陈述得一清二楚。这些产品的创造者及设计者参加讨论，提出批评和建议。工资水平、工作时间、方法、生产节奏和赢利统统放到桌面上大家讨论。大家知道一项革新即使定下来了，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投产的。托尼心情愉快的时候，把这一套方法称之为托尼体系。这是一个正在发挥作用的体系。该体系的发明人毫不犹豫地透露他个人收益的总额。照他的看法，工资是建立在等级制度上的。级

别和工资是按能力大小和职务高低确定的。工资的数额必须保证职工及其家属的生活，不要让他们陷进不可克服的物质困难之中。社会保险带来的进步基本上没有改变托尼体系。此外，托尼·索昂并不认为他的任务有多么复杂。他断言他有时要挑起难以承担的精神重担，负担法律上的责任。要是他个人承担这些风险，职工就可免除这些风险。全体职工都赞同他的原理，我本人也认为他的体系并非欺人之谈，也不是蛊惑人心的宣传。

妈妈不承认她有65岁。她会有些什么想法呢？我一点儿不知道。她从来没有和我谈过她自己，她不是那种容许别人刨根问底的人。我呢，我好像一株无根的草，悬在空中，超脱于时间之外。

由于机缘凑巧，我揭开了帷幕的一角。我耐心地听到一些片段的谈话。我就这样东拼西凑的凑出她的身世，从而搞清了我的来历。并不是我冒失，这本来是我有权利知道的事情。说实在的，我知道的东西很少。

外祖父母活的岁数不大。用妈妈的话说，“他们的寿命不长。”外祖父是个裁缝，外祖母是他的帮手。他们从图卢兹流落到阿尔芒蒂埃尔。他们在那里开了一家前店后厂的服装店，制作蓝底灰条子西服。服装店很大，店里有陈列厅。店里到处堆放着卷在厚纸板上的各色料子。有两三次（我去的次数不多），店员让我在像镜面那么光滑的橡木柜台上滑行。女徒工们在车间里干活，说是车间其实只是一个半明半暗的通道。外祖父用深色和浅色画粉按照样子熟练地画出线来，然后用裁缝剪刀剪深色料子。有一些先生来量尺寸。另一先生或是来试样子或是来修改衣服。外祖父跪在地上，手里

拿着他叫“软尺”的皮尺。他拉开皮尺量顾客的肩膀，顾客冷漠地看着天花板。接着他量裤裆到地面的长度。我觉得很奇怪。当外祖父给我量尺寸，让我试一件海军服时，我感到难受极了。那时，我约摸六岁。

外祖父身材高大，爱说爱笑。他瘦削的前额上耷拉着灰白色的头发。

车间后面是一排昏暗、有很多扇玻璃门的住房。外祖父躲在帘子后面掀动帘子。我在另一边猜他玩的把戏。每次玩到最后，我们总是追来追去喧闹一场。外祖母要我们立刻停止，她说我们吵得她头疼。

外祖父患有顽固性便秘。有些日子他的脸色发黄，有些日子他的脸色发灰。有一天早上，家里人叫不醒他。医生说他血液中毒、肠梗阻。外祖父那时还不到62岁。他的死使我懂得了期望某种形式的永恒生命是一种幻想。

一个冬天的下午，服装店关门停止营业。放置上过釉的纸板模特儿的橱窗拉上了栅栏。模特儿脸上笑容可掬，头发柔软光亮，姿势滑稽可笑，大部分都穿着外祖父缝制的衣服，在菱形幕布后面禁止的舞台上演一出影子戏。

外祖母的性格和外祖父不大一样。她胖胖的，面色红润。她很可爱，但是有时候却相当严厉。教育孩子就是这样。她讨厌喧哗吵闹，即使最天真、快乐的嬉戏也不例外。所以她爱动手打人。她身着灰色衣服：料子质地考究、漂亮、光滑。领子、袖口上都装饰着花边。她说话少，看书很多。她也管帐，但是她手里或口袋里总有一本小说。她每天夜里看书看到两点钟。她喜欢的英国作家有弗吉尼亚·伍尔夫、杜莫里埃、奥尔达斯·赫胥黎、乔治·奥威尔、爱德华摩

根·福尔斯特①；她喜欢的法国作家有皮埃尔·伯努瓦、乔治·杜阿梅尔、罗歇马丹·杜加尔②。这样拼命读书损害了她的视力，也损害她的脑子。她的血液循环系统及整个身体都垮了。读书、熬夜使她的身体日渐衰弱。外祖父去世后八年，她也相从他于地下。这一次她是患脑充血。她受的罪比外祖父多得多。她先是上半身瘫痪，声带受到损害。她的嘴唇老是战栗，发不出声音来。那些认为死在医院里是可耻、堕落的成见，家里人都顾不得了，想把她送到医院里。因为附近的诊所设备简陋，连最简单的手术都做不了。所以家里人把她送进一家大的医疗中心。妈妈和她姐姐吉赛尔都用不着自责。一天夜里，外祖母就这样死在很远的地方，身边连一个熟人都没有。后来的仪式，我一点印象也没有。那时候我大概快14岁。也许妈妈认为用不着让我参加那些仪式，或者那天她完全把我忘了，这也是说得通的。

整整几天，妈妈眼睛都是红的。妈妈拒绝戴孝，因为只有乡下人还戴孝。反正我们从来不出大门，戴不戴孝还不是一回事。

我现在还记得，外祖父母忙于生意上的事情，顾不上照看我。总之，我和他们接触的机会不多。

姨妈吉赛尔死于癌症。我对她十分敬慕。她美丽绝伦，嗓音清脆……她比妈妈大两岁，嫁给地方上一个小企业家。她生了三个孩子，他们都默默无闻。姨妈是瓜子脸，五官端

① 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杜莫里埃（1907— ）以《蝴蝶梦》闻名；乔治·奥威尔（1903—1950）；爱德华摩根·福尔斯特（1879—1970）。——译者注

② 皮埃尔·伯努瓦（1886—1962）；乔治·杜阿梅尔（1884—1966）；杜加尔（1881—1958）。——译者注

正。她是自然的深颜色皮肤，她高高的前额圆润光滑。她的眼睛或是深沉或是笑吟吟的，好像两个清新的深色湖泊。

她的嘴大、嘴唇厚，对我说的全是愉快的话。即使她责备我时也不例外。我觉得妈妈身上缺乏的东西她都有。后来我把炽烈的感情转移到她大女儿——我表姐伊雷娜——身上。这种感情至少保持了一个夏天。从相貌上说，伊雷娜酷似她母亲项链坠里的玉照。然而她是一个硬心肠的姑娘。有一天，这位既像劳洛勃丽吉达又像依丽莎白·泰勒①的表姐骂我是笨蛋。她还扬言说我在她庆祝18岁生日的家庭舞会上烦得要死，说我不配去公共场合。这是实话。我感到受了莫大的羞辱。为了报复，我扬言说她永远比不上她母亲。这也是实话。后来伊雷娜嫁给一个爱好打猎、打网球、嗜饮劣酒的粗鲁家伙。她给他生了一大堆孩子。我想象他欺骗了她。我並没有因此感到特别高兴。我很难想象今天她已经是一位45岁的老太太了。

妈妈和姨妈之间从来只维持着一种适当的关系。凡是她们两人有差别的地方都是姐姐占上风。这使妈妈隐隐感到不快。这一点没有逃过我的眼睛。

妈妈年轻时，头发近乎于金黄色。她圆圆的脸，五官端正，下巴略略向后缩进去。她的身材比吉赛尔矮小。总之，从体形上讲，无论是整体还是各个部位，姨妈都占上风。差别不仅仅在相貌方面。吉赛尔的丈夫和蔼可亲、多情。战争期间，他在东普鲁士当了俘虏，被送到一家罐头工厂做工，产品运送给俄国前线的德国将士。这家工厂里发生过种种破坏活动。姨父几乎没有逃脱党卫队的报复。他和英雄——我的父亲——不同，他回家了。他重新掌家，管理工厂，使他的工

① 前者是意大利女电影明星，后者是美国女电影明星。——译者注

厂蒸蒸日上。妈妈对她和她姐姐之间的这些差别耿耿于怀。她不能原谅她姐姐的首饰、皮衣服，会旅游，去海滨，有乡间别墅，还不说在当地上流社会的声誉。两姊妹走动得越来越少，最后终于断绝了来往。我最初的、不可告人的失望心情就是从亲戚间的小纠纷引出来的。难道在我心里占据着崇高位置的妈妈竟会有这种可耻的嫉妒心理吗？

托尼·索昂曾经是我长时间钦佩、爱戴的人，我怎么会对他心存芥蒂，甚至怀恨起他来了？有时我也责备自己。是不是因为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我和妈妈的一切都是靠他的能力、才干得来的，我时不时感到内疚：从战后那几年到现在，我们过着近乎于奢侈的生活是多亏他。有些人觉得现在生活困难，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从前的艰难岁月。对忧心忡忡的妈妈来说，他如同自天而降的救星。她知道如何对他表示感激之情。也许我也应该向他表示我的谢意。她要证明什么事情的时候常说："要不是你父亲给我们派来托尼先生，我们不知道要落个什么下场哩！"或者说："我们要不是有托尼先生帮忙，真不知道你母亲会跌进什么样的深渊了！"她像车间的女工一样称呼托尼先生。后来她干脆叫他托尼。

我应该承认托尼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那种利用他在我们家举足轻重的作用来攫取过多权力的人。他为人精明、颇有分寸；不会冒着失去我们信任的危险去贪图眼前的利益。他采取审慎行事的策略。他以良师益友的身分对待我，接着渐渐以被推定的父亲身分对待我。妈妈承认他的身分，而且很快就授与他这个职责，"既然这孩子再见不着他父亲了。"最初我觉得这局面对我有好处。我充沛的钦敬感情需

要有所寄托。托尼·索昂长时间巧妙地支配过我的感情。这个桥头堡建立起来之后，妈妈就听任他摆布了。素来忧郁、愁闷的妈妈以为在他身上能找到她需要的爱情。

他用这一套手腕取得的最初成功基本上瞒过了我的眼睛。我只记得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有时候使我很窘。他们有时和少数几个朋友关在客厅里狂舞乱跳，我只听见传出来的喧闹声。当托尼和妈妈习以为常地关在卧室里时（拉插销、上锁的声音仿佛还在我耳边响着），这不受欢迎的人的身分叫我难以忍受。我本来会承认我母亲从他那里得到我父亲拒绝给她的快乐。使我反感的是她和他（不知道究竟要保全什么面子）都不肯名正言顺地来往，把我撇在一边使我蒙在鼓里。我一天比一天明白我受骗了。他和我谈起她时说“你母亲”，他和她说话时客气地称呼她阿歇尔太太。当他以为我在远处听不见他说话时，就叫她吉内特，好像他们是青梅竹马的朋友。

仅仅就他敢亲热地叫她的名字、把她的名字据为己有这一点，我就有遭抢劫、受侵犯的感觉。吉内特，吉内特……我只能在夜深人静时呼唤这个名字，除非公然违反礼仪。今天，年幼的孩子对父亲或母亲直呼其名的情况并不罕见。只有老一辈的人或者受过刻板教育的人对此不大习惯。在公园里、露天咖啡座……每当我听见孩子叫父母亲的名字时，总是十分激动。我羡慕那种随随便便的关系，那种在一个人的地位、职务确定之前先得到承认的权利。娘家姓拉卡兹的阿歇尔·吉内特从来只许我叫她妈妈。

我和托尼·索昂之间的关系是在他教训我、干涉我的初恋时（我知道他并不能以身作则）破裂的。他得到妈妈的支持。那时，我15岁。这是我第一次试图识破一个盎格鲁撒克

逊作家称之为女人的奥秘的尝试。我完全不是一个厚颜无耻的人。虽然我在生活上不尽如意，我还不至于采取那种态度。事实上，我对爱情上的事一窍不通。

我常常到阿歇尔制作车间去见习，我在那里转悠，没有具体工作。因此，我有空闲时间结识一个姑娘。她母亲是我们厂里的缝纫工。那姑娘14岁，她叫西蒙娜。她长着一头褐色头发，红红的嘴唇很丰满，我恨不得咬一口。

西蒙娜在郊区职业学校学习。她在那里学习烹制各种食品，用袜底板补袜子的许多种方法。换句话说没有学会什么像样的手艺，很难在这个虎视眈眈的社会里挣一口舒心饭吃。放学后，她到阿歇尔工厂来接她母亲。托尼·索昂答应她在工人下工之前这段时间让她在档案室里学习。她在那间屋里复习菜谱卡片（也就是她的功课），她的眼睛黑得发亮。档案室的门是朝走廊开的，那儿从来没有人经过。从狭窄的夹丝玻璃窗透进室内一点微弱的光线（十月份起室内光线很暗）。雨水在窗玻璃上留下绿、黄色的条痕。这一切我全看在眼里。我认为到这间僻静、愉快的屋里和西蒙娜作伴是极其自然的事情。

我们谈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计划，谈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茫茫前途。这些谈话，我一点也记不得了。

我在西蒙娜身上爱的是我自己。我的意思是说我爱的是我认为我身上萌发的那种吸引人、诱惑人的特性。我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这位天真的姑娘的目光使我感到我身上有一种新的力量。我感激西蒙娜，她给了我一种幻觉（她并不一定是有意的），仿佛是我发现了她那易激动、变化无常的特征：沉默、控制住的冲动，突然表示亲热，连连亲吻，热烈亲吻，满怀激情地倾诉爱情；当我伸手摸她身体上对我

尚有保留的部位时，她又避开了。虽然我有强烈的欲望，还是不愿意强迫她干她不愿意干的事情。我满足于闻她有柠檬气味的皮肤。她对我的盲目信任使我感动。由于冲动、性急，我有时候几乎要辜负她的信任。我觉得她有所戒备，同时又觉得她脆弱。换了别人也许会以为她是很容易到手的猎物。对我来说，她不是的。今天，小伙子和姑娘说不上三两句话就在一起睡觉，人们再也体会不到易洛魁人[1]调情的激动和乐趣了。

车间的顶楼上有一个房间，临窗是镀锌旧屋顶。这间房间从来没有固定的用途。我毫不费事就要来这间房，在里面读书（我是一年级学生）、画画。我绘画有一点天赋。顶楼房间从气窗得到光线。有一扇门通到屋顶。可以从一个狭窄、陡峭的梯子爬上顶楼。因为我没法带西蒙娜到家里去，所以我和她决定在我们称之为“小房间”的地方幽会。我搬进去一块木板和一个三角架当课桌用、几本书装装样子。西蒙娜帮我抬上楼一个长沙发、两把低安乐椅，都是从蒙特勒伊跳蚤市场买来的。每个星期天，我们在那小房间里会面。下午，我们在黑暗的电影院里或者在奥尔良门一家酒店里度过几个小时。晚上我们爬上顶楼的小房间里。我们在房里手拉着手，互相看着一直呆到半夜。

我们长时间相互注视、接吻、抚摸的时候，我感觉身上涌起一股股猛烈的热流。我们分手之后，我身上出现过热流的部位还觉得难受和抽痛。西蒙娜完全不是一个卖弄风骚的姑娘。不过，越来越明显她也感受到和我同样的欲望。只不过她的欲望比不上我的欲望炽烈。或者说她比我善于克制、

---

① 北美洲印第安人部落，繁文缛节很多。——译者注

控制她的欲望。我们两人的爱情新奇而真实。我们不想用海誓山盟互相欺骗……我们随着穿过我们生活的波涛飘流。有时候，西蒙娜的自信心倒像是麻木不仁。我们的爱抚就更加热烈了。

星期天到星期一夜里，我们索性不回家了。一整夜，我们就在小房间里度过，这个新情况引起了注意。妈妈不赞成。她说我年龄还小，不要交女朋友，不要涉足……以及诸如此类的话。我不能和姑娘们来往，只能一心想着学业。她说姑娘两个字时，很明显她克制着没说坏姑娘这个词，因为她还不明白事情的真像，还不知道是什么人。此外，她大概觉得这问题很快就能得到解决，不愿意把事情弄僵了。当我公然不理睬她的叮嘱时，她的真实动机就暴露出来了。她先发了一通脾气，抓起几样东西朝我扔过来。她的脸色变得狰狞可怕，接着她说出了她的真实思想：

“你爱上的那位小姐是一个破烂货、婊子、娼妓。而且她是工人家庭出身。你这样胡闹能继续上学吗？”

妈妈给我筹划了医生这个职业，或者至少进高等商业学校。她骂的那些脏话引起我本能的反感。我的自尊心受到刺伤。我对西蒙娜的眷恋之情反而加深了。我第一次体会到可恶的阶级仇恨观念恰恰在我最意想不到的地方表现出来。其实我的这种观念比较淡薄：我母亲这位慈祥的化身竟然会反对一个完全不懂得蔑视为何物的人，我完全不在乎她的出身。“娼妓、贱货……”我简直不相信这些肮脏、轻蔑的字眼是从她嘴里说出来的。她对礼仪一向是很注重的。

妈妈甚至连我和西蒙娜的关系都不想弄清楚。告诉她我和西蒙娜只限于接吻、抚摸是徒劳无益的。她不会相信。她认为我已经变成了小嫖客、色鬼、堕落的人……然而事实恰

恰相反。不错，我和西蒙娜一夜一夜躺在小房里的长沙发上，不过她从来只让我摸她的乳房。她紧紧拽住她的尼龙衬裤，我想脱下她衬裤的种种企图都失败了。我不愿意强迫任何人，这不符合我的个性。在西蒙娜方面，她只摸我的脸颊、我的上身、肩膀。好像她这样抚摸就很满足。我们的嘴唇结合起来，我们互相吮舌头。我们的亲密关系就到这一步。怎样对妈妈说呢？我说不出口。今天，这样扭扭捏捏的态度似乎可笑得很。就算妈妈相信我说的话，她一定会觉得我们的行为荒唐可笑。

由于我装聋作哑，妈妈向有心计的托尼·索昂求援。她对托尼不是言听计从吗？托尼不是以处理事情迅速著称吗？托尼不是处理棘手事件的干才吗？妈妈委托他突破我的防线。妈妈要我找他。其实妈妈一点儿耐心都没有，她把全部时间都用来等待消耗她生命的说不上来的什么东西上面，她连一个小时的时间都抽不出来。她不可能和我说话。我也得承认训斥和说教丝毫改变不了我的意图，也丝毫改变不了我的行为。

我要到托尼·索昂的办公室去接受他的训斥。办公室离西蒙娜等她母亲的那间房很近。我"出庭受审"显得滑稽可笑。我本来可以不接受他的传唤。但是一开始就对我进行过威胁。妈妈对我说："我劝你还是去一次为好！然后我们再谈。"因为有希望和妈妈谈话，我才拿定主意。

托尼·索昂让我在他秘书的办公室里等着。我更觉得这情景可笑。我应该为莱莉蒂埃小姐辩白一下，她努力自然、友好地接待我。她真诚、殷勤，十分娇媚。当我走进托尼·索昂办公室时，我快要气疯了。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时候很像我母亲。他脸上露出一丝微笑，招呼我坐下，随即又埋头看他

面前的一堆文件。我一进屋就明白他们要演一出奚落顾客的戏。他给莱莉蒂埃小姐打电话，请她注意不要让别人进来打扰我们。他交叉起两手，拨弄手指头，默默地看着我，摆出通俗喜剧中受骗的父亲的神态。他还没有开口，我已经气得不得了，特别想哈哈大笑。我和他，我们这场蹩脚戏究竟要怎样收场？

"您的样子真滑稽！您要是看……"

我这句话几乎是脱口而出的。我大概想把事情处理得轻松一些。托尼过于认真。我看见他皱起鼻子，眼睛里闪着浅蓝色的光。他脸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他像看一个贫穷的债务人、一个同行的竞争者或者一个税务员那样看着我说：

"我可以做你父亲。"

我反驳说：

"可惜您不是我父亲。"

调子定下来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记得很清楚。托尼的克制的语气。他执意说服我他只是尽他的责任。我父亲没尽到责任。他不是谴责他。他没有儿子，他要把我看成他的儿子，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他的眼睛像四十层楼上的窗户，里面闪过片片灰色的阴影。这些阴影使他的眼睛失去了光彩。

我处在被告的位置，并没有听见有人向我宣布罪状，再加上他那一番显得诚挚的劝说，这一切使我气往上冲。我不够精明，辨不出真假。他身上穿一套灰设得兰①料子的西服，系一条浅蓝色领带，闪亮的圆领结处在我的视野中央。我已经不回答他的问话。他的怒气也在悄悄地上升，同我的

① 设得兰是一种毛料。——译者注

怒气来得一样快。他说西蒙娜和我们不是一个社会阶层的人，她没有受到完全的教育。我上过路易·勒·格朗中学。照他看，这个差别是无法缩小的。他说我和她之间不是程度上而是本质上的差别，我不可能指望和这姑娘建立任何持久的关系……每天都有经验表明大多数文化水平不相称的婚姻都是以悲惨的结局告终的，家里人深受其害……

托尼仔细掂量他的每一句话，好像要把和我可悲的处境最有关的论据从脑子里一一发掘出来。他的诡计骗不了我，但是我仍然感到很不自在。我和西蒙娜从来没有任何建立家庭的打算。我们只是过一天算一天。托尼·索昂的话使我非常反感，我觉察到他话里有说谎的成分，想逼我就范。不过我仍然闷不作声、毫无反应。他终于谈到也许是妈妈最担心的事情：

"我不知道你和西蒙娜姑娘能……嗯，你明白我的话吧？这事应该立即停止。"

是的，可能会带来一些后果……是的，我可能会败坏那姑娘的名声。她虽然出身贫寒，她也有她的前途。纸里包不住火。有些人就是喜欢说闲话、诋毁人。一旦人们有理由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对我母亲、对我、对她都会造成很大的困难。因为他也许不得不把西蒙娜送到国外去。那得花费很大一笔款子，目前我们无法筹措这笔钱，还不说和这种事情固有的诉讼风险。在这个问题上，我很难说他有错。我的学业刚刚开始，怎么能轻易拿学业当儿戏呢？再说，浪费精液等于浪费生命，且不说我们对西蒙娜的情况一无所知，看来她不是人们认为的那种人……她会不会传染给我什么病菌、病毒或者螺旋体之类的细菌呢？当然，发生这种事情的可能性极小。既然我从几位杰出的教授那里清清楚楚知道福楼拜、莫

泊桑的惨死……波德莱尔变得痴呆、不停地"骂娘"，我何苦要去找这个晦气呢？

在我清清楚楚听见上面这一番混帐话时，我脑子里闪过另一些画面：西蒙娜浑圆的胳膊，她那金黄的圆胳膊仿佛搂住我的脖子……在昏暗的小房间里，她的嘴对我喁喁低语。……

托尼·索昂的戏演过火了。这出可笑的喜剧也应该收场。我气得两手冰凉。我抄起带底座的墨水瓶，朝托尼脸上扔去。他气得眼睛煞白，好像一条等着挨揍的狗。墨水瓶是战前制造的产品，是用大理石和青铜制作的。墨水瓶向文件柜飞去，墨水瓶离开底座砸在托尼·索昂左眼上方的额头上。一道黑血从他脸颊流到鼻子旁边。他愣着一动不动，他的嘴巴痉挛性地收缩。他一声不响，呆呆地坐在椅子上。我已经站起来整整衣领。我没有向莱莉蒂埃小姐打招呼就走出办公室了。托尼·索昂整整六个月没有和我说话。

在这段困难时期里，妈妈显得非常苦恼。她的双重失败使她极容易动气。我没有妥协。这一次托尼·索昂的才干没有施展出来。

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我和西蒙娜的关系有了变化。我们采取速战速决的策略，幻想用生米煮成熟饭的办法使他们无法把我们分开。我不用央求她，她就答应了。她出了一点血，似乎没有丝毫快感，我也没留下什么印象，不过我们又试过三、四次，仍然没有得到更多的快乐。

一个星期天早晨，我和她半睡半醒地躺在长沙发上，沙发的弹簧硌着我们的肋骨。托尼·索昂冲进车间。他们的行动是预先协商好的：只有进攻才能决定战争的进程。我们听见开门的声音、他们说话的声音。他们并不曾想压低声音。他们有把握捉住我们。妈妈大喊大叫，挖苦人的劲头比今天

稍逊一点。

“上楼！他和那娼妇在小房间里！抓他们去！”

妈妈读过杜莫里埃，保尔·布尔热的书和“剑刃”①……所以她用的词汇和情景十分贴切。

我跳下地，推醒西蒙娜。她睡眼惺忪地站起来。我把当床单、被子用的流苏床罩裹在她身上，把她推到镀锌房顶上的烟囱后面。我重新躺下，装出睡熟的样子。房门被推得摇摇晃晃，终于被推开了。

“这个，这是什么？”

妈妈拿起西蒙娜的乳罩在我鼻子底下摇晃着说。

“可怜的菲立普，你比我想象的还要蠢。不过你用不着害怕，我们不会到那位小姐藏身的地方找她去的。她不配。你记住。这出喜剧结束了（说得不错，我们正在演费多②的喜剧）。我和索昂先生决定向你要回车间的钥匙。你说得不错，小房间，甭想了。只要小房间确实用来温习功课，你稍微在里面看看书，我们可以让步……但是这儿明摆着变成窑子了。”

她把我的罪证——乳罩——扔在沙发上，他们就下楼去了。

托尼始终在场，他脸上露出害臊的父亲那种心照不宣的神情，表示同意。他没有说话。我既为我母亲说的“可怜的菲立普”的轻蔑语气，也为她在我面前骂出的脏话感到痛苦。不过，我很清楚，她摆脱不掉那些她叫做“猥亵淫乱行为”的烦恼……

我再见不着西蒙娜了。因为她再不去厂里接她母亲了。她拒绝去我们定好的约会。厂方对她母亲施加过压力，她叱责

---

① 布尔热（1852—1935）法国小说家。——译者注

② 乔治·费多（1862—1921）法国剧作家。——译者注

过她女儿。我多次试图找到她，我甚至到有很多灰色营房的远郊区她家里找过她。她母亲是一个声音悦耳、身材矮小的腼腆女人，她告诉我她女儿很少回家。她找到新的工作。她劝我最好不要想办法找她。这对她、对我都有好处。她对我说西蒙娜不愿意继续和我来往。再说，她就要订婚了。

妈妈取得了全线胜利。

“是在谈恋爱，”我带搭不理地向妈妈承认说。是恋爱。不是恋爱。我说不清楚。我不能作出肯定的回答。我只想说实话。实事求是地说，我应该承认波拉·霍真在我心里占据的位置、时间比任何人都长久。至于说她对我的感情，我丝毫也不怀疑。我怎样想就怎样说，平静而有分寸。我知道平静和分寸是小资产阶级的平庸情调。波拉·霍真也知道我想些什么。她对我没有误解，我对她也没有误解。我们不是一起去迎接爱情的风暴。没有那种从狂热的想象中或无知中产生的惊跳。对我来说，和西蒙娜和别的几个女人的交往已领略了其中的奥妙。

从我们认识以来，我们没有觉得有必要讨论持久的爱情或专一的爱情这种讨论不出结果的问题。我们对我们的爱情天天相互作适度的保证。有时候，我们的关系似乎很平淡，所以也有点厌烦，仿佛我们在一处景色平淡的地方旅行。好处是从她到我，事情都很简单，心照不宣。我们有这种本事，两人在一起默默无言地呆几个小时，既不觉得烦闷也不觉得难受。尽管我们的以金钱为标志的社会地位十分接近，我们仍然相信意气相投。

我们最近一次一起散步（在蒙苏里公园，我们在那儿给鸭子撒过面包屑），围着儒尔当大道上那座破败的东方亭子

转圈时，波拉·霍真对我说："我和您，我们一定得考虑一起干点什么事情，不管是什么事情，我相信一定会有好处的。"我回答她说行，我回答她说我不怀疑她是对的。

我和波拉互相用您称呼，即使是、特别是我们做爱的时候也是这样称呼。这不是一个礼貌问题，而是一个自由、享乐问题。今天，年轻人一见面刚交谈几句话，就你呀你呀地称呼起来。

当我抚摸波拉·霍真深色的肩膀，当我把手伸进她的乳房中间，当我把嘴唇从她的眼皮、乳房移开问她："您愉快吗？您和我一起幸福吗？"时，我们快活得透不过气来。有时，人们似乎会陷进平庸的时间里，我们轻而易举就摆脱了它的束缚。我们之间的明显距离反而使我们肉体的结合更加奇特、不合常情。相互称呼你反而会失去给予对方充分、正确地位的能力。

我是在恋爱吗？当然，妈妈很快就猜出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不能向她保证她用的这个词是否准确。我们回到巴黎以来，我们的生活和从前不一样了。我晚上外出，有时甚至下午外出。几年来，除了托尼·索昂之外，我们不招待任何人在家里吃饭。波拉和妈妈谈了一阵。她们只谈了一会儿闲话。就在那天夜里我们睡觉之前，妈妈对我说："这姑娘不错，比我原来想的好。你笨手笨脚、不懂人情世故，我希望你不要失去她，你注意点。"我很高兴波拉·霍真博得妈妈的好感。

在过去，这种事情可不像现在这么容易。前些年，我曾鼓起勇气带了几个姑娘到家里来见我母亲。其中肯定有几个是处女。由于妈妈冷冰冰的态度，那几个倒霉蛋后来再没有来过。妈妈认为她们都是圣·日尔曼或蒙帕纳斯区的酒吧女

郎。我只好租一间房、住小旅店，偷偷摸摸地活动，尽管我讨厌这种做法。但我违抗不了妈妈的执拗：她非要生活在伪装、谎言之中，还要把我拖进去。我处在既可耻又可笑的处境之中。有一次，我不得不和其中的一位小姐到郊区一个围着破铁丝网的墓地上成其好事。我们头上顶着银白色的月光，前面是附近大楼闪烁着蓝色光晕的窗子，脚下躺着死人。我们在这种地方做爱很不是滋味。那姑娘一直在哼哼，不是因为快乐，是因为害怕。每当我鼓起劲要满足更不可靠的欲望时，她就问我："没人来吧？你看清楚了没有？你听见什么声音没有？……"此情此景，好梦难续。我们只好败兴而归，搭头班公共汽车回巴黎。

在格朗奥古斯丁滨河大道上行驶的车辆开始减少了。圣·米歇尔大道人行路两旁的办公室、咖啡店、商店、服装店开门了。人们在工作。人们在为生活忙碌。黑夜过去了，城区恢复习惯的样子，这是最安静的时候。妈妈还在睡觉。这并不奇怪，昨天夜里他们聊到很晚，托尼·索昂凌晨三点钟才走。我听见他带门的声音。他们之间还有什么事情好谈呢？难闻的雪茄烟味一直飘到我床底下。我得下决心换换房里的空气。

从前，托尼·索昂是个美男子，头发上抹着发蜡，很有风度。周末，人们在水边或者在歌舞晚会和舞会上能碰见那种美男子。他和妈妈本来可以结成一对惹人注目的和谐夫妻。但是他们却鬼鬼祟祟地来往，像得了见不得人的病似的。

昔日卢森堡公园里的女人扭头注视的那位美男子托尼，今天已经是一个大腹便便、有些秃顶的平常人了。回想他由

青春期到衰老期的变化过程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我知道我确实不够宽容。在智力方面，他还能给人以假像。"我身体保持着原状"，他喜欢把这句话挂在嘴上。他不停地抽难闻的麦加牌细雪茄烟。门房和银行职员都喜欢抽那种烟。烟灰落在他背心上时，他都懒得用手掸掉。他气短，他在楼梯口按门铃之前要先喘喘气。他的前景可以想见。

当托尼·索昂来家里陪妈妈消磨一个晚上时（比如这个星期五），他们配制各种药酒。似乎他们既要保养身体，又不放弃无忧无虑的青年时代。那些闷闷不乐的晚上，他们互相说些什么话呢？说真的，我一点儿说不上来。我想不出他们有什么话好谈。妈妈不告诉我她的心里话，她从来不对我说心里话。我没有站在门口偷听的习惯。虽然我对这问题没有多大的兴趣，我想象他们谈的是托尼退休后阿歇尔工厂生产管理方面的问题。他们不征求我的意见。他们是对的。我是一个碌碌无为的人，我意识到了。妈妈和我的看法一致。我觉得我干不成任何一件特别的事情。这不是一个智力问题。我在路易·勒·格朗中学时，数学、物理成绩都是优秀。凭这些优异的成绩，我可以敲开医学院、商业学院的大门。但是我连试都没试就放弃了。妈妈说我天性懦弱。"你不像你父亲，"有时她加上一句。

对于管理工厂，他们不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高等学校的毕业生有的是。我们只要在费加罗报、世界报、法兰西晚报上刊登一则招聘启事就行了。"服装厂拟招聘管理人员，年龄30—35岁，持有商业经济文凭，懂英语、德语、西班牙语者皆可应聘。职务：经理。最低报酬：30,000法郎×13＋分红＋津贴。"应聘的人会络绎不绝。我们只要从他们中间挑选一个我们中意的就行了。我们？我是说最后由托尼·索

昂拍板。像过去一样，妈妈只相信他的话。她也许会要求最后一个保证：派人到我父亲藏起来的地方征求他的意见。我看出来会这样办的。我们将看见一个看起来很年轻、有轻度胃下垂的人来应聘。这人穿一身庄重的深色西服，配上合适的袜子、领带。他手里提一只[illegible]带的黑皮公文包。他那洒脱的气派给妈妈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一上任就提出革新方案。这将是最微妙的时刻。我们将研究他的方案，接受他的某几条建议以便更好地反对他的其他大部分建议，不致挫伤他的积极性。他会比较满意。晚上，他回家时会骄傲地对他妻子、情妇说，“亲爱的，你知道，我在这个工厂里能够说得上话……”他相信他能说得上话（我像碌碌无为的人那样喜欢挑日常用语的毛病，这是一种无伤大雅、排解怨愤、失意的消遣）。他将为企业的发展兢兢业业工作。我和妈妈将继续得到我们的红利，继续无忧无虑地生活，只须考虑怎样花钱，到哪儿去度假就行了。这是最主要的。

第二章

胡思乱想像无所事事一样，使我在往事的腐朽木板上过快地滑下去。

波拉·霍真同意只要我们两人中间任何一个人想见面，我们就可以见面。我们用不着住在一起，用不着改变生活方式。我大部分时间仍然是在我的拉上窗帘的房间里度过的，窗外就是穿梭行驶的车辆和散发着臭气的码头。我不再看我的旧家具、毫无价值的小摆设、书籍、褐色花纹糊墙纸。真正无处不在的是时间，而不是空间。

往事。倾向于往事，而不倾向于我一无所知的将来的事情。这是一种反常心理。我和很多同时代的人都有这种反常心理，我是一条长满湿疹的狗。我使劲儿挠我的旧伤疤——回忆。我这个伤疤被挠得鲜血淋淋、火辣辣的。

我未老先衰了。我13岁或者14岁时就露出衰老的迹像。在人们只对青春，或者至少对青春的外表恭维备至的时期，这个发现是令人伤心的。妈妈说我是小老头。今天，波拉·霍真提醒我说，我是一个保养得很好的小老头。她对我不会怀有恶意的。

我承认我未老先衰。我像老年人那样攒东西。我从来没有终止过。我15岁时，壁橱里整整齐齐塞满了杂志、报纸。当我开开壁橱门，一摞摞报刊、杂志要倒下来时，我才下决

心把它们处理掉。这时，我仔细挑选一遍。我把每一期杂志都翻阅一遍，把有保存价值的某几篇文章剪下来，分门别类地放进封面上写着文学、绘画、音乐、司法、科学、哲学等卷宗里。那些卷宗塞得鼓鼓囊囊的，最后总是从褶痕处撑破开来。我进一步分成细类：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经典哲学……我重新剔除我认为没有意思的文章，或者我不喜欢的文章。我可以趁这个机会把我耐心积累起来的资料重读一遍，使我的记忆活跃起来，区分精华与糟粕。这样一来，我可以减少好几个卷宗，其中有我冠以"意识形态"标题的那一卷。我交替用以下两种方式给思想概念下定义：从属于原因的真理，服务于原因的谎言。经过筛选我处理掉壁橱里的一些资料。

这些陆陆续续积累起来的报刊、杂志经过不断地淦析，在我脑子里沉积下来一些见解。我的个性部分地是由于我壁橱里一大堆怪僻的资料形成的。

巴黎是一个耽于梦想的城市，一个为自己的梦幻发狂、什么也不会忘记的城市。最漫不经心的行人从吕泰斯圆形剧场到博布尔高地不会看不见它的巨大的耻辱标记的。

巴黎就在近旁，好像依在我身上。我熟悉的巴黎是一个不夜城。只要侧耳细听，人们就可以听见隆隆的飞机声。飞机不顾禁令在郊区上空飞行。飞机的白灯、红灯在云层里闪烁，像占领时期一样。

战时夜间飞行是轰炸的预兆，吓得我毛骨悚然。我叫我母亲。由于她不来，住在我们家里的乡下姑娘玛丽亚一听见叫声就跑来。妈妈知道。是的，她肯定知道。玛丽亚好像没有睡觉。她跑来握住我的手、抚摸我的额头。她用没有变嗓子的童音和我说话。遇到紧急情况时，她常带着我和大楼里的其

他住户一起躲进防空洞。第二天早上，她总是假装生气地说："我的小菲立普昨天夜里又把我叫醒了。"然后，她亲亲我。

玛丽亚不喜欢巴黎。我想这仅仅因为她不是在巴黎出生的。

玛丽亚的腿有一点瘸。有两位医生诊断过："髋骨缺钙。"1945年的一天，有人带她去离巴黎很远的贝尔克大医院，几乎在另一个地区。那里有海风，有很多碘……对骨质病人、结核病人都有益处。玛丽亚每个星期都给我们写信。妈妈给我念她的信，她沉默片刻说："多好的姑娘！我们很快就去看她。"

秋季的一天，我们到达贝尔克。玛丽亚躺在雪白的床上冲着我们微笑。还是我熟悉、喜欢的那张笑脸，不过当时我并不知道我喜欢那张笑脸。那天，我感到我喜欢那张微笑着的孩子脸，因为玛丽亚是一个孩子。她摸我的脸蛋。妈妈给她带去桔子。在饥荒的年代，那是很稀罕的水果。她病情严重，不能下地走动。她用硬纸片、布头和彩色铅笔做明信片和盒子。她做得非常细心。她让我挑一张明信片和一个最漂亮的盒子。我很不好意思，因为我什么东西也没有给她带，我竟然没有想到这一点。然而，我和妈妈离开时，她眼睛里高兴得发亮。

几个月以后，我们在一个白雪覆盖的陌生的村庄里。我们去墓地一个很小的坟前凭吊。那个坟只不过是一块长方形水泥地，外加一个油漆木十字架。这时，我想起我和玛丽亚在房里玩捉迷藏的情景。我躲进食橱里、柜子里，她从那里面把我拖出来。我还想起我吓得魂不附体的夜晚，想起她用手握住我的手，想起她的笑声——像锦缎破裂般的笑声。

我看见圣·克卢门广场。那些周围有矮树丛的灯火辉煌的圆形建筑，皇后大道，左边是由塞夫勒桥通向维尔达弗莱和圣·克卢公园的爱德华瓦扬大道。凌晨四点钟，人们在公园的山丘上看东升的旭日染红拉岱方斯、贝尔西和夏朗通三个区庞大建筑的正面。夏天的晚上，在那些公园里，有一些想入非非的年轻人期待着艳遇，慢步尾随在幻想的女郎后面。一对对情侣在交错的矮树丛下面。人们听见呼唤，可是不知道是鸟儿被惊醒时的啼叫，还是孤独的孩子需要爱抚的声音。

我在布洛涅树林边上。林中是卖淫和卖麻醉品的市场。那里有妓女、男妓、同性恋者、贩卖麻醉品的人，他们用彩色灯泡、用尖声喊叫，或是用唾液充盈的红嘴唇争夺顾客……

我沿着黎明滨河路，路易·布莱里奥滨河路走去……我看那些舷窗没有灯火的豪华快艇沉沉睡去。那些褐色的巨大快艇和昏暗的河水浑然融为一体。河水里有天文学家不认识的星星在颤动。

协和广场像原始星球一样明亮、空旷，像港口那样四通八达。马利石雕马在铁皮箱里旋转①。一辆亮着灯的黑色轿车驶过。驾驶汽车的是一个金发女郎。她抽着香烟，向四面看，接着消失在圣·日尔曼大街的漩涡里。杜伊勒利宫滨河路白茫茫一片，像暴风雨前的景象。风把隧道里的报纸刮得四处飘动。

我应该沿着旧城的干道，沿着黑夜的凄凉的塞纳河走去。呼吸它的11月的潮湿气息。在它的桥上走过，眼睛始终盯着它。接着，我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股力量促使我走进一条阴暗的通道，塞巴斯多大道，圣父街，圣·雅克街……巴

① 因为拆迁，当时石雕马已经装箱待运。——译者注

黎，神圣的城市。女人的高跟鞋在光亮的人行道上咯咯地响着。

一个姑娘坐在一幢大楼门口哭泣。她的相好把她遗弃了。他在那边，六楼四号一间女佣人的房间里。他床上躺着一个红发女郎。我在哭泣的姑娘旁边坐下。我小声和她说话。她默不作声，满腹狐疑。我并不泄气。我一个劲儿地和她说。我提议和她一起散步。她总算答应了。我们走了很久。她带我去叙雷讷山岗。我们蹑手蹑脚走进一间小房里。她房里睡着一对男女。她准备茶和小吃。我们吃着、喝着。我们在起居室的红长沙发上躺下，我们在那里做爱没有惊醒房里的人。我不知道她是满足还是假装满足。夜里我心里热一阵、凉一阵，我注意到玻璃窗上出现霜结成的彗星状透明图案。她简略地对我叙述了她的经历。她说她父亲是一个外省城市的面包师。从她16岁起，他就没有和她说过话。她现在的家里有时住着一个到中国去旅行过的伙伴。她的相好住在莫贝尔，他正在房里抚爱那位红发女郎，那是一个患躁郁症的疯姑娘，第二天早上就要住院。精神病医生用不着别人帮忙就能使她安静下来。他也是一个疯子。他还在学习。他希望当哲学教师，通过会考……

那姑娘没有睡意，我也不困。我们还接着喝茶。她把唱片放在唱机的转盘上，放低音量以免打扰别人。我要她放康塔塔圣灵降临节的星期日。她没有那张唱片。她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她讨厌合唱。我不知道怎样回答她才好。

她敬我一支带大麻叶的香烟。我们吸着。她的相好很容易弄到L.S.D.①。下次，如果我愿意，可以和他们一起

① L.S.D.英文缩写，一种强迷幻药。——译者注

弄……我用肯定的语气回答说行。当我告诉她我比她大十二岁时，她笑起来了。我觉得那次邂逅毫无意思。

隔壁房里有僵直的身体轻轻移动的声音。街上有一辆汽车朝城外驶去。大楼里什么地方有一个孩子在哭。接着又是一阵沉寂。我看见那姑娘眼睛下面的紫痕。她沉默不语，看着天花板。窗外，天空变成白色，又变成蓝色。黑暗中浮现出红色小屋顶。我想到一个村庄。我靠近那姑娘，抚摸她的头发。她那细长、蓬松的褐发。我问她的名字。她叫西尔维。我们没有什么话题好谈。我离开她之前说：

“如果你愿意，我再到你家里来。”

“好的。”她回答说。

外面，寒风扑面，吹得我透心凉。无论白天黑夜，我是它①生命和命运的轮廓。它是我的慰藉，我的归宿。在无边无际的耕田、菜地中间，在因两次战争及架设电视中继站遭到破坏的村庄外边，它是各国商旅经常往来的地方、一个自由港、一个口袋，那里一切都是意想不到的，那里一切都有待于发掘。它毫不犹豫地提供桌子、床铺，供人们谈话的客厅：电话，酒吧，广场上用的凳子、书店。无论什么时代，人们总能在那里找到谈话的知音。有讲道德的人，不讲道德的人，沉默寡言的人，健谈的人……多少享乐！高墙后面壁炉里燃烧着火焰：人们在那里炮制词语、图景、闻所未闻的声音。只要进去坐下就行了。所有的音乐逐渐具有一种意义。

我爱这城市，如同爱长时间受人蔑视的母亲。我终于承认它的价值。我爱它爱到恨不得把它吞下去。我撕扯它那慷慨施予、取之不尽的躯体果腹。它就像往日我们的母亲——土

① 它指巴黎。——译者注

地那样。困难的黑夜降临的时候，它仍然是芬芳、新鲜的。母亲，母亲……你身着熏黑的石头盛装，戴着烟雾的面纱。我们的肺在这儿窒息了，这无关紧要。我们呼吸上的困难同心里富于刺激性的欢乐相比不值一提。你广阔无边。你是我这样的弱者可以栖身的唯一地方。弱者可以在你的怀抱里找到消遣和食物，找到足够使他们以为活着的真实生活和幻想。他们被你穿过，像你被一条主干线穿过一样。你用导管和亲切的梦想养活他们。有些人自认为欠着情。大部份人心里怀着怨愤、愚蠢的恐惧到海滩上和冬季运动场躲藏起来。他们试图在那里恢复你的丰采。那些后代子孙多么忘恩负义！也许是无意识的。这会持续到他们离开人世为止。那时候，他们将在你这受到千百回翻耕、磨难的土地上找到庇护。他们将再次回到子宫、拉雪兹神甫公墓；按照你表盘上指针的反方向，去蒙帕纳斯、蒙特鲁日、让迪里、瓦尔米、贝尔西、圣芒代、贝尔维尔、蒙马特尔、莱巴蒂尼奥尔、沃吉拉尔……城里，城外。

“啊，是您呀，菲立普？……晚上好。”

托尼·索昂说话很慢，好像很吃力。在电话里，他的声音相当苍老，有很重的鼻音。他似乎在想怎样措词。我感觉到他听出是我接电话不大高兴，不过很快就掩饰起来了。

“请告诉您母亲……今天晚上我不能……不能像往常一样……和她一起……”

托尼·索昂在私生活方面不善于撒谎。他知道他不大能瞒得过妈妈。在生意上，他那些晦涩难懂的话也许有一些作用，但在现在这种情况下……

“她一定会感到遗憾的。我也感到遗憾。”

"谢谢，我知道您不会感到遗憾。不过，我还是谢谢您的好意，请转告您母亲……我感冒……出不了门……菲立普，请转告她我感到遗憾，尤其是……请不要打扰她。"

"我一定如实转达。谢谢您来电话。祝您康复，再一次祝您康复。"

他挂上了电话。在一般情况下，我虚与委蛇的口气他一听就明白。另外，我没问他要不要我们帮忙替他去药房，给他买些药品。

妈妈正在专心翻阅费加罗杂志。

"菲立普，登这么多广告吹捧这些小说真是可笑。又不是卖蔬菜、奶酪！谁来的电话？"

"托尼来的。"

"他要和你说话？"

"不，不是专门给我打的。他要我转告你，他因为感冒今天晚上不来了。他很遗憾，是的，他很遗憾。"

"哼，遗憾！遗憾！……我要孤零零一个人了。他这是存心的……"

她的调门儿在向上升。她怒不可遏，尖声喊叫起来。我提醒她注意她说的最后那一句话有些欠妥。

"怎么能说你要孤零零一个人呢？我不出门，我跟你在一起。"

"你想对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吧。再说，你出不出门还不是一回事？反正你自己关在你的房间里！"

她揉揉手绢。费加罗杂志滑落在地毯上。

"你安静点，行吗？我建议我们一起去吃晚饭……我们可以聊天……"

"他究竟是怎样跟你说的？"

"他说他感冒了，别的什么也没说。"

"我确信他在撒谎。他说话的声音像衰弱的老头子，是吧？"

"是的（怎么能否认事实呢？），他好像真的感冒了。"

"我的小菲立普，你真够天真的！你不了解他。他对你也许能瞒天过海，但是他别想蒙我……我知道他用老山羊嗓子说他生病了时，是把你当成脸上长痤疮的中学生，我知道他捣的什么鬼……这坏蛋，他在撒谎！他在撒谎！他从五十岁起就是这样的。感冒！这骗不了人。昨天，他还活蹦乱跳的。他一定是玩婊子去了。这才是真实情况……"

妈妈气得抽抽噎噎地哭起来。她的嗓门升到歇斯底里的最高音域。她伸手捡杂志，可是没有够着。我弯腰拾起杂志递给她，希望会使她消消气。她把眼睛转向客厅的窗户，转向走廊，转向天花板，就是不看我。我想：她可以成为一个多么出色的喜剧演员啊！她举起两只手，又垂下去。只有她颤动的灰色脸颊、翕动的鼻孔显露出她内心的激动，这完全不是做作。这时，我感到又烦恼又怜悯。我握住她的手。

"我们两人一起出去。我们到拉贝露丝饭店去吃晚饭，你看怎么样？"

"去饭店吃饭！你看我现在这副模样能去饭店吗？"

今天晚上开头就不吉利。她坐在安乐椅上抽抽噎噎地嘟哝说："饭店……饭店……"接着又说"那坏蛋撇下我一个人，他去玩婊子，我孤零零一个人……"

我砰地一声带上房门，躲到我房里去了。

我并没有失去希望。积习难改。我想：她不会改变的。我应该同情她，但是谁也无法使她改变。我隔着一堵墙听她的动静，她近在眼前，仿佛又很遥远。她克制着不抽泣。我

和她一样。我们在各自的房间里、处在相同的境遇之中。这样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没有任何明显的出路。

出去？离开她？哪一个真正的儿子能毫不伤心地下这样的决心呢？再说，上哪儿去？哪儿来的钱？我觉得我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波拉·霍真并不准备白天黑夜容忍我。说到温情、爱情，我和妈妈都彻底破产了。应该等待、等待。

我躺在床上想着这种寂静，想着我母亲的、像发臭的泉水般流淌着的寂寞。她为什么这样讨厌、这样自私自利呢？我呢，我干吗要继续折磨自己而不抱怨呢？这关系着我的尊严，就像我在孩童时代，然后是少年时代遇到日常擦破点皮、情绪激动之类的苦恼那样。这不是装腔作势，不是做戏。尤其是她在我身边、在隔壁房间里难受成这个样子，我不能顾影自怜。

人们在麻木过一段时间之后会振作起来的。人们以为是重新从零开始。景色“依旧”。至少，人们竭力说服自己是这样。有时候，人们隔得远远地保持着冷静，好像控制着局势。但是，任何方法都是无效的。意志无能为力。

我在法国音乐转播节目的嗡嗡声中睡着了。我想是肖邦的曲子。他的音乐总是使我感到说不出的惆怅，即使是那些节奏活泼、轻快的乐曲也给我一种冰冷的感觉。我知道奇怪的面具下面表现的是什么……也许我缺乏感情，没有同情心？这一发现不值得大惊小怪。

我终于在双重苦恼的斜坡上滑下去，接着便跌入梦乡。我醒来时已经是深夜。下起雨来了。汽车轮子在沥青路面上发出刺耳的嘘嘘声。我觉得休息好了，精神振作起来。我有些饿。身体不会多愁善感，忘记它的需要的。这也许是叫人

放心的事情，仿佛是生命的呼唤。然而，我一直把进食、解手，甚至梳洗这些需要视为可耻的职责。我和我的身体很难得有和睦相处的时候。

我起床下地，走到厨房的冰箱前面，决心认真考虑一下进食的问题。我知道我即将取食品的动作甚至会使我把进食问题都抛在脑后了。还有，每当我允许自已满足我的基本需要时，其它种种忧虑也应该统统忘掉。我打开冰箱的门，陷进卑劣之中①：有妈妈总喜欢放在里面的罐头，还有用半透明纸包着的黄油，放在盘子里的四条沙丁鱼。我和妈妈很喜欢吃这种鱼。沙丁鱼浸在一层凝固的油里。我倒一点水在锅里，把盛着鱼的盘子放在锅上当盖子，把锅放在炉子上，点着一圈蓝色的火焰。

炉子上方的天窗半开着。天空漆黑，充满柔软、光滑的影子。为了更好地看那些影子，我把窗子完全打开。锅里的水轻轻地吟唱着。幢幢黑影在天空中看得见的地方相互追逐，然后消失了。我陷入梦幻之中，梦里一片寂静，像在深水里的潜水艇里，像我十一岁时在“海底两万里”②中读到的那种潜水艇。那是令人宁静的、长长的几分钟。仅仅由于梦想的作用，格朗·奥古斯丁滨河路的厨房变成了“鹦鹉螺”号。它以一万五千海里的时速行驶着。它驶过沙地、珊瑚林带，它面对凶恶的激流、海底强大的压力。大楼的天井里没有传来任何声音。这是安静的时刻。雷娜太太的孩子早已入睡了。在我睁大眼睛沉入梦想的时候，孩子们的梦想也许像天上没有一定去向、随风飘动的黑影。也许，他们在梦

① 前文说他把进食视为可耻的事，这里打开冰箱要接触食品，所以说陷进卑劣之中，——译者注

② 法国科幻小说作家凡尔纳的小说。——译者注

里还会感到恐惧、欢乐，等他们醒来时就记不起来了。恐惧和欢乐也许会在他们眼睛下面留下浅蓝色的虚弱痕迹，他们的母亲（真正的、好的母亲）不免要为此担心的。

一辆救护车的呼啸声把我拉回到沙丁鱼上。锅里的水呼噜呼噜地响，盘子被顶起来又落下去，叮叮当当地响。现在沙丁鱼自由自在地浸泡在溶化的油里。为了不烫手，我小心翼翼地把锅放在桌子上。洗碗槽的水龙头一滴一滴向下滴水。我注意听洗碗槽里像海水的哗啦声。我好像住在一个气泡上，一个古怪的小星球上。

吃沙丁鱼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需要细致、技巧，还需要面包、黄油、刀叉。最好是一把又快又尖的餐刀。首要的是把长着鳍的鱼脊背朝下放正：因此要一只手用叉子齿把鱼保持住这个姿势，另一只手用刀从肚子一直切到尾巴处，露出来香喷喷的紫色肉。接下来要仔细地进行手术（借用外科术语），包括用刀尖剜除发红的硬阑尾和鱼精（过去的繁殖力、生殖力的证据）。对凝固的脊肉、原来和鱼头连在一起的残余器官可依法炮制。最后用一只手稳稳当当地把那一串半透明的天然细珍珠项链——脊刺——剔出来，放在盘子旁边。一刀下去把尾巴切下来，沙丁鱼就像躺在普洛克路斯忒斯的床上①，以备随时享用。挑出肉中的小刺是手指头和手腕先于口舌的享乐。

我正在剖开第二条沙丁鱼时，听见地板上有响声。我从尖尖的声音判断出那是走廊地板的声音。地毯上的脚步声、布料衣服的窸窣声。厨房的门打开了。妈妈看着我。

“啊，你没有睡呀？”

---

① 希腊神话中的强盗，将抢来的行人放在床上，较床长的人被砍掉脚，较床短者，强行拉长。——译者注

她身子歪斜地靠在门框上，一只手放在额头上遮挡天花板上的强烈灯光，显得疲乏不堪。她穿着铁蓝色的睡衣，耸肩缩脖。我讨厌她那件衣服。我仿佛看见一个女人在逃难的年代站在路边，精疲力竭地靠在成鳞片状的法国梧桐树干上。八月的阳光垂直地照射在树上。我驱赶掉这个幻影。

“别靠在门上，请坐下。你吃沙丁鱼吗？”

“好的，谢谢，请给我一条。”

“别了，我给你开一听新的。这几条鱼有一股冰箱的气味。”

“好的，劳你驾……”

她在我面前坐下。她沉默一会，用干巴巴的微弱声音说：

“原谅我刚才的事。”

我吃了一惊，手里的盘子差一点掉在地上。“原谅我，”我记忆中不曾有过这样的事情，妈妈在我面前会谦逊到这个地步。这是谦逊吗？为了掩饰我的慌张，我打开挂在洗碗槽左边的柜子，什么东西也没有拿又关上了。那是我们放酱、糖、巧克力和罐头的柜子。

“请……你用不着道歉，也用不着请我原谅。”

我真诚地认为母亲不用为任何事情道歉，不用为任何事情请求原谅。否则她成什么人了？

我终于从柜子里找出一听罐头，像冬天的太阳那么鲜亮、光滑、黄灿灿的一听罐头。索皮凯牌橄榄油浸沙丁鱼罐头。这是我们喜欢的牌子。我在瓷砖台上拿了一个柠檬，从桌子抽屉里取出一付刀叉。

“我给你挤一点柠檬汁在上面。你想喝点什么？”

“我去煮咖啡，谢谢。”

"你不怕影响睡眠吗？"

"你看得出来我不困。要是你刚才的邀请还算数，我们就一起在这儿吃……"

"当然算数。"

我对沙丁鱼和咖啡在一起不好消化这一点只字未提。她去厨房角落里翻找去了。狭窄的房间里充满了器皿撞击声、纸张摩擦声、食品佐料的香味。总之，房里充满了生活情趣。我把六条鲜亮的沙丁鱼倒进盘子里。妈妈吃沙丁鱼的方法和我不同。妈妈平常吃东西非常讲究。这会儿光去掉尾巴，连鱼肚子都没有剖开。遇上她高兴的日子，她甚至会说一句笑话：沙丁鱼嘛就是没头没尾的。我在银白色的小鱼上挤了些柠檬汁，接着我拿几片面包抹上黄油。妈妈在盘子两边各放了两只杯子。热咖啡的香味和橄榄油的气味混合在一起。为了和这一顿夜餐的气氛协调，我问道：

"你要加糖吗？"

"我喝咖啡从来都放糖。你应该知道的。"

是的，我应该知道。可是糖会使人发胖，使血管阻塞。你要保养身体吧？其实，这是我问话的本意。

电咖啡壶发出呼噜呼噜的哮喘声。妈妈拔掉插销，把滚烫的咖啡壶放在桌上。她坐下来，一边倒咖啡一边说：

"刚才我很可笑。不过我没有答应去饭店还是对的。这顿即兴冷餐吃得很愉快。天黑了，我喜欢在星光下野餐……"

我没有看见一颗星星，只看见她眼睛里很快暗淡下去的一丝微弱的光。她掩饰起或者说破坏掉她的快乐。她沉默不语。她会再一次缩回到甲壳里去吗？蜗牛母亲。妈妈像腹足纲动物那样能减缓血管里血液的流动，爬到花园尽头的瓦片

下面，在那儿蛰居整整一个冬天。她异常敏感。我得当心别出纰漏，否则今天晚上正在搭起来的脆弱建筑就会毁于一旦。对我们来说，这个晚上才刚刚开始。我用眼角瞟她。她专心地咀嚼沙丁鱼和抹好黄油的面包片，因为她不愿意把黄油弄到手指头上。厨房的静谧气氛使她的面容显得安详。她的脸颊上甚至露出一抹红润。我的眼光在她的细皱纹下面、嘴角上、嘴唇上寻找已经逝去的东西，从前那个母亲的光滑、可爱的面庞。她那张光滑、坚毅的白脸在阳光下和谐地颤动。我竭力保持住这个幻像，但是她的脸好像冬天的花园，花儿和欢乐早已逝去。

“你不觉得我刚才可笑吗？”

这问题是单刀直入地提出来的，没办法回避。肯定或者否定，我总得回答。否则前功尽弃。她想要我回答是的，要我羞辱她、帮她陷进罪过的泥塘里呢？还是要我对她撒谎、安慰她呢？怎样向她承认她在我眼里总是可笑的，因为她拼命糟蹋她生命中的每一分钟，因而也是糟踏我生命中的全部时间？怎样向她讲明，不论怎样我仍然同样爱她，除非在我们歇斯底里发作的时刻。我把她看成一个我老是要回避的人，因为我既不能引她出错，又不能使她恢复理性。我就采取迂回的策略。

“这个词不恰当。”

“照你看，哪个词恰当？”

她嘴里吐出的话隐蔽、嘶哑，却很激烈。我试图补救：

“你不可笑。谁也不可笑。你只是不幸……”

“我不幸！你想说笑话吧？”

她皮笑肉不笑，是我熟悉、讨厌的那副面孔。

“充当怜悯母亲、慷慨陈词的角色很容易……”

我对自己，对自己无能促进刚刚缓和的气氛十分气恼。我们谈不上三句话就会像发怒的野兽那样互相冲撞。我只好拿出看家本领——见风使舵：

“很好，你很可笑。如果你坚持要我告诉你……幸福！你想不出我看见你这样幸福有多么高兴！”

“混帐！你是一个混帐东西。”

“和你在一起能够无话不谈。”

我把心里话一古脑儿倒出来。现在一切都完了。房里鸦雀无声。接着她从嗓子眼里发出笑声来，先是压低声音笑，后来是放声大笑。她推开只剩下六条鱼尾巴的盘子。她一面摇头，一面看着我。她的蓝瓷器般的眼睛里噙着泪花。

“我的小菲立普，你永远不会改变。我们干吗这样别别扭扭的？我想抽支烟。你房里还能找到几支黑猫牌香烟吗？”

所幸这个晚上谈话的气氛还没有破坏掉。

我第一次和妈妈出外度假时只有十二岁。那是在1948年。她刚刚被遗弃。我们要到圣·马克西姆去度过整整一个夏天。

在那些疯狂的年代里，我给她吃发霉的面包、给她喝自来水；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暂时平静的时期。她常常几个小时极度消沉。她心绪平静的时候显得很美。她不像三十多岁的人。她渐渐恢复了生活的乐趣。

圣·马克西姆：广阔的海滩上撒满阳光，阳光照射在白色的沙滩上连眼睛都睁不开。海里散布着礁石。许多个下午，我在那里钓彩虹色的鱼。妈妈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晒太阳。她细嫩的金色皮肤渐渐变成古铜色。那个夏天，她在读《仁慈

上帝的小阿尔庞》。书摊开放在她手够得着的地方。她阅读的进度很慢。我在两次起竿中间转身欣赏她的被海水浸成白点儿的头发尖。她用一顶红帆布帽子压住她的头发。我同样赞美她丰满的金色肩膀，它们使我想起美味糕点。当她在阳光下打瞌睡时，我尽情地欣赏她而不会被她发觉。

那时候，那地方很惬意。海滩和山丘之间有一条公路相通。公路上，车辆不多。那儿有宽阔的石级通向一座教堂模样的建筑（我记不得确切的地方）。星期天早上，到这里来避暑的大群妇女的浅色裙子把海滩都遮满了。我喜欢和妈妈呆在那儿，并不是出于孝心，而是因为她很像她周围的姑娘和年轻的妇人。

后来我和妈妈一起过的假期再也没有那样的乐趣了。她岁数大了，有上年纪人的怪癖。每次光挑选地点、旅馆就是一个难题……她受不了喧嚣的人群。因此夏天最热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去海滨，不可能去海水浴疗养地。隆冬时节，我们却在拉博尔或者在芒通。我们得在八月去西欧唯一的雪山。因为旅行社提供的情况都被当作欺骗和敲诈，所以她亲自写信给旅馆经理、市长、协会会长。她打听菜单、主要的风向、毯子的数量、房间的方向及窗外的景色、地毯的质量……她要求那些不怕麻烦给她回信的主管人、负责人详细说明某个形容词、副词的确切意思："非常舒适的房间"是指一个盥洗盆还是两个盥洗盆，是木鞋形的浴盆还是普通浴盆？"亲切的气氛"是说能碰见一些喜欢运动、蹦蹦跳跳的年轻人，还是那些只关心交易所行情的安静的退休的人？最后，她要求他们用书面的形式、以名誉担保遵守她准备同他们订的道义上的合同条款，她才肯冒险到那些地方去。我们在那里已经寻觅不到任何新奇的东西了，愉

快的也罢，不愉快的也罢。尽管有那些麻烦，有时我们还是出发了。我们离开格朗奥古斯丁滨河路的时刻也是一个鲜明的插曲。我们的西斯帕诺牌汽车停在大楼门口。汽车的发动机和车身从1945年以来没有任何损伤的痕迹。我们把大大小小的行囊物品塞进汽车里（大部分是用不着的）。那些物品是出发前一小时才找出来的。因为妈妈反应不灵敏，所以由我开车。她觉得道路条件不错时也驾驶几公里。在那儿逗留的期间，我们成为苛求、甚至是百般挑剔的顾客。我在那儿很难得到休息和娱乐。我陪着妈妈，我照顾妈妈。因为我想她不能没有我的照顾。不过，我正是在这样的假期里认识波拉·霍真的。

当时的情况毫无奇特之处：一个夏天的晚上，在一个叫贝尔维代尔的旅馆里。妈妈希望泉水能治疗她的神经衰弱症，所以挑中那个泉城。那是七月底三伏天，难以忍受的酷暑，对面是光秃的山峰。傍晚稍稍凉爽的时候，疗养地真正的生活才开始。妇女穿着半透明的短上衣，戴上她们的全部首饰。旅馆的舞池里有旅馆里的客人，也有因慕乐队名声来的外面的客人。每天晚上总要演奏好几次古典乐曲中的保留节目：在美丽的蓝色多瑙河旁。乐师们尽力满足各方面的要求。跳舞间隙中夹杂着连续不断的笑声、谈话声，刀叉和玻璃珠项链的清脆碰撞声。年轻的姑娘坐在红丝绒长椅子上耐心等待幸运的年轻人来请她们跳舞。有几个姑娘不但相貌难看，脸上还露出妒嫉、气恼的神情。她们的脸上冷若冰霜，喝着五颜六色的汽水。叔叔、婶婶、教母及被派来监视她们的陪伴看着她们。

那天晚上，妈妈略有点中暑，睡得比平日早。我把她送

到房里后，准备再下楼去散散步。恰巧波拉从她房里出来。她穿着散步的衣服。我们在楼梯口碰见了。我在旅馆里见过这位姑娘，她常常陪一位穿着考究、但有些过时的太太用餐。她举止自然，同我们多日来浸沉其中的拘谨气氛大不一样。她亮晶晶的深色眼睛，她身上那种说不出的优雅，直到她那极其甜蜜、嘹亮的嗓音（我第一次听见）都使我着迷。

环境促使我们认识。我们喁喁而谈十分投机。旁观的人会以为我们在策划一件什么事情。其实我只是问陪她散步是不是冒失。我们两人不是幽会，我们在公园里转了几圈。浪漫的圆月亮及从大厅窗子投射到砾石路上的方形亮光把公园照亮了。巨大的天蛾随着华尔滋的节拍狂舞。

我们谈到我们的意外相逢颇有些电影里的浪漫意味，还谈到我们在景色迷茫、昏暗的公园里的散步。我很喜欢波拉这个名字。我说不出什么理由。她激动的时候，嗓音清脆、和谐像淙淙的泉水。我找话问她，好多听她那清脆、悦耳的声音。她的回答活泼、自然，抵消了我们处境及我们谈话本来会有的装腔作势的印象。我们想像我们正在表演的场面，仿佛在哪部影片里见过。她向我举出了好几部影片，我只听说过片名。她全看过，能详细说出每一个角色。我只举得出我想起的唯一一部片子：甜蜜的生活。她大嚷大叫反对那部堕落、罪恶气氛的影片，反对由马斯特罗亚尼①扮演男主角的怯懦行为。

“我希望您不是那种人？”她出其不意地问。

我回答说当然不是，我十分自信的口气使她笑了。她和我从散步中得到同样多的乐趣。大概我的情绪表露得过于明显，她要我不要产生误解：她陪我散步，我陪她散步，事情

① 马斯特罗亚尼（1924—）．意大利电影演员．——译者注

不会超出友谊的界限。她像我一样也是严守教规的清教徒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谈得来，事后我打听到有时候她善于迎合别人的思想、行动，然后加以煽动。我想像我们在某个轻歌剧里，如快乐的寡妇或維也纳精神。她不知道那些歌剧。她出生得太晚，通俗喜剧早已衰落。但是她母亲（那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久出生的老派时髦太太）一定看过莫加多尔剧院最辉煌的演出。

旅馆里所有的客厅里响起欢快的喊声，仿佛有人宣布跳法兰多拉舞或者皮埃蒙特王子舞。钢琴师用力弹奏出暴风骤雨般的和弦，鼓手用雨点似的鼓声激励着大厅里的人，一阵阵"嗨"，"哟"的声音传到花园里，使癞蛤蟆和昆虫的叫声黯然失色。

波拉·霍真带我到绿廊下的木门前，门外是一条小街，有四盏颤动的灯笼照明。有几幢低矮、不透光的房屋，是手艺人或商人的住所。那里是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里有忧郁、充满阳光的真实生活，那个世界里的人欢笑、嘲弄贝尔维代尔旅馆客人稀奇古怪的行径。我们向街口的广场走去，向石凳和树枝低垂、开花的灰色大树走去。下面有一条小溪：在若隐若现的小径旁我们看着波光粼粼的小溪。那里是一个清新恬静的地方。我们坐在石凳上，能够远眺拱桥的栏杆和法国人的老城门。据说拱桥是罗马人建造的；城门是恐怖之门、入侵之门。城门附近还有断垣残壁。

我们的谈话集中到那个幽静、美丽的地方。谈话中间不时有一阵阵长时间的沉默。

"您认为会发生什么事情吗？"波拉·霍真问我。

"细想一下就知道不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您知道我是犹太人吗？"

"您为什么向我提这个问题？"

"就为了让您知道我是犹太人，这是我挑起事端的方式。"

我沉默了几秒钟，我问她是否认为我会因此改变对她的印象。她说我的问题证明我不会改变对她的印象。她把手放在我的前臂上。她告诉我她父母亲住在巴黎圣路易岛上，她自己在佩雷尔林荫大道有一间房间。

这时，我们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超出友谊的界限。她叙述她的身世。她在童年时经历过恐慌和心灵上的感情枯竭。这已经在她身上有了反应。她写起诗来了。这使她生活得好些，或者说生活得像大家一样，虽然并不是人人都写诗。上帝？她不信上帝。她不再信上帝了。因为上帝纵容人们对她宗族的人犯下罪行。

波拉·霍真话说得很慢。她每说一句话就沉默一阵。只听见小溪的淙淙流水声。她说到某些音节、某句话时声音变得越来越低，最后听不见了。

一只萤火虫举着它的小绿灯笼在我们脚下飞来飞去。我们凝视它好几分钟。我们回到旅馆里时，一切又陷入迟钝之中。客厅的所有窗子半开着。小支光电灯发黄的光晕勾勒出窗子的轮廓，窗帘轻轻地摆动。我们走进旅馆。癞蛤蟆的叫声一直传到熄灭的水晶玻璃灯下。舞池上弥漫着灰色的尘土。

我们在三楼的楼梯口分手。她主动依在我身上，我动心了。我独自一人回到房间里时，回想她对我说她是犹太人的的神情。那既是一种挑逗，也是一种试探。她把手放在我的前臂上证明我顺利地经受住了考验。再说我完全没有妈妈那样的偏见。她的偏见，我是知道的。即使在、尤其在战争时

期，妈妈总是默不作声。她对大楼里、集中营里大搜捕中发生的事情从来不表示赞成，也不表示反对。即使在没有人不知道有焚尸炉、死亡营的时候，她仍然持那种态度。这是她既不表示完全赞成，也不表示完全反对的独特方式。我记得我在战后翻阅过报刊、杂志。那些刊物上，每期都刊登着证明那些暴行的照片和文字。那些骨瘦如柴、脸色惊恐的孩子，那些关在集中营里的孩子，那些低着头、举起手走路的孩子，那些被枪杀的孩子，那张着大嘴吐出累累白骨的炉子，我记得十分清楚……那些照片给了我清晰、明确的印象。我不再相信有普遍的爱，不相信有利他主义的感情。我觉得每个人都可能成为那样悲惨的猎物、被追逐羞辱的猎物。后来，我听说人们承认刽子手和被害人的人性降低到堕落的最底层，另一些处在同样境况里的人上升到灵性的顶峰。我的思想逐渐变得模糊不清了。

妈妈并非总是无动于衷。不是指对纳粹赤裸裸的宣传而言，是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残留到今天的沙龙排犹主义①，表面上轻描淡写无伤大雅，实际上更加隐蔽或者说更加狡猾。然而，我知道我和她谈起波拉·霍真时，她不会指责我的。

塞纳河像一条充满海鸥啼声的平滑如镜的走廊。它是我熟悉的巴黎南城和不好客、没有光彩的巴黎北城的分界线。我在房间里——主体建筑上的隐蔽部分、迷宫的一个偏僻角落——听见雷娜太太拉她奇妙的垃圾箱。现在，人们用不着抬垃圾箱。它们没有声音地滚动、滑行。这可以节省人力、不用肩扛手抬。这些，我没有梦想到。我蜷缩在床单、毯子里。

① 指客厅里排犹太人的时髦议论。——译者注

冬天的阳光试图穿透门窗两边帷幔和天花板之间的缝隙。我想像对岸封闭的空间，修过枝的树，奥费弗尔码头的墙，庞大的城堡主塔，圣·夏佩尔教堂和法院。远处，上方是开阔的空间。在桑利斯、博韦、蒙迪迪埃、努瓦雍原野上，在卡佩王朝法国的固定田野上飘动的棉絮般的云头和那空间衔接起来。对我来说，知道这一切在外面存在着、活着就够了。室内，一切合乎规矩：我房间里的秩序永恒不变（表面杂乱是蒙蔽客人的），我在里面生活就像獾住在洞里一样。有时，我走开了，房里的秩序或者说那奇特的混乱使我放心。那是我的老习惯。我知道那习惯轻易是改不掉的。

房间建在大楼的水平面上，排列成L形，内侧是像竖井的内院。实际上是雷娜太太孩子们的游戏场所。这儿与外界隔绝，见不着阳光。有时候，孩子们的吵闹声、叫喊声沿着积满污垢的墙壁传上来，在L字长划上的走廊窗口都能听见。雷娜太太走到内院用宏亮的声音喝令孩子们安静：不要惊扰房东，他们睡眠很惊醒，耳朵很灵。走廊虽说在侧面，但它是房间的脊柱，脊柱上排列着一个个脊椎骨：房间、客厅、阅览室、厨房、厕所、洗澡间。进门是一处宽敞的过厅。在过厅里，一眼就能看见走廊上一扇扇的房门，直看到拐弯处便是L形的短划部分，那是用来堆放东西的房间。细细想来，这是一套很漂亮的房间，我从小就在这儿生活。我闭上眼睛都能想出房间的每一个角落。房间的每一处破损、难看的地方，我都知道：割绒地毯破损处（妈妈说纯卷毛地毯，今天哪儿也买不到），脱落的墙纸、瘸腿家具、藏污纳垢（不知从哪儿来的）的阴暗墙角、有细裂纹的黄色天花板、松动、嘎吱响的木条地板……空气！房里的空气滞重、充满灰尘。室内常年雾气沉沉。我们从来不换空气。一点用

处没有：外面的空气更糟。我们的空气是芬芳的。主调——一种隐约的怪果酱味——根据周围的温度及湿度由下面几组不同的主音加以烘托：妈妈抽的黑猫牌香烟的霉味，托尼·索昂的呛人的雪茄烟味，胡萝卜炖牛肉的调味香料气味，橄榄油、杀虫剂、白垩，特别是罕见的草酸硅藻土混合物的气味。今天在法国，她也许是唯一一个用那种混合物擦拭铜器的人。

悬浮在空气中的灰尘使光线变得柔和起来，房里显得格外宁静。几十年来摆设在室内的物品在这宁静的气氛中显得格外沉重。有时候，一些声音，如远处的嘈杂声、朝街一面的双层玻璃门窗的颤动声，内院雷娜太太孩子们的叫嚷声，过于腼腆不足以使房间震动，但可以把房间团团围住。那是一种特殊的宁静。那种宁静包裹着我房间里有自己色调的宁静。我们说话的声音几乎不大会扰乱那种宁静的气氛。普莱耶牌钢琴闲置在阅览室里。妈妈还是在结婚后的头几年里弹过舒伯特的曲子。那架钢琴像古生物学研究所昏暗的展览厅里的一副动物骨架。

妈妈房间的进深和我房间的进深相同，只不过她的房间宽一些。实际上，那是一个长方形的大房间。床、柜子、衣橱、沙发、软座圈椅、桌子和梳妆台放在房间里绰绰有余，好像是房中之房。天花板上装饰着仿大理石的小天使。小天使们吹着小喇叭，露出绕着饰带的屁股。我可以进妈妈的房间，不过我尽量不进去。

妈妈不再笑了。我不知道她在看什么书，甚至不知道她是不是在看书。我们每天早晨收到世界报和费加罗报。有时候，我看见过厅里靠墙的桌子上堆放着好些分还没有拆开封套的报纸。那些报纸要直接投进垃圾箱。为什么我们不能退订呢？也许是马虎，也许是无意识地想通过脆弱的报纸同

外界保持联系吧。如果说我和妈妈真有相同的看法，那就是我们对新闻的看法。新闻这个词极不恰当地表示令人生厌、可以预见地重复下流事件。制造那些事端的人不是真正的坏蛋，就是庄严的偏执狂；由于老百姓的愚蠢，他们才得以上台，又由于利益和怯懦凑在一起，他们得以维持下来。是的，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看法完全一致。

妈妈一连几个小时幽禁在半明半暗的房间里，对她来说，沉默是规律。沉默像两个戒毒疗程之间的麻醉剂那样不可缺少；非难，眼泪、叫喊，小摆设的碎片、砸门、砸家具、乱砸……我们不再能逃脱这个恶性循环。我从童年起就过着这样的生活，没有想像过另一种生活。我和妈妈确实很相像。她不再抱任何希望。也许这恰恰是我很难摆脱她的缘故。

她把夜里第一支黑猫牌香烟的烟蒂掐下去。她慢慢地把一支白色的香烟放在嘴唇上，像做圣事那样稳重。她眼睛闭着，头向后仰，两个鼻孔痉挛性地收缩，呼出排放过毒的灰色烟雾。我再次提醒她注意她给致命的肺癌以可乘之机。恐怕我是白费唇舌。她会要求按她的意志支配她的身体及她的生活，也许这是对的。她会反对我动不动对所有的事情说教的毛病。再说，我自己不是也去找那包香烟吗？

我听着滴水声、妈妈均匀的吸气和呼气声。妈妈像木乃伊那样坐着，根本不注意别人看她下巴下面的肉垂。那是脖子上的肉和脂肪的结合。她脸上的皮肤粗糙，在电灯光下面颜色发黄。她嘴角两边有两道长长的白色褶痕。她突然说话时，两条褶痕变得更加细长。

“菲立普，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不用告诉我。也许我

不够正视生活。你很为我操心。然而，事情简单得很。我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我厌倦了，非常厌倦。菲立普，我很了解你。你不该为我操心。是的，事情简单得很……”

她伸出右手在桌子上摸烟灰缸。我把烟灰缸推到她手旁边。她的眼皮眨着没有表情，像暴风雨中从深海里掀到海滩上的鱼的眼睛。她的眼睛盯着厨房的天花板，这并不说明她在看天花板。然后她扬起头，鼓起脸颊。我以为她那瓷样的眼睛在笑。

“我没有勇气朝我的脑袋开枪，也没有勇气吞我的安定片……我也没有勇气生活。一切都是那样费解。我会蔑视我自己：我随意支配我的全部时间，我用不着干活儿谋生。我多会儿想旅游就可以去旅游……有多少人羡慕、追求这种生活！我还有一个能忍受我怪脾气的儿子。你瞧，我没有忘记你这个体贴我的儿子，你不让我一个人住在这所大房子里。然而，我怕孤独。我对生活几乎没有留恋。生活，生活，我不停地谈论生活，却没有生活。你也有理由抱怨……我们处在无法摆脱的处境之中。”

我刚才以为在她脸上看见的微笑已经模糊了。我留心听她讲话。

“我这个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别的女人像我，我也像许多别的女人。她们和我的年龄相仿。她们或多或少经历过我这样的生活，她们和我殊途同归。我认为不同之处在于，我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道路不同。每个女人走自己的路。我呢，别人驱赶我在路上走。我日夜赶路。走不出去，也不会迷失方向。封闭的圆环把我带到同一个斜坡下面，一个陌生的深谷。好像我什么地方也不在，在一个迷宫里，一个不辨东西南北的地方。我身上被荆棘刺破了，伤口没有愈

合。我朝前跑。幻觉。你很清楚，那些旅游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好处。最多起到催眠的作用。最美的景色没有打动过我的心，只能愉悦我的眼睛。我曾经赞叹不已。那仅仅是出于礼节或者模仿。我必须寻找别的刺激。情夫。是的，我像好多别的女人一样，以为有了情夫我就可以解除烦恼。没有秘密。不再有秘密了。你不再是孩子了。我有过各种各样的情夫，各种国籍、各种肤色的情夫。不过是一些男人，如此而已。我得承认他们只不过同美丽的景色起到相同的作用。他们讨厌、轻浮。对，是这样，轻浮。男人像羽毛一样轻。他们自以为了不起膨胀起来：学问、金钱、政治，如此等等……什么也不行，他们毫无份量。他们是透明的，只是一阵过堂风。有真正坚实的男人吗？我怀疑。我没有幸运碰见过那样的男人。我可以把思想深处的东西告诉你，托尼·索昂也不是那种男人。你父亲么？怎么能知道呢？我以为男人遇到一点困难就会气馁、退缩。都是些懦夫。像所有的懦夫一样，他们喜欢打斗，喜欢在格斗中证明自己能克服使他们心胆俱裂的动物般的恐惧。恐惧是他们的重心，是他们灵魂的色调。人们想像男人就是力量，能够自制……这是浑话，那些人什么也不明白。”

她大笑起来，接近于年轻人的笑声。一股压抑很长时间的力量从她身上迸发出来。

“菲立普，我们谈得很少。为什么今天晚上一切如此不同？”

她拿起一支香烟，干净利索地点燃了。我透过那股白烟看她的脸。她那打褶子的眼睛里露出一丝难以捉摸的光。

“菲立普，你呢？我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谈论你吗？因为你是我的儿子，我就应该沉默不语吗？我知道大多数母亲都

有那种可笑又有害的癖好：把她们的儿子看成神祇，看成世界未来的主宰……”

“我承认你没有那种癖好。”

“请你不要讽刺。事情已经够复杂了，不要再火上浇油！我认为我这个生来不会当母亲的人跟你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你应该感到高兴。特别是你给我增加了不少麻烦。我一直清清楚楚、心平气和地看你，从来不像那些容易上当受骗娇惯孩子的母亲。我真喜欢你身材更高大些，相貌端正些，脸上少长些疙瘩。你少年时，脸上长了一脸的疙瘩，我想像这与我不无关系。你穿衣服的样子古怪得很，你怎么打扮也不行，好像是从旧衣店出来的。后来你是不是有些长进呢？长进不大。唉，你和别人不一样，我是说和所有的男人不一样。虽然你是我儿子，我也能看清问题。你真的并不笨，也不怯懦。我们姑且把它叫作……胆小退缩吧。你的优柔寡断不止一次使我羞惭，不过，我得承认你从来没有试图装模作样显得比你本人好些。你有自知之明。这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你心眼不坏，只是脾气不好，像弱者一样。你不要想像我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感情把你描绘成一副可鄙的模样。相反，我用你我都具备的的那种犀利目光看你。男人的不幸在于他们不能正视他们的弱点。你辱骂我、威胁我时，我知道该怎么对付你。我知道你也会对付我。你像一个孩子，像一个幼小的孩子那样脆弱。

“我不大容易想像你和女人相处的情形。你会说这不是我的事，你说得对。不过你只说对了一部分。当母亲的难道不应该了解她孩子感兴趣的一切事情吗？我不是那种专断、有占有欲的母亲，会妨碍生活，妨碍在原处打转。你没有什么可以指责我的地方。我一点不知道你和女人相处的情况。

你追过女人，你很有节制，再说你做任何事情都有节制。这是你个人的优点，你的特征。你没有迷恋上咖啡店、夜总会里闲逛的荡妇、极其无知的蠢女人。波拉姑娘来得是时候。她聪明、富有同情心。依我看，她应该写小说。好了，咱们不谈这事了。我看不惯你对她粗暴、无理。再说，你不是那样的人，她也不是那种人。她不会忍受的。过去，不很久以前，女人默默无言地挨打受骂。她们忍气吞声。她们甚至感到高兴：他对我拳脚相加，他拿走我的苏，可我还是爱他……谢天谢地，那个时代过去了。今天的姑娘会生活。她们还会看错人的，是吧？……但是她们陷进去快，拔出来也快。首先她们不结婚。我不会指责她们……波拉姑娘对你有意思，这很好。可是，我可怜的菲立普，你懒散惯了，连我都不知道你在忙些什么？你怎么能这样混日子呢？这能叫生活吗？你甚至算不上漂亮。真叫人难以理解……请给我一个火（夜里的第二支黑猫牌香烟在她食指和中指之间烧完了）。谢谢。我知道我使你心烦。像今天这样的晚上，我应该对你说些中听的话。总之，说些让你高兴的话。但是这不可能，完全不可能。只有真心话能使黑夜变得更加美好。你知道我讨厌寒冷昏暗的冬夜。我只相信友谊、友爱或者真情实意……”

沉默了几分钟。是的，需要真情实意。真情实意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周围、在小厨房里浮动。幽灵般的真情实意把我们聚在一起。我一点儿没费事就让妈妈同意我们夜里的谈话完全是偶然性促成的，而不是温情、母子之情或者某种吐露心曲的愿望促成的。我们互相说过的话，我们互相要说的话，本来也许永远不会说出来的。要是托尼·索昂来了，那天晚上一定会是另一个样子。如果果真是那样，她会像刚才对我大发议论那样对托尼进逆耳忠言吗？不会的。他们很久以

来相互间已经没有什么话好说了。那么，他来电话说他来不了时，她为什么发那么大的脾气呢？是因为她讨厌最后一分钟变卦，因为她有她的习惯，还是因为她想到冷冷清清的晚上就害怕。是一些闪烁其词的回答。如果一切像应该发生的那样发生了，他们会谈些什么呢？我当然不可能确切地知道。我猜测他们一定会谈托尼·索昂即将去旺代的事情（总之，谈提前退休的事）所以，他们一定谈到过阿歇尔工厂的生产状况及其远期、近期的前景……他们还可能谈购买新电子机器，在伊夫里一带购置更宽敞的地皮的问题……最后他们还可能谈到我对这些关系我们前途的问题毫不关心的固执态度。由谁接替托尼·索昂的职务呢？托尼·索昂对这个反常的情况再一次感到忧虑。需要重新向我父亲请示吗？“我们的生意和父亲还有关系吗？他在什么地方？他不是老了或病了吧？”

“住嘴，菲立普，住嘴。”

她把这天夜里第三支黑猫牌香烟烟头在烟灰缸里压灭了。过了一会儿，她又捡起来抽。她把烟头伸到我鼻子底下。那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烟头。一头熏黑了、撕破了，另一头沾着口红。她突然平静下来，把烟头扔进烟灰缸里。

“你看，菲立普，战争不仅摧毁了城池、一些地方，战争不仅杀死活人，还摧毁了活人，我知道这一点……战争造成了一些半死不活的人。泉水被毒化了，齿轮被砸坏了。当然，机器还在运转，但是它发出一种奇怪的嗡嗡声。你父亲么？我们能评论他吗？对我来说，这种愿望早已过去了。评论没有任何意义，不会在一个罪人面前给清白无辜的人带来良心上的平静。谁清白无辜？谁有罪？恐怕连上帝也弄不大清楚，也不想去弄清楚。人们能评说的唯一一件事情是自己的痛

苦。当然，他碰见另外一些女人。那对我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不过我能够理解，能够忍受。战争、秘密工作、长时期的恐怖，这些理由足够了。我不把自己看成是受欺骗的女人。他小心翼翼地把他有外遇的事瞒着我。我被遗弃了，我被粗暴的、最终的遗弃了。我的心如槁木死灰。这些事，你是知道的。他对你很重视。他坚持让你上路易·勒格朗中学，不让你在别的学校读书。他通过托尼·索昂关心你的学习。他派托尼·索昂来不仅仅因为他是商业方面的干才。他让托尼·索昂作为他的代理人照看你。我的存在又一次被否定了。好像没有我这个人似的。当然，这怪诞的蒙太奇① 只产生过一两年的假像。托尼·索昂不辱使命，我承认。他努力试过，但是父亲不是自封的……最后我们都中了圈套。中了战争的圈套，中了谎言的圈套。我们的生活变得杂乱无章。是的，像奇怪的儿戏。我们的破船四面进水，舵失灵了。但是这没关系。去这里或那里都一样。当然，我本来可以献身于事业，或者报名参加U.D.F.②，或者为保卫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而斗争……是的，填补生活的空缺，自己骗自己的办法多得很。有时候，我对自己说我们过的是昆虫般的生活。我轻视我自己，我轻视我们。昆虫，是的，是还没有演化出来的微粒生物。我们的意识构成我们和千千万万我们这类昆虫之间的差别。对我们来说，形态不可能改变。我们永远不会是漂亮的昆虫，或者永远不会是有益的昆虫。”

我十分了解妈妈低声表达的思想。这常常也是我的思想。我也可以用同样的话表达那些思想。我知道憎恶自己的罪过

① 拼凑起来的假象，指谎言。——译者注

② U.D.F.民主妇女联合会。——译者注

和原罪一样大①，任何东西、任何人也洗刷不掉的。我曾想抹去那些过失，向前走去。我最后的希望叫波拉·霍真。我爱她，或者以为爱她。但是，正像妈妈说的，欺骗自己的方式多得很哩。

那个夜晚是充实的。那个夜晚是一颗钻石。

我们兴奋得两只手发颤。我们的两只手玩弄着叉子、盐盅，把面包屑揉成灰色的小丸子扔进盘子里。

整个夜晚，我们呼吸急促，动作紧张，苦苦地回忆。波光粼粼的河水在我们脚下流过。我们有力量挣脱出来向前进吗？我们清清楚楚听见载着另一些人的身躯的救护车的呼啸声，醉汉的叫声，行人难以理解的笑声，我手腕上表的可怕滴答声。我们可以看见高高的、不透光的阳台，两岸道路上无数道不停移动的黄色灯光——城市真正的光环。妈妈用她瘦削的手摸她的嘴。她的鼻孔紧绷着像神经过敏的人，或者像刚苏醒过来的窒息的人。我们两人感到无名的恐惧，仿佛置身于一个透明的船舱里，正在穿过一个陌生的空间向黑暗的夜、向不可知的抽象港口驶去。我们希望把我们的船停泊在那里，尽管希望非常渺茫。

她用那种不会受骗的母亲的神情看我。

“菲立普，你不舒服吗？”

“不，没事儿。”

大概，我的语气不够坚定。说实话，我难受得要死。眩晕，恶心。

“你等等，别动。”

① 原罪：亚当因违背上帝命令吃禁果犯下的罪传给后世子孙绵延不绝，故称原罪。——译者注

她忙碌起来。她蓝裙子上的花朵飞舞起来，像一副穿不透的盔甲，在电灯光下闪闪发光。我觉得被吞没了，猛然向下沉。我呼吸困难。没有任何理由。我在想一个理由。不，想不出理由。妈妈解释说我和我父亲一样娇嫩脆弱。她给我配制提神酒。她打开柜橱又关上，不知道在找什么药品。我看见她蹲在棋盘格子似的黄黑瓷砖地上。

忽然，桌子上出现几袋香料和一瓶香槟酒。克利科寡妇牌香槟酒。她给我解释说应该按埃佩尔内地方的习惯用高脚酒杯喝这种药酒，可是她总是喜欢用平喇叭口杯子喝，她说不出为什么有那种偏爱。我们有1900年雕花图案的漂亮酒杯。也许是这个缘故吧。她一点不想改变她的习惯。桌上添了两个酒杯。她捻碎两个干辣椒放进酒杯里，挤些柠檬汁进去，再倒些香槟酒。这种鸡尾酒有很好的疗效。

“你把这酒喝了，”她命令我说，“你看吧，立刻见效。”

发亮透明的酒加上柠檬汁就变得浑浊了。辣椒屑飞旋起来，一会儿跳动着在酒杯底部沉淀下来。我慢慢呷一口。清凉而辛辣。我觉得喝的是玉液琼浆。这酒使我振作起来。这酒像有魔力似的，把我们联合起来。渐渐地，我的心重新落在实处。我像遇难的人那样跌跌撞撞地从我良心的怪诞崩塌处苏醒过来。渐渐地，我明白我驾驭不了这天夜里的游戏。我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坚强。好比对弈，我还没有看清楚将军的杀着，已经落进自己的陷井里了。人们由于自负、愚蠢蒙住了眼睛，然后睁开眼睛。人们以为把对手陷入重围，迫使对方就范时，突然发现被对手巧妙地击败了。

我喝着，我想这酒对我大有好处。不能让妈妈猜出我走神了。不能让她知道我们到哪一步了，也不能让她知道我们

玩的是什么把戏。是的，我娇气、脆弱。这个解释尽够了。我不无虚伪地把她引到一条错误的路上。

"这酒叫什么名字？"

这酒叫提神鸡尾酒。我从前喝过，但是我不记得了。这方子是早年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可怜的产妇难产时一定得用这种酒刺激机体。在其它很多情况下，效果也很好。一定能治好你的病。再说，妈妈记得的方子有的是。有些方子是前人传下来的。妈妈家里总是用药方治病，通常是为了省钱。请医生、买药都要花很多钱，虽然香槟酒……我慢慢地从黑暗的深渊里出来了。

夜，美丽而明亮。我欣赏琳琅满目的夜色。我过早地放松了警觉，我自以为安全。和妈妈谈话进行得十分顺利，非常融洽。但是这只是幻想、障眼法。她和我说话，谈到煎药，容易使人饱胀的食物，清凉油膏、涂擦剂……这些秘方的主要成分是芥茉、天仙子籽、火石、金丝桃、老鹳草……

"你要香槟酒吗？"

"好的，再来一杯。"

很明显，我们至少要喝掉这一瓶香槟酒。我不再听她讲话了。她即使发现了，脸上也不会表现出来的。那是从前的偏方千例，民间药方杂志。她自己很少用那些方子。因为她通常在比西街药房买药。不过那些方子全在她脑子里。她不是因为孝心，也不是因为相信那些感性知识的效力才记住那些方子的。妈妈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及随之而来的暴行、食品定量配给时，那些知识将是必不可少的。很明显，那时药品试验完全无法进行试验和生产。这一切还是假定（不大可能成立）在不使用原子和中子武器的情况下发生的。她一一举出金车酊剂的灭菌、愈合功效，杜松子焦油的收敛、抗疥

疮效力，芥子泥治疗中黑芥末的各种用量（我童年的惨痛回忆，她给我讲一个鲸鱼的故事，讲了40秒钟，这时我娇嫩脆弱的皮肤忍受着泥罨剂的腐蚀），最后，她谈到3％的皓矾溶液治疗狗的耳卡他性炎的效力。这时我陷入白日梦中。我又回到童年和战争年代，又看见英雄了①。他还像过去要离开我们去执行危险、吸引人的使命时那样，还像我入睡前出现在我想象中那样。

我进入一片树林。我以为从我记忆中永远抹去的那个人就藏在那个树林里。我走到潮湿的树林中央，那里有像意大利五针松一样浓密的种树、叶簇。那里有一条看不见的、致命的断层。英雄携带着他的全部武器在那里战斗。遮盖过去的积满灰尘的帷幕突然拉开了。眼前的布景像在后台或者顶楼上发现的布景，像刚制作出来时热烈、鲜艳的其它失去的布景后面的布景。这时，旧剧院的门打开了，脚灯一盏也没有烧坏。

英雄穿一条蓝长裤、一件饰有金线的醋栗色军大衣。那既是他的军服，也是他的节日服装。我从来不觉得他那身衣服可笑。他腰带上插着机枪、手枪、军刀和手榴弹，那模样和去钓鳗鱼的列那狐②十分相似。在林下灌木丛里，他警惕地注视着一切，派人架好速发炮、埋设引线炸药。他指挥一团像他一样年轻漂亮的士兵。他赢得配置着坚固阵地的士兵的信任。树林是一个遭受蹂躏地方的跳动的、流血的心脏。可是，这心脏跳动着复仇、解放的节奏。

广阔的天地是他们的战场。敌人从四面八方发起攻击：敌师团用火网封锁住神圣的树林。敌工兵在挖地道。敌轰炸

① 指男主人公的父亲。——译者注

② “列那狐的故事”中世纪法国民间长篇故事诗。——译者注

机中队向树林投下一串串炸弹。大炮日夜轰响。伞兵特遣队刚刚落进树丛里，树丛便像池塘里的黑水那样闭合起来。伞兵得不到半点便宜。这个抗敌据点是坚不可摧的焦点。

英雄和他的部下是那辽阔战场的主人。一次次进攻被粉碎了。树林边上尸体堆积如山。敌人把尸体装在汽车上运走，像水车那样不停地运往德国。德国那边，母亲们嚎叫、抱怨，要求结束这场疯狂的战争。但是，什么也不能使这场战争停下来。这场疯狂战争的特性就是没有限度。成吨的碎岩石、伤痕累累的橡树——从树梢劈到树根的千年橡树——崩塌在鼹鼠身上。炸弹落在长满青苔的地里没有爆炸，落在装甲防御工事顶上炸成碎片。炸弹重新被启用回敬给敌人。敌人的伞兵挂在树枝上。英雄和他的伙伴们把他们采摘下来。侥幸降落在地上的伞兵被手榴弹、手枪、大刀消灭了。抵抗战士把他们吊起来，千刀万剐。战士们用树枝生火，用烧红的刺刀捅瞎他们的眼睛。敌人的哭嚎声响彻森林内外。

我仿佛经历了所有的战斗。在这些屠杀中，我是一个毫不留情的刽子手。我力大无穷。我满腔怒火和仇恨，不过我说不大清楚。对一个十岁的孩子，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敌人意味着什么？有时，当我掐脖子，当我捅破肚子，当我全身肌肉绷得紧紧的，当我的嗓子嘶哑不能出声时，我感觉我杀死的人或我折磨的人是在替人受过。那些人和我们经受的战争毫不相干。那是另一码事，我只能意会，却说不出所以然来。

敌人心胆俱裂（我也害怕），他们发起疯狂的反攻。浑身是血、眼睛失明的幽灵从前线退下来，仍然被派上前线。他们抓住荆棘，紧紧附在上面像被粘住的鸟儿。他们哼哼唧唧，苦苦哀求战士结束他们的性命。他们也踩在地雷上，或

者绊倒在捕兽索套里。艰难地到达树林边缘的人恳求他们的伙伴解除他们的痛苦。不时可以听见清脆的慈悲射击声①。

英雄和他的士兵对敌人既不宽恕也不怜悯。英雄和他的士兵都体现在我身上。我就是他们。我一个顶他们全部。当然，我曾经每天看见穿灰绿色军服的士兵列队从警察局走到圣·米歇尔桥，从圣·米歇尔桥走到新桥。他们去执行整顿法国混乱秩序的任务。有时候，他们在能晒死牛的阳光下行进。另一些时候，他们在滂沱大雨和鹅毛大雪下走着。那些年轻士兵是从曼海姆或汉堡，或是从勃兰登堡，或是从荷尔斯泰因等偏远省份来的。他们的嘴唇发青毫无血色。他们的腮帮子绷得紧紧的。有时候，他们唱着使人振奋的、雄赳赳的歌曲。我对他们没有真正的仇恨。可是，在梦中藏在我内心深处的这种仇恨在他们中间找到了替罪羊。

解放的明媚的日子和那个梦境十分相似。八月的一个早上，我曾在阳台上看见巴黎市民掀起铺路石、垒沙袋，以便更好地用机枪扫射警察局高大的窗子。我高兴得仿佛胸膛都快要炸开了。我想和别人一起去搬运圣·米歇尔滨河路上的石块，爬上临时防御工事窥视敌人，偷一件武器……当然妈妈是不会同意的，并且威胁说如果我不听她的话就要训斥我、体罚我。迫于形势，加之年龄太小，我不得不让英雄一个人去实现我的战斗愿望。因此，他就在我想象中扎下了营盘，占据了我的心和我的脑海，每天夜里在那里演出一幕幕雄壮的戏来。

那些屈辱和无可奈何的日子使我养成一种有破坏性的好斗心理。我习惯把我的好斗性格隐藏在谦逊、有时近乎于怯懦的外表下面。同时那些日子几乎矛盾地使我产生一种信

① 指使重伤员免受痛苦而给的致死的一击。——译者注

念，应该正视厄运，应该解开或斩断结子。当障碍显得无法逾越时，那些日子也使我产生不可遏制的怒气，产生不顾一切克服它或砸碎它的激情、意志。我现在对和平主义及其鼓吹者的憎恶也是从那时候来的。协同建造屠宰场的就是在去屠宰场路上咩咩叫的愚蠢的绵羊。

我以为遗忘的那些旧日景象及别的一些不那么古怪的情景顷刻间浮现在我眼前。英雄也是一个穿灰衣服的小个子，他把皮包放在过厅靠墙的桌子下面，就是雷娜太太每天早上放我们的信件、报纸的那张桌子。他利索地用同一个姿势整理一下他的领带，拉一拉衣袖和卷边。他从一个红皮匣子里掏出一把角质梳子梳梳头发。然后他打开身后的壁橱（我和妈妈放旅行装的壁橱）取出他的大衣从容不迫地穿上。他总是先穿右边的袖子。他关上壁橱门转身照照镜子。镜子里的形像肯定既雅致，又符合抵抗战士的秘密工作原则的。他有条不紊一丝不苟地细心打扮。最后他在出门之前，在大衣领和外衣之间围一条灰色或褐色绸围巾。他穿衣服时嘴唇显得比平时更薄、抿得更紧。他右嘴角翘起的胡子下边有一道几乎看不出来的皱纹。这给他脸上增加了一种恶意嘲讽的表情。也这种表情，我只在这种场合看见过。我又害怕、又自豪地走到他面前问他是不是去打仗。“你别害怕，”他回答说，“我去弹钢琴，我不会出事的。”我从他说话的语气、他闪烁的目光里看出来他不愿意或者不能明白地告诉我。我猜想他是按照他的方式作战的。我不怀疑他参加过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主要事件。我很快就知道钢琴是收发报机，我想我是从妈妈那里听说的。我父亲用那台机器给英吉利海峡那边拍发过绝密情报。

穿灰衣服的小个子转身往回走几步。他吻吻我，对我

说："现在，你去睡觉吧。"然后，他向房门走去。妈妈就在门旁边等着，眼睛红红的，两手揉着手绢。穿灰衣服的小个子吻吻妈妈。他用嘴唇轻轻吻一下。接着他喃喃地嘱咐什么事情。如果电话铃响了，应该拿起话筒等对方问帐目是不是整理出来了。对涉及到他的问题，应该说普塞先生在外省，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这么回答，对方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因为宵禁，他得赶紧走。门关上了。他向我挥手道别。妈妈插上门闩。我们听见他在楼梯上的脚步声越来越小。大楼的门开开了，沉重的门闩碰在中侧柱上。房间里又是一片寂静。妈妈靠在门上，喉咙发紧，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趁这工夫跑到窗子旁边，不顾宵禁的命令，想看着他离去，想从他走的方向猜测他秘密接头的地点。通常他总是穿过码头沿新桥方向走，笔直朝前走。他开岔的大衣下摆拍打着他的小腿肚子，步履矫健。他给我的印象是他有不屈不挠的决心。越来越浓的夜色、他周围灰蒙蒙的雾，所有这一切增加了他出发时的神秘气氛，我也很感动。有时，我想哭一场。但是不应该哭。那是战争时期。我应该坚强些，应该明白些。灰大衣在烟雨中变得模糊起来。

我跑到妈妈身边，想用胳膊搂她。她机械地用手抚摸我的额头。我对她说战争要结束了。德国人要回他们自己的国家。我们要一起去参观凡尔赛宫的王后村和特里亚农。那两处建筑，我只在照片上看见过。妈妈对我说好。她还在哭泣，我的努力毫无结果。

她把我送到床上。那些晚上，英雄的形像在我心里变得越来越高大，我的疑问逐渐消失了。每次他走的时候总是自称普塞先生。我觉得那名字很滑稽。有时我听见妈妈喃喃低语，她好像在说服自己："他搞情报工作，不会有危险的，

他不会被捕，他很谨慎，不会……”她的话和我的梦、我的愿望一点不吻合。我知道英雄冒着真正的危险。我深信他有生命危险。在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当妈妈眼泪汪汪地对我说他不回来时，我的问题脱口而出："爸爸死了吗？"她的回答是难以理解的："不，他没有死。"我脑子里乱成一团。

大约是凌晨三点钟。城市沉入平静的睡眠之中。到处都有看不见的人在干活儿。他们注视着气压表，打开、又关上石头、玻璃、钢、水泥客轮底层的闸门。他们的工作像静悄悄的、摸不着的梦。四面八方睡着的人喘着长长的气息。失眠症患者的身体传导着电流：节日的幻想、死的幻想。另一些人把他们的赢利和损失用无可辩驳的可笑的数字列出来。还有一些战斗，爱情肉搏战。好些人把手伸进药柜里寻找安眠药、巴比妥酸剂。那些药品可以使他们陷入遗忘之中。还有一些人无力地互相看着，起身去上工。他们看见自己在空荡荡的大街上走着；闹钟响起来时他们精疲力竭地睡着了。喜爱黑夜的作家像猫一样静悄悄地写作或闲逛。很多人把心爱的男人或女人的平静的身体搂在他们完美、脆弱的胸前。

一辆汽车在林荫大道上呜呜地驶过。汽车过后，空气又变得像死水一样光滑。

我挣脱了父亲的羁绊，爬到陌生的岸上抖动身体。妈妈对我叙述她的身世。这事是怎样发生的呢？

她的回忆像刚从盒子里取出来的包在薄纸里的小物品那样新鲜、完好无损。她自己也感到惊奇。

“好像是昨天的事情。”

我点头表示赞同以免打断她的思路。她的叙述对我是极其新鲜、宝贵的。

妈妈的童年是在比利牛斯山区度过的。呢绒店制作男女服装。她母亲年复一年地工作劳累过度，再不能去车间监督女徒工干活了。店里的业务缩小了，只收男活。图卢兹是一个赏心悦目的城市，气候宜人。但是由于车间减少了，难以维持生活。“得上巴黎去……”她从幼年时起就听见这句口头禅。迟早有一天我们会去的。去首都就意味着离开家乡。所以要经过慎重考虑，然后作出决定。因此去巴黎的事只好向后推。尽管日常生活一个月比一个月窘迫，行期还是年复一年地向后推延。

吉塞尔订婚后，第一个去首都。从那一天起，家里的困难稍有一些缓解。父亲因为爱女婚期临近喜形于色。外祖父拉卡兹在行动上和思想上喜爱吉赛尔甚于吉内特。说实话，他眼里只有她。妈妈的嗓音低下来，说话很吃力。

“菲立普，我很痛苦。我嫉妒吉赛尔。父亲只和她说话，只谈论她。她长得漂亮，人人对她夸耀她。我呢，他看着我什么话也不说。他那神秘莫测的眼睛闪着嘲弄的光看着我。父亲和她一起时亲切和蔼。真叫人受不了。

“我母亲很忧伤。她病得神情恍惚。她喜欢看书，看的书很多，什么书都看。吃饭的时候也看书。家务事她一概不管。一个来自巴斯克地方的姑娘给我们做饭。那姑娘放心大胆地报花帐。妈妈一头扎进书里，别人给她什么她就吃什么。这一切使我父亲心烦意乱。她对他的指责只是翻白眼、唉声叹气。她那神情像医治不好的疯子。爸爸一气之下，丢下刀叉离开了饭桌。他躲到车间去了，上手裁缝用专为过

滤咖啡的袜子①给他过滤了一杯哥伦比亚咖啡。他仗着这一杯咖啡干一下午的活。他有时候干到深夜，和谁也不说话。那不是人过的日子，那不叫生活。

“只有吉赛尔的婚事——出于对社会习俗和家庭礼仪的最大尊重——才引得出他们这样的话：‘娶吉赛尔的男人绝不会抱怨新娘太漂亮的’。两人摇头晃脑脸上露出得意之色，舌头嗒嗒作响。我是一个感情外露的人。家里人只是在要我做事时才和我说话，比如去取活儿或者送活儿，饭桌上递面包，卷布料，洗碗，要我换裙子之类的话。因为我身上的裙子太脏会给顾客留下不好的印象。他们对我从来不说一个谢字。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吉赛尔有她的角色要演，那就是漂亮、容光焕发、讨人喜欢。我有我的角色要演。她在学校里用不着用功，她学业上的进步会受到表扬、奖励。我学业上即使是最优秀的成绩也只能得到有限的称赞。这是不用说的。很明显，我对学校和学校的许多限制很快就厌烦了。

“我从父亲那里得不到鼓励，有一段时间，我转而向母亲寻求安慰。这同样是白费气力。我得到的只是一些使人不快的回答如：‘别老是缠着我！’或者‘你可真缠人啊！’妈妈确实不是一个慈爱的母亲。她尽到她的责任了。她生下我、哺育我，把我抚养成人。这是主要的。不能再要求她什么了。不能再要求她和我说话，不能再要求她笑，也不能再要求她抚爱我。菲立普，你看出来，我母亲什么也没有教会我……”

一股股新鲜空气吹进厨房。天上渐渐发白的云、汽车行

① 从前法国人煮咖啡时，习惯用新袜子过滤。——译者注

驶的嘈杂声音预示着天快亮了。妈妈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她的手指头在烟缸上颤抖。她低沉嘶哑的声音也在发颤。她和我谈她父母亲时的痛苦、专注神情，我从前没有见过。她那神情好像是在揭没有愈合的伤口上的绷带似的。

学习已经引不起她的兴趣了。不过她还是“读”到了高中一年级。可是不可能通过中学毕业会考。她长时间旷课一点不在乎。校长找她谈过话，随后又找家长谈话。毫无用处。学校决定允许她作为旁听生随班就读。学校不同意把她列入正式学生名单。那么怎样打发时间呢？她在图卢兹大街上闲逛。一天晚上，她父亲骂她是小娼妇，她满不在乎地冲他笑。她结识了一个伙伴。那是一个巴斯克姑娘，她做得一手好甜椒炒蛋，是康博附近艾英诺阿镇人。

“那姑娘起了一个西班牙名字：玛丽亚·布兰卡·德尔罗西奥维多利亚·阿里兹德基。家里人叫她布兰卡或布兰谢特（白皮肤的意思）。她的名字和她这个人不相符。她的眼睛、头发都是黑颜色。她圆圆的眼睛是深黑色的。她的头发卷曲。她身上的一切都吸引着我，使我着迷。她和我完全相反。有时候，她使我想起吉赛尔。她仿佛是一个长得略微逊色、但却更富有朝气的吉赛尔，她的皮肤例外：她的皮肤雪白，有时显得格外苍白，人们会打听她是不是得了妇科病，是不是应该尽快把她送回她村子里去。

“我很喜欢她，甚至可以说我爱她。我想她也爱我，不是女仆人对她的小女主人的爱，而是对无话不谈的伙伴的爱。夜里，我们习惯趁家里人都睡了的时候，在我们两人中任何一个人的房间里会面。我们在一起玩得很开心。我们吃饼干，喝波尔图葡萄酒，酒里掺一点从楼道水龙头接来的水。我们相互倾诉内心的隐密，我们随便编一些故事来讲。

“布兰谢特清楚地意识到她的社会地位低下，但是她并不为她仆人的身份感到羞耻。我们可以随便谈论这件事情。她怨恨她父母亲（富裕的农民）把她‘安置’在远离亲人和朋友的地方。她只有十五岁，但是她的自信心比得上十八岁或者二十岁的姑娘。她攒钱的决心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她计划积蓄一笔钱去某个国家的首都——马德里，巴塞罗那，罗马或者伦敦。她要学英语。她教我地道的西班牙语。我教她蹩脚的英语会话。她在她选中的首都站住脚后就会钩引上一个有钱的年轻人（可能的话，还得漂亮）。她对我详细描绘那个年轻人的相貌，我听得目瞪口呆。因为布兰谢特把非常实际的主张和惊人的梦幻力结合起来。我们谈论西班牙男人、法国男人、英国男人的优点。其实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我们能在一起相处，感到三生有幸。俘虏一个可爱的王子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只要有机会看见他从面前走过就行。据布兰谢特说，姑娘们具有某种只能提供一次、花费一次的本钱。那笔资本足以吸引任何一个可爱的王子。需要小心稳妥地行事，钓一条大鱼，让鱼上钩，看准时机起竿。世界上合乎正常秩序的事情是最容易的。布兰谢特心里没有丝毫怀疑。所以我心里也没有任何怀疑。对于她谈到的本钱的性质，我只有一些极其模糊的概念。由于她的解说和我们的共同探索，我才有了比较准确的了解。她还对我说我们应当按最高价值估计我们的本钱，不要害怕在拍卖的决定性时刻抬高价格。我们应该想到把我们的本钱兑现，这不能马虎，否则我们永远是愚蠢的女人。总之，我们应该想着善价而沽。因此我们理所当然地想知道我们是不是真漂亮，即我们能不能找到买主。我们一点儿把握也没有。布兰谢特用她掌握的大量成语给我们鼓气，什么‘太漂亮的女人必有爱情上的苦脑呀’，什么

'化妆品愈好姿色愈美呀'。我要她给我解释那些话的意思，发现原来她懂得的并不比我多。她村里所有的人从小就学那些人人都懂得的道理，但是他们并不一定非理解它们的意思不可，只是从经验和时间的启发中去体会那些道理。"

"我们知道我们必须战斗。为了熟悉我们的武器，机会到来时我们能更好地使用它们，我们毫不宽容地检查我们身上每一平方厘米。我们的嬉戏常常猥亵而天真。我们的比较不局限在解剖学方面。布兰谢特按照山区的秘方配制出精妙的混合剂，可以使皮肤细腻光滑。她微薄收入中的相当大一部分用于配制玫瑰香水、橙花精、蜂蜡、甜杏仁油、香柠檬油、橙花油及其它化妆品上面。我也跟她学。我们配制秘密的合剂，把那种合剂涂在身体的各个部分，花费好几个小时。我记得我们配制的酒精、安息香、硼砂合剂能使脸上的皮肤光洁。还有润脖子、胳膊、胸脯的好几种合剂，我们统统称之为'cold creams'①。我们使劲用手把美容霜揉进我们裸露的皮肤里。有时候，我们喝大量掺水的波尔图葡萄酒。我们笑个没完。我们谈论伦敦。据布兰谢特说，伦敦是欧洲最大的城市。我们谈论伦敦稀奇古怪的钟。我们谈论有一天会迷上玛丽亚·布兰卡·阿里兹德基，会娶她的老勋爵，那是一个有哮喘病的百万富翁。有时候，我们搂在一起睡着了。要是让人看见我们这个样子，我真不敢想会发生什么事情。幸好我和布兰谢特被打发到四层顶楼上。我们是另一个世界的下等人。没有人会想到看看这个被遗忘的角落里发生的事情。要是妈妈上过一次楼，看见我们赤身裸体睡在一张床上，一定会把我当作魔鬼附身的人对待，布兰谢特一定会被

① 英语意冷霜。——译者注



处以火刑的。是的，布兰谢特那小姑娘，我爱她，我很爱她。你瞧，菲立普，我对你说这些一点儿不觉得难为情……”

我再听不见自来水落在洗碗池里的滴嗒声，也听不见从小窗户透进厨房里的嘈杂声。电灯光一阵阵亮起来，我们眯起眼睛。我的倦意消失了。看来妈妈和我一样，在夜的抚摸下觉得十分舒畅。

“布兰谢特后来怎么样了？”

“嗯！我这就给你讲……那是一个简单又复杂的伤心的故事，因为它和我的故事、我家庭的故事是联系在一起的。我把那一切深深地藏在心里……不过，你不要误会，讲出来我心里也痛快些。好比在做游戏似的，我摇动回忆这个万花筒，我看那些画面。菲立普，我和你一起看那些画面。多么奇怪！我再不愿意做一个坏母亲。你从来不向我提过多的要求，我给你什么就是什么。在生活上，你总是给我方便。我可以给你讲布兰谢特的故事和我自己的故事。我的故事和她的故事是混在一起分不开的。我们有两年的友谊不分彼此。然后，我们就失去联系了，或者说布兰谢特消失了……”

“消失了？这话是什么意思？”

“那是在1935年。战前，西班牙战争以前。吉赛尔就要去巴黎，然后到北方去完婚。家里人只谈论这件事。学习，再加上家里这件头等大事使我心烦意乱。我决心把这些事统统抛在脑后。我要勤劳些，我要自己谋生。当时一个女孩子有这样的想法是会被人瞧不起的。我对这些，一点都不了解。我先找父亲谈话。和我意料的相反（要是我稍有点脑子，我本可以想到的），他平静而镇定。‘我同意’，他说，‘不过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你得学一样手艺，选一个具体的行业。’我这一辈子第一次和我父亲找到一个共同点。

我们立刻就谈妥了。离家不很远的一家医院给有足够学历的女孩子办了一个护士培训班。所以，我就进医院工作了。上午是理论课，下午是实习课。我们学习基础卫生常识，生物学、医学、药物学原理等课程。我们应当学会给病人铺床、读体温记录表，给病人塞便盆、肌肉和静脉注射、伤口消毒、贴敷料、抽血、洗尸体……总之，学习很有意思。我觉得在学习具体、实用的技能。我的学习成绩优异。班里的女孩子大多比我小两岁，都是从图卢兹近郊农村来的。我成为班里的大姐姐。同学们纯朴而快活。对我来说，没有一个同学像布兰谢特那样有魅力。只有她是我的朋友。整整两年中，每天晚上我都高高兴兴去找她，给她讲我白天在医院里的见闻，和她一起度过闲暇的时光。我们仍然像过去一样。我们的联系反而比过去密切了。由于我在医生、病人中生活，我知道一些趣闻，或者恐怖的故事，可以讲给她听。她给我讲她和我母亲之间因为买东西的钱或者她烧坏了土豆时发生的争吵……我们再不为那些斤斤计较的吝啬事情苦恼，我们想出一些新的计划。布兰谢特决定和一个西班牙绅士通信，他是一个真正的末等贵族。她会到马德里嫁给她的末等贵族。她在家里会使唤着成群的伴娘、厨娘、侍从、仆役……，海绵、抹布、篮子等家务活儿统统交给别人去管。可怜的布兰谢特哪里知道比利牛斯山外早就没有末等贵族了；那些人变成了乞丐中的乞丐。我对现实可能会给梦想设置的障碍逐渐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然而，我还是觉得布兰谢特的崇高计划是完全合乎情理的。我要是处在她的地位会想什么、渴望什么呢？我理解她要摆脱仆役地位的急切心情。我又变得快活起来。我并不因为每天看见病人、垂死的人变得伤感起来。倒不是因为我麻木，而是因为我如实地看待生活，直至

生活的终结。在家里（我逗留的时间很短），大家的关系缓和些了。父母亲对我的新工作并没有多加注意。我松了一口气。我不再有被人纠缠的感觉，也没有完全被人轻视的感觉。我重新积极地进入生活的航道。家里人免除我一部分家务劳动。

“吉赛尔的婚事终于有了眉目。确实是一位‘体面’的年轻人。这既说明不了什么，又能说明一切。我姐姐就要离开我们了，即离开父母亲。整整一个星期，妈妈眼睛是红的，嘴唇发颤。爸爸一直不说话，多么伤心！有人看我时，我也洒几滴眼泪。人人都信以为真，吉赛尔也不例外。可怜的蠢女人竟以为我会舍不得离开她。说真的，那次离别本身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影响使我烦恼：我姐姐就要开始她的生活，进入一个我不了解的天地，她变成妇人了，从而把我推到第一线。我也会步她的后尘的。从另一个角度看，她的婚姻就要给我打开通向自由的道路。不论她到什么地方，爸爸妈妈一定会跟她去的。父母亲和小两口会相隔一段距离。新婚夫妇应该享受独立生活。但是他们又不能离得太远，以免新婚夫妇误认为独立和自由是一回事。父母亲会有办法和她乘同一辆车、同一班火车动身的……用不着我担心。

“家里人得考虑怎样安置我吧。要带我走吗？要我抛弃我在最后时刻才开始的技能学习吗？我已经开始从事我那微不足道的职业了。每个星期，我在医院工作四个夜晚。我协助值班护士给失眠症患者分发清凉饮料。这样我可以挣得少量报酬。最初，家里人决定请布兰谢特照顾我。多开心啊！我们在图卢兹的房子租期是三年。我们两人可以舒舒服服地住在我们的房间里。车间和二楼的房间要转租给一个手艺人。显然，承租的人家照管我、供我膳食的时候，我家就

不用付工钱给布兰谢特了。那时候，布兰谢特就要被打发回她老家艾英诺阿镇了。爸爸把这个决定告诉她时，她哭起来了。我为这事责备过她。这对她不也是一次争取自由的机会吗？她不是就要找到她的自由之路了吗？我们只须订计划就行了。

"吉赛尔临行前几天，布兰谢特带着证件和小箱子假装离开房间。她径直去医院。她得到护士长的默许，可以在一间休息室里暂住几个晚上。那时正是春天。早上她离开临时住处去逛大街小巷。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旅游。雅各宾建筑、圣·塞尔林教堂对她再不是什么秘密了。我下课后去新桥附近或南运河的陡坡上找她。我们无忧无虑。陷阱呀、障碍呀都不一定存在，遥远得很啊！我们从我们短暂的信念里汲取用不完的精力。冒险是希望之乡①。那样的地方很多，我们挑选不过来。最后我们选中西班牙。一切都促使我们作出这种选择。布兰谢特说西班牙语。她教过我一点入门知识。我们在运河边幻想我们在巴塞罗那的巴里奥吉诺过夜的情景，幻想我们在盖内尔利弗花园或瓦朗斯桔树下阳光明媚的早晨。我们永远生活在风景明信片上的秀丽景色中。漂亮的骑士用过时的殷勤高雅态度追求我们。我们没有遇到物质上的困难。那些先生满足我们的需要，迎合我们所有的愿望。我们头上总是阳光灿烂。夜里，我们躺在城墙下面手拉着手睡觉。我们穿过旧卡斯蒂利亚，在塞拉内华达墙垛上露宿。我们到达塞维利亚，加的斯。我们在乘船去美洲以前和茨冈人生活在一起……世界、生活，一切向我们的愿望敞开。我们就要出发了，我们出发……"

① 圣经故事，上帝赐给亚拉伯罕的迦南地方，意谓乐土。——译者注

妈妈累得嗓子都哑了。她好像很高兴回想起往事，很高兴讲给我听。我向她提议吃早点，同时要求她接着讲布兰谢特故事的结尾。小厨房里充满咖啡的浓香味。我仿佛也回到童年时代了。妈妈在我去路易·勒格朗中学之前给我煮了一大杯浓咖啡。无论如何得叫醒我让我清醒清醒，准备接受算术或拉丁文老师的提问。一片寂静包裹着大楼，揪住我们的心。

我从一个玻璃纸袋里拿出四片松软的面包。面包屑从我手指头缝里掉下来。

"我给你烤一下吧？"

"不用，谢谢。涂一点黄油就行。"

我不知道出于什么无意识的联想，想起了两个醉汉便笑起来了。

"你笑什么？"

"真的，没笑什么。我想起两个喝醉酒的人在打发他们的儿子上学以前给孩子喝一碗热酒。可怜的孩子到学校时兴奋得不得了，一个钟头没有安静，接着趴在课桌上睡着了。老师终于明白他喝醉酒了……"

"是的，我听过这故事，是战后那几年听说的。可是我看不出来这两件事情有什么联系

"这两件事情没有联系。"

"啊！那就好。你给我拿一片软面包，在上面涂点黄油，好吗？"

我得当心点儿，别把面包心捅破了。因为黄油很硬，不容易抹均匀。我仔细地涂了很长时间。妈妈食指和中指之间捏着一支香烟，她忘记点着了。我在盘子里放了三片面包，每片面包上涂了薄薄一层黄油，看上去像鱼鳞。妈妈拿了一

片面包把一个角在咖啡里浸一浸。

“菲立普，你瞧，他们走了，我心里真轻快！”

一阵沉默。接着妈妈又回忆起来：

“爸爸、妈妈、吉赛尔决定乘火车经巴黎去里尔。他们出发的那天早晨，未来的新娘子容光焕发。她眼睛发亮，像皮靴上两个发出不可捉摸闪光的铜扣子。她对自己十分赞赏，摆出高贵、可笑的神气走来走去。我们告别时显得十分伤心，其中的奥妙只有家里人知道。妈妈洒了两滴眼泪，把手绢重新放回手提包里。她嘱咐我不要荒废学业，在房客到来之前注意不要把厨房的洗碗池弄脏了。爸爸在站台上来回走动，脸上露出焦急茫然的神情，像候在产房外面的年轻父亲。因为吉赛尔要迎接另一种新生活了。他准备迎接这个事件，或者要装出激动的样子。吉赛尔面前展现出不可捉摸的美好的未来。他这个无可辩驳的父亲要准备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意外事情。总之，要娶吉赛尔的体面的年轻人，家里人只见过他的照片，所以，本人到底怎样还不得而知。新娘的父亲比谁都清楚像吉赛尔这样天真无邪的姑娘会碰见什么样的意外事情。再说难道不应该给新婚夫妇提供必要的帮助，让他们成家，给他们出主意、当参谋吗？……生意只是勉强维持着，不过会有起色的。他保证要开创一个新局面，把买卖的规模扩大到这不开眼的城市从来没见过的程度。他们毫无遗憾地离开这个城市。他坚定的步履、高贵固执的沉默态度充分说明情况的严重和他为应付这一局面所发挥的特殊才能。火车终于进站了。

“他们顺着看不到头的列车找他们的车厢和他们的包厢。他们吵吵嚷嚷，晃动着他们的手提箱，惊恐地喊叫，终于惊动了车站的工作人员和站台上的旅客。他们装腔作势的

样子骗不过我。不管在什么处境里，他们总要成为世界的轴心。他们在包厢里安顿下来以后，隔着玻璃窗向我招手，然后坐在椅子上。妈妈在招手。父亲起身把一个包裹塞到行李架上。火车还不像要开动的样子，他们又开始那一套把戏。当火车终于开动起来时，妈妈又掏出手绢在窗口挥动。她认为成功的离别非挥动手绢不可。吉赛尔和爸爸消失在远方以前向我扮了最后一个鬼脸。

"由于角度的变化，眼看着列车在第一个弯道上变得越来越小了。站台上的其它人和我一样，眼睛盯着列车直到它消失在远方。我有点惆怅。不过，我注意到我的眼睛是干的。我并没有长时间责备我自己。我向我的住处走去，我和布兰谢特约好了，她在那儿等我。两天后，我收到一张蒙帕纳斯火车站内景的明信片及另一张北方车站巨大外景的明信片。巴黎很宏伟。他们想着我。

"布兰谢特手里提着一只箱子在街上等我。我把她安置在我的房间里。有三周的时间是属于我们的。三周时间，我们可以随意支配房间、车间，甚至服装店。我们可以在这段时间里制订我们的计划。我们的房客（一个阿耳比的鞋匠和他的家眷）要过三个星期才到。我们决定在他们到达以前动身。不过我必须参加初级考试。如果我能通过考试就能得到助理护士的职衔。那样我就能挣得维持我们两人生活的钱。眼下，我在医院挣的工资只能使我们不至于饿死。布兰谢特在设法替我们搞到去西班牙的护照，她在准备轻便的行装。我们有条不紊地为冒险做准备工作。我们知道不能带箱子，否则行动会不方便。买两个登山运动员用的处理背包就够了。短短的三个星期过得愉快极了。

"阿耳比的鞋匠已经通知我们他抵达的日期。他不得不

提前48小时出发。碍我们事的人就要来了。我通过了考试，卫生、生物、护理病人三科成绩优异。我考了第二名。第二天我们就出发了。

“布兰谢特在店里的抽屉里找到一些哔叽布头。她给我们两人各缝制了一件合适的旅行装。有了适于行路的宽松裙子、有很多口袋的布上衣及我们的全部行囊，我们别提多高兴了。布兰谢特还缝制了两顶宽边帆布帽。我们毫不吝啬地买了两双结实的皮鞋。我们没有帐篷。我们没有钱买帐篷。我们将要风餐露宿。我们的旅费总共只有几百法郎，是我的积蓄和布兰谢特最后两个星期的工资。她一文钱也没有寄回老家。我们到达边境不会有什么困难的。以后的事，我们另作考虑。我们想像我们能找到活儿干的。我可以去救济院或诊所找活儿干，布兰谢特可以去旅店找活儿干，一直干到我们挣够旅费为止。

“我们把房门的钥匙交给对面大楼的门房，请她转交给从阿耳比来的鞋匠。我记得那位好心的女人在门房里看我们时的眼神，她见我们从头到脚打扮得像电影里的女探险家便问道：‘小姐们出去旅行呀？怎么就你们两个人？瞧，华而不实的姑娘！’”

“得编点儿瞎话让她不起疑心。这种事不大容易。她那一对小黑眼睛紧盯着我们。为了麻痹她，让她收下我们的钥匙，我们信口说我们要出门远足两天，并把我们回来的确切日期和钟点告诉她……她相信我们的话，或者装着相信我们的话。我们把钥匙放在漆布上便逃之夭夭了。不过她的疑心并未消除，她跑到门口向我们喊叫。她想知道我父母亲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八点钟，我们背对着太阳离开图卢兹，踏上去塔布的

路。我们的计划是经过圣让·德吕兹和昂代去西班牙。那不是一条直路。但是布兰谢特向我保证说去西班牙只有走巴斯克这条路，别的路有走私犯出没。1935年7月底，天气特别热。我们心情愉快、信心十足。仿佛旅途上没有任何艰难险阻。中午，我们已经走了18公里或20公里。我们两腿沉重，肚子也饿了。我们到达加龙河和阿里埃日河汇合处的上游，缪雷已经遥遥在望。我们在城里找到从山上流下来的拉鲁日河。我们躺在河边把随身带着的面包和巧克力全吃光了。我们的行囊减轻了，刚走了一上午给养就出问题了。我们决定走一程算一程，在经过的城市和乡村采购食品。一路上所过之处有菜园和果园。我们动了顺手牵羊的念头。生活不成问题。沿途物产丰富，老百姓不吝啬。我们吃生菜、水果，甚至捡麦粒用手搓着吃。

“我们计算过，按每天走25公里或30公里计算，大约需要9天能走到边境。当然我们一直落后于这个大致的行程表。我们带着一个加基科涅、贝亚恩、巴斯克三省简明地图。地图提供的资料十分贫乏，所以时不时碰见意想不到的情况，有使人愉快的，也有使人泄气的。有时碰见挤在葡萄园和稻田之间的无名村落；有时碰见一股可供我们解渴的清泉；有时碰见湍急的溪流，我们只能沿溪逆行由桥上过河；有时碰见幽暗的小树林，那是座落在崇山峻岭山腰上森林的前哨。我们从矮树丛穿过窄狭拐弯处的重叠扁平的弯道。

“过了缪雷后，我们朝偏南方向走，把隆贝和阿尔马涅亚克地区抛在我们右边。我们沿拉鲁日河走了一段时间，然后穿过萨夫河，塞依古瓦德河及根据不同时间、地点有时清澈有时浑浊的其它河流。沿途旖旎的风光消除了我们的疲劳。有时，自由的感觉沉重得使我们感到压抑。要是在另一些时

候，这种感受会在我们心里和头脑中激起波澜。

“我们在考虑乘坐朗默藏一带来往于各村落之间的公共汽车。我们在蒙特勒若附近。我们放弃了这个念头，不是为了省钱，而是为了享受新获得的自由，观赏那壮丽的山河、草木、农作物和岩石。晚上，我们在村落边的山坡上或者公路、小路边找一个栖身之所。我们要找能看见外面而不会被外面看见的地方。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找一处岩洞铺上树叶或干草，或者是一间筑路工人的棚子、一个废弃的谷仓、一个散发出牛羊膻气的羊圈。我们裹着毯子搂在一起睡觉。有时，半夜寒气很重。每天早晨，橡树上的莺和松鸦先于山谷里的公鸡把我们唤醒。我们立刻去小溪边沐浴或洗衣服。

“经过四天的跋涉，我们离卡斯特尔诺很近了，那一带有一个叫圣狼的村子。我们曾穿过一个叫布伦的村子。我们不止一次向一个镇子斜插过去。我们在指路牌上看见那个镇子的名字很有意思、好听、让人鼓舞、使人不安……加兰，卡斯代巴雅克，图尔内，姆尔杜斯……我们有意避开国家公路，碰见国家公路我们就拐弯。我们在沿路稀少的食品店、面包店买面包、巧克力及沙丁鱼罐头。

“有时候，警察、举止像乡村警察的老人或者像在地里锄西红柿的农妇用惶惑的眼光看我们。那时，我们感到奇特的自由压在我们肩上、腰上的分量无比沉重。显然，那是税务员看私盐贩子的眼光，户主人看偷鸡贼的眼光。那些诚实的人对一切活动的东西、对他们第一次看见的东西都是这样看的。也许他们以为我们是从教养所逃出来的？我们街对面的女门房没有看见我们按时回去，会不会报告警察局呢？在这种情况下，从佩皮尼扬到巴荣讷每个警察局都掌握我们的面貌特征。有人在跟踪、寻找我们……有一队警察在搜寻我

们。有人在十字路口、树林边上等着我们呢。

“那种冒险的前景给我们的长途旅行增添了有趣的色彩。我们时而向北走，时而向南行。我们竭力避开笔直、规则的大路。我们向南经巴涅尔、奥尔迪比及别的记不起名字的地方绕过塔布。我们这样弯来绕去地行走更加减慢了我们的行程。不过我们再也不为这事操心了，我们反而喜欢按想象中的路线走下去。

“我们面前展现出道路、激流，消失在云海中的峭壁，生长在半山腰、小山谷的庄稼，在可爱的平原上放射成三角洲的峡谷，在我们周围、头顶上四面八方呼啸而过的狂风暴雨的无垠的空间——我们一米一米走过、用我们姑娘孱弱的身体作标尺测量经过的空间。我只能在回忆和想象中找到那些印象。我后来的旅行再没有给我留下类似的印象。今天，只有攀登未被征服的山峰的登山运动员、在月光下穿过沙漠的走私贩子、根据星座辨认方向的孤独的舵手能有那样强烈的感受……每天早晨，我们心里的焦虑都减轻了一些。经过几天漂泊，我们就生活在时间之外了，也就是说我们和时间生活在一起了。我们决定在11点钟上路而不是在7点钟上路，或者决定在清凉的草地、栗树下休息一个下午，这些都变得无关紧要了。

“那次旅行（应该说那次穿越旷野①）的另一个乐趣是我和布兰谢特的关系有了变化。从图卢兹出发时，我们之间的主仆关系的最后痕迹尽管微乎其微，但仍然是存在的。这些痕迹自然而然地消失了。我的假定的优势是和学校、城市生活、阶级、金钱联系在一起的，这种优势在山地、果园

① 源出圣经指有危险的时期。——译者注

里就没有用武之地、没有市场，变成废物了。这一次，真正的优势在布兰谢特那一边。山的女儿是她，不是我。她能在三十步以外的地方认出鸡油菌或者岩蜜菌，我们用那些菌子改善我们的伙食。她能探测激流，她能在使我惊慌失措的旋涡中找到浅滩。她能像她村子里的男孩那样把胳膊伸进小溪的洞里，抚摸鳟鱼的肚子，把鱼捉住。她一眼就能辨认无害的水蛇还是灰褐色的蝰蛇。她能从枯树枝上找到蜜脾。她还会用蓍草汁止血，能使我们的气息带有野薄荷清新、辛辣的气味……布兰谢特每天都让我大吃一惊，她每天有新招儿。她悉心教我这些生活常识，我津津有味地学。

“我们穿过依泽斯特附近的奥索激流。那一阵子，我们只能靠自己的本领填饱肚子，因为那一带地方既没有食品店也没有面包房。我们避开村子向山上爬。我们在田边、地头拾麦穗。当我们拾到足够的麦穗时就用两块石头把麦粒磨成面粉，掺上蜜和成面团，用树枝生火烤饼吃。那是我们不能缺少的鲜美食品。我们的菜谱上还列着桑葚和草莓。我们感到无比兴奋。因为我们依靠自己生活。我们不再计算过去了多少个白天、多少个夜晚。我们甚至连这次旅行的目的都忘记了。西班牙是一个安全、遥远的地方。西班牙在我们前面，仿佛近在咫尺，远在天边。

“我们的新生活、打猎、采摘瓜果真是开心。我们想不出更好的生活了。每天晚上都是节日。我逐渐不再害怕乔木林中的风涛、林下灌木丛枯树叶的飒飒声、黑暗的矮树丛里野兽的奔跑、追逐声……甚至不再害怕碰见灰熊（总是可能的），我们偷走了它的蜜。我们在隐蔽的岩石边或在牧羊人的围栏后面生起火来，我们把毯子铺在厚厚的树叶和草地上。我们一面像姐妹那样说说笑笑，一面捏呀、搔呀、挠

呀……每天，布兰谢特变得更像我姐姐。我想象我对她也不再是她主人拉卡兹夫妇的女儿吉内特了。我们喜欢这种亲密的关系。我们两人搂在一起谈论这件事情。我们靠在太阳晒热的岩石上坐上几个小时，岩石的热气温暖着我们的身体。或者我们把毯子拉到我们身上。我们手拉手搂在一起。我们过着比图卢兹顶楼上更美好、更单纯的生活。我们留着薄荷汁的嘴唇结合在一起，紧紧地吻着。我在山上见到的布兰谢特不是图卢兹时的布兰谢特。我们是平起平坐的伙伴。菲立普，说实在话，我和男人、情人一起时从来没有享受到那样的乐趣……

“但是好景不常。故事的接尾和我们能够想象的大不相同。我们过了伊索尔和阿拉米斯。我们决定在我们绕过的埃彻巴尔步入崎岖的山路，我们可以经布尔丁和阿法尼斯山口到达圣·让彼埃德波尔附近。那时正是八月初，白天变短了。周围的山峰高达1200米到1400米。入夜后寒气很重。我们决定在九点到凌晨六点这段时间走路，白天在太阳光下面睡觉。黑夜行路速度减慢了。我们的食品几乎吃光了。山上这一带地方没有任何充饥的东西。光秃的山坡充满了敌意。沿途随处可以找到水，这里却找不着了。在山下，巨大的岩石、荆棘后面能找到泉水，或者在山上高处看不见的山顶周围能找到水。

“一天下午，我们躺在一个光秃秃的半山腰上。我们挨了一夜冻之后，太阳晒得我们浑身暖烘烘的。我们的蓝裙子洗的次数太多加上尘土，变成白裙子了。我们躺着像蜥蜴那样一动不动，我们一天比一天更接近土地的颜色。只有鹰的眼睛或者山民训练有素的眼睛能够看见我们这两个丑陋的人。

“我第一个醒来。太阳快要下山了。四周一片寂静，我清清楚楚听见布兰谢特缓慢轻微的呼吸声。她侧身躺着，一只胳膊枕着脑袋，另一只胳膊平行地放在平静的身体旁边。我出神地看着她那像蓝色钢屑似的鬈发，她舒展的眼皮说明她好梦方酣，我看她微微张着的嘴唇露出的牙齿。我感到十分惊讶。我为她那美丽的神态激动起来。突然我仿佛听见从不同层次的气流中传来的铃声。我注意听，那铃声传来又飘走了。上面什么地方，旋风把牲口群不清晰的声音传来又送走了。

“我长时间打量我们面前矗立的山坡，那坡势徐缓。但是在头几道起伏的岗峦后面，巨大的陡坡周围那一片片绿色的树林在我们小路周围和令人迷惑的牧场之间划出一道毛茸茸的界限。上面是凄凉的暗褐色峭壁，像比利牛斯山的峭壁。我仔细察看环绕牧场的毛茸茸的小路，想看看小路上有没有牲口和牧人。我徒然察看各个角落、树林边上的每个树丛。我既没有看见人，也没有看见牲口。清脆的铃声渐渐消失了。我莫不是在做梦吧？也许附近根本没有牲口群？我正准备放弃观察，忽然看见山毛榉和冷杉地带上方有一个流苏状的灰色印痕。那是一个小房子的房顶。一个谷仓顶或者是一个羊圈顶。我想象那儿要是有房子（即使是荒废的房子），我们有可能在那儿找到我们需要的水。我们将近有二十四小时没有喝水了。我们想洗洗澡、洗洗衣服。如果我们马上动身，天黑之前我们就能赶到那里，可以有一个栖身之处了。我叫醒布兰谢特，指给她看那2000米山坡上的小房子。一眨眼工夫我们就站起来，收拾好行囊，开始爬山了。

“我们没费事就穿过头几道平行的岗子，又翻过一个陡坡下到谷地，那片树林好像仍然在原来的地方。山坡上是灰

白色的石子。太阳火辣辣的。从下面看，那片林子仿佛近在咫尺，走起来却要一个多小时。那是一片老栗树、雄伟的山毛榉。高大、茂密的千年老树之间有一定的间隙，柔和的光线得以均匀地射进树丛。我们接近目的地时反而看不见那片树林了。我们按估计的方向前进。布兰谢特吓唬我说我们在这大山里可能会碰见猞猁或者狗熊。所以，我们小心翼翼地向前走，尽量不弄出声音来。相隔一段路，我们就绕过一些孤立的岗子、长满苔藓的褐色石堆。一些枝杈交错的大树环绕着岗子、石堆，俨然是看守陵墓的卫士。如果我们脚下的石头滚下去，如果一只看不见的鸟儿扇动翅膀擦着我们头顶上的树梢飞过，那该多么激动人心啊！我们呆立不动，我们的心抽紧了。我们两人都在想最好还是折回去，找到有测量标志的小路，找有人烟的地方。不过我们不敢说出来。我们心里感到一种冷漠的冲动。我们不能半途而废。我们发现到处是欧洲越桔树，我们很走运，越桔已经熟了。通常要到八月中旬以后才能采摘。我们采了很多越桔。

“我们徒然眺望那一片草场，我们不知道朝哪个方向走。显然，我们盲目穿过树林时偏离了方向。我们偏离了多少路程？偏向哪边？怎样寻找原来的标志？我们在山下隐约看见的栖身的地方现在是在我们右边还是在我们左边？水呢？根本看不见溪流的痕迹。只有继续向上爬，爬到能向下看见视野开阔的地方。但是动作要快。黑夜就要来临。我计算过，再向上爬150米准能看见灰褐色的房顶。布兰谢特受不了酷热。她几乎精疲力竭了。她留在树林边上，我开始爬山。我向上疾走。山上长着短而密的草，走起路来毫不费力。我用了一刻多钟就爬上高坡，那儿视野开阔，我转身向下看，在我右手足足一公里的地方，有一间小房被草木遮挡

住了，我看见那低矮的房门和射击孔。

“布兰谢特像蚂蚁那么小。我向她指指像羊圈的方向。我从近处下坡，几分钟内，我们就会合了。我们走近时发现一个山洞，像海关人员休息的地方。

“光线变成淡紫色，树林里热得喘不过气来，高原上却寒冷刺骨。我们察看一下四周的地势。在暮色中，屋顶上的石板呈现出血红色。房子的墙又高又厚。一面墙上有一扇钉着几块木板的门。经过风雨侵蚀、日光照射，那扇门变成银白色的了。其余三堵墙上只开了一个小窗洞。

“我们两人一起用力把门推开了。屋里几乎是一片漆黑。我们有一点犯嘀咕。这伸手不见五指的破房子怎么进去？我们的眼睛习惯之后，看出一个过道，里面堆着一捆捆干草或者麦秸，一把瘸腿椅子、一张凳子及一张桌子。有一架梯子通到楼上，上面多一半地方也堆着干草。我们稍稍放下心来。那地方可能是为进山放牧的牲口回来时用的饲料仓。我们决定在楼上干草堆上睡觉。这孤零零的饲料仓说明附近有泉水或水眼，我们要趁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找到那泉水。那是一条小溪，在不远的地方，约有200米。水从一堆岩石中间涌出来，流进一片茂密的绿色草地里，我们高兴得叫起来，把酸痛发胀的脚浸在溪水里。

“溪水冰凉，我们喝个痛快，还把葫芦灌满了。我们洗脸、洗脚。溪水向下流进我们看不见的一条小沟里。天黑了，加上寒气袭人，我们只好回到羊圈里。

“这天夜里，我们蜷缩在楼上芳香的干草堆里，感到十分暖和。我们商量好次日早上去附近察看地势，然后才高兴、疲乏地闭上眼睛。要是我们找得着食品充饥，就在这舒适的阁楼上逗留几天。我们没有精神长谈。那天夜里寂静得

像石头子和野草，我们一宿无梦。我醒来时，已经日上三竿了。布兰谢特不在我身边。我看见她的背包在原处才放下心来。我想像她在草地上散步、寻找浆果或菌子去了。

“我又睡着了。睡了很久或者几分钟，我说不清楚，菲立普。我第二次沉睡中仿佛听见远处有喊叫的声音。开始，我没有听清楚那声音。接着我相信那是布兰谢特的叫声；有疯狂的呻吟声夹杂着男人的嘶哑的命令声。我猜不出是几个男人。一阵短暂的沉默，接着传来草地上的脚步声。

“羊圈的门猛地被推开了。他们把布兰谢特推倒在地上。他们骂她‘娼妇！小娼妇！’她一边脸颊上全是血，她两手按住腰上断开的裙子。她强忍住眼泪哭着。我从笑声中听出他们是两个人。他们是在小溪旁撞见她的。她突然反抗起来。她吼叫着抓起椅子腿向他们砸去，接着向他们扔干草。他们扑到她身上。

“我失去知觉和感情。我浑身强直痉挛。我变成哑巴，动弹不得，说不出话来。

“那是两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其中一个身材高大。他们瞪着好奇、固执的目光。他们穿着破衣烂衫，腰上系着绳子。与其说是牧羊人，不如说是流浪汉。高个子抓住布兰谢特的裙子使劲扯。她也许在拼命咬他，因为他嚎叫了一声。他暴跳如雷，拳头雨点似的落在她身上。她蜷缩着，无力地呻吟。她那两只可怜的手挡不住有力的拳头。小个子先站起来，靠在墙上津津有味地看着那场面。那人揍了很久，很久。布兰谢特嘴里不出声了。她一次也没有向我呼救。只听见那禽兽每用力揍一拳时的嗬嗬声。他终于气喘吁吁地停下来说‘这贱货咬了我一口。她欠揍。’

“布兰谢特变成一堆模糊的肉、头发、蓝布和干草。她

一动不动了。不，她身上没有能动的地方了。那行凶的人站在她面前揉他那粗大的拳头。'她不行了'，小个子说。我以为他们把她打死了，'她不行了'，小个子走到前面说。他拨开她身上的干草。他仔细地慢慢地扯下她的裙子。布兰谢特的手指无力地松开了。那人是深颜色卷曲的头发。他像饲养牲口的人要在牲口身上打记号那样抓住她的胳膊和腿把她拉到他身边，他把她拖到草铺上，把她的两条腿分开。

"突然，布兰谢特痛得喊叫起来，满屋都能听见。那殉难姑娘的似人非人的痛苦叫声仿佛是从不可知的阴间传来的。我心里、脑子里响着这喊声倒在草铺上晕过去了。我醒来时黑夜笼罩着寂静的羊圈。

"楼下没有一点动静，我大着胆子向漆黑的井底看一眼。黑暗中隐约显出模糊的影子，接着，有极强的闪光照得睁不开眼睛。一个一动不动的身影在灰色土地上靠着一堆干草好像睡熟了。我叫一声，我的声音太微弱。布兰谢特没有答应。她灰色的身躯靠在干草堆上。我应该下决心克服我的麻木和怯懦。我扶着梯子下楼。我的脚踏在地上发出很大的响声。要是那两个暴徒在墙外边睡觉呢？要是他们听见我的响声呢？他们这会儿进来怎么办？我等着。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我看见布兰谢特。她没有改变姿势。她两腿分开贴在肚子上。她的胳膊、手、分开的手指试图保护她血迹斑斑的脸。我抚摸她的头发、手指，希望把她从痛苦、屈辱中唤醒。我注意到她的皮肤异常鲜嫩，同时也意识到我的怯懦。她曾用她执拗的沉默保护我。我抚摸她发暗、不动的肩膀。我又叫了一声。这一下我明白了。我确信事情已经无可挽回。我试图把她僵直的两手分开。突然，我摸着一手粘稠的东西。布兰谢特早死了，不是两名歹徒强奸至死的。现

在这十分清楚了。她非常顽强。一定有别的缘故才能像打死树林里的小动物那样把她打倒……我怀着怀疑、恐惧的心情寻找。他们还对她下过什么毒手呢？真相被掩盖起来了吗？布兰谢特！布兰谢特！……我把她的手从她脸上移开。她眼睛是睁着的，却看不见我。她胸口上有发黑的血迹。布兰谢特躺在她自己发黑的血泊中。干草和土地把她的血吸干了。她脖子上有一道宽宽的刀痕，是用剃刀那样锋利的铁器切开的深色口子。一定是那个高个子干的，我对此深信不疑。布兰谢特！我向空中呼唤她的名字。我嘴里没有发出声音。我的嗓子被沉重的黑夜凝固了。我们两人都是孤独的。我惊呆了，我觉得我快要死了……我既不能留在尸体旁边，又不能逃走。我已经摆脱可以计量的时间的约束，变成寒冷的月光下的一块山石。我蹲着。被毁坏的身体隐没在黑暗之中，只有那一双眼睛像梦想的宝石那样闪光。我向外面、向夏天寒冷的黑夜张望。外面，天气很好。外面，天空清澈、晴朗。我认为应该给她合上眼皮，可是我合不上，她的眼皮睁着。她的脑袋耷拉在肩膀上，好像一下子掉下来了。失去光泽的眼睛向下方看着。我慢慢地清醒过来。我第一次对周围的寂静感到放心。应该做点什么呢？”

妈妈沉默不语。我们的咖啡凉了。我们两人中间放着涂过黄油的面包片、香烟。也许我们不吃面包、不抽香烟了。还是那个问题：应该做点什么呢？那是她给她自己提出的问题。不，那是她在圣·让彼埃德波尔向警察局长提出的问题。显然，警察局问讯过她。尸体呢？还在山上。究竟在什么地方？她说不清楚。在一片林子上边、小溪旁的破房子里……后来，她听见什么了？她碰过尸体吗？她试图藏起尸体吗？后来她什么也没有听见。不，她逃跑了。不，她先在尸体上

盖了些干草。为什么？因为。她说不清楚了。因为附近有野兽出没。不能让野兽发现那具尸体。她深更半夜穿过树林。她几乎几十次掉进沟里、黑洞里。她自以为有人追她。尸体呢？既然布兰谢特已经死了，尸体有什么要紧呢？是的，在重要的调查中，所有的细节——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细节——对于捕获罪犯都可能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当然，因为尸体是裸露着的。因为没有别的事可干。因为寒气侵蚀着死者的身体。她在看到那触目惊心的场面之后，她脑子里充满罪犯的喧嚣、良心的内疚之后，她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

"小姐，您不必责备自己。如果当时您露面了，那两个歹徒会让您受到同样的命运。"

"你们难道不明白布兰谢特牺牲了？她是为我牺牲的？"

"我们明白，小姐，现在您一定得安静。然而初看起来，你们不应该在那渺无人迹的地方。您应该给我们解释一下。你们要去哪儿？"

"去西班牙。"

"去西班牙？你们走的道儿不对呀，小姐……您看看后果吧。您为什么不呆在父母家里？姑娘们应该呆在父母家里。您给我们说说那个人的特征？他们的相貌？"

她详细地描述了那两个人的外貌。她提供的标志不明显、不够多。高个子和小个子。他们说法语，不是西班牙语，也不是巴斯克语。她不懂巴斯克话。两个长着褐色头发的瘦子。他们腰上、脚裸上系着线绳。他们象是牧羊人吗？她不知道。她从来没有看见过牧羊人。她只看见过书里插图上刚出生的耶稣周围的牧羊人。那些穿着卷羊毛短上衣、裹着绑腿的牧羊人……不，那两个人不像牧羊人。那么他们是流

浪汉？是走私犯？是的，是流浪汉。调查好像困难重重，也许无法进行。警察没办法搜山，没办法进行大规模的搜捕。”

“你知道有人在寻找你们的下落吗？”

“不知道，嗯，知道。”

她想到有人报告警察局了。

“是的，小姐。图卢兹的门房报告警察局了。你们应该出门两天后回家。那门房去警察局报的案，她请我们通知您的父母亲。他们急得不得了。我们的巡逻部队没有找到任何线索。在蒙特勒若，有好几个人声称看见过你们。后来就没有消息了。您给我解释一下你们的去向。你们是绕着村子走的吧？你们是避开公路走的吧？你们想要自由。多么惨啊！您看，要自由落个什么下场！”

那儿的人和蔼、富有同情心。警察局长也和颜悦色。调查期间，人们把她安排在一位医生家里。那位医生是一个好人。从头天晚上起，他就给她服用必要的镇静剂。她睡了。她和医生家里最小的女儿玩牌。她怎么能玩牌呢？调查开始了。有几个小分队仔细搜索过阿萨布拉峰和埃斯加利埃峰之间的地带。他们找到了羊圈及血肉模糊的尸体。由于天气炎热，尸体已经腐烂。但是没有发现那两个杀人犯的踪迹，已经过去三天，他们走远了。他们永远融化在景色之中了。

一个木匠做了一具杨木棺材。布兰谢特的遗骸运回艾英诺阿镇，被妈妈送上向北去的火车。她要回到家人中间。她本不应该离家出走的。

“我姐姐出嫁了，我母亲眼睛充血，我在北方受到的接待可想而知。我成了疯子，不近人情的女儿，干坏事的女人。我没有可以吐露心曲的人。我肯定会疯的。我被关在一间隔

室里，受到疯子一样的待遇。那个城市叫阿尔芒蒂埃尔。令人恶心的煮土豆气味从厨房传到我的房间里。远处钟楼响起清脆的钟声。他们吃荷兰土豆，那东西便宜。钱要用在车间上，要扶持车间，要贴补吉赛尔的家用。为了她（为了他们）家里人就是罄其所有也毫无怨言。家里人情愿对自己苛刻些，情愿吃土豆。我一个人在顶楼上吃饭。父母亲不让我上饭桌和大家一起吃饭。我是家里的奇耻大辱。我让人害怕。家里人给我送面包和果酱。最后我绝食了。我浑身瘫软，我发觉我瘦了。我的月经停了。我不起床也不梳洗打扮。我卧床不起。爸爸说我不配做他的女儿。也许他想象我曾经是他的女儿。另外，他取消了我的继承权。这倒颇有意思。

“我瘦骨嶙峋，显然我不久于人世了。我形容枯槁。家里人爱面子，怕闹出丑闻，决定请一位医生来家里看看。他们从远郊区物色到一个长头发的老头儿。我那丢人现眼的丑事丝毫不能泄露出去。那位医生从小楼梯爬上楼。虽然脏东西已经清除掉了。他还是觉得我的环境污秽，我是污秽中的污秽。那位医生气得浑身发抖，他要单独和我在一起好给我检查。他和颜悦色地和我说话。他告诉我，我有生命危险。我只记得他一句话，‘小姐，您应该接受治疗，我要带您到一个地方去治疗，现在您不用害怕。’一定是家里人使他认为我拒绝治疗。他把家长们找来。

“今天就得找一个地方安顿她。”

“好的，”父亲回答说，“最好找一个远些的地方。”

“那地方很远，在巴黎附近。一所养老院，那位老医生认识养老院的院长。一切都不成问题，膳宿费可以打折扣。”

又是一阵沉默。我趁这工夫在碗后面点着香烟递给妈妈。她用手指头捏住香烟，送到嘴唇上呼出一口烟之后，闭目养了一会儿神。她的脸松弛平静了。她的嘴上似乎露出一丝笑意。但是我没有把握。我等着。我让回忆的水车去转动。这一会儿真是得来不易。

旧城就要从昏睡中醒来。我们听见风在河道上、桥洞下驰过的声音，风在不透光的建筑物正面、围墙、潮湿的石板路上掠过的呼啸声。昏暗的河水滚滚流淌。妈妈的呼吸声和风的呼啸声遥相呼应。外边，里面，奇怪地相互渗透。我一动不动像孩子那样乖。我的手表指着三点半。

“菲立普，这故事很奇怪，是吧？我在桑利斯附近那家养老院里生活了一年。嗯，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养老院里的职工殷勤、能干。休养人员呢？也不错。小部分人爱挑毛病、刻毒。那些人没法办。我还是听他们说话。生活曾有负于他们，但是大多数情况下生活对他们过于厚道。所以他们每天早晨诉说他们的伤心事。蜜糖般的日子过去了，死期不远了，身体上的苦楚实不堪言。他们不明白，怪别人不够理解他们，他们怨天尤人。谁也不和他们说话。他们在诽谤别人中度过他们的余生。其余的人性情温和、平静、笑容可掬。他们是一些富于幻想的人、可爱的童心未退的人。也许是生活把他们磨练出来了，也许他们生性是好人。他们有他们对抗的方式。他们爱我，使我恢复了信心。就是那些行将就木的人使我恢复了生活的乐趣。

“在那类机构中，通常是财力有限而不乏善良的意愿。经过半年的治疗和休养，我的身体康复了。我要帮助别人，我要还债。养老院的领导考虑到我新近的学业和我尚未经过实践检验的助理护士资格，接受我的请求。我从病员变成了

管理人员。我在大楼侧面分到一间房。医疗部门的同事鼓励我争取高一级职称。我选修桑利斯医院的课程及一部分函授课。每过一天，我过的生活就更像生活。我回到生活中来了。

“我在和老年人的来往中弄明白了，即使是最特殊的人也只能做他力所能及的事情。人不能超越自己。总之，我学习生活。我感到养老院十分亲切，我像一个幸福的孩子在那里看见一个幸福的、交往的新环境。在那里，我有许多上年纪的朋友。第一个是昂雅尔曼医生。他60岁挂零，瘦得像竹竿，想必是常服用他自己调制的煎药的结果吧。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极其秘密地研究植物学，他惊人的成果大概要在他去世后才会为世人所知吧。

“那个时期，我在来往的所有的人中间最喜欢一位瘦小的老太太。她一头的白头发，说话声音很低，一向平等待人。她叫奥唐斯·路易丝·马雷夏尔·阿歇尔寡妇。菲立普，她就是你的祖母。我一到养老院，她就很喜欢我。据昂雅尔曼大夫说，我刚进养老院那段时间，睡眠中常说胡话，她总是照看我到深夜。她那一对椭圆形的小眼睛是灰蓝色的，显得十分亲切。她那一对眼睛从不斜视。我每次醒来，她的眼睛总是对我报以冬天的微笑，那微笑比所有的微笑都温暖。她把她的想法告诉我。她说我过去的生活不是真正的生活。我应该想到明天。”

我对我祖母奥唐斯·路易丝只有一些模糊的印象。她去世时我刚两个月。我那些模糊的印象来自：贴在像坟墓般的影集里的两张照片。我觉得妈妈刚才给我描绘的相貌和照片不大一样。照片上仿佛是另一个女人，年轻一些，在40岁到50岁之间。照片上的女人神情呆板，好像是强作笑颜。她脸

上的表情因为某种固执的目光显得极不自然。她的目光也不像妈妈说的那样，没有朝任何地方看，没有停留在任何东西上面。

“奥唐斯·路易丝有一个儿子。他叫夏尔·埃瓦里斯特。每到周末，他准去看望他母亲。夏尔·埃瓦里斯特不是小伙子了，不过年纪还轻。那时候，他管理着他的纺织制造厂。他中等身材，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漂亮的年轻人，他长着褐色头发。男人抹发蜡，争相模仿鲁道夫·瓦伦蒂诺①，他却不抹发蜡。他是绿眼睛。他母亲和我都觉得他的眼睛绿得少见。显然，我很注意夏尔·埃瓦里斯特。奥唐斯·路易丝感到高兴，鼓励我的‘正当愿望’。她给我出主意。我应该稳步前进。她儿子不是胆小，但是他和女人交往总是有些莫名其妙。他曾经打算结婚，但是他又没有任何表示。猜出他心思的几个姑娘等得不耐烦了。所以奥唐斯·路易丝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看着她儿子过单身生活，抱不成孙子成为她难以排解的烦恼。星期天，我在养老院碰见夏尔·埃瓦里斯特（因为奥唐斯·路易丝特别崇拜夏尔·德傅科神甫，而她的热爱精确科学②的亡夫特别崇敬数学家埃瓦里斯特·伽罗瓦③，所以给他取了这个名字）和他母亲一起散步时，他看出我情绪激动，他也许注意到老太太的脸比我的脸红得更加厉害。

“他的脸颊和下巴上的肉松弛。他的嘴唇薄而不整齐。我不喜欢。但是他的绿眼睛弥补了这一切。他看他母亲的时间少了，他母亲反而高兴。不久他就带我乘他的白茹牌汽车

---

① 瓦伦蒂诺（1895—1926）意大利出生的美国电影明星，被无数妇女崇拜为20世纪20年代的伟大情人。——译者注

② 指数学、物理等科学。——译者注

③ 埃瓦里斯特·伽罗瓦（1811—1832）。——译者注

去桑利斯。他把他穿飞行服的照片给我看。那些照片是在布尔歇飞机场拍的（有几张是在布雷盖双翼飞机上飞行时拍的）。我都看入迷了。

"我们处在动乱年代。1936年。工场、工厂、百货公司统统控制在工人手中。'阿歇尔工厂不在工人手中，'他对我说，'我们用不着害怕，我已经满足工人的许多要求。我们给外国生产。我们应该继续生产以免通告废除合同'。工人们迫使他作出了一些让步，他对工人毫无敌意。

"有一天，奥唐斯·路易丝告诉我时机成熟了，我应该对夏尔·埃瓦里斯特作出表示。别指望他来求爱。解决问题的钥匙在我手里。必要时，我应该用我认为最适宜的办法打动他。奥唐斯·路易丝也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虽然她知道我并不是一个追求物质享受的姑娘，但是她仍然觉得应该把我觉察到的情况加以说明，即夏尔·埃瓦里斯特人材出众，这是一门好亲事。我打听到阿歇尔工厂的总营业额，故而对我的安全、幸福放心了。因此我对夏尔·埃瓦里斯特作了表示。这就够了，有一次我们去桑利斯时，他要带我住旅馆。那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我们两人都是新手。我回想起布兰谢特，有一点傻乎乎的。虽然我很尊重你父亲，我得直说他也不内行。两个月后我就怀孕了。婚礼是在圣母德尚教堂举行的。婚礼后四个月，你出生在郊区的一家医院里。你是早产儿。你在暖箱里呆了好几天。我不能看你。他们终于把你放在我床上时，你手上戴着的小环上有你的名字和出生日期，它证明你是我的孩子。我不敢把你抱在怀里。我得习惯一阵子。

"奥唐斯·路易丝到医院去过一次。夏尔·埃瓦里斯特开汽车去接她。大约当天晚上就把她送回家了。她上楼去暖箱室看你。我生的是男孩，她感到欣慰。她吻我，祝贺我：

'亲爱的，您知道我为您和夏尔·埃瓦里斯特感到高兴！现在一切都有着落了，我死而无憾了。'她哭了起来，我也很激动。

"后来，我们还见过她一次。也是一个星期天，在夏尔·埃瓦里斯特摆设着督政府时期家具的房间里。那个星期天，你睡了一整天。奥唐斯·路易丝没有机会抱你感到十分遗憾。接下来那个星期三，她动脉瘤破裂症发作。她是在星期四到星期五的夜里去世的，她死前没有清醒过。举行了葬礼。我好像没有看见夏尔·埃瓦里斯特哭过。

"阿歇尔工厂的事情占用了他全部时间。做生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白天他全在维尔纳夫勒罗瓦。我在家里感到很无聊。看书、弹钢琴、教育孩子不足以填满女人的生活。每月第二、四个周末，我们接待朋友。那些朋友和战争一起消失了。星期天，我们远足去枫丹白露或马勒塞布。还有时装展览、汽车沙龙或者卡特朗草地、跑马厅或别的地方举办的选美女活动……你父亲的朋友都住在豪华区。我们外出时就把你托付给佩兰太太照管（我想你也许不记得她了），就是在我们家干了不到两年的醉鬼卢瓦佐太太之前的那个女佣人，最后才是雷娜太太。佩兰太太是一个好人，她很喜欢你。当夏尔·埃瓦里斯特一旦宣布我们要去乌尔加特或多维尔度周末，他是不会改变主意的。我真想带你去，这事无法谈通。夏尔·埃瓦里斯特性情温和，但是他听不进半点不同的意见。说真的，我在一切事情上都让着他，不和他计较。我没有什么特殊的愿望。那生活对我十分新奇。我很满意，即使呆在家里足不出户我也满意。比利牛斯山上的恶梦消失了。我抓住夏尔·埃瓦里斯特，像溺水的人抓住手边的木板那样。我随着波涛飘流。

"我在唯一一个问题上寸步不让。他坚持要我和我父母恢复联系。他要我把我们结婚及你出生的事情通知他们。资产者的圈子里，家庭联系（即使是表面的联系）似乎是不可缺少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之间的斗争持续了几个月。他要我写信。他甚至提出要帮我写那封信。不管我怎么解释，我的恐惧、憎恨在他看来都是无谓的孩子脾气。柔利养老院转来一封我父亲的信。我父亲埋怨说他为我操劳受苦，等待忧虑了许多年得不到我任何消息。他还说他向养老院院长打听过我的情况。院长只同意把我恢复健康的情形通知他、替他转信。父亲觉得这样行事太不近人情、令人气愤！不过他还是原谅我在他对我的父爱和我之间设置障碍的可恶行为。在那种情况下，加之欧洲到处传说要爆发战争，他要我尽快把我的地址告诉他，並要我收拾行囊准备回到一直想念着我的家人中间。此外，我应该知道由于我可怜的母亲的努力和牺牲，新服装店终于开张了。家里人需要我：一些应该由可靠的人担任的工作不能让职员去做。而且要消除我1935年夏天恶劣行为造成的极坏印象，那是我要做的起码的事情。不过家里人准备原谅一切（可见他们还没有原谅），准备忘记过去（可见他们还没有忘记），我母亲患白内障再不能当他的好帮手了（除了家务活之外，还要我管帐、开发票）。吉赛尔很好。他丈夫身体也很好。他吻我。信的落款是：'你的父亲'。

"我火冒三丈，我感到受了莫大的侮辱。夏尔·埃瓦里斯特承认那封信里的意思含糊不清，却又执意要在那封信里找出我父亲对我的关怀。至少，信中的用词是欠妥的。我责备夏尔·埃瓦里斯特总是屈服于社会生活的陈规陋习，责备他因循守旧。那是我们之间的第一次争吵。后来又吵过几

：。关于我和家庭恢复联系这个问题我寸步不让。夏尔·埃瓦里斯特终于妥协了。不过，我感觉他的沉默不语说明他对这一点也不理解。

“我们的夫妻生活是在那个时期终止的。1940年6月。北部、东部，甚至西部，各条战线都被击破了。英国人撤走了。在巴黎，人们翘首以待。每过一天，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行动就更像做梦。人们听到的消息仿佛是另一个国家的消息。难民、伤员、逃兵把公路、车站挤得水泄不通。整个法国响着一个声音：德国鬼子来了！政府刚刚撤离巴黎。政府逃走了，垮台了。14日，德国鬼子好像在巴黎。我竟然不相信，你想想。可是德国人的卡车从我窗子外面驶过。第二天他们列队游行，嘴里唱着霍斯特·韦塞尔歌①。他们占领了各个部、市政府、警察局……夏尔·埃瓦里斯特十分沮丧。他才42岁就显得很老了。他这种老态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占领是一个有秩序的行动。德国精神是不允许发生任何盲目事情的。维尔纳夫勒罗瓦工厂虽然只有极其微小的战略意义，还是被征用了。从那时起，我们工厂就为帝国生产了。夏尔·埃瓦里斯特对工厂漠不关心，整天关在屋里收听英国广播，阅读雅克德莱斯丹和罗贝尔德博普朗出版的附敌言论周刊。他终于克服掉他的消沉。他宣布说得干点什么，总不能长吁短叹、袖手旁观。‘抵抗运动’这个词还没有出现，因为法国任何地方都还没有出现抵抗运动，或者说抵抗运动的规模微小、脆弱，鲜为人知。夏尔·埃瓦里斯特只不过想干点什么。我一点没有反对他的意思。只是我不愿意看见他一天比一天衰弱下去。我要他小心一些，为了你，也为我们全家。用日常生活上的话说，一切是这样开始的或者一切是这样结束

① 纳粹国歌。——译者注

的。夏尔·埃瓦里斯特想出了他的计划。‘我考虑好了’，他对我说，‘我有一个很好的幌子。我管理的工厂专门为德国生产。我要大大方方地、仔细地演这个附敌的小厂主的角色。我要格外卖力气。我要发挥我的工厂的作用。我能随便进出驻法国的德军司令部，尽量接近封·施蒂尔纳格①。如果一切进行得顺利，我就可以和那些同防卫部队勾勾搭搭的人取得联系。我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我只须提高营业额就行。大家都认识我，我和占领当局签订了合同。总之，我经营好我的工厂，那么我总可以找到突破口的……能够设法打进去的。

“从当时的情况考虑，这不失为一个好计划，一个可靠的计划。有风险，不过任何行动都会有风险。夏尔·埃瓦里斯特准备承担风险。这也许是我第一次钦佩他。他更加按时去维尔纳夫勒罗瓦工厂。他和占领当局之间的关系到什么程度，我说不清楚。他轻易不说心里话，据他说是出于谨慎。我好不容易才从他嘴里掏出这几句话来：‘我的计划正在实施。一切顺利。他们东线需要呢绒。’后来的事情，你都知道。42年，我们每个月只能看见他一次。他搞无线电情报。当然，我们什么也不缺。后来，他就不再回家了。最后一次是43年3月。我知道他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情报网的成员。说真的，那个组织很难破获。我们战前的朋友似乎都没有参加那个组织。我从这方面得不到消息。警察局呢？不行。我从来不愿求他们。再说他按时来信。工厂把我的信转给他，他会出其不意地到工厂去。从那以后他再没有回过家。胜利后他给我们派来了托尼·索昂。”

“托尼·索昂？”

① 1942—1944任驻巴黎德军司令官。——译者注

“我知道你不喜欢他。他像父亲一样待你，他很喜欢你。他填补空缺是很自然的。我承认他曾经是我的情夫，我不觉得可耻。菲立普，你知道我不是那种母亲，失望的时候张牙舞爪地扑到儿子身上，抓住他拚命折磨他。我不是那种母亲，我强迫自己不要干那样的事情。我对你很严厉。这是我做母亲的责任——使你免受你母亲的折磨。托尼·索昂帮助过我。他曾阻止我在享有金钱地位的斜坡上滑下去。比如说阻止我带你到很远的……瑞士山区，我曾那样想过。我们有钱。我本来可以找一个空气清新能治疗肺病的山区小木屋。我们本来可以独自幸福地生活在那万绿丛中。我本来可以在大自然里把你培养成自由的孩子。我们本来可以领略花、水、昆虫、哺乳动物、鸟、风、雪、季节……我们可以买书一起阅读，我可以做你的启蒙老师。那时你8岁。本来一切都是可能的……托尼·索昂也许没有如我要求的那样爱我。我不怨恨他。至少他对你尽到他的责任了。他使你免受你母亲神经官能症的折磨。你对他那样苛刻是不公平的。”

妈妈似乎走到这天夜里的思想和回忆的尽头了。我沉默不语。我们两人的脸蜡黄、浮肿，一定很难看。我们像月球上的一对怪人。我们商量一下是否要吃一顿真正的早餐。虽然她发现最后几片面包发霉了，还说像她这样一个糊涂老太婆能吃发霉的面包，她没有什么可怕的。她觉出我听她的话很为难，便补充说她不爱惜她自己，她打算把她的身体献给科学，尽管科学从人体研究不出什么名堂来。

我知道她又在虚张声势了。她只是想掩饰她神经发作而已。她又变成平日的模样。她抽第九支黑猫牌香烟，把烟慢慢吸进去，致命的烟雾进到肺里，散布在毛细管中，在她体内扩散开来。我提醒她也没用，她明知后果严重仍在戕害自

己的身体。她会回答说用不着我来教训她。不管怎样，她没有勇气向她的头上开一枪……

她脸上露出奇怪的微笑。天空已经泛出苍白的颜色。天花板上的灯一分钟比一分钟显得更白了。两岸之间的河水不再发出喃喃的低语，不再在夜的梦幻般的雾里浮动。河水归于沉寂，沉寂中响起行人的脚步声、凄厉的摩托车声……河流在寂静的脏水中沉沉睡去。我看云头飞驰而过，可是魅力消失了。

“你在想什么，菲立普？”

她的嗓音紧张、嘶哑。

“我在想你的呼吸，我无意中听见你的呼吸声。”

“你永远是一个白痴，菲立普，你回家时小心点儿，别吵醒我。”

第三章

无论冬夏，房间里总是昏暗的，因为双层玻璃窗上挂着厚厚的帷幔。我从来不拉开那帷幔，因为塞纳河两岸往来的车辆频繁。高峰时，窗子上的长玻璃不停地颤动，嗡嗡的响声不绝于耳，连谈话都无法进行。

波拉·霍真喜欢我们的房间，因为她觉得我们的房间古怪、有特色。从那以后，她常来我们家。妈妈看重她温柔、优雅，原谅她写诗的毛病了。尤其她最近出版的诗集受到批评界的好评，那事也就烟消云散了。有时候妈妈不理解为什么我和波拉不打算结婚。据妈妈看，我很难找到更称心如意的对象。这话不假，但是我怎么向她解释我们不打算给自己套上婚姻的锁链呢？

波拉的笑声清脆、富于感染力，她的为人也是那样的。当她在我房间里坐在办公桌前，或者躺在床上看书时，我喜欢听她的笑声。从她在我房间里过夜时起，我对房间的看法有很大的变化。我觉得那些小摆设、书柜里的书确实是外省古老博物院里的一堆没有真正价值的古董。应该把那些破烂统统扔掉，进行一次大扫除，重新油漆，换换空气……然而我连灰尘都不掸。无论如何我不愿意用抹布擦亮窗间墙上的镜子。当我醒来时，壁炉架上的那面镜子把从窗帘缝里射进室内的一线模糊的阳光反射给我。小摆钟上、我塞进镜框

里的脱了色的风景明信片上，以及我的大部分装饰品上都覆盖着一层透明保护膜（波拉·霍真注意到那是堆积的灰尘和污垢）。对我来说，那层保护膜是减缓时间流逝的保证。波拉还埋怨房间里那一股闭塞的气味。似乎我早该换换房里的空气。显然那是不行的。空气只能慢慢地换，这一点很要紧。是的，波拉对此十分理解。因为是她想出这绝妙的词“静止的时间的香味”来形容我房间的特殊气味的。我送给波拉两个佛像，她非常喜欢它们，把它们摆在她佩雷尔林荫大道房间的小桌子上。她的房间和我的陋室相反，既宽敞又明亮。

阿歇尔纺织厂在维尔纳夫勒罗瓦。新机器已经到了。什么机器？说实在话，我脑子里根本没有考虑组装车间的问题。托尼·索昂要我去看机器。我觉得去那里转一转倒没什么。我对机器一窍不通，会不会要我发表意见？那没有任何意义。是不是要我签字？最近妈妈授权我代理她。是的，也许是这么回事，准是这么回事。

不管怎么说，我去厂里看看还是说得过去的。我可以放心大胆走进地铁。尽管我没有什么具体任务，我也不能无目的、无目标地乱走。我一面沿着站台向前走，一面想着波拉·霍真。她常对我说要不失时机琢磨词句。或者：要琢磨、修饰、剪裁词句……要在词句产生之前进行加工。要在词句产生之前。我没有这样的奢望，我不敢说我总是能够正确理解波拉对我说的话。

天气很冷。那是一大清早，第一批职员成群地从歌剧院站和昂坦堤站蜂拥到人行道上。从帕西到贝尔西，天空乌云翻滚。只要朝天上看一眼就知道这一天的天气糟透了。

费内隆公立女子中学的栎木大门紧闭着。我想象这类修

道院里（所有公立女子中学都像修道院）的修女害怕或者希望神学院的穷学生及其它跑街的人的追逐。然而我连一个人影子也看不见。时间太早了，街上还看不见穿着讲究、满嘴脏字的姑娘（今天的姑娘大多如此），也看不见满身灰尘、挟着干瘪公文包的教师。在我的想象中，马塞尔·儒昂多①沿着帕西街迎着他的学生德蒙走去时就是那副模样。

圣·日尔曼林荫大道另有一番景象。越来越稠密的人群涌向作坊、办公室、服装店、俗气而自命不凡的小咖啡店。我却逆着拥挤的人群走进地铁，朝奥斯特里茨方向走去。我在朱锡站换车。十路地铁的路线还没有改造。灰色车厢在铁轨上发出哐当哐当的响声。这条线路毫无动人之处，是劳动者的线路，给人的印象极坏。随处可以看见不爱搭理人的发黄的面孔。站台上有这样的字迹：我出狱了，我没有工作。沉重的脑袋左右摇晃。车窗外面闪过肮脏的隧道，能看见斑斑尿渍和广告的痕迹。每到一站，暗黄的光线射进车厢里来。乘客睁开眼睛眨巴几下又闭上了。现在行驶到7路地铁，这里俨然是一座地下小凡尔赛宫。蓝色车厢在五光十色的梦幻世界里闪烁。列车开过来了，在橡胶轨道上浮动，像飞翔的巨兽在喘息声中停下来。一张广告上有许多乱涂的题词，其中一句话是用黑自来水毡笔写的：20 000年前，你们的祖先是黑人。

我在维特里换乘公共汽车。天上也布满了乌云。交通堵塞。开汽车的人用手紧紧握住方向盘。维尔纳夫勒罗瓦。若弗尔元帅大道。利奥泰街，戴高乐将军街。这是把战争、殖民化方面的词汇用在都市的地名上。在城乡交界处的阿布隆，树荫下露出黄色的墙，露出高高的天窗。天窗里颤动着

① 马塞尔·儒昂多（1888—1979）法国作家，曾当过教师。——译者注

淡紫色的霓虹灯光。我想我应该常到这里来转转。在住着麻雀和猫的可怜的小山坡上，一堆堆灰色的水泥(郊区的旧货)像陨星一样扔在地上。一幢幢像乡村火车站似的石头房子东一处、西一处。塞纳河的金属般的轮廓仿佛在屋顶的那一边，被束缚在风化的水泥河岸之中，叫人十分放心。凌驾一切之上的是一只翱翔的海鸥和它那异国情调的啼声。阿歇尔纺织厂几个红字招牌在苍白色的天际闪亮。

职工上班来了。男人穿轧别丁雨衣、戴鸭舌帽。中年妇女身上穿着旧大衣，胳膊下挟着雨伞，或者手提包里露出雨伞。正门嘎吱嘎吱地响，其实那只是安装在两个砖柱子上的旧铁架子。我向门房报过姓名，他做出要脱帽子的样子说："我认出先生来了。"

院子里的砾石是一种说不清楚的单调颜色，姑且称之为工作日的颜色。我在通往经理室的水泥路上走着。一扇门上写着"接待室"，我看成"欺待室"了。我略略推开那扇门：上过漆的铁架子上放满了卷宗和文件夹。从前我和西蒙娜小姑娘在这间房里曾有过一段情缘。现在她怎么样了？我要使劲儿想才能回忆起她的声音、容貌……屋顶上的长玻璃早已取掉。现在，平瓦下面是涂过白漆的天花板。

车间的工人都到了。但是办公室还是空的。职员通常比男女工人要晚到一会儿。大概这是身分问题。只有莱莉蒂埃小姐办公室的灯是亮着的。我敲门走进屋里。莱莉蒂埃小姐正在把她的红棕色狐皮领放进一个柜子里。红棕色狐皮领早在三十年前就不时兴了，她好像並不知道。她向我问好，招呼我坐下。我们相互称赞对方守时。她对我说索昂先生不会让我久等的.索昂先生说过我一到，就见我。她用已经变成她第二天性的职业上的谦虚口气问候妈妈身体健康状况——那

是一种冷冰冰的商量的口气。然后她打开取暖电炉的开关。她身上穿着一套细白条纹绿毛料衣服，她略略发胖的腰上系着一条宽牛皮带。——她有多大年纪？——腰带说不上漂亮，大概能起到遮丑的作用。

托尼·索昂不算拖拉。传来他沉重的脚步声。他的面孔也显得笨重。他用年轻人的微笑、使劲握手来迷惑人。但是我看出来他眼睛下面、嘴角都耷拉下来。他用嘲弄的口吻说我们好长时间没有见面。我如约来看他，他很高兴。他想要什么？要我表示遗憾吗？要我低声下气吗？我走进他办公室，这间房里引起我注意的第一件东西是缺一个角的血红大理石墨水缸。托尼·索昂身上穿一套灰衣服端坐在我面前。他把两只手放在办公桌上。我等着。他脸上露出从前那种严肃、慈爱的神情。我想笑，我想一走了之。“我有要紧的事情对您说。”他对我说。

首先谈阿歇尔工厂的事情，工厂的状况很好。阿歇尔工厂已经打入好几处国内外市场，可以算得上是一家有竞争力的企业。托尼·索昂並不把功劳算在他自己头上。他一如既往为我母亲和我的利益尽心工作。他亲自参与技术革新工作，得到工程师和会计师的支持。事无巨细，他必亲自过问。从职员的工作调动、调薪之类的小事到关系生产的大事，如最近安装布料图案设计程序设备，莫不如此。他用同样的口气补充说他意识到我现在对他的感情远远不如我小时候对他的感情。这种事情无法挽回。这是生活。这是时间造成的。

我对他看问题的方式表示赞同。他乐于接受我对他提出的批评。他愿意在退休之前尽力解决工厂的弊端。因为谈的恰恰是这方面的问题。他觉得休息几年是当之无愧的。旺

代[1]在等着他。说到抱怨，他比谁都清楚他代行父权的企图早已失败。他很怀念我们一起在卢森堡公园散步的年代。

他笨拙地承认他曾想强迫我屈服于陈旧的道德秩序。西蒙娜引起的风波使我们的关系更加恶化了。在他和我之间有我的生父。企图填补这空缺的一切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母亲和他有某种特殊关系。尽管他们对他们之间的关系讳莫如深，他知道这事还是使我十分痛苦。我应该承认他们的关系纯系他们两人的自由。我想起星期五晚上的聚餐：讲到保守秘密，他们可以说做得相当好了。那是环境、生活造成的。他要用男人和男人的方式和我谈话。他用安详、认真的口气说着。事件、命运……人们在遵守生活的普遍法则的过程中发现了那些法则。他补充说，目前他只和妓女来往。至少，这不是谎话。我眼前又出现妈妈发红的眼皮，我耳边又响起她对妓女的骂声……托尼·索昂瞪着眼睛看我。有时他把贴在肚子上的右手挪到胸口上，在那儿停几秒钟。那些似是而非的话就是这样说出来的。

"菲立普，您打算干什么？"

托尼·索昂把火力隐蔽起来。说实话，最后这个问题是个难题，是这场谈话的唯一目的。首先他突出"您"这个称呼是要向我表明距离和尊重。对我这未老先衰的年轻人要谨慎对待，要像把蝴蝶钉在盒子里一样一劳永逸地制服这年轻人。他用从前那种温柔的声音叫我的名字。他停顿了一会儿——好像无尽无休——接着说：

"这是个难题，是吧？不过这问题迟早总是要提出来，要作出回答的。"

我开门见山地说：

---

① 旺代是他老家。——译者注

“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至少您的意思不是说您打算赋闲吧？”

“既不想赋闲，也不想干活儿。”

我让他琢磨我晦涩的回答。

“很遗憾，是的，很遗憾。”

他和我母亲谈过。对此，他没有隐瞒。因为类似的谈话必须坦诚。对我是否有意接替他的工作，她让他不要抱幻想。这一点，他没有撒谎。妈妈真希望我能胜任，同时她又担心：她怕我把工厂搞破产，弄到递交资产负债表的地步。但是她相信我能权衡负担重大责任的企业领导的利益及光荣。还应该考虑到成功带来的喜悦。我的前途和工厂的前途都操在我手里。当然，可以招聘一个持有文凭的新主管人，虽然这并不是最好的方案。托尼·索昂爱阿歇尔工厂，专心致志地为工厂的利益工作。他像一个忠心的老仆人，并为此自豪。总之，他只是按我父亲的吩咐行事。最后他承认在我的事情上，他被表面现象所惑。我害怕干涉，害怕脚下有阴险的陷阱，态度强硬起来。由于我再一次沉默不语，他显得有些烦躁。他怨我不随和，不和他配合。我的能力不成其为问题。他一直关心我的学习，了解我的价值。那么症结在哪儿呢？也许是闭塞。是责任心暂时麻痹。又是一阵沉默。我不给他任何把柄。当然，他准备在退休前把一切情况告诉我。他不需要我立刻回答。这时，我发起进攻：

“是我父亲亲自委托您向我提出这些建议的吗？您最近见过他吗？他怎么样？他为什么不来一趟？他为什么不写信来？他来不来？他为什么不叫我去他所在的地方见他？再说他在哪儿？他藏在什么地方？是因为怯懦吗？他是因为什么阻碍来不了吗？他还活着吗？我愿意亲自告诉他我对经商毫

无兴趣，我一辈子什么事也不干，也不想干任何事情。我
子里想的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您呢，托尼·索昂，为什么缩回去了？您怎么突然采取守势了？您想干什么？叫我来有什么目的？您希望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我因为激动和忿怒，连珠炮似的说了上面那些话。他站起来，走到我跟前。不，我误会了。他毫无希求，他也不想在我身上打什么主意。他承认他是为了让我母亲高兴才安排这次谈话的。我是完全自由的。我应该从容考虑。物质方面的问题总会有办法解决的。关于我父亲，他可以告诉我他还活着。至于其余的事情，他有责任保守秘密。

“他在什么地方？”

他脸色苍白，踱来踱去。显然他想结束这场谈话。他劝我不要去找父亲呆的那个地方、那幢房子。那是白费时间再说那幢房子不存在了，电话簿上根本查不着。他不能对说更多的事情了。

他派一辆厂里的车送我。我让这辆汽车送我到奥尔良，

应该走路。我周围万物都在运行。路人、职员、工人巴黎市民都在走路。永不休息的思想，我永远跟不上的想，我的思想，不尽如人意的思想在运行。命运呢？命运，无意义地逝去了。命运的对立物逝去了。但是一切在运行。

没有其他解决办法。我走路。我行进。我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我並不总是走捷径。别人跟我一起走。别人，有熟人，也有陌生人。大家都处在空间里，都在那不可捉摸的小路上。诗人把它们叫做命运，其它人把它们路叫做作简单的、变化无常的、可溶解的生活。

天下雨了。转眼就是十二月。人行道光滑、闪亮、难

道，快人行道沿路在淌着水。勒克莱尔将军大道。我身后是……大道的汇合处，维克托巴什广场。那里突然露出圣·皮埃……教堂斑驳的墙，好像我一辈子不应该从这儿经过。最后这种印象很特别，无法解释，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当我碰见认识、不认识的漂亮女人，偷看她们一个动作、一个目光、牙齿或眼睛的闪光、撅着的嘴唇、皱着的眉头，她们並未发觉。也许是真的，也许是假的。应该按规矩办事：走路。人人按规矩办事。她们经过时我並不转身看她们。与其说她们走开了，不如说我促使她们从我身边走开了。我把她们打发到坟墓里去了。古怪的享受，但终归是享受。自以为是唯一一个体会到某种感情——甚至是感情的精华——的人。多么狂妄愚蠢！好的。就这样。我不明白。我就是这样感受到……宇宙生命焊接成一体的我渺小生命的运动。我那微不足道……命是运动中的运动，那就是……我喜欢的形象是城市……，那形象充满活力、均匀，富于女性的魅力。这里一……是形象。城市是装饰着两个M字母的女性躯体，只有女……的盛装饰物。那躯体忠实地随着相继而来的风尚变化。那……轻浮的躯体其实是人的最脆弱的作品。

……天下雨了。我不是唯一一个走路的人。我来到徜徉过那……回的圣·米歇尔林荫大道。我就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吉内……·拉卡兹（她是什么人？）孤孤单单在格朗奥古斯丁滨河路房子里休息。天已经大亮了。那是一个潮湿、阴冷的日子。她睡着，她儿子在走路，在附近街上徘徊。他不知道上……去。他走进吉内特的睡眠之中（她的儿子是谁？）城市……由清醒到梦境的麻木状态中：她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一……来的梦、盛装少女的梦。那些少女中，有的在工作，有……享乐。

不，我不是唯一的人。还有别人在城市里走着。人们可以随便进去。人们可以随便出来。庞大浅薄的躯体在呼吸。像压力抽水泵。据说，人们更加躲避城市。然而人们在那里保留着墓地、骨灰存放所。天下雨了，会一直下到来年春天。那是一个印象。这儿，人们只能靠印象生活。雨下得太多，河水暴涨。人们呼吸的空气里浸透河水的气味。那是我从关着的百叶窗下经过时发现的。我认出百叶窗架子上成鳞状剥落的油漆及一道道污痕。我忽然产生了一个不恰当、使人反感的美妙想法：吉内特·拉卡兹家的架子和毗邻大楼的架子及其他上千个难以辨别的架子一模一样。

我禁不住想喊叫："吉内特·拉卡兹，你醒醒，起来，跟我走。你别衰老下去，你会死的。你恢复青春吧，你重新变成照片上的那个姑娘吧。你别玩鬼把戏、别让我心惊胆战。要是你愿意，你可以在走路中摆脱一切，你可以投进光滑的喷水池里，你的肌肉会重新变得柔韧，你的眼睛会重新放出光辉，你的头发会重新发亮。我会受到生活的吸引，会得到拯救。你不愿意那样。吉内特·拉卡兹，你会从屋里出来吗？你为什么不出来救我呢？"

我不叫喊。人们会转身看我的。人们会去报告警察局的。今天，人们不能容忍精神失常的人。人们怀疑他们企图闹事。此外，人们受不了喧闹声，特别受不了痛苦的喧闹声。人们也不愿死一般的寂静。那么对精神失常的人，出路只有沃克吕兹疯人院。不能留在这个城市里，尤其不能留在这里。因为我无意毁损我们旧城的美丽景色，从清晨起笼罩着旧城的这场肮脏、潮湿的毛毛雨已经威胁到它了，我只好缄口不言。我沿着塞纳河走。和我作过彻夜长谈、精疲力竭的吉内特·拉卡兹，那位似认识又不认识的漂亮过路女人拉

在我后边了。

就剩下塞纳河。它好像一条导线。它那扁平的灰色锋刃切割出城市的谷地。从这儿看，这谷地是笔直的。从我所在的地面，人们无法判断那谷地实际的蜿蜒曲线。它切割出旧城的躯体，如同沟纹勾勒出女性生殖器一样。我闭眼不看那不值一提的景色。我把塞纳河想象成另外一个样子：秋末，两岸点缀着淡红色的叶簇。水面上，橙黄色、褐色交相辉映。我停下来，打量它敞开的生殖器。从那里正在流出每年一次的血①。一阵眩晕，景色在天空下展开，重新回到个别和万物的总体之中，回到城市起源的抖动之中：它首先孕育出鱼，其次是鸟、狐狸、老鼠、鹿、水鸡，然后是船、渔夫……春天来了。树叶的血红色褪尽，现出脆嫩的绿色。接着来的是猎人，猎人后面是木桥、缆桩、风车磨房，不坚固的住宅，然后是房基在泥里的早期石屋，人们铺砌石板的泥泞街道，散步的人群，档案保管员，勘察人员、妓女，银行家（咳！咳！一个叫劳的人）②，外勤女店员，花边女工、警察，然后是最初的宫殿，国王天真地想象在老百姓拥戴下在宫里幸福地生活，车轮刑、断头台的广场，火车站，工厂，飞机场，低租金房屋……所有这些进入万物的摆动之中，分散在人人都能尽情观看的生殖器周围，只要他们有这个愿望不以有此愿望为耻就行。

在奥塞沿河路口，我睁开眼睛。我又看见和人行道、光滑的马路、恶劣的天空十分和谐的塞纳河河水。满怀愁绪代替那一江血水。我碰见一个电话亭就给波拉·霍真打电话。

---

① 把塞纳河比拟成女性，生育出万物，秋天的塞纳河水像例假。是他闭着眼睛想象的。——译者注

② 劳（1671-1729）英国银行家，到法国后破产。——译者注

我按了按电铃。我听出波拉·霍真在过道地毯上的脚步声。她走路像猫那样轻盈，掠过空气、家具。她给我开门。我穿越城区时身上淋得像落汤鸡。她站在门框里，身子显得十分苗条。波拉·霍真的美就在于她苗条柔软的身材。今天的许多姑娘大不一样，过多的食品和体育锻炼使她们的体形变得十分难看。

“我好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然后是照例的寒暄，“愿上帝降福于您父母亲，他们生出您这么漂亮的女儿。”

她微微一笑。她忙着帮我摆脱狼狈的处境。我头发、衣服上的水滴在地毯上。我脱掉衣服，到浴室电干燥器下面吹干了，然后去房里的地毯上躺下。

“我希望我没有打扰您吧？”

“您从来没有打扰我。”

那是一块沙子色长羊毛地毯，四边织着荆豆花纹。我好像躺在干涸的河床上。我的两个佛像带着扑塑迷离的神情瞧着我。我用一条床罩把身子裹得严严实实的，那是一个长方形的丝绒罩，主色是绿褐色。我意识到我把波拉·霍真明亮、整齐的环境搅乱了。

那天，她没有写东西。大概是一时困倦了。为了消磨等候的时间，她把内衣全部洗了。随便找点儿事干以驱散胸中的郁闷。像我这样行事，或者不如说我本不应该这样行事，我是有些过分。换一个人处在我的地位至少要说几句中听的话，感谢受到热情的接待，一定会称赞女主人的容貌。女主人看见他像落汤鸡似的站在楼梯口，他一定会注意到她炯炯的目光，一定会为她胳膊的细嫩皮肤赞叹，她没有搂他的脖子……从荷马算起，任何人都会那样做的。我却把三千年的礼仪一笔勾销了，多么气人啊！

波拉穿着一件没有袖子的淡紫色浴衣。在逆光中，她的褐色眼睛发出深水般的光泽，那是眼球中心反射出来的光。她披散着的头发（没有用卷发夹、橡皮圈、软帽、带子）垂到浴衣敞口处，像河流的优美姿态。首先，我承认我的过错：一个多星期没有露面，突然像个流浪汉狼狈不堪地上门求救……波拉不知道怨恨为何物。她说话和写东西所用的词句相似，她用虚嗔、心照不宣的柔和声音说：

"您还冷吗？"

"不，这会儿裹着床罩不冷了。"

"您的衣服天亮前干不了。"

"我等着，我在您这儿很舒适。"

"您困吗？"

"不困，真的不困"

我看白色的天花板。天花板中心部分有一处过分雕琢的蔷薇花饰，那是双层贝壳装饰。贝壳里的小厄洛斯把他的箭射向普绪喀的苍白的乳房①。四周是一圈细细的条纹。四角开放成扇形贝状装饰。这些装饰比中心的图案显得过分纤弱。那图案好像翻滚着雪白浪花的凝固的海滩。从落地窗（我只能看见上半部分）射进房里的浅灰色光线经过细平纹纱帘过滤和淡而柔和的淡绿色墙纸的集中、反射神奇地变成金黄色。

波拉避免在房间里摆设过多的家具。除了一张桌子之外，只有一个供她放内衣的浅色红木衣柜。衣柜的每一个抽屉上有一个亮晶晶的铜把手。柜子上放着几本书。可是她主要的图书放在过道里的高架子上。厨房挨着浴室，比较狭小。

---

① 厄洛斯爱神挽弓射向凡人和神祗的金箭百发百中，普绪喀是他的妻子，通常被描绘成带有蝴蝶翅膀的少女。——译者注

除了炉子、冰箱，还有一张圆桌、两把藤椅。波拉写东西时就盘脚坐在床上用硬皮小本子垫着写。

她躺在我左边，在床和我中间。我们沉默不语。我们好像没有任何牵挂。我闭着眼睛想了一会房间里的沙子色荆豆花饰地毯，想房间里几乎不可思议的光线，那光线仿佛超脱于时间之外，尽管有我们的呼吸声加上佩雷尔林荫大道的持续喧闹声。波拉·霍真首先打破这不完全的寂静。

“您母亲呢？”

“我想她在睡觉，也许在看书。昨天夜里我们谈话一直谈到天亮。”

“谈话？”

“是的，主要是她谈”

“为什么是她谈。您没有话对她说吗？”

“没有，我没有话说。”

“她呢，她有什么话对您说？”

“她对我谈了她童年的事情，也就是说她回忆往事。她还谈了其他更近的事情，关于我父亲的事情。不过我没听到什么，或者说听到的不多。”

“您还想知道什么？”

“我说不清楚。我在寻找。我不知道我能发现什么，甚至不知道能不能有所发现。也许，偶然性是这旧事的唯一主宰或者说唯一的缘由。”

“我要让您见见我父亲。我知道他能够帮助您。”

“您父亲？”

“过两天他要宴请宾客。您会接到邀请的。他很高兴认识您……”

我们的窃窃私语声、我们躺着的身体几乎无法辨别了。

然而那确实是我们的声音，那确实是我们的身体。我们像同谋犯，又像有血缘关系的年轻情人，仿佛在演玛格丽特杜拉斯①一部影片中的某个角色。我为在这与世隔绝的地方享受到片刻宁静而喜悦，也为受到波拉的邀请而高兴。那宴会是她父亲心血来潮临时安排招待教外人士的，不受日程表的限制。我觉得我的肩膀陷进荆豆花纹羊毛地毯里。我们十分暖和。波拉解开腰带，微微敞开淡紫色的浴衣。我看见她胸脯、肚子、大腿的曲线。我的手顺着起伏不平的曲线摸下去。波拉喃喃地说："放手，别动！"她接着说："不，现在不行。"

夜幕已经降临。我们终于进入睡乡。子夜时，我们睡意蒙胧。我们饿了。有苹果酒。我们可以摊鸡蛋。我给妈妈打电话。她白天睡了一整天。这会儿当然不困了。我向他解释我今天夜里不回家了。她欣然同意。我们吃完即兴夜餐，波拉·霍真给我念与谢芜村的徘句②。特别是下面这一句留在我记忆里：

一只老鼠掉进
水桶里
黑夜十分寒冷

然后，我们赤身裸体靠在一起像兄妹似的睡了一夜。

波拉一夜酣睡。大约凌晨四点钟。她蜷缩着身子，脸冲着我呼吸。她的气息掠过我的前臂。安详、持续的气息。失眠和睡眠的共同之处是它们都能使界限模糊：无所谓里面外面，甚至无所谓地点，可能在任何一处地方。没有意念，谈

---

① 杜拉斯（1914—）法国当代著名女作家。——译者注

② 与谢芜村 17世纪日本俳句诗人。——译者注

不到集中思想，胡思乱想在理智的步枪射程之内，但是步枪没有发射。我们终于互相挨着睡着了。

城市安静下来。黑暗中，我仿佛看见她。我在某一条街上、某个广场上走着。我半途折回。我停下来。我从一幢房子走到另一幢房子，从一条街走到另一条街，从一个区走到另一个区，从城东走到城西，从河这边走到……现在思想清晰、明确了：我像所有的人一样在巨大的跳鹅图[1]的格子里永无休止地移动。桥：请进至12格。客栈：您在此处过夜。水井：在此处停留或者进至6格。楼梯：您摔断了股骨颈，您多大年纪？……迷宫：城市，您转圈，您转圈。监狱：任何人都不能推托说不懂得法律。坟墓：回到出发地。鹅城堡：您得救了，妖魔要吃掉您。奇怪、荒诞的跳鹅图游戏，一切都由骰子决定，那骰子是别人放在您手里、以便更好地欺骗您的。

气息在游动。游动的气息触到我的手指。我在想我配不配得上这似乎要长久持续下去的平静的快乐。我甚至感觉不到这个问题会在我心里引起不安，如果我的眼睛是睁着的。波拉·霍真还睡着，还在她的黑夜里呼吸。她的宽阔的夜也包含着我的夜。她意识到了吗？

人们在城市张开的手部行走。他们历来在城墙里面、在假窗下面徘徊。他们去执行卑鄙、凶残的任务：偷盗、布下陷阱、强奸、屠杀、放置炸弹，在地下室使用酷刑。在我的记忆中，他们一直干着这种黑夜的勾当。还有使人担惊害怕的工作：抵抗运动。英雄出现在所有的十字路口。我根据贫乏的记忆想象英雄的业绩。

英雄脸上是不是带着微笑？也许他脸上没有带着微笑，也许他像那没有微笑的时代：阴雨、黑墙、设在各个部门

---

[1] 跳鹅图或跳鹅游戏，相当于我国的升官图。——译者注

口、用沙袋保护起来的岗亭。在本世纪那场最后的、陈旧的屠杀中，面色阴沉、忧郁的士兵。尤其是那些严酷的冬天，皑皑白雪、天气奇寒，像人们想象中俄国或北欧传说中的冬天。同样艳丽的春天，有丁香、金合欢那些早就不时兴的花。英雄身上一定带有那雨、那些士兵、那雪，那些花的特征。

回忆在我心里走着，英雄也在回忆中走着。我在楼上客厅窗子后面窥视他出发去进行黑夜的工作。我一听见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响，就冲到玻璃窗前。妈妈插上上面的插销，再插下面的插销。我聚精会神地看空荡荡的大街。我等着。我一秒钟一秒钟地数着。他终于穿过大街；他的披风、帽子和那个时代模糊的灰色一模一样。他和那个时代协调，和那个时代普遍的阴沉、模糊融成一体。碰到宵禁：他沉着地触犯那不可思议的禁令。英雄用小快步走路，因为他不是一个身材魁梧的人。他体格不强壮，身材也不高。我为他担心。从卍字装甲车上下来的人身材高大，魁梧极了。但是我有信心。他身上迸发出一股沉着、镇静的力量。那是装出来的吗？我感觉出他的脆弱。如果他们逮捕他、拷打他……我眼睛里噙满眼泪。他一定会死在刀下、铁棍之下。他不会招供的。他们会敲掉他的牙齿，他还是不会招供的。他已经在人行道上走远了，消失在黑夜之中。我脑子里还响着他的脚步声，好像我在他旁边走着，好像……

波拉·霍真翻了一个身。她的身体随着思想或梦的运动作不可解释的运动，醒来时什么也记不起来了。她仰面躺着，两只胳膊安安稳稳放在身体两边。她叹了一口气，平淡的气息又开始游动。我熟悉她脸上的最细小的斑纹，甚至那些细微的缺陷。因此她的脸对我是无与伦比的。她睡着的时

候脸上没有一丝短暂的颤抖，好像是死者的卧像、熟睡的石像。我想她也许死了。接着我丢开这念头，责备我自己心眼不好。

黑夜快要过去了。通常，死的念头总是很难丢开。终于有一个声音在我夜里烦躁慌乱中对我说了些什么，显然我一点没听懂。不能控制的兴奋情绪又占上风了。我深信我疯了，我什么也不是，不是任何人，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东西。我甚至不想变成东西、人或者什么要紧的东西。这使人沮丧的信念大概使我的脸看上去像杀人犯的脸。杀人犯的脸不过是睡眠不好的人的脸。

佩雷尔林荫大道的间质性光线、头班公共汽车轮子滚动的声音掩盖了波拉·霍真的呼吸。我竟以为我荒谬的想法变成了现实。我向左边翻身，把我的手搭在她的前臂上。我感到她身体的热量，我感受到早晨的现实。

波拉·霍真把奥斯丁汽车停在圣·路易岛上一条狭窄的街上。

“我父亲和蔼可亲，您会看出来的。”

她觉察到我有些胆怯、犹豫。她看对了。不用骗她，不用装着天真的样子问她怎样看待我对她父亲的看法？我无可奈何地解释说：“您知道我和父辈在一起总是觉得不自在。”她针锋相对地说：“菲立普，您跟谁一起都不自在。您应该习惯。”

我们处在激流的中心①。波拉在按大楼门口的数字锁时，我想我来赴会未免多余。我们还没有走进过厅，我就想

---

① 圣·路易岛在塞纳河中间。——译者注

出几条打退堂鼓的理由：首先我算什么人，我凭什么来参加宴会，我用什么名义？当然，我可以说是波拉的朋友，但是我们刚刚认识不久。我没有任何理由闯进她的家庭生活圈子。她父母亲有种种理由用犹太人接待异教徒的方式客气、随便地接待我。胆怯会使人变得愚蠢，甚至作出错误的判断。但是胆怯毕竟是胆怯。最后看一眼灰红色的天空，过去从妈妈嘴里听到的仇视犹太人的议论像死水里泛起的水泡，又在我脑子里浮现；所有这一切使我心里出现一种奇怪而不安的感觉。说奇怪是因为轮廓分明却又看不见。最后一刹那，我想起我父亲。实际上，我是考虑到我父亲才接受波拉邀请的。首先我是为父亲来这里作客的。电梯上升得很快。我责备自己自相矛盾。我问自己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不能大大方方干生活里简单、平凡的事情。也许我没有任何特殊理由活在世上。但是我活着是一个事实。当然我並不为此感到骄傲。我们来到楼梯口上，生的欢乐是我本来应该感受到的一种正当感情，但是我感受不到这种感情。霍真家的门打开的时候，我神态安详、镇静。

房间里是一派盛大宴会的热烈气氛。在楼梯口听不见谈话声，进房间里谈话声像雷鸣那么响。因为有限的空间里聚集着稠密的人群。客厅大门两边的衣帽架挂满了斗篷、帽子，像五颜六色、奇形怪状的巨兽。一个身材魁梧的人来给我们开门。他弯腰热情地亲波拉。他是金色头发，波拉是褐色头发。

“这是我弟弟，尼科拉。”

“尼科拉，这是菲立普。”

他像运动员那样使劲和我握手。客厅里的三盏水晶吊灯发出耀眼的亮光。房里灯火通明，一张张面孔，混杂的人群，嘈

杂的谈话声。波拉推着我朝前走。我看见远处中央吊灯下面的餐桌上五颜六色的丰盛菜肴。仿佛有一些无形的支杆在一个大的搅奶油桶里，通过循环输送装置不停地把一批批客人推到那里，推走，又推来。我们按照不易觉察的粒子运动规律在人流里前进。波拉·霍真一边走一边向似乎认识她的客人打招呼。有时候她给我介绍。我出其不意地握握先生们的手指头，大多数是上岁数的人。有时我握他们太太的手，努力不碰翻他们的点心碟。有些人向我这张陌生的面孔微笑，陌生的面孔也向他们微笑。有些人翕动一下嘴，说一句客套话，我也假惺惺地回答一句客气话。还有一些人嘴里塞满食品或者正在咀嚼，不知嘟哝了些什么，我假定那是对我说的。我们从陌生男人身边走到陌生女人身边，从一堆人走过另一堆人，我们穿过整个客厅。我们还绕过无法靠近的"小岛"，或者因为组成"小岛"的人群无法通过，或许因为显而易见那些人的唯一快乐就是把他们有限几个朋友的圈子关闭起来。

波拉父亲身边聚集着几个朋友。她父亲是个胖子，他用洪亮的声音给他的朋友们讲犹太人的故事，逗得那群阿谀奉承的人哈哈大笑。那些故事中总是设置陷阱的恶人或利欲薰心的人倒霉，所罗门或摩西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下面这个故事显然是从波兰或加利曾古老的修道院传下来的：有一天，亚拉伯罕去他朋友摩西家借一头驴。摩西回答他说，"你干吗要借我的驴？""我要去赶集，"亚拉伯罕说。"可惜不行，亚拉伯罕，我的驴在地里干活儿哩。要是驴在家里，我早就借给你了。"他刚说完这句话，隔壁牲口棚里的驴使劲叫起来。"嘿，"亚拉伯罕说，"奇怪呀，你的驴在地里叫，这儿都能听见。""我不能相信，"摩西生气地说。"你相信驴胜过相信我。"波拉很喜欢听这有趣的故事。她

一定听过。她父亲还讲了一些类似的故事。每个故事都受到热烈的欢迎。我在这位生命力充沛的人的脸上也看见我熟悉的波拉的宽额头、长着卷曲黑睫毛的眼睛、红红的厚嘴唇。我们快走到他们身边时，人群让开一条路，伸出手来。有片刻沉寂，波拉趁此机会给我介绍。她父亲起身热烈地招呼我。我第一次不再感觉我参加宴会是唐突的举动。

他搂着我的肩膀把我拉到餐桌前。他是一个和善而有经验的长者。他设法不让我感到拘束。比如他说："阿歇尔先生，要是我对您说您是一位生客，那我是在对您说假话。我女儿波拉不止一次和我们谈到您。我很高兴和您见面……请过来，我给您介绍我的朋友和我的妻子。"我们先在一位坐在扶手椅上高谈阔论的老太太旁边停下来。她身上珠光宝气，说话带着俄国口音。再往前，有一些年龄不相上下的画家。他们在交谈绘画的技法，不时说几句画家的笑话，都是一些蠢话。"还有一个理由说明您完全不是一个生客，那就是我在某个时期认识您的父亲，也许波拉对您说过……是的，是在可怕的战争时期。您也许还回忆得起来。如果您想知道，我可以给您谈谈他的情况。我应该承认您和夏尔·埃瓦里斯特有很多相像的地方。您比他高一些，但是脸部表情一模一样，特别是您注意力集中、态度严肃的时候，这确实让人吃惊。密莉安，密莉安！……"

他越说越激动。我们向餐桌走去。

"密莉安是我妻子。她一定高兴认识您。请跟我来。"

要穿过最后一道人墙。

波拉的母亲忙着把各种颜色的饮料倒进鸡尾酒杯里。她是一位身材高大、身体硬朗的女人。她听见丈夫的叫声抬起头来。虽然上年纪了，她仍然显得端庄漂亮。我立刻想到她年

轻时一定是一个美人。

“密莉安（他拉住她的胳膊），你记得夏尔·埃瓦里斯特吗？喏，这是他儿子菲立普。”我们相互问好。我竭力不显出过于局促的样子。她记起夏尔·埃瓦里斯特。她表示遗憾，战后再没有见过他。那可恶的时代把生活搅得乌七八糟。人们不可能知道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的人被消灭、被毁灭。另外一些人消失了。人们也许永远弄不清楚那些人是不是还生活在地球上的某个地方。有些人一直很好，或许变好了，另一些人一直很坏，或许变坏了。对任何人做出判断都可能会有失公允。我听懂她在客厅的喧哗中对我说的那一番含蓄的话。她身上散发出慈祥的氤氲。她说我既然是她女儿的朋友，请常到她家来玩，使我不致因不明不白的身分参加宴会感到别扭，这证明她的性格慈祥。她向我伸出滑润的手，她只在手腕上戴一只不坚固的白金手镯。有一会儿，我想吻她的手，然而我只握了握她的手。主要是由于腼腆，不是要遵循我们时代的不典雅的风尚。

“请过来”，他拉着我走，“咱们到书房去躲一躲，离那些人远远的。”我们分开谈话的人群，迎着像浪潮一样起伏的酒杯走去，终于穿过客厅。他提到的书房在大厅的另一头，还要穿过一条走廊。我趁这个机会看一眼架子上放着蓝色陶罐的老式厨房。我坐在一个帝国时代的长沙发上，沙发上铺着细环图案的绿绸垫子。这书房的陈设也过分讲究。波拉的父亲很自豪地让我看他货真价实的家具。“我跑了十几年古董店。我为这事费的周折最大。您看这把扶手椅（他指给我看一把椅子，我看不出它和别的椅子有多大的差别）是从马迈松买来的，是有保证单的。您想不到凑齐这些有签名的家具多么费事。”他从一个大理石面、包角有青铜鹰装饰

的写字台里拿出一个小本子。那是一本影集。

“我要给您看的东西，您一定会感兴趣的。”影集的封面是皮制的，为浅栗色，里面的页片是硬纸做成的。第一页上用白水粉写着两个年代1935—1945。

“阿歇尔先生，您会发现我是个条理分明、一丝不苟的人。我的纪念品都是以十年为期排列的。我的信件也是这种方法分类的。在最后那场战争中，正是这种癖好挽救了我们，我的意思是说挽救了我们全家人的性命。

“这几张照片（他让我看第二页的照片）和后面几页的照片不一样，同您没有直接关系。不过，我还是要请您仔细看看。这几张照片是1935年4、5月份在中东拍的。这一张是在伊斯坦布尔的皮革商业区，旁边这一张是在士麦拿……房屋看起来很新：经过1922年的大火，城市重新修建过。您和我女儿交往，您对她父亲却一点儿不了解！您要知道我是一个普通的地毯商。我常到土耳其叽里旮旯的地方采购伊朗、叙利亚、伊拉克地毯。我是做地毯生意发财的。”

影集里整整齐齐贴着6×9寸的齿花边照片。照片上有他和几个穿浅色衬衣、深色衣服的陌生人。他们都冲着摄影师微笑。他们是一些做大买卖的商人。背景是商店铺面前绳子上或竿子上挂着的布匹或地毯……

“我熟悉那些人。他们都是好人，各人有各人的癖好。比如这个人（一个像鞑靼骑兵模样的胖子），他每次谈生意之前总要带我到低级酒吧喝茴香酒，似乎只有他一个人知道那种地方。您看，另外那个人就是我。我有点像他们。我的穿着和他们一样。我那时22岁。在那个时代，一个22岁的年轻人要想获得成功就得打扮成40岁的人。”

这个身着不吉利男装的年轻人不大容易认出来。第二次

世界大战以前，那种服装很流行。这人是个瘦高个儿，脸上露出庄重忙碌的神情，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他头发蓬松，目光炯炯，鼻子清秀。

“我们翻一页，1936年。美好的年代。我和父母亲在一起，似乎法国人全都度假去了。我们像每年夏天一样到海边去了。我父亲有一辆绿色塔尔博·拉各汽车。他让我驾驶。多么神奇的汽车。我们开到150迈。我们有一种特殊的自由感觉。后来，我们再没有体会到那种感觉。我们在桑斯过夜，第二天在埃克斯过夜。这位太太是我母亲。”

这张照片是用慢速曝光在马路上法国梧桐树荫下拍的。那时代，人们很喜欢那种拍法。他坐在塔尔博拉各驾驶舱里坦率地微笑。也许那近乎于咧嘴的强笑是阳光直射在脸上造成的。他母亲坐在他右手，看起来有50来岁。从她头上戴着的头巾里露出几绺浅色头发。一只手戴着手套随便地或者说优美地搭在车门上。

“我母亲始终保持着青春，身体显得年轻，思想也很活跃，也就是说她无论遇见什么麻烦，完全不像老年人那样怏怏不乐、一触即怒。我说她从来没有衰老过是不会错的。她是一个绝妙的女人。她喜欢我们全家人每年去圣·拉斐尔避暑。我们在那儿有一幢别墅，她很喜欢那幢别墅。1938年，她和我父亲躲到那里去了。您还要一杯威士忌吗？”

他给我斟了一杯杜尔威士忌。

“四年前我父母亲去世后，我们把那幢别墅卖了。对我们来说，海滨太远了。再说，海滨也不是昔日的海滨。我们还保留着诺曼第的房子。我从来不去那里。我只能在巴黎生活。我连诺曼第那个避难所成什么样子都不知道。是的，我把那儿的房子看成避难所。人世间的事难以预料，是吧？再说从

海峡群岛乘船去那里还要航行两小时。我们犹太人不得不准备一条退路。如同舞台上的暗梯。我想让波拉最近替我去那里察看一下房屋的状况。如果房屋需要修缮，好有所准备。阿歇尔·菲立普先生，您愿意陪她去那里转转吗？”

我向他解释说我没有任何事务缠身，可以随时陪波拉去诺曼第。

“谢谢您慨然应允。您知道她一个人去那里，我不放心。您在那里生活会不大方便的。自来水、电也许都没有。不过那地方很美。您会看到的，诺曼第的公路是一个奇观。咱们还是谈影集吧。这张照片是我在1936年5月拍的。这张照片很有意思，能说明那个时代的气氛。那是雷蒙洛色朗街，11区。您看这些工人，他们聚集在大街上，面对工厂的办公室，是水泥厂或这一类的工厂……请看这公厕上的十个人。他们在挥动拳头，轮流唱国际歌和卡马尼奥拉歌[1]。他们对面的经理大楼上，白领职员挤在窗前。那些人和楼下的工人属于不同的世界。两边的人在对骂。我记得很清楚，那个穿灰色工作服的工头大声吼叫：‘法国完了！法国完蛋了！你们的工资照发的休假……真正的战争，你们会得到的！’其余的人大声唱起来：

起义者，他真正的名字叫人
他再不是驮重的牲口
他只听任理智的驱使
他满怀信心地前进
因为科学像普照大地的太阳
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

---

① 卡马尼奥尼歌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歌曲。——译者注

“大楼上叫骂的白领职员首先偃旗息鼓，楼下的人人数上占优势，有毅力坚持到底。应该说烧酒起的作用也不小……”

我仔细看这张照片。公厕的圆屋顶上，有几个工人手里拿着酒瓶。阳光照得他们的牙齿闪闪发亮，他们张着嘴好像要把天吞下去似的。我问波拉的父亲，他对那个时代的动乱有什么看法。

“我是把那些事件当作自然现象拍下来的。我知道短时间内不会发生那种动乱了。我认为保留一些动乱时期的场面是有意思的。我没有十分明确的政治观点。我既不站在这一方，也不站在那一方。因为我认为不能偏袒任何一方。作为犹太人，加上我在这儿的地位方面的考虑，我禁止自己介入社会和政治斗争。我认为社会和政治斗争与我无关。我父亲对我说过无数次：‘不论你在什么地方都不要介入任何事情，只要把你自己的事情干好就行了。让他们解决他们自己的事情。’

“我长时间遵循着这条生活原则，一直到战争爆发的时候。不过，虽然我没有介入，我却试着了解。从感情的角度看，我明白工人再不愿意当奴隶。他们是对的，他们完全在理，所以他们在一年内争得了权利。从那时起再没有人想要剥夺他们的权利。某些人想剥夺他们的权利，但是那些人错了，如果人们永无休止地挑起阶级间的斗争，那么任何实实在在的事情、任何真正人道的事情也做不出来。那个时代，我就是这样想的。同时我到各地旅行，碰见一些贪图钱财的商人，那伙人都用挑剔的眼光看待社会变化。他们把世界看成静止的，那儿只有做大生意的车子在滚动。我不同意这种自私自利的见解。但是由于我和德国的接触频繁，所以我对

那儿发生的事情还是非常了解的。我很难责备那位工程师或那个叫嚷战争迫在眉睫的工头说他们错了。因为工人和老板一样，只关心他们自己的事情。至少，在这个国家是这样：他们关心的是工资照发的休假、工作时间。其余的事情、世界的进程，对他们都无关紧要。然而我知道会发生战争，德国会发动战争。只有聋子、瞎子才看不见。法国人、英国人只愿意谈论和平。那人的喊叫声'你们会得到一场真正的战争'好像还在我耳边响着。不过我不会对工人说他们就要得到战争，我不会说战争好得很。因为战争要把他们对休假和对舒适生活的向往扫除干净，因为战争要扼杀他们的工会，使他们不能提出自己的要求，消灭那些不安分守己的工人。不，这些话我不会说的。我会对他们说这样的话：你们就要经受战争。我们就要经受战争。请你们睁开眼睛、竖起耳朵。我们最好还是考虑一下我们能够做什么事情，使这场劫难不致于发生。如果我们想不出办法避免这场战争，至少要想想我们准备用什么方式进行斗争。缺少的是这些，首先是看清局势，其次是准备抵抗。应该坚持斗争，对吧？人们不应该预先接受暴政的统治。本世纪真正的灾难就是屈服于来自任何地方、任何形式的暴力。个人屈服于国家的暴力，个人组成的人群屈服于有形的暴力和思想意识的暴力。"

"占领时期有不屈服的例子吗？"

"有些人证明有。开始他们的抵抗不引人注目，有时候是分散的，被动的，然后和其他抵抗力量联合起来。后来越来越积极地进行斗争。某些人却另有一番勇气让别人说他们是懦夫、卖国贼。我坚信每个人都能够而且应该在他所在的地方进行抵抗，不论抵抗多么微弱。那些初看起来无足轻重、没有明显效果的抵抗运动是引不起统治者的注意的。然

而这微弱分散的斗争加起来汇成强大的潮流，不断冲击障碍物，终将冲垮那些障碍。

“请翻过几页。42年是关键性的一年。这些照片相当于一部巴黎街道文献，是我偷拍下来的。士兵列队行进。还有巴黎市民用来搬家的古怪车辆。”

1942年。照片贴得很整齐，每页四张。不像战争时期的照片，大多数是在室内拍的。显然比前面的照片拍得好。波拉的父亲给我解释说这些照片是用莱卡相机拍的，相机是在拉斐特街第朗蒂商店买的。大部分照片上可以看出房间豪华，有穿便衣的人，也有由漂亮女人陪酒的德国军官。这伙人显得轻松愉快、无忧无虑。

“这是巴黎里尔街帝国大使馆。所以照片上有穿制服的军人。我承认这些照片不像在为抵抗运动战士树碑立传。可是在我看来，这些照片是无可辩驳的证明。没有在阴森恐怖的岁月生活过的人要学的东西很多啊！历史书籍里显然没有把一切都记载进去。

“您看这个人，（他让我看一个瘦小、没有长胡子的人。这人站在门旁边，手里拿着一杯酒，脸上的表情不可捉摸。）这人叫朱利安·朗贝尔，是我的朋友。德国人家里开家庭舞会时，他乘机收集大量情报。夜里，他常和铁路工人一起破坏列车。一次，他中了埋伏，被枪杀了。您父亲和我在同一个情报网。我们收集情报、拍发情报。朱利安·朗贝尔常出入大使馆。因为他的德语说得很流利，他是鲁道夫·施莱尔的朋友。他有条件当双重间谍。

“这人是大使阿贝茨。他在巴黎的日子似乎过得很惬意。他还不知道柏林就要召他回国。这人是艾伯特，他是大使的守护神，他帮助大使记住某些明显的事实：即法国只有共产

党、黑人、犹太人，这些人都是帝国的敌人。法国的价值只能用两个标准衡量：香槟酒和女人。您看，角落里的这个人是格林。他是有名望的教授，比艾伯特更加激进。他说所有的法国人都是黑种人。瞧他们这帮混蛋。还有几个有名的法奸。我就在那儿从容不迫地拍照片。

"阿歇尔先生，您有权问我，我这个犹太人怎么没有被铅灰色的车厢运到一个叫奥斯威辛的小村庄里，烧成烟尘冉冉飘向宁静、晴朗的天空，却能轻而易举地拍摄德国人的招待会。这问题提得好，我也常常向自己提这个问题，得不到答案。不过，我愿意帮助您弄懂这问题，那时您是个孩子不可能懂得的。您父亲夏尔·埃瓦里斯特曾是我的朋友，我说'曾是'是因为自从他自动失踪时起，我只能谈他的过去。要是他此刻在这里，我一定会对他说：'你是我的朋友'。

"当然我们是在战前尼斯出口商代表会议上碰见的。我们两人一见如故。后来我们又在巴黎见过几次。战争爆发了。巴黎和半个法国被占领。我们在直接受到威胁的人之列。夏尔·埃瓦里斯特成为我们的救星。他可以自由出入巴黎警察局。亏了他，我和我全家人才能变换身分，我们还趁此机会改行从事另一种职业，变更了住处。没有丝毫疏忽大意的地方。夏尔·埃瓦里斯特指点我们疏通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在国防军列队通过爱丽舍田园大街之前（也就是在贝利兹宫反犹太人展览之前），我们的全部手续都办好了，有了保障。我们在每个敏感地方的档案全部换上了我们的新名字。我们的旧档案里记载着：移居美国。

"亏得您父亲，我们和许多别的人才能幸存下来。帮助犹太人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也是我初期最紧迫的、唯一的任务。我们对敌人的毁灭意图及敌人的残酷要有所了解。还应

该了解敌人的计划。应该动员一切我们能动员的力量以牙还牙。我们的情报、联络和反宣传网逐渐形成。我们没干出什么特别光荣或英雄的业绩。我对某些国际市场和商业规律的知识成为我的特洛伊木马。战争时期商品总是紧缺、有用的，我借助于它进入吕泰霞饭店，留心观察德军司令部的动静。

"战争使德国人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德国工厂并不比被占领国家的工厂更能满足他们军事上的需要。我负责替国防军寻找外国供应商。因此，国防军得到一些阿根廷皮子、土耳其烟草……那几笔交易是通过奥托百货公司做成的。要留在原处不受到怀疑必须付出这样的代价。给他们东线的士兵提供腰带、鞋、军大衣、军裤的布料可以使幸存者挣得一份工资，使抵抗战士及时得到通知，了解酝酿中的一网打尽的搜捕计划，头天夜里把次日清晨大楼里、区里大逮捕的消息通知犹太人……您明白吗？"

是的，我明白。经过这么多年再提这样的问题好像不大容易被人理解。用皮子、带子、布、物品换来生命和良心上的平静，我明白。要成为人，始终成为人，难道不应该做应该做的事情吗？难道不应该付该付的代价吗？波拉的父亲和我之间有片刻的沉默。

于是，我对他谈起战争快要结束的时代；我了解那个在我脑海里留下深刻印象的时代。那时我变成一个很懂事的孩子，我怎么也忘不了占领时期阴沉的气氛。我想起那时的恐惧，我母亲比我更加恐惧。因为我没有能力左右她：她为我父亲担心，为我担心，为她自己、为一切、为牛奶、为面包、为肉、为流弹担心……可以随便举出一个例子，有一个朋友的小女儿从蒙苏里公园回来时腰部中了流弹。她只是由于奇迹才捡到一条命。占领时期严冬的寒冷是没有尽头的。

我还和他谈到我父亲，谈到我痛苦地回忆起他深夜离家的情景，谈到神秘的气氛和我们的孤寂。然而我为他参加战斗而高兴，尽管那是一种忧伤的喜悦。

“阿歇尔先生，您是对的。人们只有在特殊情况下，自己也卷进事变中时，才能下定决心。苍蝇在蜘蛛网里一直挣扎到死或者逃掉为止。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场挣脱蜘蛛网的斗争。我不相信那些绝对的决心，那种决心常常会变成盲目的信仰或者怯懦的忠诚……要是只有内心感到恐惧的空想理论家，一切事情就简单、容易多了。可是日常生活提供适于蠕虫生活的松软沃土，有一群过一天算一天的小恶棍，还有掮客和匪徒。还有三面人，四面人，多面人。首先是那些告发犹太人的人，他们掠夺犹太人的财产，再用批发价转卖给德国人，还有形形色色诚实的屠夫：几磅牛肉，几磅男人肉、女人肉。再也找不到比这个屠宰场更像屠宰场的地方了。当然，我不大可能变成那样的恶棍。可是每天我都可能被人们认为我和他们是一丘之貉。对我来说，这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您不是有假名字作掩护吗？”

“乔治·安德烈这个假名字能起点作用，但是並不十分可靠。人们再也找不到万全之计。我戴玳瑁眼镜、染头发等诡计都不是靠得住的掩护。只有深信这些伪装，这些伪装才能起到保护作用。可是碰见熟人，我就会暴露。战前的熟人也许一眼就能把我认出来。由于彼此不了解，所以必须提防所有的人。国家社会主义的细菌在腐蚀人们心灵的同时保持其鲜嫩的外表。我们所有的人都危在旦夕，我们无法时时掩饰噪音，掩饰不好会使我们暴露，一个稍稍敏锐的目光也能招来杀身之祸。”

我翻过一页。1943年只有两张照片。

“阿歇尔先生，您认得出您父亲吗？”

我把照片上的人同我记忆中的形象比较一下，虽然他的面貌、体态显得年轻，可以说是一个年轻人，我还是认出他来了。照片上的人和那个穿灰衣服的小个子判若两人，我忽然想会不会是两个人。显然是他。从他眼睛里的嘲弄神情判断，从他那似乎专注地看我身后什么地方、使我想回头看的表情判断，我不会看错的。还有，他即使坐着左手也叉在腰上的姿势，我也不会看错。右边那张照片上，他优美地盘翘着二郎腿，他的软帽子由后向前斜戴着（和电影里美国强盗的姿势相反）。他用右手捂住脸颊。他把手指头放在嘴角和脸颊中间。我记得从前看见过他这个姿势。在1943年的两张照片上，他就是这样用右手捂住脸的。

“他为什么老是用手捂住脸？”我问波拉的父亲。

“我说不大清楚。他脸上长了点东西，皮肤上的小毛病，他大概想用优美的手势掩饰那个小疤。”

“他常用手捂住脸吗？”

“他总是那样。”

有一张照片是在林下灌木丛路边拍的。树枝上有透明的小叶簇。大约是在春天，照片上有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金发女人。她面带微笑看着我父亲，我父亲看着镜头。

“这张照片是在什么场合下拍的？”

“是在远郊区的布克森林里拍的。我们架设了一台活动收发报机。那是在五月的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

那女人还年轻，最多30岁。她和我母亲有几分相像。她身上穿一件浅色华达呢外衣，一件深色上衣，十有八九是蓝色或灰色的，一条对比色菱形图案的裙子。她长着灰蓝色的眼睛。她的上嘴唇超出下嘴唇，显得精明。她似乎身材不

高，因为她和我父亲差不多高矮。我仔细打量背景上的灌木丛，林下灌木稀疏、贫瘠。我看见后面远处有两根较粗的树干。照片上的情景和我小时候想象我父亲藏身的森林大不一样。

"阿歇尔先生，这类照片是很稀罕的。情报网的成员拍照片是要冒很大风险的。除非我们觉得百分之百的安全，否则我们从来不拍照片。您看这张照片。"

这是我父亲的单人照片。他只穿一件衬衣，室内亮着有灯罩的大灯泡。他面对摄影师。他面容憔悴。从他兴奋的目光里也能看出来。他头上戴着耳机。他右边有一台发报机。在灯光下，他的房间好像很大；我仔细看才发现原来那是一间小房间。

"我自己冲印这些照片。器材不容易搞到，我把它们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您看出来夏尔·埃瓦里斯特是报务员，他是一个专家，一个行家（我发现我还是不了解我父亲，尤其不知道他是无线电方面的行家，他会摆弄无线电）。那天，我们在有比较固定设备的地方。您看那儿的笨重设备能快速安全地收发报。因此，我们有最重要的情报时才使用那儿的机器。我们遇到过那样的情况，不得不在一个小时内转移那些机器。德国无线电测向仪四处窥伺着。我们的机器装置在16区一家妓院的顶楼上。那幢房子还在，依旧不大引人注目。我想那幢房屋的功用几乎没有改变。今天的客人不再是德国军官，而是上流社会的先生们。那是一幢公园里的阴暗的建筑，和周围的房屋没有多大的差别。您也许会问我们为什么安置在一个军官妓院里。因为那是一个安全的地方，还因为那是一个有情报来源的地方。

"德国人怀疑法国人想使国防军得梅毒病。他们认为梅毒是我们的秘密武器。所以他们对妓女进行过整顿，以便

保护他们自己。妓女们每周接受两次医生的检查，一个法国医生、一个德国医生。条例上规定，十家妓院里有四家专门接待占领军士兵，其余六家门上贴着这样的告示：德国士兵严禁进入本游艺场所。有一段时间，不十分挑剔的军士专门光顾这几家妓院，如One Two Two或者斯芬克司，后来他们讨厌嘈杂的人群及形形色色企图挤进去的人，就穿着便衣出入于上述16区一家不大显眼的妓院。他们试图借那个地方忘掉战争、流放、对胜利的担心、对失败的担心、憎恨和污浊……

“这家妓院的妓女是百里挑一的绝色美人。其中的一些姑娘为我们工作。她们的拿手戏：枕头上刺探情报。利用士兵的沮丧情绪能有效地收集到情报，如开往德国的列车、装运的货物及目的地，还有德国司令部、战地宪兵团、甚至盖世太保军事首领的动向。有时妓女预先把吕泰霞饭店或福什大道第四处策划的搜查及大搜捕通知我们。我们可以加以防范。被搜捕的人从他们手里溜掉了。我们从同一个情报来源得知占领者疯狂的反响。我们收集到特别重要的情报时，您父亲就爬到顶楼上，取下衣橱后的两块隐蔽的木板，拿出他的钢琴立刻发报。联系上之后拍发两次。然后他让发报机一连休息好几天。德国人也许能截获电文，但是他们来不及确定发报地点。他们的定向探测车长时间在附近街上游弋。我们停止发报。最后他们失去了耐心。”

我看这个年纪还轻、面有倦容的人的照片。我好像注意到英雄深沉、锐利的目光。他坐着拍照的姿势使我忘记了他矮小的身材。他端正、呆板的上嘴唇上留着稀疏的胡子，也许不像我记忆中想象的那样阴狠。夏尔·埃瓦里斯特执行战斗任务时，神情极为严肃。正如波拉父亲说的，他一定是一

个出色的专家。这张照片还有一个特点：我父亲的脸没有被荫影遮住，也没有用手挡住脸颊。他右边嘴角和脸颊之间有一个钱币大小的黑斑。

波拉的父亲在一张名片上写了几行字，塞进我上衣口袋里。

“您考虑吧，我把地址给您。这是最后一处地址。由您自己决定。得了，我们把这杯威士忌干了吧。”

我在波拉家的宴会是这样结束的。

生活中存在着、呈现出最难以置信的事情。任何人只要稍加留心便会意识到统计学家认为这种机缘实现的可能极其渺茫，一定会把这种机缘看作是令人惊奇的自然现象，当然是自然现象，最多会议论说：这是生活嘛，或者说一句：生活中什么事情都会发生的。比方说，某个人和他童年时失散的兄弟在相邻的两幢大楼里生活了二十年，这兄弟二人从来没有碰见过，或者他们碰见了彼此没有认出来、没有交谈。在现实生活中，发生过这种事情，今后还会发生。这种事情使我们开心、感伤、惊奇，但是我们並不真正感到意外。及至一个电影编剧把这个故事搬上银幕，我们就觉得它不可信了。一个小说家想象出一个有百万家财的父亲，他的儿子疏懒成性，把家败了，渐渐落到一贫如洗、潦倒不堪的地步。这小说家肯定找不到出版商替他出版这部传记小说（然而我们能举出一些尽人皆知的例子），倒不是因为这小说悲惨，而是因为在这个社会里，天资平庸的子弟能靠家庭关系轻易摆脱困境，因而这小说会被人斥为完全不真实。总的说来讲自己的事情是一件极其愚蠢的举动。要说普通人有比较生动、活泼的经历是极少见的，至于说超群的人，他们的经历抽象、可

望而不可及，远非一般人所能理解。想接近那水平纯粹是装腔作势。因此，我实不能设想我处在某个故事的中心。如果我能叙述点什么，我一定竭尽全力避免处在画面的中心。确切地说，我在那里並不比一个几何图形的中心有更多的意义。充其量我只能偶然排在次要的地位、缩在后面。很明显，我对绘画、艺术一窍不通，我承认（我自己认识到）。我自己的生活是我操心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正常的。我命途多舛，遇到种种看似荒谬的事情。我不得不想在从未发生任何事情的生活里，我也会遇见意外变故的。就以今天这个寒冬腊月的日子为例，我在恩加丁一家旅馆的房间里冻得手脚发麻。这事情本身是难以置信的，然而这是事实。另外，我和我母亲分享一切：乏味的度假的时期，我出世后就和她同住的巴黎的房屋，对我来说她竟像一个陌生人，她只在今年冬天的一个夜里和我进行过唯一一次真正的谈话，这不是同样令人难以置信么？还有我竟然长时间不认识我父亲？他抚育了我，后来又抛弃了我？我只能想象他的生活，想象他本人？那未尽到责任、去向不明的父亲是个什么人？即使我见到他，恐怕他对我也是一个难解的谜，还有我和我父亲的朋友的女儿波拉邂逅，又遇见她父亲？难道我一生有这么多机缘吗？我是环境嘲弄的对象吗？我无法回答这些问题。或者我不敢。我承认这一点。

淡灰色的影子蹦蹦跳跳，溅到我们脸上。那是一个下雨天的早晨。我们从圣·克卢门驶出巴黎。黑色奥斯丁小轿车行驶了将近一个小时。我和波拉只就加油和交通情况谈了几句。西边的高速公路像一条灰色的带子在灰色的天空下面展开。在细雨蒙蒙和尘雾弥漫的天空下面隐隐约约可以看见树、工

厂、工业用建筑、城市的一角（芒特拉若利、埃夫勒……）

波拉像往常一样车开得快而平稳。她的每一个动作都干净、利落。她沿着宽阔的塞纳河谷地在蜿蜒曲折的公路上行驶。她变换车速，换低挡的动作熟练而恰到好处。表盘上的指针在120到130之间摆动。有时，水珠溅到驾驶舱里。奇怪得很，我觉得很安全。

过了埃夫勒，房屋渐渐稀疏了。隔一段距离，一个远处的农庄迎面驰来、绕着我们转圈，然后消失了。草地上，几条狗在相互追逐。一个孤单的骑马的人在滂沱大雨中向我们招手，然后消失在我们后方。

我想起头天夜里的情景，一切是那么简单，又令人惊奇。我本来应该知道我该做的事情。波拉的父亲让我明白“由您来决定”。可是我拿不定主意。很久以来，优柔寡断已成为我的第二天性，我丝毫不为此觉得别扭。我本应去迷人的小岛(名片上有地名)①，但我却飞快地离开它向诺曼第海滨和科坦登半岛驶去。我这种与目的地背道而驰的特性使我晕头转向难以忍受。所以我坦率地笑起来，那坦率是要掩盖什么。波拉没有看错，她深知我的诡诈、我的软弱的防御手段。我欣赏她尖尖的鼻子、爱噘着的嘴唇，因为注意力集中显得特别美的面孔，她握住方向盘的手。因为疲倦，她的动作显得有些迟钝，不十分灵巧了。

“菲立普，您有的是时间，可以从容考虑。您可以在那儿考虑。那地方很清静。那是一座正在冬眠的偏僻小城。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看见海峡群岛，尤其是这个季节，海滨景色十分壮丽。房屋在山坡上。”

---

① 指他父亲所在的小岛，在巴黎十六区。——译者注

"房屋在山坡上"，这就是说我们可以眺望大海和城市，也就是说我们在那儿会过得很好、很幸福。说到幸福，采取怀疑态度是上策。但是，我宁愿想波拉任何事情都不会弄错，她是我的向导，她知道把我领到什么地方。我过去是（现在也是）一个病人。我的苦恼使我得不到片刻的安宁，我不会忘记我不同于健康、无忧无虑的常人。我由她驾驶汽车。我闭上眼睛，不看那由带刺铁丝网连接起来的一片片草场，一排排树木，在两个小丘之间藏在树丛里的一幢幢建筑物、那高高的丘陵，那一束束道路，所有那些直线组成的驯服景色，它们既使人害怕又使人放心。因为小树林和无害的山岗能藏匿形形色色的盗贼。我竭力把以精耕细作、色彩斑烂的土地，时时变化的朦胧天空为特征的法国景色想象成另外一副更加恬静的景色，宽阔的公路在靠近陆地那一面陷进地里，从靠近海洋那一面的绿色和淡紫色的港湾处露出来……四面八方，鲜红色房顶的白色建筑和东边葱绿的山丘、西边的碎石构成一幅突兀的和谐景象。奥斯丁在一个尚有某些野蛮残余的真实、开化地区和另一个更加安静、辽阔地区之间的某地行驶着。那儿，一个红白色的埃索汽车加油站飞快地奔来，使我想起什么人在开动机器。汽车在减速。我睁开眼睛。我们把汽车开进一个大停车场，汽车的四个过热的汽缸发出嗤嗤的响声。停车场里有许多车辆及手推车。天还在下雨。雨伞的影子在发亮的汽车中间跳动。有一个油泵，那儿有人出售降价汽油。

"我们在什么地方？"

"在一家超级市场前面。我们想要在海岛上的房屋里住下去就得采购些东西。"

"您以为我们要住很长时间吗？"

"我说不清楚。需要住多久就住多久。这由您我决定。"

"是的，不错，需要住多久就住多久。"我用平淡的口气附和说。

波拉·霍真在后视镜里照一照，整理一下头发。我深深吸了几口新鲜空气，我觉得空气中已经有大海的气息。这样有助于适应环境的变化。我拿她褐色卷发开玩笑，她正仔细地梳理。人们不会把她当成农村姑娘的。我有过（现在还有）这种愚蠢的想法。把波拉和农村姑娘加以比较实属滑稽。再说我这个从未离开过巴黎第六区的人对农村姑娘能知道些什么？也许我知道农村姑娘很漂亮，大概农村漂亮姑娘所剩不多了。她们逃避沉重的农活儿。她们跑到舒适的城市里去了。

"您告诉过您母亲我们出来了吗？"

"不，没有。"

"您应该通知她，快，那个花棚旁边有一个电话亭。去吧，一会儿到里面找我。"

她精神饱满地推着小车走进超级市场。尽管还下着雨，我还是不慌不忙地朝电话亭走去。我一边走一边想象店堂内部和它的一整套仪式：挑选、押金、在货架之间鱼贯而行、默默地排队等待，付款及小资产阶级的乐曲。手推车上装着一盒盒通心粉、糕点。想起这些标准化的大批量消费，我不禁感到厌恶。我知道要使价格适合大多数消费者的水平，这种方式是必不可少的。

电话亭四面通风。在包着套管的电线一端挂着耳机，电话簿又脏又破。没准儿遇到的是白白地吞下硬币，而无法和对方通话的糟糕电话。我居然一拨号码，妈妈就讲话了。我试着向妈妈解释我陪波拉在埃夫勒和利济厄之间某地的一家超级

市场里买东西，我还告诉她我们要去看波拉家在科坦登半岛的房子。我让她不要担心。我没法告诉她我们什么时候回去。我听不出妈妈的声音是高兴还是伤心。她的声音很平淡，好像是从梦中被叫醒的人的声音。这也许表明她的容忍或者是表面的安详。再说妈妈知道我讨厌打电话。她打电话时很少发脾气，也不用事先考虑过的话责备我。是的，她等着我。不，她不会挂念。不会的。是的，她认为在海滨住些时候对我会有好处的，因为海边的空气清新。是的，如果我们要多住些日子，最好给她写一封短信，或者再给她去个电话。是的，她明白我为什么没有早些通知她。不，这没什么。她自己能够解决。再说她已经习惯了。是的，托尼·索昂去过。他身体好些了。他真的病了。她很抱歉，错怪他了。他们谈过工厂的事及近期要采取的措施。是的，等我回去后，我们可以讨论。一切都好。不，她什么也不需要。是的，我什么时候回去都行。我再一次答应给她写信。是的，我定期给她写信把我的情况告诉她。

我走出电话亭时，觉得自己很可笑。我好像第一次参加暑期夏令营的孩子。大人用无动于衷的声音告诉孩子，大人对他很放心。我在风吹雨淋的花摊上买了一束含苞未放的红康乃馨。我很喜欢这种花，这花好像有点难登大雅之堂。某些阶层的人不作兴送这种花。这是给市井女子送的花。妈妈不愿意我送她这种花。然而，它那像箭羽般张开的浅绿色的茎和紧密辛辣的红花瓣形成多么强烈的对比，那花瓣仿佛是可以撩开的揉皱的香纱裙。我在酒类部和渔具部间的走道上找到她，我送给她那束花。她已经把各种食品装了满满一车，她身后还拉着另一辆小车。我把花放在大米和炼乳中间。

“给您母亲打通电话了吗？”

"是的，一切顺利，我得到批准了。"

"菲立普，您做事像个孩子。别这样，您应该昨天通知您母亲。"

"我要学习的事情多得很。"

"我喜欢康乃馨。我希望能在家里找到一个花瓶。"

"我们可以买一个。"

"在这儿买？随您便。我们还得买餐具、金枪鱼罐头。爸爸告诉过我食品橱里没有吃的东西。我们还得买睡袋。"

我感到一阵晕眩。我们站在野营器材部前面。波拉忙着挑选商品，她显得很开心。她随便拿了两个耐寒的睡袋，堆放在后面那辆推车上。

"我们用得着这睡袋的，暖气也许坏了。"

"这种睡袋还有一个优点，可以连成一个夫妇睡袋。"

"花瓶呢？"

"在那边。"

"那些花瓶不漂亮。"

"咱们就要这个吧，这花瓶不算难看。"

这是一个细长颈花瓶，用来插脆茎的康乃馨最合适不过了。我们的两辆小推车装得满满的。我们通过付款处走到汽车旁边。雨已经停了。超级市场里、停车场上的扬声器播放着平克·弗洛伊德的一首名曲：月亮的阴暗面。

十字路口的路牌上写着　冈城30公里。我们已经行驶一刻多钟了。

"您知道，"波拉说，"我们有肥鹅肝。"

"肥鹅肝！您一句话说得我嘴馋了。能找一处地方把汽车停下来吗？"

我们用眼睛搜索一条近道，一片可供我们休息的树林。那

边，不行，这儿。我们在几个村子附近兜圈子，绕过贝朗格勒维尔、希谢波维尔、塞克维尔、孔特维尔……我们在省级公路和村间道路上行驶了一会，开进一处安静的林间空地。波拉把汽车停在一条有车辙的路上，奥斯丁底盘蹭着长满草的粘土堆。波拉两手紧紧握住方向盘。她对我说她讨厌那些住着公证人和马贩子的乡村客店。仔细衡量一下，宁可冒着陷进泥泞之中的危险到野地里休息。我祈祷上帝保佑我们，别让我们像亚马孙河流域粗俗的探险家那样被困在沼泽里。

"您不觉得这地方景色优美吗？"

她把汽车开到一条小沟旁几厘米的地方停下来，小沟里是暗绿色的泥浆。

"是的，我承认这地方美极了，远远离开了喧嚣、纷乱的人群。"

我忽然想起杰罗姆①的一部小说不禁笑起来了。那是我小时候读过的一部小说。我们今天的处境和小说中的几个场面同样窘。

"您好像热锅上的蚂蚁。您为什么那么急于开到大马路上去呢？您把鞋、袜脱掉。"

"为什么？"

"把鞋袜脱掉，去打开后舱盖，在右边的口袋里把肥鹅肝和索泰尔纳白葡萄酒拿来。开罐头刀在我的蓝帆布包里。"

"就这样光着脚去吗？我不干！"

"那好，我去。"

"还是我去吧，怎么说现在也是十一月的天气。"

① 杰罗姆（1859—1927）美国作家。——译者注

我绕汽车转了一圈。草上的晨霜变成了白天的露水，脚踩在上面很舒服。第一个感觉是火辣辣的，一会儿传到腿上。脚趾头踩进泥里有一种新鲜、舒适的感觉。我的两只脚在冰冷的、咔嚓响的泥里搅动。我脚上的热量使泥块重新变得柔软起来。波拉打开车门探身看我。她欣喜若狂地祝贺我，像大人看见胆小怕事的孩子做出什么大胆荒唐的事情，期望那孩子因此变得聪明起来。我好像在大路上败叶残草的烂泥里生了根，感到非常快活。波拉笑得喘不过气来。她催我把吃的、喝的拿去。她说得不错，索泰尔纳白葡萄酒、肥鹅肝都在她说的口袋里。我还拿出黑麦面包。我回到座位上才发觉没有拿刀，没法把鹅肝涂在面包上。我正要下车，波拉说该她去了，她说她要去。她把裙子提到膝盖处，要在泥浆里蹚一会儿。她把脚伸进我踩出的褐色泥坑里，在疏松的泥浆里搅动。

我在后视镜里看见她，同时我还能打量我前面的景色。一些树上还披着有深色斑点树叶的残装，我无法说出是哪些树。附近树林的叶子也没有完全脱落。树枝不停地簌簌抖动，它身上裹着的那一层绒毛显得更加娇弱。要不是我们又说又笑，那地方真是寂静无声。受惊的鸟儿早已离开那儿，也许因为我们光临，也许仅仅因为鸟儿的季节已经过了。一片灌木丛后面依稀可见的田野也十分荒凉。那里好像没有庄稼人，田野只是一些植物、逼真的布景、美丽的假象。

波拉回到车舱里。我们两人脚上好像都穿着一双长及踝骨的亮靴子。

“菲立普，您还没有对我说我们要感冒哩，您会改变吗？”

我们吃得津津有味。她想要什么？她有一个打算，还是

任何打算也没有。总之，我並不想知道。“您会改变吗？”依我看，这单刀直入的问题是进攻。对我来说，我怎么能否定改变的必要性呢？我对我贝壳式的生活能满意吗？今天，我能满意吗？人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

波拉·霍真似乎不同意我对荒凉田野的悲伤的感情。她在田野里显得很愉快。索泰尔纳白葡萄酒使我们有一点醉意。我们决定在松软的泥浆里，或者说在有小树枝、卵石和败叶的泥浆里蹚最后一次。在沙地上也许会舒服一些，但是不够味、不够刺激。

我们钻进树林里。我们根据凸凹不平的锋利或有棱角的路面、丰润的地衣、柔软的腐殖土辨认出不同的土地。我们急匆匆地跑到这儿，跑到那儿，寻找一处有树叶、干草、高低不平的地方……这又变成一个游戏，好玩极了，最后我们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不得不作罢。波拉靠在一株长满地衣的树上，滑倒在地上，顾不得潮湿的树干会磨坏她的蓝上衣。她把裙子撩到光滑雪白的大腿上。我伸手抚摸她的大腿，就像抚摸冬天凛冽的北风吹拂刚落下的雪花。她嘴里呼出一股虚弱的水蒸气。她的呼吸是我们能够听见的唯一声音。她收拢的、弯曲的腿在寒气里没有战抖。我在她结实、颤动的大腿上吻了一下。她大腿上竖起的小毛孔像地上的砾石。我们突如其来地亲热起来。我们默不出声、充满情爱地抚摸。我们感到冬天冻土的凉气侵入我们的身体。我们应该站起来整理一下衣着。我们很吃力，气喘吁吁，有气无力。

我们向等着我们的奥斯丁走去，这段路程可以说是一条耶稣受难的路。这回，小碎石子像一把把尖刀，荆棘无情地刺破我们的脚踝。波拉在我前面走着，身上的衣裳破破烂烂，她像本世纪初在巴黎旧城墙遗址上玩耍的淘气姑娘。看

见她我也知道我自己的模样了。我们属于那些穿得整整齐齐的孩子在花园里，由着性子独自想尽方法把身子弄脏，抹掉文明的俗气的光彩。

车门砰地一声关上了。活塞开始轰轰运转起来。我们在低垂的暗绿色的天空下驶出小道。突然加快速度。我们要在入夜以前赶到目的地。左右两边闪过一堆堆石头、一处处绿篱。速度越来越快，汽车发出轰轰的响声。冈城，10公里。

“抽香烟吗？”

“香烟？”

“阿歇尔先生，您生活放荡，我在想这一切何时了结。”

“我们有把握的唯一一件事情是总有一天会了结的。如果您继续开快车，了结的时间会来得更早些。”

“阿歇尔先生，您永远不会改变，我们能有把握地说您永远不会改变。”

擦火柴的声音（出乎意料，仪表盘上没有安装电点烟器）。汽车舱里充满硫黄的气味，一会儿就充满了烟。得放下车窗上的玻璃。波拉避开了一只有自杀意图的鸡。我们重新驶上去贝叶和卡朗坦的公路。一阵阵狂风荡涤了天空的污垢。天空向上微微敞开一个口子。

“菲立普，您驯养过野生动物吗？”

“您认为白老鼠算野生动物吗？”

“也许，如果那只白老鼠没有和人接触过或者和人只有很少的接触。”

“那么，我驯养过。”

“您说说看。”

“我应该向您承认，我小时候得到过一只完全野性的白

老鼠。我想不起是拿什么东西和一个邻居小朋友换来的。我是说它刚出生不久，通身粉红色。那只白老鼠完全无害。它除了啃生菜叶子或面包之外什么也不会。那是任何一只刚断奶的白老鼠都会的。那小东西有温和的野性。”

“您是怎样驯服它的？”

“我在驯养它的过程中给它良好的教育。它天生会啃干面包，我教它挣得这份面包。说真的，它更喜欢的是奶酪。要得到奶酪，它就得沿着一根细绳爬行，然后站在细绳穿过的一块木片上。它出色地完成了这些动作以及其它一些动作。比如晚上，我骑自行车在格朗奥古斯丁滨河路人行道上穿行时，它一动不动地呆在车把上。它可以在我的任何一个衣兜里睡觉，或者在我被窝里过夜。它因此送了命。我母亲暗中发现了这反常举动，决定加以制止。有一天晚上，我从学校回来，只找到了白老鼠白天睡觉用的空纸板盒子。我当时就明白了。妈妈把她讨厌的动物处理掉了。她赌咒发誓说这事与她毫不相干，她说我的白老鼠逃跑了，因为它的天性促使它寻找它的同属。当然我完全不相信她的话。我知道她把小白鼠放在窗台上了。那时门房的猫总是在那里转来转去。波拉，您呢，您驯养过野生动物吗？”

“没有，我不能说驯养，只能说接近驯养。我的时间不够。那是在战后。我和我母亲在南方度假。我们住的那所花园住宅大得很，属于洛可可式，有咖喱哥字群落。周围到处是小树林，林中小径纵横。我们常去散步，采集百里香煎香汤。我看见一只被猎人或偷猎的人打伤的鹭。当地很多人带枪。那只鹭扑打着翅膀，就是飞不起来。它靠在树干上进行自卫和我对抗。它一只爪子支撑住身体，向我伸出另一只危险的爪子。它张开尖嘴准备随时啄我手上的肉。我钦佩它有

勇气和我这个怪物对抗。我要救它，可是怎样抓住它呢？我想起一个主意，脱下我散步时穿的外衣扔在它身上。这是个好办法，因为它一陷进黑暗里便失去了抵抗能力。我把它抱回家、把它放在地窖里的一个草筐里。寂静和昏暗使它安静下来，我举着蜡烛看过它好几次。它逐渐习惯看见我，习惯我的声音了。它用金色的眼睛瞪着我。那是一只很美丽的鸟。翅膀下面是纯灰珍珠色。背部和嗉囊处长着褐色的羽毛。我喂它碎肉丁，用匙喂它水，让它恢复体力。最初，我戴着手套走近它。但是很快我就明白它不觉得我对它是一个威胁。我每次下地窖时，它总是激动地向我表示欢迎。所以我可以用手摸它，用手指掰开它的嘴，给它喂水和蛋球。我长时间和它说话、摸它。这真使人高兴、使人感动。我想象它会喜欢我。我想象驯养它不会有任何困难。它经过休息、吃了食品恢复了体力。它站在筐沿上扇动翅膀要试一试或锻炼一下翅膀。刚过十天，它的伤口就好了，体力也恢复了。一天早上，我发现它站在瓶子上。它得救了。它又飞起来了。我决定再喂它几天。那几天我犹豫不决，想留下它继续驯养它，又想还给它自由。动物从来属于它自己，我却想把它据为己有。我明白只有不辜负它的信任、不把它变成可笑的玩物，我才配得上它让我接近它、让我抚摸它时给予我的信任。当我确信它已经复原时，我把它放进一只口袋里，在猎人都回家的傍晚时刻把它带到附近的山上。我在那里慢慢地打开口袋。那只鹞在晚上凛冽的空气里浑身打战。它似乎从清新的空气里，从田野的迷蒙的声音里感觉到自由即将来临。我把口袋的绳子松开一些，它用力从我手里挣脱出来。它扇动几下肢膀便消失在凹下去的朦胧的斜坡下面。然后它似乎被气流托起，突然升到空中缓缓向南边的大海方向飞。

去。它在地平线上消失后，我就下山了。我既感到难过又感到幸福。”

我的白老鼠不能和威武的猛禽相比。说到自由，白老鼠只能成为猫的口中食。我向波拉提议我换换她。她不觉得累，要继续开车。我们沿着海边行驶。按交通牌的提示，我们离大海很少有超出五、六公里的时候。然而我们却看不见大海。篱笆和向海边升起的草地遮住了我们的视线。这地区的海水下面似乎有宝藏。甚至穿越拉维尔港湾更加引起我们的好奇心。然后我们驶过卡朗坦，接着穿过科坦登半岛。我们驶进谷地。太阳吃力地、慢慢地落下。西边，一道寒光，灰色的影子又蹦起来，溅到我们脸上。有时，一株树，一个小棚子，几个畜栏，蜷缩着的村落一闪而过。雨已经停了。

看不见的大海无力地拍打着，它似乎不愿意露面。它舔我们下面的花岗石和水泥防波堤。它的喘息声告诉我们这儿躺着的海兽①还活着，它身上散发出一股股模糊的蒸汽，那蒸汽融化在黑夜之中。我们到达了。

“您看，旅客从这里上船去岛上。”

可不是，很不容易看出来。我朝防波堤尽头走去。一些没有罩子的灯泡向有胸墙和旗杆的地堡射出微弱的光线。那不是一处军事设施，而是一处附属建筑。涨潮的时候，轮船的舷门靠在那上面供乘客上下船之用。冬天夜里，这里没有人迹。一阵阵狂风把一团团蒸汽吹到黄色的灯上。平静的海兽提醒我们注意，它在这凄凉的景色外边拥有一个帝国，它

---

① 指大海。——译者注

的力量是无边的。

“房屋在山上。”

波拉·霍真让我看淹没在草木丛中的一个灰色的小点，在陆地那一边的岬角上。下面，可以猜想出有一些关着护窗板的房子（旅游季节两个月前就结束了）、车库、木柱支撑的拖网渔船的船坞。一条狗在黑色的船壳中间走来走去。树木、房屋连同那条狗都落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上。那上面有一串绿色的珠子，那是一条向上曲折蜿蜒的路径。空气中没有碘味，也没有盐味。没有鱼鳞或者贝壳的气味。冰冷的潮气把那些气味通通吸收了。

关着门的房屋，海员咖啡店的招牌，指示瑟堡方向的路牌，黑夜动物发磷光的眼睛在奥斯丁的灯光下面一一闪过。我们循着绿色珍珠向山上行驶。波拉把汽车停在一扇铁门前面。门上除了铁锁之外，还有一条铁链。波拉的父亲嘱咐过她轻轻摆弄卡住的锁，首先是栅栏上的锁。她腿上溅满了泥，裙子揉皱了，她借车灯的光亮使劲摆弄了一会儿。链条上的锁终于打开了，栅栏上的锁装模做样地坚持了一会儿。“要是我让您开门，”她对我说，“您早把锁砸坏了。”链条在铁门上哗啦一声滑下来。什么地方有一条狗在汪汪叫。我们推开大门时，那狗狺狺地狂吠起来。

波拉一直把奥斯丁开到埋在叶丛里的一间小屋前面。我跟着她在长满杂草、苔藓的小径上走着。右边和左边，可以猜出是一个荒芜的花园。小径尽头是完全不透光的砖石结构房屋，有三层楼。房顶呈尖帽子形状，高得不成比例。我的眼睛已经习惯于黑暗了，认出一个小塔，塔上有精工制作的小钟楼和箭头对着风的发亮的风标。台阶上横七竖八地堆满树

枝，几乎没有落脚的地方，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清理出一条路通到门口。那沉重的橡木门使人肃然起敬。钥匙在锁孔里转动自如。

"这是西南房。另外一边有一个平台朝大海。明天我带您去看看。"

得找着藏在楼梯下面的电表。那是一个旧黑匣子，有一个向下扳动的手柄。那电表运转正常。光线，或者说被苍蝇粪弄黑的战前的灯泡发出的微光照在过道灰红色的墙上。墙上贴着植物图案的墙纸，这墙纸能用几个世纪。这儿、那儿的霉斑使墙纸失去鲜艳的颜色。波拉苍白的面孔使我大吃一惊。她的目光从一处移到另一处。她好像不快活。我提醒她注意。原来是我弄错了。她很快活，完全浸沉在重新见到她童年时的房间的喜悦之中。她在楼梯上、房间里嗅沙子和藻类的气味。还有年复一年因阴暗潮湿失去鲜艳色泽的帷幔的特殊气味。

她在楼上空荡荡的房间里走来走去，打开门窗、又关上门窗。她试着拧开一个劲儿嗤嗤响的水龙头，白白地费劲。

我取出我们的行李，堆在过道里。一切又变得安宁、寂静。我们在这陵墓里怎样生活，或者怎样幸存下去，我一点不担心。我的心情极其沮丧，所以居住条件无论多么差对我也没有影响。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我到这儿来干什么？我为什么要到这与我毫不相干的陌生房子里来？陪波拉·霍真勉强算一个理由。我知道另外有一个理由，一个我说不清楚、但相当充足的理由。我就是为此头晕目眩的。我们来打开这幢老房屋的大门、察看房屋的状况不过是一个借口。什么？唯一能肯定的是：我在这儿或者在那儿，在这里而不是在巴黎都无关紧要；我们在这儿逗留並无回天之力，既不能改

变命运，也不能解释命运，並不能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我们只有忍受它。

波拉愉快的叫声把我从困惑的沉思中解脱出来。我上楼去找她。她在一个壁橱里找到两张照片和一本小说。巴尔贝·多尔维利①的《一个上年纪的女主人》第一卷。阿尔方斯·勒梅尔书店，1928年出版。她兴冲冲地翻阅那本书，接着给我念开头几行："183……2月的一个夜里，寒风呼啸，冷雨敲打着瓦雷纳街一幢房屋的玻璃窗……"也有一些颇费解的句子，可以信手拈来："沸腾的热血神秘地注入那金色的物体，突然嘴唇下面露出夺目的光彩，那张美妙、恬静脸上遗传的，不习惯的轮廓是命运的朱红的……"我承认我不理解"金色"这个词。多么有趣的天书！波拉快活极了。

"这本书我从前读完了。不过我从来没有找到第二卷。"

她充满激情地回忆起那些浪花翻滚、词句优美的篇章，那些关于大海的描写。它们一浪接一浪使她进入睡乡。

"您知道巴尔贝多尔维利的作品里没有大自然吗？他只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只是一种程式。比如他写道：'冷飕飕的月光'这就足以使人联想到普罗尼子爵黑夜里的漫步。他制造一个背景，这就够了。"

"那两张照片呢？"

"一张是我父亲穿海滨浴衣的照片，这是1935年流行的式样。我还没有出生。另一张是卡特雷海岸的风景照，在波尔巴伊那边。您看这悬在半空中的浪峰……看照片上的大

① 巴尔贝·多尔维利（1808—1889）法国作家。后面引他书中的话费解，所以称为天书。——译者注

海、一瞬间拍下来的大海总是给我一种奇怪的感觉。”

她带我参观她的房间，她的床的位置。床和其它家具都不知道弄到什么地方去了。她不知道是怎样搞的。家具和房屋主人一样都是房屋的过客。我到底把水龙头拧开了。我们用多尔维利式月亮①那样寒冷彻骨的水洗了一把脸。厨房里的旧炉子旁剩下一张桌子、几张凳子及一些不成套的杯盘。我们在这儿吃完饭，像一对老夫妻那样上楼睡觉。我说过，我们走进伸展在平台上面的房间里。天气晴朗的日子，可以在平台上远眺海岛。波拉又说这个季节里雾气经久不散，我们肯定看不见海岛。房间很宽敞。我们拖进去一张旧床或者说一个弹簧床垫，我们把睡袋铺在上面。因为空气寒冷潮湿，我们没有脱衣服。我们蜷缩着身子搂在一起像一个暖和的肉球，沉沉地睡去。

我们每天碰见的这些普通事情要思索几个小时才能弄明白。比方说要弄清楚昨天什么事使我们痛苦得喘不过气来，使我们脑子里空无一物，今天居然无动于衷。不过我们並没有忘记折磨着我们的事情。我们可以提出一些问题或者重新勾画出我们愁闷的轮廓。但是我们连那样的欲望也没有。似乎我们对这一切陌生得很，我们就要踏上新的土地。我们向那新世界冲去。我们竭尽全力要得到它。波拉·霍真还睡着。我在思索这些问题。昨天晚上，我在寒冷的过道里自己问自己，我到这房子里来似乎显得荒唐。这会儿我醒来没有问题、没有苦恼。心里明亮得像不可预见的风吹过的天空。我悄悄地笑了。我们思想中或者心里认为这幢房子重要，这房

① 像巴尔贝·多尔维利书中描写的月亮。——译者注

子才重要。否则这房子就无重要性可言。黎明时寂静无声。波拉一直挨着我躺着她的体温使我感觉很舒服。我惊奇地想起那天夜里做的一个梦。

一个边缘模糊不清的平面是洁白无瑕的。最能说明那个平面特点的是它的白颜色而不是它的边缘。它使人想到一块银幕。那白色平面是柔弱、没有颗粒、呈絮状的。那平面是非物质的，豪华到使人有一点恶心，人们不知道那恶心会消失还是会发展到呕吐的地步。雪、没有污点的白鼬毛皮、奶、刚烫过的白内衣、河马的长牙都不足以和那白色平面比拟。那平面是完整的，不像由深层结构颤动反射光的其它白色物质那样颤动，也不像太阳光那样刺眼。相反，它吸引目光。眼睛乐意盯着它，从中得到满足，可是做不到。

做梦的人突然发现自己向那白色平面走去。他移动他僵直的上身和他的两腿。有时他觉得他跳跃着前进。另一些时候，他觉得他像鱼一样在水中游着前进。有一股力量使劲把他推向那平面。他体内体外都在运动。好像四面八方他触摸到的空中物及触摸到他的空中物都为他让开一条路。恐惧、紧迫不安的感觉消失了。他只要想起他移动中的不便就感到十分痛苦。他心里什么也没有想（但並不是空白）。他的活动余地是无限的。他能分辨上下、前后，还能在空间里辨别方向而不会溶解其中。他远远看见的是一个湖。他借助于身体的摆动向白色湖面前进。但是他並未感觉接近那个湖，也没有感觉时间的进展或消逝。时间的标志消失了。他处在凝固、冻结的现在时里。他想在他看见的那个白色湖水里沐浴。

现在他好像在海底行走。他的动作特别缓慢，像潜水员

的动作。但是他自己并不觉得笨重、不自然。他觉得毫不费力。所以他一点不觉得累。他不仅不觉得累，而且越活动越觉得接近入睡前几秒钟肌肉松弛的感觉。他非常激烈地移动。可是他不能断言他在移动、前进或后退了。那洁白的湖既没有接近他也没远离他。他一点不觉得失望，不觉得苦恼。但是他知道他在醒着的世界里感到过失望与苦恼。那个世界并没有在他意识里完全消失。

那白颜色猛烈地吸收不知从哪里来的光线，使它自己的絮状组织遭到破坏。水面变得光滑、明亮，呈现出它前所未有的颗粒状，是局部的颗粒状。这儿，那儿有一些分散的颗粒。那些颗粒仿佛加热到炽热的状态。其中一颗可能燃尽了，难以觉察地变成浅灰色。做梦的人知道或者说不怀疑他过一会儿会沉入湖里。对时间的感觉恢复了：灰色颗粒开始扩展。它的中心变黑了。那黑点扩展到整个颗粒，蔓延开，扩散到整个湖面。做梦的人明白他应该迅速设法遏制黑颜色的扩展。他预感到扩展的范围及其不可控制的速度。他觉得不安。他感觉他已经离开的世界和他应该在那里新生的世界移近了。他在睡眠中收缩起来。他的眼光注视着尚留着几处白颜色的湖面。他处在完全虚弱无力的状态里。

现在，一块未被污染的地方也没有了。而且，污染还在继续。全面展开的灰色变得更暗、更厚了。做梦的人的眼睛徒劳地从一处移到另一处，模糊了，寻找清彻洁白的水面。那是找不到的。整个水面由淡灰色变成浅黑色，它的变化速度是无法改变的。他呢，愣住了，美妙的运动、温柔的融合都完了。他感觉到他的胶状实体、他的限度、他的独特性。虽然他心急火燎地要推开那死亡的帷幔，却只能一动不动地等待。他知道他很快就会被分开。

什么也阻挡不住深色的水面变成黑色，犹如墨水泼在白纸上，人们也说“白纸黑墨”。他身上沁出了汗水，呼吸异常困难。他无力解开束缚，无力推开四面八方向他挤压的无形的墙，也克制不住预兆呕吐的嗝儿。这还不算完。他感觉被捆住了手脚。他挣扎，和无视他的存在、推着他前进的力量抗争。现在湖面完全被污染了，变成一片黑暗。那坏疽不容许一丁点儿健康的肌肉存在。那湖面凸凹不平、起伏错落有如山脊、裂缝、坑洼、突起的煤层……他的目光毫无表情。简直是疯狂。他看见无法看见的东西：黑夜的难以忍受的、猥亵的光芒。他醒来浑身是汗。他大张开嘴，脸挛缩着。他喉咙里发出醒来时的叫喊。

我在似醒非醒的梦境。接着，我睁开眼睛，看见若隐若现的金黄、赭石色的微光，这微光使空荡荡房间里的空气暖和起来。虽然是在冬天，天气一定很好。波拉把头枕在胳膊上睡得很安稳。她白净的眼皮吸收微弱的光线。她温和均匀的呼吸吹拂着我的手。她的嘴唇半张着向我露出一副美丽的牙冠。我好像在山顶上俯视经历几百年的城堡的巡逻道。一切像她的呼吸、像无数孔隙透进房里的奇怪的光线那样平静。我内心不可告人的宁静和房屋、附近的房屋、近在咫尺却又看不见的海滩和大海的宁静气氛相应和。

用布列塔尼地区灰花岗石砌成的平台（我终于找到通向平台的路径）按一天中不同的时间被阳光染成金色或粉红色。平台的花岗石块不是用灰泥拼缝，而是像库斯科城① 的

① 秘鲁首府 原为古印加帝国的中心。——译者注

巨大的石块砌合，接缝处连一个刀片都插不进去。平台边的栏杆柱顶盘由一排凸肚圆柱支撑着。在顶端和角上砌着青铜承水盘，盘里的植物已经枯死。我没有弄错，朝西的平台几乎得不到充足、温暖的阳光。平台是蓝色的，把空气和墙都映成蓝色的。平台的南面有一个温室，也是用石块砌合的，只能从房里进出。

下面的花园像一个原始森林，茂密的斜坡一直延伸到港口和海边。早晨急骤的风飑在叶簇和枯树枝里掀起一阵阵突兀的喧声。灌木痉挛起来。一阵风刮过去，草木重新变成撒在干硬地面上的薄薄一层干绿叶。一队蚂蚁从地洞里爬到平台上，搬运着各种各样的残屑和虫卵，是迁徙也许只是搬家。这队蚂蚁沿着栏杆爬行，通过一个坑洼重新回到花园里，好像经历过一场战争或者躲过一场蚂蚁世界的浩劫。

大约九点钟。我把手表丢在房间里了，只得根据海边阳光的强弱估计时间的早晚。在平台上能够欣赏海浪的景色。时间融化在空间里。要不是我潜心细致地观察（担心对我看见的东西既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我自己恐怕也融化在空间里了。我想摆脱开“追忆”[1]的叙述者，他在巴勒贝克的房间里醒来时（至少我记得是这样）站在窗前眺望大海，开始看见“裸露的、没有阴影”的大海，接着看见白皑皑的浪峰、翠绿的波浪、青色的蒸汽，使人眼花缭乱的大海……真实的景色逐渐被另一个半真半假的景色所代替，我仿佛看见一个内心的幽灵似的大海。我注视的海倒像一块未磨光的不动的薄钢板，像放在地平线上的黄色大地毯上的一块穿不

① 指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流水年华”。——译者注

透的钢板。那海像沙漠一样空旷。唯一运动着的生命在天空中，或者不如说天空仿佛在运动。一阵猛烈的风不住地把一团团白云驱赶到陆地上。白云从容不迫地滑动。接着，白云被陆地吸引，一下子刮跑了，飞快地从我头顶飘过。

我对景色精确地观察变成凝神注视。我禁不住在那景色里发现了钢板、黄色地毯、沙漠。不，显然，观察的人不可能不把自己包括在他的视野之中。我靠着栏杆，恰恰在这视野之中。另一个站在高处、远处的观察者一定早已把我摄入他的视野之中。我向四周看那可能存在却不可见的观察者，他也许已把我摄入一个从上向下的画面之中。我什么人也没有看见。

我试图重新进行一种更加完美的观察。在围绕房屋的树林下，有一些分散的红瓦房，烟囱里冒出一缕缕灰烟，这说明房子里住着人。既听不见喊声、铁锤声，也听不见摩托车声。这……是一座死城。一面被阳光晒得褪了色的旗子在码头地堡顶上飘动。海上没有出现帆船。总是有活儿干的小花园里却看不见人的影子。这是不是可以从狂风怒吼的狭长的海滨，枯燥、令人生厌的环境找到解释呢？没有诗，也没有大海的美。对于住在那边堤上、岬角的人来说，大海没有什么好看的，大海一文不值，那里的人甚至不愿意看大海，愿意呆在自己家里。他们不声不响，不做任何动作。他们与环境协调一致。

这个季节没有人参观海岛。海岛和陆地之间的海上贸易终止了。码头没有人管理，那面旗子会飘动一个冬天。从现在到那时候，海风早把那旗子吹成破布片了。

平低潮的时刻早已过去了。风更加猛烈地刮起来，把乌云撕破、扯碎，吹成齿边形的细片，使它们飞快地变成雾

气。我听见风哮喘似的呼啸。大海好像向前移动了。那混沌的稠浆难以觉察地移动着。蓝色钢板变得越来越厚，它的四边镶着细细的白色花边，钢板上掠过瞬间的亮光。大海苏醒了。

太阳从浮云中挣脱出来。沙滩伸向北方和南方，一边是紫色水晶镶边的金色细带，另一边是绿宝石细带。沙丘的野草、沙和水又一次变成宝石和贵金属。人，即使是最没有才气的人，也是一个奇特的炼金术士。

头三天平静地过去了。我们在平台上生活，我们在平台上吃早点。不管空气多么凉，我们喜欢面对大海吃早点。我们主要的话题是波拉每天下午写的诗。我们从车库里找出来一张小桌子，她在那张桌子上写诗。那是一些短诗。诗的主题是；砾石、小草、鸟啼……波拉想让没有生命的东西说话。她说明或者试图说明它们的形状，如此而已。小草在风轻柔的抚摸下弯下腰。扇形条纹的贝壳一半埋在沙里……最近，她的博物收藏品中增加了一颗卵石、在沙滩上拾到的一根信天翁羽毛。她要缩小和事物的距离。她做到了。我赞美她的诗。但是我认为用没有生命的东西的名义讲话是转弯抹角多此一举。它们用不着人的语言来表达思想。波拉同意我的观点。但是她坚持认为人丝毫不了解周围的世界。她认为唯一可能的行动是：首先用我们的语言说它，幻想懂得它。至于我，我承认我不了解周围的世界。

波拉腻味和只知道怨天尤人的人们说话（这是我们争论的另一个题目）。有些人善于以激烈的呻吟、辛辣的泪水为自己获利。任何东西、任何人都没有能力安慰受害者（在这一点上我无法驳她）。那些受害者经受过酷刑、屈辱、恐怖的死亡，他们大概无论如何享受不到和平和遗忘的宁

静。那些诗人过去是（现在是）遗忘的敌人。死人、活人，甚至由于奇迹死里逃生的人要是能重新过一秒钟、十分之一秒钟他们过去的生活，必定会想起过去的恐惧。提醒他们的并不是他们的良心，而是仇视遗忘的诗人的呼唤。那些诗人时刻对他们说：同样的苦难在不久的将来等着他们，最坏的情况依然可以预见。那些诗人投身反对遗忘的斗争是为了他们良心上的平静，为了问心无愧。那些诗人是人们熟悉的、出名的、一丝不苟。那些诗人连篇累牍地写、占据了广播和荧屏，传播总是有成效的有声资料：受害者嘶哑的喘息声及恐怖的叫声。那些诗人怀着完成任务的满意心情倾倒出他们钢笔的最后一滴血。他们把这些叫做：反对遗忘的证词。从旧金山到汉城，从巴黎到墨尔本……他们倾吐出神圣的语言。血！血！当心！敌人就在眼前。也许嗜人血的怪物已经在你们身上？也许你们就是那怪物？因此，再没有人能够过合乎人情的宁静生活，将来也不可能。

“可是你是犹太人。”我对她说。

“正因为我是犹太人，我要求大家埋葬受害者，让他们得到善终，让生者开始生活，只有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不会再出现受害者。要生活就一定要真正的、纯朴的新生活。为了触及到那生活，只给那生活划一个轮廓，我就得先用石头、海藻、云和空气的语言说话，或者用我认为是它们的语言说话。我要从零开始，把过去的流血的旧世界先放在一边。受害者不再需要我了，但是我需要受害者。我要忘记，我要在我的记忆中抹去滴着被害者的血的词句。我要用给我生命的其它词句说话。”

比如说卵石，我们没有挑选它。确切地说是随手拾起的一块卵石。乍一看，它和潮水冲积成千万堆其它卵石毫无差

别。可是仔细看看它，一切都变了。那是一块独特的卵石，介于蓝色和白色之间，平行的深色条纹由底部延伸到顶部，越来越细。由于在几百年间受到风雨的侵蚀，它的外形像一个旧金字塔。它身上的环状条纹是从底部（不完全是扁的）的主条纹开始的，主条纹开放成第20个希腊字母的形状。因而这是υ形卵石。它的表面像女人或孩子的皮肤那样光滑。它的颗粒非常细。我们把它放在阳光下转动时，它相对的两侧出现闪亮的小点。

"是它的眼睛吧？"

"菲立普，您应该知道，石头是没有眼睛的，您缺乏诗人的想象力。"

我乐于承认我在这方面以及在其它许多方面都没有才能。

我负责采购食品，好让波拉在清静的海滨进行创作。既然我干不了任何事情、也干不好任何事情，至少我可以干点默默无闻又必不可少的活儿，为她创作诗略尽绵薄，我的内心也是高兴的。超级市场在去瑟堡的公路上。我驾驶奥斯丁去采购。

我们在那里的生活安排得很和谐。我甚至把地下室里藏着的一个旧锅炉搬出来，让它发出热量。固然我们说不上多么暖和，但总不至于挨冻。暂且不谈回巴黎的事。我避免谈那件事。我在这地方过着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生活觉得很舒服。波拉不是曾经劝我从容考虑么？

我给妈妈写信。我在一家书店里找到一套旧时的明信片。那是两幅古老的柔和的赭石色风景画片。

第一张风景片上有耍熊的尼古拉·弗拉芒。1909年8月14

日，他在C城街上经过时拍的。这位先生戴着饰有彩带的圆锥形帽子，穿一件紧身衣，肩上搭着一个褡裢，穿一条在森林里走路的人穿的紧口灯笼裤。他的膝盖和脚踝处系着粗绳子。他骄傲地看着摄影师，像那些自以为干不同寻常职业的不同寻常的人。他脸上显出安详自信的神情。他的熊是一只聪明的动物，穿得很整齐。一只熊穿短外衣，戴一顶小圆帽。另一只熊穿长外套，系着肩带及一把木剑，戴一顶用金属盒子制作的帽子。主人和驯兽师在它的帽子上加了一个尖顶。仔细看就能发现尼古拉·弗拉芒的忠实伙伴夏斯博和比斯马克总是追随他左右。他们周围有几个孩子（穿着木履、半长裤、长袍）组成一支固定的、热心的仪仗队。孩子们因为骄傲、快乐，眼睛奕奕有神。他们有双重幸运，既目睹过这不同寻常的事件，又被照相机拍下来永远被人记住。渔夫、家庭主妇、农夫神情严肃、呆板地观看那个场面。照片的背景上有一个人影大步离去。

第二张风景片题材完全不同。那是本世纪初，船驶向海岛的情景。这张照片因时间难以确定有一种神秘的思乡气氛。风景片上有我们到达时经过的码头。尽管有几个看热闹的人（尤其是一个穿长裙子、戴宽边帽子的女人。帽檐的阴影把她的脸遮住了），码头上仍然显得十分荒凉。这张风景片的神秘之处就因为那看不清面孔的女人。我想象她面目清秀、漂亮，也许她很激动，因为她在挥手。她是不是在送一位远行的人？送一个朋友？送她丈夫？她兄弟？她情人？……也许仅仅为了遮挡刺眼的阳光？拍这张照片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把防波堤、大海、蓝天和相当漂亮的双桅帆船纳入背景之中永远保存下来。但是对我说来，这张风景片的价值恰恰因为占据画面中心的那个女人。其实她只是背景中的一个无

关紧要的偶然角色。她还活着吗？那位老太太和她的亲人一起生活还是住在养老院里？从体形判断当时这位年纪在三十来岁的女人去世了吗？……真正的问题是：她是什么人？她的生活怎么样？

我在平台上用眼睛寻找她站过的准确地方。我想象她站在那空地上的身影。我突然感到心酸。我知道我这样失魂落魄实在幼稚。但是我不能自禁，我在寻找她的倩影、她的痕迹。我不用仔细看照片就能看见她抬起的胳膊，她的手也许要握住帽檐，还有和她漂亮的紧身上衣形成对比的浅色襟饰。她送别的男人或女人不在画面上。也许她只是来欣赏停在海天之间的豪华的双桅帆船。我想起一个念头十分懊恼。这张风景片和风景片上的主角不归我一个人所有。当然我买下了全套风景片。但是很可能别的书店、别的收藏家也有这种风景片。总之，我喜欢它归我一人所有。波拉·霍真也喜欢它，不过她是因为别的缘故。码头依然是她过去看见的那个码头，旧照片的厚而模糊的颗粒使大海显得很遥远、不大真实。那陌生女人昔日的风姿和优美的双桅帆船宛如一幅图画。我每两天给妈妈写一封信，我只用要熊人的风景片给妈妈写信。

我从超级市场回来时在海滨旧教堂附近停车作远距离散步。我一边散步一边给波拉捡各种各样的小东西。冬天快来了。海滨笼罩在一望无际的雾中。一股酸气流扫过海滨。海水退去了，仿佛在远处沉思。海水在那儿变成一条微弱、浮动、暗淡的带子。我散步一个小时或更长时间。我鞋上粘满了沙子。前几个夏天留下的垃圾散落在几公里的海滩上：腐蚀的缆绳、塑料袋、防晒护肤膏、皮子、金属瓶盖、伞骨、

眼镜、乳罩、拖鞋、卷发夹子、保险别针、损坏的三脚架、干硬的夹心面包片、帐篷桩、浮标、残破的网、铁锨把、桶、瓶子、碎裂的车胎、羽毛、罐头盒、烟头、避孕套、香烟盒、布头、唱片袋、铁丝、破玩具、肥皂头、钥匙、一部令人恶心的粉红色封面的书（丽达·谢莉奥辛的最新小说）、褪色的手绢、自行车胎、掉了头的烟斗管、一本色情杂志的封面，封面上有一位撅起屁股的小姐（大概她的面孔不堪入目，摄影师认为还是撩起一角裙子把脸遮住为妙）、破框、圈毛毛巾、一段乐谱、硬纸碟杯、家用橡皮手套、鱼贩子手套、空瓶子或装了半瓶什么液体的瓶子，银光纸、脏月经带、一张扑克牌（没有表情的方块J）、球拍、羽毛球、泄了气的皮球、发黑的桔子皮、坏了的克利凯特牌打火机、表链、各种游泳帽……海滩上遍布着人的痕迹。大海一丝不苟每天两次，舔、侵蚀、磨损、消耗、消灭这些垃圾，但是奈何不了这些合成塑料制品，大海把它们驱赶到沙丘下面，它们终于在那里构成一堆不会腐烂的环状混杂物。

我还拾了几片羽毛，海鸭和海鸥羽毛。我常常观察海鸥。纤弱的银白色海鸥成群结队地飞行，落在退潮扔下的发亮的篷布上。它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像睡着了。当我朝它们走去离它们还有五十米远时，最近的那只海鸥不声不响地逃开、落在队伍的另一头。第二只海鸥等我和它之间的距离缩小到五十米，超过这距离它要受到威胁时便飞走了。它们跟在退去的波浪后面飞行，肚子吃得饱饱的。它们聚集在贻贝养殖场上，当潮水退去水面上露出坑洼可以大饱口福时，它们便发出短促而不协调的哀鸣。

海鸥所过之处留下一段段小蟹的绿色残肢。这些甲壳动物不是海鸥的对手。它们在坑洼边上争斗。海鸥用万无一失

的嘴叼住螃蟹，把它仰面朝天扔在沙滩上。我想象螃蟹晃动着无力的螯（因为我在远处看不清楚）可笑地拚命挣扎。也许螃蟹知道任何努力都无济于事，突然变得迟钝了，也许它们胡乱挣扎到底。海鸥啄第二下就把螃蟹刺穿了。螃蟹还在蹬腿进行最后的自卫。螃蟹害怕吗？海鸥从这种杀戮中得到满足了吗？有时候两只海鸥争夺一只螃蟹，它们乱啄乱抢，最后共同瓜分掉那只螃蟹。在三趾足印中间只留下一些角质甲壳和残肢．这就是这场力量悬殊的战斗的痕迹。

我给波拉带回一段残肢、一个螯。奇怪得很，我想起我们四年级历史老师用微弱、激动的声音念傅华萨①的这几句话："星期六、在布华和克雷西两地之间的这场战争十分残酷，使人毛骨悚然……"就像我在听老师讲述那天想象的那样，我又看见菲力普国王的臃肿的骑士被盔甲羁绊住，在英国人秩序井然的三个战役中一一被刺死了。

我在海滩上散步时，有时会回想起模糊的远古时代，想起人几乎是赤裸着身体，使用燧石刀在海滩上奔跑的时代。在气候宜人的季节里，人们用贝壳类动物充饥，寒冷季节到来时他们就回到内陆。在我所在的地方，我怎样才能可靠地和那些古代的人沟通起来呢？通过在这柔软的沙滩上行走的办法行吗？是的，也许能行，不过感情不够激动。通过看那滔天巨浪行吗？那个时代的人不知道有大洋彼岸的世界。那永不休息的水域在他们眼里也许是一个可怕的、咆哮的怪物，它突然狂怒起来。风！是那怪物的吼声，是那怪物的语言。是这样！几乎赤身裸体的老人一面走一面听它说话。那怪物的声音在他耳朵里越来越响。它大声吼叫。接着吼声变得轻

① 傅华萨（1333—1400）法国诗人。——译者注

极了，变成拍拍声，汩汩声。于是那怪物对他柔声细语。他停下来，注意听它说话。那怪物催他入梦就像它催我入梦一样。同样的声音：风声和沉重地砸下来的波浪声。

还有气味，辛辣的气味，好像胸口上缠了一道钢丝。浪花把气味带来又把气味带走。辛辣、呛人的咸味。胡椒一样的辛辣味，潮味。青色及褐色的藻类、海底草原的芳香。生锈的船壳、损坏的帆缆索具的涩味或醉人的气味，鱼鳞、鱼肠、鲸蜡的腥味。从已经腐烂的活跃物质中分离出活跃物质。

那边，最远的岛屿航行两小时可以到达。在这植物不生长的寒冷季节，海岛上没有香味。我想出它们春季的芳香。袭人的丁香味及经英国年轻妇人的手栽培的玫瑰的更微妙的香味。我可以随便想象英国年轻女人的手，可以随便寻找更远更芬芳、阵阵香气向我袭来的别的小岛：桂皮、香木瓜、西瓜、烧焦的橡胶，遇难的人的乳白色的肉，辣椒、头发、汗水、姜、西番莲果、可可子、面包树的面包、腐烂的芦苇、蜜煎鱼、烤木薯、火烧地的烟、兰花、木犀草、含树脂的棕榈酒……索利芒风送来西边的芬芳。我永远不会去那些岛上。我知道我一点不感到遗憾，也不感到羡慕。对我来说，想象就够了。

冬天的风向我表明它强韧的呼息能吹进海滩上稀疏的松林里。瘦弱的树干徇陆地倾斜。它们一直在风力的挟持下生长。风也可能是短暂的、微不足道的。它掀起沙柱，又喜滋滋地轻易把它砸烂。它肆意喧哗，猛然回头迎面袭击波浪、削平波浪、把波浪赶回大海。于是波浪卷走了花粉、瓶盖、肥沃的种子和灰尘及被风驱赶的麦秸、骨粉、金刚石粉等。人们在沙丘外的垃圾场里堆积的物质布满在海里：一切在我们眼前开始，重新开始。只有这种生命的气味。我试着品尝

那气味，然后吸进肺里，试着用这种气味浸润我这城里人的身体。我做到了，或者有时候以为做到了。不过通常，我並不过于悲伤地感到我没法站在生活这一边。

我给波拉带回一个有精细螺纹的珠色和粉红色贝壳，一根弄皱的镶黑边的微蓝色羽毛。她接过贝壳和羽毛在空中转动、浮动，用阳光和水考验它们，她抚摸它们把它们贴在脸上从中得到享受，它们好像在她那巫师的手里诞生了。她对它们说："过一会儿你会说话的。"我觉察出幻想，从中得到快乐。它们具有实实在在、不怕消失的东西的令人不安的美。还有一个共同之处：不对称。寄居蟹在从贝壳顶端轴线周围形成的藏身处的半圆分成两个大小不等的部分，像尾部周围羽毛的羽支。我对这些观察比对我的印象和感情更加满意。波拉似乎並不责怪我缺乏诗人的想象力。

这幢房屋里还有许多物品和传说故事有待发掘。这与世隔绝、无人居住的房屋使我着迷、也使波拉着迷，它不断唤起她新的回忆。当然，要给永远不去那陌生房屋的人提供房屋状况的报告是既乏味，也毫无用处的。那种报告使人疲乏到极点。比方说就像有人强迫我们去雕刻陈列馆大厅里长时间转悠，而雕刻恰恰是最引不起我们激情的一种艺术，那种陈列馆对我们只不过是一幢巨大的空房子。所以我们一定会免去那一类散步的。

这幢房屋的趣味並不在建筑的布局方面，即使没有漂亮的家具它也很吸引人。固然这幢房子称得上是一幢漂亮的别墅，但是除了它的地势较高之外，和二十年代按同一图纸在法国沿海建造的其它成千幢类似的别墅並没有什么不同之处。这房子的趣味在于它积累的意想不到的故事，只要我们

探索，每天都能有所发现。我们找到她父亲的照片和卡特雷海岸的照片，还找到一本《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主人》。每天晚上睡觉以前，我都给波拉念几页。我们念到“约婚夫妇”那一节。我们在那一节里读到迷人的古典美人如波拉斯特隆小姐，她“身上有一种若隐若现、半藏半露的特性”，其魅力是无法抗拒的。那种气质使她像印度人想象中的女人，像从花萼里跳出来的漂亮姑娘，人们不知道花在何处结束，姑娘在何处出现！还有那些描写不知怎么使我想起妈妈：“她在一切方面成熟得早，开花的同时结出了果实，弗莱尔侯爵夫人很早就带她到上流社会。她在那儿看见的年轻人，他们在她面前走过，却引不起她的注意。”后来我索性天天把那本书带到海滩上去读。

一楼的大厅（从前的饭厅或客厅）朝花园（从前是收拾得很好的）有三扇大落地窗。大厅里有一张桌腿呈船舱形的桌子及几件杂物。没有人愿意费力气把那些东西和别的家具搬走，并不是所有的物品都不值钱。我喜欢壁炉上的挂钟。钟是有灰色纹路的粉红色大理石的。钟上有精工制作的青铜艺术品。主题是多那泰罗①的作品大卫。大卫的头发、头饰、体形姿势极其暧昧、富于挑逗性。令人吃惊的是处在青年时期的大卫②全然没有尚武精神。这样一个人居然会使这个野蛮的圣经故事闻名遐迩。通体光亮、柔韧、乏力的美少年靠在从歌利亚那里缴获的土耳其弯刀上。大卫无精打采地统治着时间，或者说统治着他脚下踩着的象征世界的钟。

还有从天花板上取下来失去光泽的吊灯。吊灯古怪地丢在桌上像沙滩上的一条章鱼。那些东西中间，我最喜欢的是

---

① 多那泰罗（1386－1466）意大利雕刻家。——译者注

② 大卫 以色列国王曾杀死非利士勇士歌利亚，见圣经旧约。——译者注

一只盛满玛瑙、大理石、缟玛瑙和斑岩水果的玻璃盘。永不褪色的桃、梨和一串串葡萄堆放在一起。水果的绿叶是用一层薄薄的彩色玻璃编织起来的。人们几乎不敢用手去触摸它们。我们拿起那些古董在微弱的光线下转动。这宝贝周围装点着旧时代的背景，有餐具桌、靠椅、印象派的花园风景、绣花台布，宁静的下午，其时孩子们正在海滨嬉戏。

“您记得这些玉雕水果吗？您记得大卫吗？”我问波拉。

不，她记不起玉雕水果，也记不起大卫。这有点儿奇怪，因为那些不露声色模仿现实的作品通常总能留在人们的记忆里。它们是属于她父母的吗？这很难说。它们是送来的吗？别墅荒芜了，谁会送来呢？我可以这样想，可以这样想象。真实的情况是：一切都可以想象。这正是别墅的一个不小的魅力。

相反，波拉·霍真却记得所有房间里的糊墙纸，那是昔日装饰陈设遗留下来的最后痕迹。那些墙纸本身具有全部意义、充塞了整个空间。在前面提到的客厅和平台顶上的温室之间的小客厅的墙纸最漂亮。在因时间过久变黄的白底色上，交织着银线及虚构的茂盛草木的涡纹和曲线。那些草木的叶簇既没有头也没有尾。弯曲的齿形阔叶树枝是柔和的深蓝色。小客厅有一处地面高出来像教室的讲台。退了色和图案磨光了的地毯还铺在地板上。有的地方一根纬纱或另一根纬纱从综框里露出来。房里的光线是从向温室开的软垫门上方的气窗里射进来的。光线经树枝过滤减弱了。窗口外面的树枝挤成一团，好像也想挤进房里。这一切给人一种亲切诱人的印象。白天我们想进行房事时就在这间房里。我们把在顶楼发现的一张床垫子和几个靠垫拖到高台上。我们把暖气

开到最高档，房里的温度还算宜人。

我们到达的那天在烂泥里蹚过，在树林里冰冷的草地上相互爱抚过。从那时起我们在楼上房间里像兄妹一样过夜。每天早晨，房里撒满金色的阳光。我们相互搂抱着取暖，在黑暗中听大海喁喁私语未尝不是很好的享乐。要不是发现了小客厅，从而破坏了我们的规矩，我们一定会过那种真正僧侣般的健康生活。

“菲立普，您想想到这里来干什么的？”有时候她劝我说，“我希望您心里是清楚的。”

我心里並不清楚。

“您别忘记，想想吧，否则您永远不能自拔。”

是的，我应该拔出来。可是怎么办呢？我看不出有什么万全之策。

“菲立普，您记得我对您谈过的那只鸟吗？”

“是那只鸶吗？”

“是的，是那只鸶。”

“我不是鸶，再说这房子也不是地下室。我什么时候想走或者您什么时候想让我走，我抬腿就走。”

“菲立普，等您想走的时候再说吧。还得您想走才行。”

波拉·霍真话里嘲弄的语气相当清楚，除了我任何人都会立即卷铺盖走路的。不过她话里也有叫人心安的体贴之情。我三番两次求她跟我一起去海滨，她都拒绝了。我只好独自去C城……逛大街，去海滩散步。我独自一人生活。学会靠自己的能力生活。

我独自思索的那些日子比我们一起在小客厅度过的时光更有价值。

很可能爱情和我那时体会到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可是我对此一无所知。我不打算对难以下定义的事下个定义。我对妈妈仅仅说我爱波拉。我看出我的无知，我要学习。我思索。爱情受到时间的制约：爱情和我们一起消失。我可以从反面给爱情下一个定义。我既写不出、也做不出任何使爱情传之后世的东西，能够唤醒其他恋人心里遥远反响的东西。也许波拉的某几首诗里有那种东西（纯粹是凭空想象）。但是不论那诗有多美，流露出的爱情就像从过于古老的香水瓶里溢出的芳香，充其量剩下一些残句。奇怪的是：我觉得爱情更直接受空间的制约。我在这里比在那里爱得深，我觉得我得到的爱也多些。我在巴黎的房间（后来我们很少在那里幽会）不是我感受到强烈爱情的地方。我觉得在那里思想上和内心都受到限制。我的房间是我的童年、战争及我长久、也许是没有尽头的依赖。波拉在佩雷尔林荫大道明亮的房间才是真正做爱的地方，房间里的天花板精雕细琢，有潘神[①]死前的明亮的希腊海滩——精疲力竭的英雄酣睡的海滩。我们的想象、我们的感觉发掘出过去时代的回忆、久远的回忆。我是这样解释那些差别的。

别墅也是适于做爱的地方，不过是因为相反的理由。对于波拉来说，别墅充满了久远的回忆，对我则没有任何回忆可说。我们住在别墅里心情十分轻松。然而那並不是一个平淡的地方而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在别墅里，时间和我们同在，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性爱和我们同在。至少，我有那种感觉。仿佛一切都很容易。

有好几次，我们想从小客厅的门走进温室，就是找不着

---

① 潘神　希腊神话中的畜牧神。——译者注

钥匙。我们用了好大的力气也没有撬开软垫门上的锁。我们只好拨开荆棘丛走进花园。我们看得见下面温室的内部，但是进不去。长长的玻璃窗是半透明的，不是透明的。有几块窗玻璃打破了，窗上的铁架子被含盐的空气腐蚀了。温室里是一成不变的繁盛草木：植物缠绕在旧时的干枯簇叶的脆叶边上，在粘粘糊糊交尾中突然死亡的蛇的皮。波拉对我说从前植物中间有一个弹子台。她没有看见有人在那里打过弹子。我们没有那么好的兴致长时间打量那荒废的花园。可是，夜里我曾在梦里游玩过那个花园。

波拉完成了那首珠色和粉红色贝壳的诗。那一首褐色海藻的诗。一撮细沙的诗。那首卵石的诗。那首海星的诗，以及其它几首诗。她很高兴，並不是为写诗高兴，而是为写出的诗高兴。据她说在文学创作方面，最大的满足莫过于此。我又给妈妈寄了两张明信片，没有写别墅的详细地址。所以我没法询问她的健康状况，波拉对我暗示她欣赏我坚定的态度。因为我並不觉得我应该受到谴责。所以，我错误地推断出有些事情真地变了。因此我们可以离开别墅。我们每天早上考虑回巴黎的事情。

最后一次散步，我朝最北面的海滩走去，就是灯塔和旧教堂双重阴影遮住的海滩。大家叫旧教堂是因为它的墙只剩下几处废墟。至于说灯塔，它只不过是一些断垣残壁、装了灯的破方塔罢了。我沿着海边走去，只见一层银灰色的薄纱。仿佛波浪迎面涌来，在最后一刻逃走了。天空一团团白云从一边飘到另一边。我真喜欢像波拉那样写作，好描绘出此刻的美景。这景致本来可以写出美丽的篇章的。人们认为孩子们讨厌在课本里读到的那样的文章。我从来不讨厌那些描

写。我欣赏那些描写如同我欣赏那些文字体现的风景一样。眼下太阳西斜，我文思枯竭，十分遗憾，海水在越来越猛烈的风的进攻下发起狂来。风猛烈地掀起滔天巨浪。波浪呈现出绿色和灰色全部变化的色调。冬天的阳光终于穿透乌云的壁垒，整个扑在那缺口上，在海面绘出白色泡沫镶边的翡翠绿环。在这神奇的翡翠环周围，一切变得透明、闪闪发光。

一对夫妇带着一条又叫又跳的狗走过来。他们离得很远。他们是从港口方面来的，也许在锻炼。他们可能会在海滩上走好几公里，然后回家。他们会想他们的血液循环。他们的肺。他们灵便的腿脚……他们不会看见我。连他们的狗也没有嗅到我在附近，或者根本没有注意到我。于是我体会到一种难以置信的自由感觉。我可能是一个幽灵，我甚至以为我是无形无味的。

我更清楚地看见他们。他们迈着运动员的大步子並排走着，步履均匀：一对和睦、果敢夫妇的步履。他们一会儿也没休息。他们固执地看着沙滩。狗跟在他们后面，或者跳跳蹦蹦地走在他们前面。它从一个坑洼跑到另一个坑洼，来回跑了许多次。那男人没有转身吹口哨唤它，而是叫："来，博比！喂！喂！"那条狗奔过去扑向它的主人。它扬起头、竖起耳朵向他表示认出他来了。每次它找到主人都要表示它的喜悦之情。它也许不知道它的主人喜欢的是它的表示、表现，而不是它的快乐。那是一条看家狗，一条黑色和火红色的漂亮狗．多可笑啊！"来，博比！喂！喂！"

那男人的皮肤吸引了我的注意。他的皮肤黄得出奇、皱得出奇，有的地方完全变黑了。一个体格健壮的人身上的皮肤难看得叫人恶心，真是一件怪事。为了驱赶掉那讨厌的形象，我就想波拉粉红、白晰的皮肤、雪白的胳膊肘，毛茸茸

的脖子，她乳房、大腿根光滑、有弹性、茸毛般柔软的皮肤。

那狗不理采主人的叫唤。它诡得很，利用波浪的喧声装聋作哑跑到很远的地方。那男人的叫声不大有信心。他干燥的皮肤整个是灰色的——灰烬和逆光的灰色。那对夫妇走远了。那狗远远地跟在他们后面像一只红色的跳蚤。在地平綫上的银白色的泡沫中，他们变成三个黑点。天更冷了。鸟回到看不见的巢里去了，涨潮掀起汹涌的巨浪，咆哮着退下去。刮起了强劲的风。海滩经过它粗暴的抚摸，遍地都是纸和破布，遍地是垃圾和浪冲积的沉沙。从细细的镍带下面喷射出落日寒光。接着墨似的黑夜突然降临。白天终止了。我逗留了一会儿，倾听消失在一堆堆贝壳中间的汹涌的波涛声。

“如果世界上万物都有自己的场所，那么海边真正是上帝为幸福爱情创造的场所……”

波拉•霍真躺在我身边。那是在夜里。我给她念“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主人”的最后一章“翠鸟窝”。寂静的空房间里响起巴尔贝优美、典雅的句子。小说有魅力的部分原因是故事发生在波拉和我住的地方，如同叙述者说的：“这是诺曼第海边最奇特、最优美的地方。”他把那地方“作为将要长期离开、涂上回忆色彩的地方来描写”。我一字一句慢慢地念，对于我喜欢的段落——对大海的回忆——给予它们自身可能并不具备的深度：“人们可以从这高处俯瞰大海和沙滩，那被涨潮、落潮剪成参差不齐形状的黄沙呈现出有明亮锯齿形泡沫的蜿蜒曲线……马奔驰的某个时候，蹄子踏进水里时在车子周围溅起泡沫……大海在紫红色的空气下面，仿佛用晶莹雪白的泡沫卷起玫瑰红的海藻，无往不胜的紫红色泽像不

朽的大自然的激动的血液渗透进一切、围绕一切循环不已。”

书的结尾部分描写艾尔芒加尔德和她丈夫在神秘的小海湾或者在悬崖顶上散步，描写他们在由诺曼第海盗的后裔驾驶的不坚固的小船上钓鱼。波拉睡着了。我能够在电灯泡的强光下不受责备地观赏她平静自信的面孔、她白晰的眼皮。要不是她胸前的睡袋有规律地起伏，我真以为她死了（我恨自己赶不走这病态的念头）。她稍稍鼓起的圆嘴唇是她脸上最动人的部位。她那淡紫色的嘴唇微微张开，由唾沫桥连接起来。我清清楚楚听见她的呼吸声。我又想起妈妈对我说的话：“那姑娘太好了，对你来说，太好了。她怎么会看中你，我可怜的菲立普？”我禁不住认为妈妈说得有理。

远处：空空的房间里，灯泡把黄白色的光圈投射到天花板上。窗旁角落里的桌子上放着波拉的诗稿。她已经写了好几摞小开本稿纸。第一摞是每首诗的第一稿，第二摞是第二稿，依此类推。从上一摞到下一摞可以看见删掉一个词或一整句，去掉一个标点符号、一个形容词，一个逗号的同一首诗。有时候她增加词句、标点符号。这比较少见。这是她的创作方法：连续不断的淦析，她认为她采取这种方法，她是在和时间合作，有时候时间也为她工作。

我熄了灯。那是我们在C城的最后一个夜晚。我们决定回巴黎。波拉·霍真缓慢的呼吸声被从西边来的风雨声掩盖了。我好长时间才入睡。

第四章

我们离开巴黎的时候正是大雨滂沱的日子。回来的时候却是白雪纷飞的深夜。离开C城的海滨並没有使我产生任何激动的感情，因为那个地方简直就像一座荒凉的大别墅。我归心似箭，急于回到这座我始终没有忘怀的城市。

我们默默地驱车前进，倾听着挡风玻璃上雨刷来回摆动的沙沙声。路上的脏水不断溅到发动机的防护罩上，而当大卡车从我们身边擦过的时候，那简直是倾盆的雨水朝我们的车身泼过来。

快到巴黎了，我们的车也跑得越来越快。不晓得为什么每当人们接近这座城市的时候就会感到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所吸引，也不晓得为什么这个时候车子就会跑得越来越起劲，简直就像把水倒进漏斗似地奔驰而去。波拉一直把油门踩到底，不管前方有什么障碍，她总会在最后一刹那间猛然而又准确地拨动一下方向盘而绕了过去。车速表一直在130和140之间摆动着。这样的速度本来会叫我害怕的，可我并不感到害怕。我本来应该反对她把车开得这么快，因为这时候的沥青公路简直已经变成真正的溜冰场，可我却默不作声。我的安静意味着我的默许。波拉为能使那小小的发动机发出呼呼的狂叫声而感到十分惬意。

寒冬腊月，驱车沿着那叫做公路的沥青带子上疯狂地奔

驰的确另有一番乐趣，这回我算是体验到了。这是极端可怕的车队行驶，一会向右，一会向左，车外的景色变得模糊不清，只看见那光亮的方向盘，那些布满绿色数字和红色指针的仪表盘，还有前面汽车闪亮的尾灯，一片吵闹的声音和五颜六色的灯光。当我们冒着最大的危险疾风般地前进的时候，似乎是巴黎城为我们提供这种勇往直前的勇气。我们如同那些被麻醉了的病人一样麻木不仁。城里的人也很自然地甘愿在这种状态下过日子。他们简直是在薄如刀刃的屋脊上行走。

此时此刻，我正想着C城所给我留下的一片空虚的印象，留在心中的只有我和波拉之间的抚摸以及我们彼此的情感，可这一切都不属于这个白色的、被遗弃的世界。

巴黎已经不远了。当我看到路边的房子、建筑、工人住宅区和乡下的村庄越来挨得越紧的时候，我就知道快到巴黎了。在进入真正市郊的时候，这是一片非城非乡的地带。黑夜里，这个地带是一片无边无际的黄色光晕。在那黑暗的窟窿里，车灯有时照射出一片刚刚耕过的土地，一排白杨树，一只流浪狗闪光的眼睛，一间农夫的棚子，一座高压电线塔。

尽管我在C城的日子过得十分空虚，但我仍觉得此行也有所收获。突然间掉进这么一个远离人寰的地方，只好自我解闷。我实在过不惯那里的生活，因为在巴黎有许许多多供你散心消遣的机会。我必须承认，我从来还没有体验过这种有所收获的旅行。这样的旅行，好歹能让你看清事物的本质：面对着我自己，我一刻也不感到厌烦，而且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属于我自己，也就是说，我可以忘掉周围的一切。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有那闲情逸致去正视自己，使我知道我乃

一文不值，实在一文不值，比一文不值还不值。

波拉的双手紧紧握住方向盘，以便对付公路上车水马龙的艰难行驶。她的目光直盯着前方黄色的光束。她想抽支烟。她说抽烟可以防止她打瞌睡，因为此时此刻她必须发挥不寻常的驾驶技术。就像往常一样，她总是有理的。她有一种惊人的毅力为自己强词夺理。那包菲立浦·莫里斯牌香烟就放在手套盒里。我点燃了一支烟，并乘着我们超越一辆黄色卡车的时候把它塞到她那两片嘴唇之间。

公路上的车辆似乎受到某种吸引而越跑越快。司机们紧贴着方向盘，操纵着他们的车子。每当有车迎面开来的时候，强烈的灯光照射得他们睁不开眼，他们脸部的肌肉就紧缩起来，或当他们超越别人的车辆时也露出同样的表情。越接近圣克鲁门，车速也变得越快。

这时我们的车速是每小时145公里。奥斯丁车发出的呼呼的吼声中，掺杂着发动机消音器的尖锐声和风从车顶上掠过的呼啸声。我们把一排排密集的树林抛在身后，正是由于这些树木，高速公路才显示出它那笔直的轮廓。我们和树木挨得如此的近，看上去像是舞台布景里的一个个魔影。在某些地方，一道植物的围墙骤然间裂开了，这使我意识到，在我们和这些粘合起来的建筑物，诸如房屋、亭子、仓库、候车棚、工厂、桥梁、架空通道、临时工棚、栅栏和城堡等等之间，只不过隔着一道薄墙。总而言之，杂乱无章的郊区充满着神奇般的幻影，可以说是座落在地狱门口的一个小小的天堂。

驾车司机的神经质变得更加明显，更加活跃。这种激动从一部车传染到另一部车。突然地塞车、排长龙，重新风驰电掣。这种激情是我们到达下一站的保证。然而，更为动人

心弦的景象是：这个从远处可以看到的被光晕笼罩着的城市已经接近我们了，郊区那环形的隐隐约约的黄色光环壮丽可观。这是一个带着蓝色光泽的乳光球体，像是一个摆在地球上的光环，其光辉高高地向着天空辐射，犹如当年修道院的箭形屋顶一样，是城市整体的射出物，它是由成千上万被照亮的窗户，千千万万匆忙移动的车灯，工厂高炉的火口以及那些在坟地里游荡的夜猫苍白的眼睛而构成的。

但是，当我们越是接近这个光源的时候，这个球体就越变得模糊不清。有一个理想的距离让你能最清澈地看到这一景象，一旦超越这个距离，那你就会像一只蝴蝶钻进了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光圈里一样。那里尽是一些用有机玻璃镶嵌起来的高墙，或者是那宛如动荡的镜子，那烟波粼粼的河流。在那里，什么事情都可能会发生。无论是波拉还是我自己，谁也不晓得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东西。我们已经以相当快的速度在陡峭河岸奔驰，准备着向夏特莱方向逆坡而上。我已经看见大法院的黑影在移动，在它的右侧，清晰地露出它那尖尖屋顶的轮廓。我们穿过桑热桥。这时正是午夜刚过的时分。波拉·霍真先把我带到家门口，然后自己驱车直向协和广场驶去。

我的房子显得格外宁静。没有任何理由叫妈妈一直等待着我。她可能早已进入梦乡。我知道她会责备我没有事先通知她我的归期。不过一切都将会按预定的方式安排妥当。实际上事情並不像表面所显露的那样难于对付。我把我的雨衣搁在显目的地方，好让她知道我已经回来。

“菲立普，我有话要跟你说。”

我睁开眼睛。妈妈已经站在我的床边。她裹在她那件蓝色的睡袍里。她说话的口气相当着急，带着她平时惯有的焦虑不安的情绪：

“菲立普，你总该想出个办法。”

我不明白她要我想什么办法。这倒无关紧要。我翻起身子靠在枕头上，並请她坐在我的床上。她局促不安地搓着手。她並没想到她的发问会让我措手不及，因为我刚经历过一夜的艰难，此时此刻还是嘴唇发白，四肢疼痛。

“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我正需要你的时候，你偏偏不在，菲立普。你总不着家，菲立普……。”

是的，当然，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随便回答她，说我今天早上就会做出决定，还说我已经胸有成竹。

“那么，今天你就去，是吗？”

“上哪去？”

“去工厂。他已经走了，你知道吗？托尼·索昂已经走了。这回你该干点事情。”

她的声音带着一种忧伤的口吻。这一下，我可全明白了。我答应了她。是的，我应该到工厂去。免得她总是这个样子地搓着手。

我了解一下事情的缘由。知道他已经走了一个星期了。可她没法通知我，因为我给她邮寄的那些明信片都没有留下地址。她急得要发疯，哭哭闹闹，唉声叹气。我尽量安慰她，答应她一定做出必要的安排。我试着找到一句能令她宽慰的话：

“我们一定会找到解决的办法的，妈妈。”

她跳了起来，仿佛我的话刺了她一下似地。

“不，不是我！是你自己应该去接替他。我，我可不愿

意掺乎厂里的事。我岁数太大啦，也太劳累了。菲立普，你自己想法子对付吧。”

她盘问我：为什么托尼·索昂要这样欺侮她？让她吃那么多的苦头？

尽管我反复向她解释，托尼·索昂离厂的事早就作了决定，並且已经公开出去，可她仍不服气。我还说他充其量只不过是一名雇员，对他来说，法律规定他有权退休。但是，毫无办法，妈妈仍然认为他只不过是滥用自己的权力来达到为难别人的目的。她站起来，然后又坐下去，眼泪汪汪地流下来。她知道，我最讨厌这种歇斯底里的场面。她到底想挑什么岔子？她的眼睛透过一层模糊的纱幕死死地盯着我。我了解到托尼·索昂已经给我留下一些指示，因而我必须去见莱莉蒂埃小姐。

“菲立普，今天上午无论如何你得上厂里去一下，非去不可。你不能把事情撂下不管。他为什么要这样溜掉，把整个烂摊子往我身上推？”

我一听就火冒三丈。她递给我一个打印着我的名字的信封。我急忙用手指将它撕开。在偌大的白纸上，寥寥写着几行字。

亲爱的菲立普：

我再也无法推迟我的行程，而且，在您不在的时候，我只好把我的决定通知令堂。请您见一下莱莉蒂埃小姐，她会替我转给您一些我认为对您有用的资料和意见。我为您设想好一些最起码、而又必不可少的措施，但愿这些措施将能保证阿歇尔工厂继续运转，並且能在将来取得成就。

您殷勤的仆人

托尼·索昂

7日17日于

维尔纽弗·勒·洛伊

我脸红了。感到羞耻。妈妈想知道信上写着些什么。我对她说，托尼·索昂根本就不想叫她掺乎到厂里那些错综复杂的事情中去，而且十分尊重她那轻闲的日子。她同意我的解释，但其疑心仍没有完全消失。我只好把这封信从头到尾再给她念一遍，并特意强调最后那一句话。其实我自知能力有限，对于未来的成就不敢抱有奢望。妈妈如同往常一样，佯装不明白我的意思。

我心里完全明白，她对我毫无信任之心。我不想多费口舌，应该立即给莱莉蒂埃小姐挂个电话，以便尽力按托尼·索昂的要求去办。只要我肯卖点力气，是可以维持阿歇尔工厂继续开下去。难道这不是最起码的事吗？剩下的问题，实际也只是我个人的事了。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也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天，妈妈一反家里常规，把早餐的桌子搬到书房里来。屋里散发着那热气腾腾的咖啡香味。她的这个新主意倒给屋里带来那种从前的气氛。不过对于这些小事，我从来不大惊小怪。白色的杯子整整齐齐地摆在金黄色的桌布上。我们面对面地坐下来。因为光线很弱，所以点着一盏灯照亮着这个十分亲切的场面。我对妈妈说，这么好的地方过去一直不用实在有点可惜。她回答说，从今以后我们就在这里用餐。

"就像从前一样？"我问她。

"是的，像从前一样。"

我心里正琢磨着这种复旧的现象。那台布莱耶尔钢琴在灯光的照耀下再也不像一具可怕的、沉睡多年的死尸，倒像一匹上了年纪的、但仍可以干活的老马。

"你想再弹琴吗？"

"有时想弹。可我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摸过它了。……我的手指都硬了。再说，我还能看懂乐谱吗？"

"你应该重新上课去。"

"干吗不行？是的，干吗不行？"

她显得很高兴。我也一样。我感觉到一种空前的安逸，仿佛任何力量都无法缩小它或威胁它。突然间，我们沉浸在一种无名的欢乐之中。可我立即就觉察到陷井之所在。不过，我依然顺水推舟，姑且沉浸在这种称之为"天伦之乐"的舒适而又热烈的气氛中。妈妈的这一招差点成功。

她对我微笑着。我让她继续想入非非，幻想一种可以存在、可以接受的生活方式，就像往昔一样，披着一件欢乐愉快的外衣。我曾一度为之感到激动，但我並没有落入她的圈套，沦为家庭中一个可悲的角色。她突然变得不安起来。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你不跟我说话啦？"

"是的。我现在正在思考问题。"

"假如我不是冒昧的话，你能告诉我正在思考什么吗？"

"我正在想着厂里的事。难道这不是最要紧的事情吗？这是唯一能称得上有意思的事。"

出租车直朝着工厂的所在地维尔纽弗-勒-洛伊疾驶。

我再也没有时间去东游西逛。我在想着对付厂里目前状况的手段，以便使我这个身为业主的可以开脱自己的责任，变成一个不孚众望的能人。我从心底里明白，托尼·索昂怀疑我的能力是有道理的。是的，我平生无任何奢望，我只希望自己一文不值。想搞一番什么事业，那岂不是天大的笑话！想有所作为，也许可以，不过这就意味着你是一头强壮而又瞎眼的牲口。但是，有志者……还是不怀任何野心为妙。

天气十分沉闷。仿佛是一条还散发着乙醚味道的肮脏绷带似的。出租车里的司机是一个戴着白色帽子的矮个子，他不说话，无论是对他的乘客，还是对着其他的司机，他总不流露任何冷热的表情。我觉得我的性格和他相似。他对周围一切都无动于衷。可他驾车技术的娴熟和稳当，着实令人钦佩。这是一个不容易动感情的人。我猜想他一定巴不得我别用谈话来惹他讨厌。

我对未来充满信心。我在想着托尼·索昂可能会给我留下来的指导意见。他比谁都清楚我对商务素来兴味淡薄。他本来应该把善后的事全部安排就绪，而不应该把事情装在信封里给我留下来，因为这太简单啦，写好信，封好口，往信箱里一扔也就万事大吉，抛之脑后。可他能有别的办法吗？不可能，那也是注定的。我的日子将变得不好过了。

我讨厌事物的变化。而最糟糕的莫过我的体型由于岁月的流逝所遭受到的变化。我年轻的时候身段苗条，动作轻巧，尽管我属中等身材，但仍显出一付修长的体型。可如今情况全变了。我多少“发福”了，这倒不是由于我嘴馋，而主要是四肢不勤的结果。我的额头直至两鬓都光秃了。有时爬楼梯时还会累得直喘气。不过这一切还都没到无可救药的地步。我仍有可以改变体型外观的余地：步履轻快，衣着宽

阔，发型讲究。我自己曾这么想：别人只能看到你那外在的热情，只有我才能了解自己的庐山真面目，洞悉自己的种种毛病，例如嘴里缺了几颗牙，还有那间歇性的痔疮等等。简言之，所有那些意味着人生衰老的症候，一种无法抗拒的衰退。因此，我必须寄希望于未来，希望所有的东西永恒不变，我必须为阻止他们的变化而挣扎。

这时我们已经到达目的地。刚才的一番思考似乎给我增添了一些勇气和力量。那位出租汽车司机临走时还向我点头告别。我站在人行道上一动不动地看着眼前这扇阿歇尔工厂的大铁门。我凝视一下塞纳河，它在那些被灰色的阳光染成暗淡的红屋顶背面显得多么美丽、多么奇妙！就像我所预料的一样。工厂的门房并没有把我认出来。他带着一种佯装的谦卑向我道歉。莱莉蒂埃小姐说话用着一种我从没听过的铿锵的声音，她用一种官气十足的腔调向我打招呼。也许是由于托尼·索昂走了以后她才学起这种官腔官调。我还发现她比上次我见到她时更加发胖了。她满脸笑容，正在堆积如山的资料中忙乎着。她把几份文件交给我。看来这些文件将是我和她的谈话必不可少的基本材料。我突然间对她眼睛化妆的颜色感到惊奇。她的眼睛涂着一种很少见的、柔和轻淡的蓝绿色。这不禁让我想起莱莉蒂埃小姐当年曾经是一位十分漂亮的姑娘和一位相貌出众的少妇。

“索昂先生嘱咐我把这些文件交给您。还有这封信。”

她奇怪地看着我。我在她的眼里，肯定像是一个白痴。不过，这倒也无所谓。我把信封打开，並从中抽出两页布满托尼·索昂的纤细字体的信纸。莱莉蒂埃小姐的那身绿色衣服和她那双精心描绘的眼睛显得很不和谐。她没有审美的能力。我念着信：

亲爱的菲立普：

我不想对我这次提前离厂的原因做过多的解释。这主要是基于我母亲及我本人目前的身体状况才做出这一决定，同时也是为了澄清我觉得受到牵连的某种与您及令堂有关的传闻。

事情非常简单。假如您决定亲自领导这个工厂的话——这是我所赞同、并为之感到欣慰的决策——您只需打开标着“1号”的那封信。您将可以看到我对工厂目前状况的看法以及对近期、中期发展的展望。除此之外，我还写明您将和我们的银行顾问会见的日期和地点，並将由您来主持这次工作会议。假如您愿意的话，我将可以为这次会议就我对文件所知的情况最后一次为您提供协助。

要是您的想法和上述假设相反的话，那封标着“2号”的信将会告诉您如何以最佳方式去招聘一位可以胜任接替我的工作的管理人员。要是这样的话，我只劝您雇用一位经验丰富的人，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您必须提供高于这种职务的工资。在这个问题上，假如需要的话，我也可以帮您审阅应聘人选的档案材料，並做出最终的选择。

无论您选择什么方案，务必请莱莉蒂埃小姐把那些急待签字的文件交给您，以免贻误大事。主要是有关向我们的债权人偿还贷款、提供预算单及订货单等方面的文件，免得因库存原料中断而停产。至于日常的事务，您完全可以交給莱莉蒂埃小姐处理，她完全值得您信任。

我亲爱的菲立普，请接受我十分亲切的致意。

托尼·索昂

11月16日于

维尔纽弗-勒-洛伊

我沉浸在冥想之中，并从眼角观察着莱莉蒂埃小姐的神态。她使劲地往白纸上打印戳，并在抽屉里乱翻一通。我知道此时此刻她在想什么："他会做出决定吗？我是否从此以后将在这个软弱无能的厂主手下干活、听从这么一个十年当中难得到厂四次的草包厂长使唤？"我审视着托尼·索昂办公室的那扇门。是的，难道我将成年累月地关在这个办公室里头，整天在这灰黄色的光线下、呆在这位每时每刻都表示对我厌烦的小姐身边工作？不，莱莉蒂埃小姐，我绝不会自讨没趣，绝对不会叫你扫兴。那么，我当然应该打开第2号的信封。也许这正是你意料之中的事。你将会有一位崭新的、漂亮的老板。我们将为你选择一位生气勃勃、精明能干的老板，总而言之，是一位只能叫你满意的标准老板。

这一切实际是白纸黑字——明摆着的事。托尼·索昂对我了如指掌，他早就知道我不会继承他的职位。他的信也写得一清二楚：他的措词造句全都是从条件式过渡到将来时，真是巧妙之极！别看妈妈口头说的或心里想的是什么，其实她最担心害怕的就是我当上这个工厂的主人。对于妈妈的这种心思，托尼·索昂佯装一无所知。

我从最后几行字开始把托尼·索昂的信念给莱莉蒂埃小姐听。她脸红了，露出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然后我们开始谈起正经事：

"莱莉蒂埃小姐，根据索昂先生的意见，我们已经看了第2号信，这么一来……（她抬起头来，用一种期待的眼光

望着我。）……阿歇尔工厂很快就会有一位新厂长。请你负责起草一份招聘启事，然后送给报社登载。我们需要一位精通德、英、西、法四种语言的厂长，当然必须目前仍在任职的。我们可以把他从原单位'挖'过来。为了达此目的，我们将重金招聘，可以提供索昂先生原来所挣工资的两倍。”

“翻一番！”

“是的。六万法郎。莱莉蒂埃小姐，因为您要看到我们所要的是能胜任工作的人。您和我所希望的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厂长，能够负责处理财政、行政、商务等方面的事情。十几年来，我们的纺织厂一直死气沉沉。这种状况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因此，前来接替索昂先生的新厂长一定要称职，善于采取必要的措施，卓有成效地工作，给企业带来点新的生机。必要时能下得了决心，大刀阔斧大干一番。”

她睁大一双受惊的眼睛。

“先生，还有那批新购进来的机器，您都给忘啦！”

“莱莉蒂埃小姐，您以为靠着这些机器，那怕是电子的，甚至是从美国进口的，就可以使一个奄奄一息的企业起死回生吗？不，莱莉蒂埃小姐，关键在于那些男、女工人。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解雇。所谓人员紧缩可不是意味着少养几条狗。”

“先生……。”

“是的，我知道您要对我说什么。我们多少年来一直没有解雇过任何一个人。难道不是吗？您别以为我不知道。这可以说是我们的失策！”

她惊讶地目瞪口呆。我不厌其烦地用一些让她琢磨不透的语言吓唬她，并用一种冷峻的声音继续说道：

“我们的竞争对手们正在减少他们的雇员，缩小他们的开

支。正当我们步履艰难、停滞不前的时候，他们都阔步前进，蒸蒸日上。他们正在把我们挤垮。有朝一日，他们迟早会剥我们的皮。莱莉蒂埃小姐，请您相信这一点。到那个时候，我们的企业就将宣告破产，那将是全面解雇……。如果我们想求生存的话，那就只好忍痛打开一条隔离火带。我们应该和他们一样迈起大步向前进。莱莉蒂埃小姐，您要想到这一点。”

“不过，阿歇尔先生，您总还需要一名……一名女……就是说，我想厂里领导总还需要一名女秘书吧，您说是吗？”

在她那双无神的眼睛里闪耀着一种不安的光芒。我知道隐藏在她那眼神的背后是什么样的想法：你想解雇谁都可以，你可以把那些整天守着机器忙个不停的男女工人统统解雇，还有那些裁剪工、甚至工头、工程师、看门的，那些有孩子的和没有孩子的人都可以统统解雇，就是别解雇我，让我留下来。把别人都扫地出门，而我却独自留在厂里。她的嘴唇在颤动，她坐在转椅上局促不安。我说：“莱莉蒂埃小姐，我从没有想过我们可以辞去厂领导的女秘书，更没想过可以没有您的这份工作，我完全知道，您的工作对于保证企业顺利发展是必不可少的。”

她高兴得扭动起身子。对于我的恩典，她简直愿意五体投地地感谢我。

我指出她忘了把要签字的文件交给我，并且要求她把那个我不愿意主持的银行顾问会议推迟在两个月以后举行，同时订好三周之后审核第一批厂长候选人的材料。最后我对大家目前所关心的天气寒冷、环境潮湿等问题提了合理的建议。我完全明白我只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

我离开了工厂，在马路上走着，应该走走路。应该向前走。一个人如同一个企业，不进则垮。我从奥尔良门开始步行往前走。在南郊这些杂乱无章的街道踱来踱去着实没有任何意思。郊区是一个不伦不类、甚至是毫无个性的过渡地带。我毫无目的在模糊不清的思想支配下走着。一个没有思想的人能够生存下来吗？也许思想本身就像这块既无结构也无规律的郊区一样。

我喜欢回到这禁锢在城墙里面的城市，一座被边界、城门、城墙所限定的城市，还有她那些林荫大道。城市是最具有人性的形象。是人类本身的形象。她象征着人类的躯体、灵魂和面貌。她诞生于位于千年古河汇合处的三间树枝茅屋之中。谁也不知道从哪里来了一些男男女女，他们身边除了一根拴牲口用的绳子之外一无所有。就在一个严寒的冬天，他们来到这里安家落户。假如当时有人在那里观看他们的活动的话，比如说一个靠设置陷井捕捉皮毛野兽的猎人，或者是一个早在那里定居的牧人，那么，从远处也许就可以看见他们那变为白雾的呼吸。他们为未来的城市开拓了第一个浅薄的地基。一座城市的真正根基竟然是一些脆弱易垮的建筑，一点没有熄灭的火星，或者一次洪水的泛滥，都可能让它夷为平地。可这个基地却能安然无恙地繁衍下来，这真是个奇怪的反常现象。他们不断地修建再修建。他们把茅舍彼此远远隔开，免得一家失火，殃及全村。他们开辟了第一条道路，第一条街道。他们不断扩大地盘，出现了第一个广场，成为新世界跳动的心脏。他们每天来到河边，在岸边堆积泥土，逐渐加高，形成了一条堤坝。后来终于成了滨河大道和码头。

幸亏我们这些祖先，幸亏他们不懈的努力，我们今天才

有可能在这块浩瀚无际的地方进行思索，或再也不思索。因为它宽宏大量，既容得下那些有思想的人——那些献身于它的建设的人，也容得下那些无思想的人，这些人或昏睡，或沉思，或怨天尤人。

维克多·巴斯克广场就在我眼前。我来到它跟前，因为我一直走着。这条大街对于我来说是一条十分熟悉的小路。我兴致勃勃地看着那拔地而起的圣-彼埃尔·蒙特鲁斯热大教堂。我感觉到我已经从害怕当中解脱出来。街上的行人变得更加稀少。可人行道上仍有几个匆忙赶路的人，他们每个人都把脖子缩在大衣领子里面，有节奏地吐出一团团白色的雾气。不久便下起雪来了。

空旷的地方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暗淡。一走过那座狮子塑像，大街就变成了小巷，其中一边全被一些黑色的建筑物所占据。这里有两家儿童救济收容所，一家是盲女收容所，另一家是天主教修道院。这里有许多献身于人类福利事业的人。马路两边的人行道旁种着一排排高大的树木。这些树木都已经叶落枝枯，因而也失去其原来的特征（城里人难于凭借树木的表皮和枝叉来识别它是什么树）。这些树木和慈善机构以及天文台花园的高墙相互摩擦。鹅毛大雪越下越大。在那暗淡无光的人行道上，我孤独一人，顶着刺骨的寒风艰难地向前走着。在远处，我看见塞纳河上的一片光芒。在这块河流穿过的地方，蒙帕纳斯的街道和皇家港被一道天然的界线所分开。

我必须走到那个地方去。首先沿着圣·米歇尔大街宽阔的人行道走去，然后再经过卢森堡公园的栅栏门。也许我会掉进那里的水坑里。艰难的行走真叫你精疲力竭。可怨天尤人何济于事？应该像一个不熟水性的落水人一样拼命挣扎。

永远向前。不能以任何借口而止步踌躇。

我的激情把我一直带到桑热桥上。我终于由于疲劳而在塞纳河这只巨臂上停留下来。我凭栏眺望着脚下的河水。啊！这可不是奥里诺科河①，不是第聂伯河，也不是莱茵河！这只不过是小小的塞纳河。她在大法院坚实的石头下面谦逊、有节制地流着。水流是如此缓慢，仿佛一动不动地滞呆着。此时此刻，天空灰暗。大风掀起一团团雪花扔进那黑色的河水。我凭倚在桥上的栏杆，尽管寒风刺骨，却仍在思考着。我所听说过的某些美国人的议论，他们竟然把塞纳河与密西西比河和其它更小的河流，诸如明尼苏达河和伊利河②相提并论，真是无稽之谈！他们根本不了解塞纳河的真正意义，它之所以穿越整座城市，并非出于偶然。这完全是一种彼此情投意合的选择。总而言之，他们创造了一种共同生活的方式。这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协作精神。这里的空气散发着一种长年累月被河水冲洗、侵蚀的石头的气味。嗅觉灵敏的人还可以闻到一股由千千万万正在运转的电器所散发出来的臭氧气味，尘埃的芳香，以及书库里被翻卷了的书页、印刷油墨、大图书馆最里头的书架上积满的尘埃所散发出来的芳香气味。书架上的书摞得那么高，恐怕谁也读不着它。不过，这是不可能的。任何一本和这座城市和这条河流有关的书都将永远不被人们所遗忘。

我正寻找生命的诞生。正是这座城市和这条河流将给予我第二次生命。他们和我那杂乱无章的思想截然不同，他们显示出一种井井有条、长久结合的形象，并且经得起历史

① 委内瑞拉境内的一条大河。——译者注

② 均为美国境内河流。——译者注

的沧桑而永立不败之地：外敌的入侵、革命的冲击、恐怖与凶杀、疯狂的日子、流血的黑夜、饥馑的岁月 、公 社 的 街垒、残酷的镇压以及凡尔赛人的反扑……。

在那银装素裹的两岸之间，黑色的塞纳河水悄悄向西流去，在那些书摊架子的上面，在那桥上栏杆的顶端，苍天和河流浑然一体。

夜色笼罩着桑热桥。刺骨的北风越刮越猛。我的目光沉浸在那失去光辉的水波，沉浸在那远处无底的黑暗的深渊。在德扎尔桥和纽夫桥那边，第一批灯光亮起来了，他们是节日里的小星星。我想起亚历山大三世桥上的灯光，那里的夜景是如此动人，使得人们不厌其烦地一再把它的夜色印成一批批的彩色明信片。

我又回到那潮湿的黑暗之中。我几乎沉溺其中而遭灭顶之灾。这里距离家门只有两步之远，几乎刚好在吉内特·拉卡兹窗子底下。不过，假如我真的死了，也许她也只能等到第二天才知道，或者稍晚一点，当人们发现我的尸体之后才知道。大家将会说我是死于车祸。或者根本就没有人议论一声。不过我将不会做出如此的蠢事。在这块运 动 着 的 地面上，大地就在我脚下，尽管漆黑如炭，但却封闭严实，它的密度大大超过我的骨肉的密度。对于我来说，我是绝对不会陷进去的。万一我真死去，我的后事也一定会弄得令人啼笑皆非，而且那皮肉粉碎会令人感到恶心。况且还得为自己编造如何厌世弃生，以便能为死亡证书提供某种推理的依据。这对我来说将是为艺术而艺术。可我无意对理智发出挑战，而且我从没有按纯粹美学的意图去办事的习惯。

吉内特·卡拉兹正等着我和莱莉蒂埃小姐谈话结果的汇报。当然她所等待的不是我，而是那位能够使唤这些老得掉

牙的旧机器并使它们重新运转的新厂长。托尼·索昂之走就是一场无可名状的灾难的先兆，而她指望我能够收拾残局，化险为夷。我能有起死回生的本事么？没有，当然没有。我的心特别脆弱，而且正是由于这种不幸的心情迫使我变得如此的刚强。应该奋力拼搏，不是吗？要竭尽全力坚强起来。如果你没有一副坚硬的头皮，你就不能在生活中闯出一条路子来。总不能把舞台上用木板、染色布制作的道具坦克运到战场上去打仗，而强迫一个人去干他本性最为讨厌的事也是不可能的。我已经走近夏特莱广场的电话亭。

铃声一响，吉内特·拉卡兹立即摘下话筒，她刚开口我就知道她正坐在电话机的旁边。“怎么啦？”她的第一句话传到我的耳朵就像一阵风撕裂船帆的声音似地。我已经知道，我再也无法和她作对，要不，也只能用半真半假的话来哄骗她。我完全知道她会给我提出一连串粗暴的问题：一个多礼拜看不见你的人影，你去陪你那个小波拉也不对我说一声；今晚你又不回来，是不是还想疏远我？而对厂里的事，难道你这一辈子就只能有一个想法吗？……在这种情况下，假如你在电话里多沉默一秒钟想去弄清对方的声音，那她就会立刻冒出第二个问题，比如说：要是谁也不愿意管工厂的事情那我们将该怎么办？或者：你是不是总想惹我烦恼？你总是让我心神不定，总是用沉默来折磨我，你自己觉得这样做很开心吗？难道你不知道我需要休息，仅仅需要休息？……不，我不会让她有丝毫的空隙去自由发挥。……

“怎么啦？”

她喘气的声音比说话的声音还大。应该回答她。

为了使她镇定下来，我告诉她托尼·索昂的要求已经落实好了。

“什么要求？”

可见她对厂里的事毫不关心。“莱莉蒂埃小姐和我都已经作了安排。莱莉蒂埃小姐完全值得我们的信赖。什么事都逃不过她……。”

“我说的正是莱莉蒂埃小姐！听着，这可是关系到我们的前途，关系到我们生存之计呀……。”

“是的，我知道。”

不，我和她不一样，我不懂得什么叫忧愁，什么叫孤独。是不是我该孤注一掷，停止对她的哄骗而说实话？

莫非我无意之中把她当成一个大傻瓜？我的缄默对她来说要比长篇的解释还更清楚。没必要让这出闹剧再继续演下去了。任何男人都不懂得撒谎，何况我比哪个男人都不如。还是让我向她吐露真情，假如我有这股勇气的话。但愿我不会把她欺骗……。

我指出她说话当中有许多是对我不公正的指责，并且向她说明我从来没想过对她撒谎，更谈不上欺骗她。我本来打算回到公寓以后再向她详细解释所有她想了解的问题。再说，事情本来就简单得很。谁将来领导我们的工厂？反正不是我……。

她原料想我会出来当厂长。她原以为……真心实意地以为我终将挑起这副担子，让她高兴高兴。她以为我即将变成一位堂堂的男子汉……。但是，我早就料想到，我一定会使她失望。男人的本性就是使人失望。我也逃脱不了这个法则。我把她带到她那幻想的顶端。她感谢我。她现在知道她该如何感激我。

她自找苦吃。她也叫我吃苦。她变得容易激动、恼火。让她容我说句话，仅仅一句话就可以。我抛出我的最大王

牌：我如何决定物色一位新厂长，并且已登出招聘广告，许下令人难以置信的工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应聘者之多将会叫人难以选择……。

多么了不起的厂长！我是不是过于天真，以为谁都可以被安置在像我们这样的企业的领导岗位上？那些有能力顶替托尼·索昂的人是不是能像我脑中的梦，会从巴黎的人行道上冒出来？……。

一阵沉默。她又重新喘起气来，我向她指出这个主意是托尼·索昂想出来的，并非我异想天开，这一点她是完全明白的。我以为我已经把她说服了。错了！她变本加厉，反驳得更凶了。

“什么勇夫不勇夫？有本事的人都有工作！他们才不会浪费时间去读你那些小广告。他们早就各得其所，早就发够了财，我们哪能让他们动心……。”

当她失去自控能力的时候，她就变得庸俗、粗鲁。我真感到难堪和反感。我所听到的只是她那衰弱的、劈劈啪啪的声音。

我还没使她感到足够的痛苦？……。

我的目光穿过夏特莱广场。强烈的灯光从两座剧院的屋楣上闪烁出来。广场上空旷无人。我把电话挂上。

我真的彻底把她骗了。直至翌日早晨，她还沉浸在黄粱美梦之中。在她的思想中，怀疑已经不合时宜了。我必须重操旧业，所以我把她骗了。所有的男人都骗过她……。

一部出租车停在维尔剧院门前。一对至少六十开外的夫妇从车里走出来，然后消失在灯光辉煌的大厅之中。我的耳朵里响起妈妈说话嗡嗡的声音。我将永远像一个不成器的小孩。一个离不开大人眼光、须由大人扶上路的小孩。仿佛我

倒退到25岁。她并没有埋怨我。她很任性，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但她如何能克制自己古怪的脾气？如何能消除那日复一日折磨着她的愁云苦雨？她曾经希望，而且并没任何过多的希望，希望我能够成家立业过个安定的日子，这将是她生活中唯一称心的慰藉。她知道，她不能把一些超过我的能力之外的任务强加于我。我克制着自己的感情对她说，管理好我们的财产并非是我无能为力的事情，并且说明由于她所想象的种种原因，我将不会拒绝承担这些任务。她哭了。她希望一切都能顺利进行，也希望我能原谅她。对一个为我献出母爱的母亲怎能谈得上什么原谅不原谅的事，我不会自找羞耻，成为人家的笑柄。她希望波拉和我都能知道……。

一阵沉默。她等着我的回答。我故意让这阵沉默延续下去。

"不错，波拉是个犹太姑娘。可时代已经变了。那些犹太人不也都是和法国人一样的法国人吗？……。"

又一阵沉默。

其实将来家里有个犹太儿媳妇对她来说毫无影响。而且恰恰相反。我应该了解一下她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波拉是一个可爱的姑娘。我们还可指望她写诗，因为她喜欢诗歌。令人遗憾的是今天爱读诗歌的人少得可怜。至少我还是有些希望吗？妈妈催着我答话。

又是催我回话。什么希望？如何回答？只好撒谎。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撒谎好。因为妈妈对我说过，任何男人对她撒谎总免不了要露马脚的。

我用一种自信、轻松、清晰、甚至是潇洒的声音和她说话。是的，我有很多希望。许多踏踏实实的希望。再说，如果我和波拉不考虑将来结合在一起并且像人们所说的成个家

的话，那我们能在一起相处这么长时间吗？妈妈在电话里叹了一口气。

"啊，菲立普，你让我多高兴！你知道，你是多么让我高兴……。"

我走得比原来设想的还要远。撒谎，这就意味着去承受某种风险。不过，这天夜里，一切正常，她将会安然入睡。我按原定计划，告诉她我今晚不回家。

"你要找她去？"

我已经走到了这个地步……。

"是的，今晚我们将一起吃晚饭。晚饭以后我们再看看……。"

我感觉到她很高兴。她已经安静下来。我并没有感到非常自豪。

我走进座落在维克多利亚大街拐角处的莎拉·贝尔纳酒店。我坐下来，要了一杯咖啡冰淇琳，然后随便买了一包香烟。我顾不上看自己买的是什么牌号的香烟，只顾环视着周围的顾客。在那绿色的灯光照耀下，人们的脸色显得又黄又紫。不过，这倒使这一张张冬天里苍白的面孔显得更为秀气，而他们那一双双没有血色的手脚却像是寒冬里毫无生机的树枝。

我必须对付四面八方的冲击。人们的脸孔就像一口口陷井，幸而白天的情景已经远离了我。此时此刻，我可以更清楚地看清酒店里每个人的模样。他们那些蓬松零乱的头发真令人厌恶。那些掉满头屑的衣领，眼睛化妆技巧的笨拙，那一张张下班以后显得疲惫不堪或饥馑贪婪的脸孔，构成了一幅表现主义的图画。他们不时放声大笑，眼睛里都露出痴呆

的目光。这时候约莫是晚上九点钟，我必须设法去对付那已经拉开的夜幕。

夜幕下一切都显得美丽。不过这是一种叫人受不了的冰冷的景色，尽管其中混杂着一些暖和的颜色：红色和黄色。酒店里的桌子、柜台在镶嵌着大镜子的墙壁之间互相辉映，形成一幅深远无际的景色。所有的东西似乎都涂上一层玻璃状的清漆，一层固体的透明胶，沉浸在一种华贵而又杂乱的气氛之中。酒店内部的装饰光彩夺目，所有的颜色都过于强烈，就像中国饭馆门厅里那幅灯光刺眼的灯光照片一样。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肉末丸子，滑溜溜的酱油蛋白，带着丝光的螯虾外壳等等。我淹没在令人倒胃的景象之中。一种令人作呕的景象。我仿佛被泡在一种叫人恶心的、淡而无味的酱油之中。这里并非是久留之地。我从人群中一直挤到玻璃门。他们的脸孔变得扁平、光滑。他们又淹没在吵闹的谈话声中。

我走到街上。应该迈步向前走。

从夏特莱广场走到森林的边缘，最短的道路是从河的右岸走去，一直走到阿尔马桥。我沿着这条友好的河流走去。它是摆在市中心的一面平放的镜子。不一会儿功夫，我就看不清人行道在什么地方，因为刚下过雨，马路淌水成河，因此，我只好趁着车灯照亮或行人走过的那一刹那间来辨认前进的方向。今天晚上，所有的光源，无论是移动的还是静止的，都被蒙在一种混浊的光晕之中。建筑物的轮廓变得模糊不清。这时正值节季犹豫不决地更替的时候，冰冷、雾淞。这初雪可能只不过是一种骗人的预兆。夜雾升起来了，漂浮不定，仿佛一口气就可以把它吹散。狂风在街上旋转，冲刷着十字路口的墙角。这里是有钱人的高级住宅区，高楼林立，杂乱无章，看上去像是乱舞的云朵，或像是一个个随风飘荡的

塑料袋。人既有被冻僵之时，也会有复苏之日。什么事情都难以预料。

到了阿尔马广场。许多条大街伸向这片宽大的广场。这些大街没有任何可以吸引你向前走去的东西。如果一个外地人没有任何交通工具，突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来到这个空旷的十字路口，那他该多么局促不安。至于我，至少我知道我的步伐将会把我带到何处。我沿着第一条僻静的大街走下去。过了特洛卡代罗广场就是乔治·芒代尔和亨利·马丁大街。后面这条街使我想起那种“莫洛波里”游戏。这种游戏，就像现实生活一样，拥有一些房子就是胜利者的象征。此时此刻，这些大街就像干涸的河流似地，死气沉沉。这些漂亮的大道竟没有一家商店，也看不到散步的或过路的行人。它们只不过是一些气派十足的马路，这和公墓里的通道没什么区别。

这里也有一条最近刚刚修好的高坡立体停车通道。通道下面的每个涵口都用栅栏堵死。汽车从一头进来，停留一定时间，再从另一头出去，那里有一个呆在小亭子的男人专门向司机索取停车费。在这里，每一平方米的地方都不能免去赚钱的义务。那个男人每天、每周、每月、每年所收下来的钱都落到这个住宅区的某一个老板手里，这似乎是合乎情理的。物尽其用，天经地义。

我继续走着。威尔逊总统大街就在我背后。这条大街曾经给我留下过一个美好的回忆。有一天，当我驱车从这条大街向德拉海牙圣母院走过来的时候，交通堵塞，我只好在斜坡路上停下。有一个身穿亮光华达尼的男人打开他那辆停在土台通道口的汽车车门。他的背朝着我，但是，在他的动作中似乎有某种风度吸引着我的目光。当他回到座位上去的时

候，他转过身来。我立即认出他就是让-路易·巴罗[①]。当时正是由于某种肮脏的政治原因，他被迫从奥代翁剧院迁到位于阿纳托尔·法朗士滨河大道的奥塞伊火车站剧院。他刚在那里演出《缎子鞋》这出戏。我本能地挥手向他致意，心想他一定会对一个陌生人的打招呼无动于衷。令人惊奇的是，他居然在开车之前也向我挥手示意，还对我微笑一下。本来这是一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只不过是一种普普通通的路遇。不过，这样的巧遇恐怕只有在巴黎才会发生，在那交通干线上停车收费的土台通道上才会发生。

亨利·马丁大街在它那最后五百米处的地方拐了两个大弯，然后与苏塞大街和朗纳大街交接汇合。它先向左拐，然后似乎受到什么牵引，又重新向右拐。正是由于它的这种猛然间东拐西弯的特点，使它很像人生的旅途，因而也成了我最喜欢的一条马路。

车水马龙、马达声声、灯光灿烂以及烟雾朦胧的朗纳大街使我突然感到震惊。我要找的那幢房子用不着花很多时间去寻找，看来就在这里的一条住着元帅、二三流政客的小道上。那幢房子背后有一片树林。波拉的父亲给我提供的有关这幢房子的特征非常准确。首先，我发现房子的外面有一道很高的围墙，可以猜想，这道围墙的厚度一定不同寻常。为了表示此墙不可翻越，特意在墙端安上一排铁栅栏，每根栏杆足有手腕那么粗，末端像刀刃一样锋利。围墙后面露出一些美国木豆树和光秃、枯干的榆树的影子。这些榆树已经被修剪一番，因为这几年真菌四处蔓延，许多榆树遭害致死。这些被修剪得光秃秃的榆树看上去像是一根根插在土里

---

① 让-路易·巴罗（1910— ），迄今仍活跃在舞台上的法国最著名戏剧导演。——译者注

的铅笔。

花园里空空荡荡，一派冬天的景象。入口处有一扇大铁门，铁门下端有个不堪一推的单扇小门。看样子谁都可以走近这幢座落在草坪中心、松柏环抱着的楼房跟前。我几乎可以听见我从这条残雪、石子、泥土和烂叶混杂在一起的小道上走过时的脚步声。

楼下的窗户透出辉煌的灯火。但是上面那层楼房除了一扇窗户之外，其它全都一片漆黑，没有透出任何亮光。在这块被高墙保护着的土地上，冬天的夜里也显得暖和一些。万籁俱寂。城市退远了，甚至消失了。突然间，无缘无故地下起了一场小雨。我直朝台阶跑去，来到一扇玻璃门跟前。

我粗暴地按了一下门铃，好让屋里的人对我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感到突然。可惜那优美动听的音乐门铃却完全违背了我的本意。一位像二次大战的小说里所描写的金发女郎出现了。她身着玫瑰色服装，走到一扇装有防护铁栅栏的玻璃门跟前，然后把门半开着，示意请我进去。她说话的那种含蓄语调和她的装束很不相称：带褶的浴衣，过时的金黄色头发，各种光源都带上遮光罩……。我被她带到一间客厅里。

我发现这幢楼里的一切都很不和谐，女招待矫柔造作的模样显得过于天真幼稚，她们的风度与这座具有十八世纪格调的豪华旅馆格格不入。那些高大的壁板都雕着花果饰边，家具都是稀有的克诺尔国际流行型的。在客厅里，白色大理石的壁炉雕刻着变形的花纹，而地板却是呆板的几何图案……。

那战时流行的吵闹乐曲和花园里的肃静的景色更显得不协调。我坐在一把长沙发上，面对一张独脚小圆桌和四把低矮的安乐椅。

那位穿着玫瑰色浴衣的小姐又出现了。她请我原谅奈莉太太的失礼，说她马上就会下来见我。我谢谢她。她觉得应该强调一下奈莉太太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女人，并且暗示我要好好和她配合。我想问问她到底我该和奈莉太太配合什么？大概不会失礼吧，或至少不会叫她感到可笑。

穿玫瑰色浴衣的小姐露出一脸笑容。她请求我同意她和我呆在一起。看来她很愿意与我闲聊。

“如果您允许的话，我跟您一起等着奈莉太太。”

我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她呆在我身旁。我倒想利用这个机会了解一下这里的情况。她坐下来，显得十分高兴，并且顺手把她那浴衣的下摆撩到膝盖上面。

“我不想说那些不该说的话，不过我觉得您似乎是头一次到我们这里来。”

“是的，是头一次来。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大家都叫我安托瓦内特。”她稍微犹豫了一下回答说。

“真是一个好听的名字。不过现在很少有人叫这个名字。”

“我跟您说实话吧，其实这不是我的名字。我自己的名字可普通得很。”

我尽量装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

“每一个名字都会有迷人之处，您不相信吗？”

“难道像‘雷蒙德’这样的名字您也觉得好听吗？”

我默不作声。

“我还听说过根本就没有人叫‘圣特·雷蒙德’，只有叫‘圣·雷蒙德’的。那是一个西班牙人。一个西班牙的修士。您知道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才好。也许她喜欢她的假名是有道理的。我尽量装出一副更加讲究实际的模样：

“安托瓦内特，请问您在这里做什么工作？”

“我是女招待……。”

她羞怯地脸红起来。

“我本来不该跟您说这个。”

“您本来不该说？那是为什么？”

“奈莉太太总是提醒我们，说我们这里不是机场，甚至连普通旅馆也不是，所以这里没有什么女招待。只有安托瓦内特和巴尔巴拉。巴尔巴拉就是那个从星期四到星期天来这里上班的年轻姑娘。我们轮流上班。”

“哦，我明白了，巴尔巴拉和您倒班。”

“是的，也可以这么说。不过奈莉太太不喜欢这个词。”

“‘倒班’这个词？”

“是的。因为我们不是在工厂或者类似工厂的地方工作。在这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务……。我们对任何问题都能够闲聊一通。”

“我明白。这可需要有聪明才智，同时还得像外交官那样灵敏、谨慎。”

“是这样，应该具备外交官的本事。您可知道，有些男人可古怪呢……。”

她显得活跃起来。她为自己有这么一个职业而感到幸福。她突然把手搁在嘴唇上，就像一个犯了过失的小孩一样，感到尽谈论自己很不好意思。其实我对这种话题也不感兴趣。于是我赶紧转换题目。

说实话，我对这个姑娘既无兴趣可也不觉得反感，只不

过认为她有点好玩而已。我可不像那些痴情的男人，他们往往以为妓女全都热情奔放。我从她那一身服饰就知道她是个妓女。不过她尽量表现出十分有修养。至少她还年轻，还没有到了不知羞耻的地步。

安托瓦内特在座位上扭动着身子。

“刚才您说过奈莉太太不喜欢听到诸如‘普通旅馆’或‘倒班’一类的词语，到底是为什么？您能告诉我她是什么人吗？”

“要是您用这些词她是不会责备您的。客人有权利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可是对我们，她绝对不会轻易放过。她用词造句可讲究，简直成了她身上的一种怪癖。”

“一种怪癖？谁没有怪癖！不过如果我们现在呆在这里的这家旅馆不是一家‘普通旅馆’的话那该叫什么？”

“这您可在挖苦我。您是不是想赶我走？”

“哪里的话。您知道奈莉太太自己为这个地方起个什么名字吗？”

“这我可不知道。您提的这个问题是很正经的吗？”

“完全正经。她到底是怎么说的？”

“好吧，奈莉太太说……。”

这时我身后的门打开了。

“为了回答您的问题，我可以告诉您，这幢房子是一个严肃的机构。”

奈莉太太走过来时我们都站了起来。她一进来就显露出一种审慎庄重且具有一种绝对权威的风度。她用一种沉着的语调继续说道：

“安托瓦内特，谢谢您替我陪伴这位先生。现在您可以忙您的去了。请您回到大厅去。”

穿玫瑰色浴衣的姑娘鞠了一躬便走开了。

“请允许我向您表示欢迎，先生是……？”

这可是一个令人尴尬而又是想象已久的时刻。首先是这种人物的更替本身就具有某种神秘的色彩。再者，她用这种半截话来逼着你毫无思考余地而必须立即作出回答……。她站在那里，等着我的答话。一种快速的反应使我感到暂不撒谎为宜，也许还会有更有用的场合。

“我叫阿歇尔，菲立普·阿歇尔。”

她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她自我介绍一下，她叫埃莉安娜·德·奈莉，说她很高兴在这里接待我。她谈吐沉着、自然，不愧是一个风度优雅的女人 。

我没发现她那略为浑厚的声音有任何丝毫的改变。她是不是比我想象中更加机灵、狡猾？我的姓名本来应该会使她发窘。当我们面对面地坐下来的时候，我仔细地对她端详了一番。没错，她正是我从照片上看过的那个女人。她那精心的化妆和她那还没有完全愈合的脸部去皱手术也无法掩盖她那明显的特征：上嘴唇比下嘴唇突出。还有她那副三角形的脸庞，以及往后退缩的下巴。另外，她穿着一件黑色丝绸衬衫和一条浅色的短裙裤：她的穿着爱好同样没有改变。

“是的，阿歇尔先生，我很高兴您的来访，尽管情况有些……该怎么说好呢？尽管情况有些特殊……。”

“情况特殊？”

“请您听听我的解释。我们这回是头一次见面。您事先并没有通知我们……。不过这倒不要紧。宾至如归，所有的客人一旦踏进我们的大门就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我们不对客人进行任何盘问，哪怕是首次光临的客人也不例外。不过，请您原谅我，因为我对您却有一种无法抑制的好奇心。……。”

“您就不必客气，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您的好奇心是很自然的。”

“那好吧，既然您允许，那我就先问您一下您是否是巴黎人，阿歇尔先生？”

当心，危险！这位太太已经开始她的调查。可别上她的圈套。

“我是北方人，是个路过巴黎的外省人。我想见识见识您的旅馆。我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从朋友的朋友谈话中听到你们的旅馆……。我知道，问题在于我没有……怎么说呢？……在于我事先没有被介绍到这里来。”

我觉得靠我这一堆谎言完全可以蒙混过去。

“我说，阿歇尔先生，您完全不需要什么介绍就能到我这里来。我一看您就明白我是在和什么人打交道。”

我知道我已经被她识破了。她的眼睛闪出了一道短暂的光芒。我的天机已被泄露。还是妈妈说得对，没有一个男人会撒谎。

“阿歇尔先生，您想了解我们这个地方是有道理的。刚才小安托瓦内特可能没跟您说清楚，我们这里可是一个严肃而又值得信任的机构。我们十分注重为客人提供舒适的服务。正是由于我们待客真诚，使我们获得声望。请跟我来。”

她拉开壁炉右边的一个大书架，就像那些拙劣的间谍影片一样，书架一拉开，墙壁便自动转开，露出了一条通道。我们走进一个有视听装置的小客厅。这里的视听设备完全可以和专业的视听中心相媲美。那个书架又在我们身后重新关闭起来。

“亲爱的先生，您现在是置身于圣人的圣地之中。”

她请我在一架电视机跟前坐下来。

“至于我，我喜欢把这个客厅叫作幻影室。您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爱好选择您的夜生活伴侣。我现在通过这个小小的屏幕向您介绍我们这里最富有肉感的年轻姑娘。她们将亲自向您表现自己的爱好或她们的小小绝招。假如您喜欢的话，我们这里还有电影片、幻灯片和录像带等等。”

我说用不着动用这么庞大的设备专门为我介绍，可她仍然请我选择一盘录像带：有金发女郎、棕发女郎、红棕发女郎等等。我能有什么特别爱好做为选择的依据吗？不过，既然眼前有这么好的设备不加利用也未免可惜。其实，我心里只希望能继续和小安托瓦内特聊聊。可我该怎么表达我的意思呢？奈莉太太会同意吗？

“请给我来个金发姑娘。”

“啊，金发姑娘，太好啦，我想您准是要金发姑娘。阿歇尔先生，您的兴趣真不错。”

莫非她觉得自己也属金发美人的行列？瞧她说话的语气那么肯定。我刚想起安托瓦内特头发的颜色，这样一来，等一会我的要求就会显得更加自然。

“阿歇尔先生，请相信我，您一定不会感到失望和后悔。我们这里的伙伴，一会儿您就会看到，她们一个个都是出类拔萃的年轻妇女。她们的年龄都在三十以下，并且十分热爱自己的职业。因为她们在家里的日子过腻了，所以喜欢来这里开开心……。这样的女人谁还能有什么挑剔的？再说，她们一个个体魄强壮，无病无痛。我们十分重视这方面的问题。她们不仅长相漂亮，而且很有修养，绝对不会叫您扫兴。当然她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特色。如果您有一点不满意的话，我们可以请您看看棕发姑娘或棕红发姑娘……。”

当她把录像带塞进录像机里的时候，我正在考虑用什么

办法才能说服她答应我的要求。

“亲爱的太太，要是说到金发姑娘，其实小安托瓦内特已经给我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说实话，今天晚上让她跟我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所以也就没必要打扰您、耽误您更多的时间。”

“哪里的话，您可一点不打扰我。再说看看这些可爱的姑娘对我来说也是一种乐趣。她们都是最精华的人物，请您相信我好了。现在如果您坚持要我们那个安托瓦内特的话（我发现她说这句话时带有一种轻蔑的语气），那您将会得到，尽管这不是我们的习惯做法。放心好啦，我们不会拒绝您的要求。”

我松了一口气。我将得到我所要的东西。（我把这里的小姐们当作商品。这也许是一种传染。）我将看看这个安托瓦内特到底性格怎么样，是否可以帮我实现我的目的……。

电视屏幕上出现一个个陌生的美女。奈莉太太一一加以介绍、吹捧。当一个名叫奥丽维娅的女人脱下衣服躺到床上的时候，埃莉安娜·奈莉侧过身来对我说：

“阿歇尔先生，我建议您选择这一位。我们的奥丽维娅是一位与众不同的出色人物。她性格随和，富有高尚的试验精神，而且擅长辞令，谈笑风生。您要不要我把她的表演再放一遍？”

实际上我看不出奥丽维娅是一个才貌出众的人物，她的表演很不真实，甚至令人感到恐怖。再说一个金发姑娘也不可能起奥丽维娅这样的名字。她的名字本身就是一种虚假。

埃莉安娜·奈莉刚才对我的疑心似乎打消了。难道这是她的诡诈？还是我已经排除她某种我自己也不晓得的疑虑？突然间，当屏幕上又出现另一个金发女郎，奈莉太太又转过

身来问我：

“刚才您是不是跟我说过您是北方人？我没记错吧？”

“没错。”

“这可就怪了！您的脸孔多么像……。”

“像什么？”

“我是想说，您长得像某一个人……。像一个我认识过的人。不过，咱们还是别谈这些。”

是的，咱们别谈这些。可我却不禁打了一个寒战：难道他已经死了？不会的。这不可能。可她为什么说“认识过”？也许她用这个过去时的目的无非是想打消我继续调查下去的主意。

看来我对埃莉安娜·奈莉已经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了。她已经完全识破我的心思。当姑娘们在屏幕上继续表演的时候，我却在琢磨新的对策。是不是应该向这位拉皮条的女人坦白我的来意？说不定她本人和我父亲还有过什么瓜葛？我真想向她坦白实际上她已经知道的一切，承认我刚才对她撒了谎。也许这样一来她就只好原谅我，宽恕我。这些拉皮条的女人——我是从书本上读过的——总喜欢拿成年的男子当孩童玩，以显自己童心不老。可是这样一来我将会冒很大的风险，说不定会被立即赶出门外。要是她已经猜透我的心思，并且继续和我演戏，这就说明她不打算把事情挑明，也不会告诉我任何有关我父亲的情况。因此，我还是应该坚持我的赌注。

“亲爱的太太，我不想浪费您过多的时间。这些姑娘全都很漂亮，很有引诱力，尤其是这位奥丽维娅小姐，您说得很对，她的确堪称第一流的女性。不过，我刚才已经跟您说过，今天晚上我还是喜欢和安托瓦内特小姐打交道，也许这

样事情会更简单一些。”

“亲爱的先生，随您的便。不过，如果您想请奥丽维娅小姐来也毫无麻烦之处，因为今天正好是她的工作日，她完全可以由我们支配。”

“请别费神了，下次再说吧。”

“那也好，安托瓦内特小姐同样也有很深的修养。”

“她不也是一位金发姑娘吗？”

我对她会心地笑了一下。她关掉录像机的电源，我们又回到大客厅里来。她把安托瓦内特叫过来，让她马上去更衣，然后到27号房间找我。

27号房间最大的特点就是那块床顶上的大浮雕，由四根果木雕像当柱子支撑着。这些木制的男像高矮和真人差不多。在屋里那半明半暗的灯光照耀下油亮发光。这张床占了整整一片墙根的地方。还有几个大壁橱和一个卫生间。百叶窗关得十分严实，使我无从辨认出这间屋子到底是在楼房的哪个方向。

刚才奈莉太太带着我走过的那条走廊拐了一个直弯，看来这间屋子并不是位于走廊的拐角处。我发现走廊的那头有一道通往上面一层的楼梯。我坐在床上等待着。走廊里人来人往，还可以听到一阵阵开门和关门的声音。我知道，现在要想叫她们把我藏起来是办不到的。(我起初为什么没有勇气为自己杜撰另外一个名字？）不过，这也不要紧。我是为了他才到这里来的。我是否能见到他、并且能跟他说话呢？

响起几下敲门声。安托瓦内特走进来了。经过一番打扮，我几乎认不出她来：头上戴着一顶小红帽，头发全收进红帽里面，身着无袖白色长袍，一直垂到脚跟，脚上穿着一双伊斯兰教式的拖鞋。不过，这位打扮古怪的姑娘倒显得很庄

重。她行个跪拜礼之后便对我说她如何感谢我对她的信任，说她一定按照我的意图好好伺候。

她已经进入她的角色，同时也开始履行她的职责。也许这将是我可以利用她的好机会。我让她躺在床上，然而立即开始对她的盘问：

“安托瓦内特，请听我说。我有话跟您讲。”

“跟我讲话？这可不是时候。有比说话更有意思的事，您不相信吗？”

“这可是很严肃的事情，安托瓦内特。请您好好听我讲。”

“让我们先加深一下彼此的认识。完事之后，您想说多少话都听便。”

“可我到这里来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加深对您的认识，安托瓦内特。”

“您怎么能这样说话，您未免太瞧不起人了！我本来很高兴和您……。我还以为您肯赏脸，认为我可以给您带来点乐趣。”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安托瓦内特。我也很高兴……。我很喜欢您，这方面是不成问题的。可我有别的问题。”

“别的问题？您害怕了吧？”

“害怕？不，那未免太可笑了。”

“不对，您一定是害怕了。有的男人就是这样，他们害怕女人，害怕这些事。他们心里火烧火燎的，可又不敢下手，怕这怕那。比如说，他们害怕得病。也许您怕的也就是这个……。”

“是的，我和大家一样，着实有点害怕。不过……。”

“请您放心好啦，我们每个人都经过严格的检查，就像

战争时期一样。”

“您这么年轻不可能知道战争的事。可您为什么说‘好像战争时期一样’？”

“这是奈莉太太跟我们说过的。她说战争期间，所有的妓女都得定期接受健康检查。我们现在也跟战争时期一样，经常接受检查。其实这还不是为了老板自已的利益。因为健康检查是一家高级妓院的规矩，目的在于树立威信。谁都喜欢漂亮而又健康的姑娘。但是我看今晚先生无意和我做爱，一定是因为对我不信任。难道先生不觉得我可爱吗？”

“我很喜欢您，这个毫无问题。不过，我刚才不是和您说过吗？……”

“要是先生真的喜欢我的话，为什么总是那么客气用‘您’来称呼我？”

“安托瓦内特，我倒很乐意用‘你’与您相称，不过，您得知道……您得知道，今晚我没有心思寻欢作乐。”

“您的话我一点也不明白。我在这里不正是为了寻欢作乐吗？这既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爱好。不过，既然先生尊意如此……。”

“您这回总算理智一点。”

“请等一下。”

她把盖着长袍纽扣的绦子掀开，这排纽扣从脖子一直排到脚跟。

“如果先生不跟我作爱，必须答应我两个条件。”

“哪两个？”

“第一：您必须亲自替姑娘把袍子的扣子解开。”

“第二呢？”

“您必须告诉我，不能撒谎，到底你来这里干什么。”

“这些条件我都可以接受。（我马上开始替她解扣子。）不过，您得先告诉我，埃莉安娜·奈莉是个什么人？我觉得您不喜欢她，是真的吗？”

“是的，是真的。我们都不喜欢她。我们在背后都叫她‘那个女奈莉’。不管怎么说，她是我们的老板娘！您见过有职工喜欢自己的老板的吗？”

“说真的，我没见过。但是，社会就是这样，尔虞我诈，互相嫉妒，互相仇恨……。不过，问题不在这里……。”

问题就在那第九颗纽扣，它刚好位于她的乳房下面。我无法把它解开。

“我来帮您解。问题在哪？”

“谢谢。问题首先是你们的老板娘埃莉安娜·奈莉。”

“您莫非是警察局的侦探？我可得事先告诉您，我什么都不会跟您说。再说，我对她毫无了解。”

“我不是警察，我只是在做一个调查，并且完全是个人的事情。”

我解到最后一颗扣子。她转过身来，使我更加方便一些。

“一个调查？您到底是什么人？”

“您是问我靠什么为生的？”

“是的，请告诉我。”

“好吧……我是一个不用上班就有饭吃的人。”

“是食利息的吧？”

“也可以这么说。”

“是老板？”

“也可以这么说。不过，我不管理厂里的事务。因为我生来就对这种事情不感兴趣。”

最后一颗纽扣解开了，安托瓦内特的长袍从她的胸脯上面滑下来。

“那您对什么感兴趣？”

“就是我现在正在进行的调查。多少年来，我总觉得这是一场永远得不到结果的调查。”

“为什么这场永远没有结果的调查会把您带到这个地方来？”

“如果我们的合作靠得住的话，我一定会给您细说。”

“能靠得住。不过您得先把我的白袍子掀开。”

我只好依着她。安托瓦内特雪白的躯体全露出来。

“您看我的身子是不是正是先生所渴望的？”

“安托瓦内特，我求求您别这样。我需要您。您必须帮我的忙，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啊，我刚才把您的调查给忘了。好吧，您就说吧，我准备好回答您所有的问题。”

“埃莉安娜·奈莉是个什么人？”

“她是我的老板娘。我得跟您重复多少遍呀？”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认识她？”

“已经五年了。自从我来到这里工作就认识她。不过，请您告诉我，您真的不是警察吗？”

“您对她的过去有什么了解？”

“什么也不知道。就是我知道了，我也不会对您说。您想叫我说那些不该说的话。再说，您这些问题简直烦死人。您还不如先跟我做爱，完事之后也许我的思路会更清楚一些……。”

“她在战争期间做过什么工作？”

“瞧，我真拿您没办法。就我所知，她过去干的和今天

一样。”

“您是怎么知道的？”

“所有的姑娘都这么说。我全告诉您吧，这个老奈莉原先也是一个和我们一样的妓女。后来因为岁数大啦，她也就高升了，成了拉客的、最后当上妓院的老板。从战争到和平，她总算成功转业了。”

“而再早以前呢？”

“再早以前？”

“是的，在她当妓女以前。您知道她那时候的一些情况吗？”

“这个……我可说不准。我听说她出身于阔富人家。奈莉可不是她的真姓。她再也不敢用她的真姓，因为在战争期间她干了许多坏事……。”

“干坏事？”

“是的，所以她才改名换姓，怕败坏家庭的名声。她跟德国佬睡过觉……。当然不是什么德国人她都跟，她只勾搭那些高级军官。显然她有她的目的。她时不时对我们说：‘我在抵抗运动的时候……’，其实这有什么好吹的！她在战争时期的名字好像叫做埃佩维埃尔。这些全都是过去的事了。是真？是假？这可不是我能知道的。我可不在乎这些，她爱跟哪个人睡就睡去。对我来说，德国人、法国人或土耳其人还不都是半斤八两。总而言之，她的日子算混得不错。当妓院被关闭以后，她就把这里改成旅馆，就像您现在所看到的，这里是一座很高级的旅馆。不过这里没有职业的妓女，也没有在街头拉客的妓女。根本就没有妓女。只有男性顾客和女性顾客。大家在这里都是旅客。全是过路的旅客。至于服务工作嘛，也只有一些出身于好家庭或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姑

娘，就像我一样，不用靠丈夫，自己挣点钱过个小日子……。这些女人来来去去，彼此看不见，也不相识。这种做法是再安全不过的了。顾客也都是精心挑选来的。您说这种办法方便不？”

“是很方便，而且很现代化。”

“请问先生的调查到此结束了吗？先生能把眼睛看着我吗？”

“安托瓦内特，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除非先生甘愿垂顾，把手搁在我身上。”

我只好轻轻地、机械地抚摸着她。她闭着眼睛，轻轻喘气。

“我很喜欢先生这双手。它是那么柔软，那么深情。现在就请先生继续提问吧。”

“是不是有个男人住在这幢房子里？”

她突然跳了起来。游戏停止了。她用一种不信任的、甚至是凶狠的目光看着我：

“我无可奉告！”

“您是说您没有这个权利告诉我。”

“一点没错。我没有权利。没有权利，您听见了没有？再说，您到底是什么人？是警察？我想您一定是个警察。一个警察！我不明白您在搞什么名堂，何况我也不知道。”

“我向您发誓，我跟警察毫无关系。”

她站起来，气呼呼地说：

“我马上把奈莉太太找来，您直接问她好啦。她会回答得比我好。谁给您的权利来向我打听她的情况？我这就去叫她来……。”

“您可别这样，安托瓦内特。请您冷静一下。”

“安托瓦内特没有啦。您让我安静一会吧！”

“请您冷静下来。要是惹出祸来对您也没有什么好处。让我好好给您解释。我不是在调查奈莉太太，我只想通过她来了解这个男人……，打听我相信就住在这里的那个男人的情况。现在我不只是认为，而且是可以肯定，这个男人的确就住在这里。他们为什么禁止您对我提起他的事？”

“我不知道。反正这是不允许的。谁也不让说。要是您还要继续纠缠下去，那我可就要叫……。”

“您是不会叫的。要是她来了的话，那我就会先把刚才您对我说的有关她的话全部搬给她听，说什么她从前是个妓女，和德国佬睡过觉，说她败坏了自己的姓和家庭，还有这幢漂亮的旅馆实际上是一座地下妓院……等等。这可都是您刚才对我说的，不是吗？”

“坏蛋！您是个十足的坏蛋！”

“现在我来跟您说说为什么我会到这里来。我再跟您重复一遍，我和警察毫不相干。我的调查只是与我和这个男人有关。我想见见他，如此而已。因为我有足够的理由断定他就是我的父亲。”

“您的父亲？”

“是的，是我的父亲。”

“这不可能！”

她两只手捂着脸。

“为什么不可能，安托瓦内特？”

“您想见他，这根本就不可能。谁也没有这个权利，就连我们这号人也不例外，您明白吗？连我们都见不着他。”

“那是为什么？”

“我一点也不知道。谁都不应该知道他住在这里，甚至

不应该知道他还活着。您就饶了我吧，我想告辞了。”

我把她按倒在床上。她挣扎着，企图重新爬起来。

“安托瓦内特，请您冷静下来。我只是想吓唬您一下，我根本无意对您施加什么威胁，也绝对不会伤害您。我只想求您帮个忙。我可以给您一笔酬金。不过，您得先告诉我，会有人看见我们或听见我们说话吗？”

“听见我们说话？不会的。不过从隔壁那间小屋子里可以看见我们。但是今天晚上隔壁不会有人。我不会再对您多说了。”

“我不想强求您帮助。您害怕是可以理解的。我想咱们还是来做个交易吧！”

“不，我不想听您的。”

“我只想求您回答我三个问题，然后您就可以自由。”

“哪您会放我走吗？”

“一定放您走。”

“好吧，您有哪些问题？”

“这个男人住在什么地方？”

“在楼上。”

“安托瓦内特，您一年的收入大概是多少？”

“这个我可说不准，……。大概差不多是36万法郎。”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您想让您今年的收入翻一番吗？”

“翻一番？那当然想。可我还看不出来谁能帮我创造这个奇迹。也许就是您？”

“这谈不上什么奇迹。我将给您签署一张36万法郎的支票。”

“我才不相信您的话。您想把我骗了。”

我从那个随时带在身上的钱包里抽出一本支票。

“那我该怎么办才能报答您的大慈大悲？我想您是不会为了我这双漂亮的眼睛就付出36万法郎。……。”

“您只是呆在这里，听我说话就行。”

“光听您说话您就能开出这么高的价钱，那您还不倾家荡产？”

“您说我能见到这个男人吗？您听清楚了，我只是想见见他而已。不管是从远处还是从近处，只要看得见他就行。您能告诉我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

“要见他？……楼上的事情不归我管。整个楼层都被包下来，谁也不准上去。这是命令。您可得理解我们的处境，谁敢冒被解雇的风险而去违背老板的命令？弄不好就将不好收拾。我真不想掺乎进去。”

“我保证您不会受到任何牵连。万一真的碰到什么麻烦，我一定对您负责到底，请您放心。作为见面礼，这张支票就属于您。明天您把它存到银行去，这笔钱就会转到您的帐上。”

我把一张桔黄色的长方纸片递给她。她仔细地端详着，似乎不敢相信这竟然是真的：

“一张36万法郎的支票仅仅是为了从远处看某一个人，天下哪有这样便宜的事！这当中必有骗局。不，我不想要您的钱。再说谁能给我证明这张小小的纸片背后真的有那么多钱？”

“您的怀疑确实多余。就说没有什么可以证明它能兑换法郎，可也没有什么可以证明它不能兑换法郎。对我来说，我视金钱如粪土。您应该相信我。再说这张支票也不至于使我变穷了。三十年来我一直在寻找这个男人，那才是真正的可

怜。他是我的父亲，您能理解我的心情吗？我必须见他，必须知道他还活着，证实他就是我父亲。好吧，我把这张支票撕掉，重新给您开一张。我把钱数加一倍……。”

“别撕！这可不必要。我现在相信您。不过，我只能在事成之后才会拿您的钱。”

“谢谢您，安托瓦内特。”

“先别谢我，事情还没办好呢。”

“难道有那么难吗？”

“比您想象的要难。首先，我从没有去过楼上。我只知道上面有个男人，别的什么也不知道。”

“哪您是怎么知道他就住在楼上呢？”

“从那些女佣人的议论中听到的。也有一些姑娘可以上楼去参加一种特别的晚会。您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不知道他们在晚会上搞些什么名堂。我甚至连楼上房间的位置也搞不清楚。我现在先去摸摸看上楼的路是否通着。您在这里等着我。”

她披着那件长袍，光着脚丫走了出去。门轻轻地被关上。那几根雕刻着男像的柱子向我投来嘲笑的眼光。多么愚蠢！不想寻欢作乐也就罢了，干吗还要花大笔钱去寻找那种也许根本就不存在的满足。我仔细观察雕像那神秘的棕色木头脸孔。也许它们的嘲笑是有道理的。它们在这些神通广大的混世女人身上，没有一块肌肉不颤动。可如今它们那种巍然不动的神态实际上就是一张无言的状纸：我只不过凭一时的冲动办事。我的行动的确过于软弱、渺茫，它既不连贯，也没有任何保证获得结果的把握。我醒时的生活几乎和黑夜的幻梦毫无差别。浮生如梦，难以续圆。

至于酬金？我本来还可以再加一倍，甚至两倍。而且万

一事情办糟的话，我完全可以照料这个姑娘。总而言之，金钱是个宝。

至于他？其实我见他又有什么用？诚然没有多大意思，这一点我心里也是明白的。然而，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挡我朝他走去。我必须弄个明白，到底是什么东西阻碍着我和他生活在一起，哪怕他置身于令人难以理解的世界之中。也许我根本就不该去寻求这一理解。实际上我只不过是在寻找那些孩提时早就知道的事理。

安托瓦内特还没有回来。我突然想到她可能由于不相信我的话而跑到奈莉太太那里去告密。可她不会不晓得要是我把她那些不谨慎的话说出去该给她造成多大的威胁。至于那张支票，她却把它留在我手里。也许这只不过是一个靠不住的证据，也是唯一可以自我安慰的理由。我听见头上的脚步声。然后，安托瓦内特像一阵风似地回来了：

“快过来！”她对我说。

“您刚才干什么去？”

“我已经把洗衣女工弗朗索瓦兹给收买好了。”

“收买了？”

“是的，您得多花一万法郎。我知道您花钱是不计较的。我已跟她说好，您想要她干什么都可以，因为她正好想买一件大衣……。”

“您干得好，安托瓦内特。她也会有一张支票的。”

“跟我来，从这边走。”

我跟着她那模糊的身影走。走廊里只有几盏间隔很远、光线微弱的守夜灯光。我们走过一些房门紧闭的房间，也许里面躺着一对对正在寻欢作乐的男女，也许根本就是黑洞洞地空无一人。门与门之间挂着一块暗红色的小挂毯。前面已

经没有去路。安托瓦内特满有把握地对我说：

“请把支票给我。一会由弗朗索瓦兹给您带路。不过，您一定要小心谨慎。”

我把支票递给她，她一下子就抢了过去，并且迅速藏在长袍的褶子里头。她把左手伸到一张紧靠墙壁的小圆桌下面。突然间，那片绒面墙板开动了，它好像沿着一条轨道往旁边滑过去，露出了一条细窄的通道，通道的尽头有一架木制梯子。

“去吧，一直往前走，然后上去。别跟弗朗索瓦兹说您给我这么多钱，行吗？”

在走进那条小通道之前，我想谢谢她的帮助。她把我拉住，然后从她那长袍里抽出那张支票，得意地在我鼻子底下晃了一下。

那扇包着绒布的木板墙在我身后重新关闭。楼梯上面有一盏半暗不明的灯光在黑暗中摇曳着。有一只手引着它朝着楼梯移过来，一直来到我跟前。一个人影在灯光的背后移动着。这是一个女人的身影，个子不算高。她领着我到了一间偏僻的屋子。

“我就是弗朗索瓦兹。”

她把屋里的灯打开。这回我才看清楚她那张小脸、薄嘴唇的狡诈的面孔。

“您想见他？”

“是的。”

“别出声。跟我来。这回正是好时候。”

“什么意思？”

“一会您看见他就明白了。不过您得先把答应好的那一万法郎交给我。”

我立即签署了第二张支票。她那敏锐的眼光追随着我每一个动作。我把这笔对她来说数目不少的钱交给她。她仔细地端详了一番，用手指摸着上面的数字，仿佛是为证实这笔款额的存在。她立即收住刚才的笑容，一本正经地对我说：

"我们得赶紧过去。仪式马上就要开始。这种玩艺有时候收场得可快。"

"您说的是什么仪式？"

"他们叫这种玩艺就这么叫法。等会您就会看见，这简直是缺德的玩艺，还能配上什么好听的名称。还不是随心所欲，胡闹一通。反正是他们付钱，这与我毫不相干。来吧，请跟我来。"

她说话断断续续，语调平淡，缺乏表情。她也住在这里吗？难道她夜里也不回家？

"我是没法子才来到这么个地方工作。您不会知道他们在这间破屋子里究竟干些什么卑鄙龌龊的事。恐怕您想都想不出来。真叫人看了都觉得可笑。但愿您不是一个感情容易冲动的人。一会最要紧的是千万不能吭声。要是他们知道是我私自把您放进来的，那可就遭透了。"

"您可不必担心。我只想见见这个男人，别的一概不感兴趣。"

"您想见他，过一会就会看见。让您看看他，这也只是我唯一能办到的事。千万别跟他说话。过一会带他出来的女人就是我。整个场面都归他组织，这个我可以向您保证！"

我们继续沿着这条长长的走廊走去。弗朗索瓦兹走路的声音特别轻。她那双洗衣女的轻便鞋擦着地毯走得很快，我好不容易跟上了她。我们从右面拐过去。突然间，身后响起一阵关门声。她马上把我推进一个房间里。我们一动不动地

在黑暗里呆着。

“他们快开始了。”她低声地对我说：“那帮先生太太们都来了。因为您不是节目单上的人，等一下我会把您藏在一个好地方。您可以看个清楚，可他们都看不见您。”

从过道里传来一群走路人的喧哗声：谈话和强忍的笑声。他们从楼房的另一端走过来，可能也是从楼下爬上来的。嘈杂声慢慢地消失了。我听见弗朗索瓦兹呼吸的声音。

“别出声！”她轻轻地对我说：“也许还有其他人过来。”然后又说：

“您太紧张了。您应该镇定一点，否则我们会惹出麻烦的。”

“什么麻烦？”

“各种各样的麻烦。”她的声音低沉又沙哑，“特别是我。我会被赶走的。奈莉太太早就想甩掉我。好像我成了她的累赘。她现在对我已经够厉害了。”

“这件事捅不了什么漏子，您放心好啦。”

周围又安静下来，我们又沿着这条羊肠小道走着。在过道中，透过那些没有关好的百叶窗，我隐约看到外面那一闪而过的灯光，这是近在呎尺而又像似远隔千里的城市存在的见证。我们突然又向左拐，仿佛这幢房子的主楼还有一片看不出来的侧翼。

“我们在什么地方？”

“在扩建的房子里。这里是几年前从主楼边上新接出来的。走，我们不能老在这里呆着。”

在这扩建部份的尽头有一扇敞开着的门。从那里传来一阵阵嘈杂声，漏出一道微弱的灯光。弗朗索瓦兹挽着我的胳膊。

"别从那边走，我们到上面去。"

她把我带到一处类似破旧小屋的地方。书架上堆放着一捆捆帐簿一类的东西。其中有一些要不是绳子结实的话早就会崩裂开来。

"这些都是档案，"弗朗索瓦兹告诉我，"全都是一些数字。他们挣多少钱，花多少钱，从战前到现在全都记在这里。真是国家机密！"

"您肯定我能见到他？"

"您什么都能看得见。至于他，您放心好啦。他总是等仪式开始以后才出场的。他不喜欢显耀自己，万一您见不到他的话，那您对这家旅馆的秘密也已经一清二楚。就光为这个花一万法郎那也太便宜了！"

她打开一个壁橱的门，很奇怪，里面竟有一把踏步梯。她头一个爬上去。她打开天花板上的一个翻板活门，然后就爬到上面去。接着，我也跟着爬上去。上面黑呼呼的什么也看不见。弗朗索瓦兹咬着我的耳朵说：

"行啦，就在这里呆着。您千万别动，也不能出声，就是仪式结束以后也别动，到时候我会回来接您。"

她又从那扇翻板活门下去了，我听见她关门的声音。我静悄悄地呆在那里。几秒钟之后，我开始试着从黑暗中辨认自己的方位。突然间，一道浅绿色的灯光从我的头上亮起来，同时开始传来一阵几乎听不见的哀怨、凄楚的小提琴声。这时候我才看清楚原来我是跪在一道栅栏的后面。这个地方很像西班牙的屋顶观景楼，从楼里可以饱览一条街或整个广场的景色，而自己却不会让别人看见。只不过这里的广场是一个半圆形的大厅，中间摆着一张空床，周围站着一帮衣饰华丽的男男女女。每个人都戴着光彩夺目的假面具。那

些饰有金银纸片的狼头，带着羽毛的首饰，给他们增添了一一种野蛮而又别致的气氛，还有眼睛闪闪发光的怪鱼头。

乐曲声变得更加刺耳而有节奏。古里古怪的人群仿佛被一个巨浪冲击似地引起一阵波动。此时此刻，我完全被一种激动、等待和害怕、甚至是满足的心情所占据。我纹丝不动，两眼被那束照射着床的强烈灯光吸引住了。小提琴奏出狂热的颤音。不一会，一些不正规的拨奏乐器撕破方才悦耳的乐曲，而当一对赤身裸体的青年男女进入大厅时，人们轻轻地鼓掌欢迎。

这对"演员"躯干修长，长相俊俏。那男子向观众微笑示意。他没有胡须，手里拉着他的女搭挡。她似乎有点哆嗦。不知到底是佯装的颤抖，还是导演的安排，抑或是由于初出茅庐，胆怯所致？人群中发出啧啧的赞美声。由于灯光的变幻，使他们那暴露在观众眼前的雪白肤体一会变成粉红色，一会变成浅蓝色。从观众那吱吱啧啧的热烈评论声中可以断定他们一个个都是行家里手。这情景使我突然想起弗朗西斯·卡尔科所写的那些书，尤其是那本名叫《隐藏的形象》的书。这是一本很有趣的杂文集，书中描写了在巴黎郊区的一个小镇上专门为来自瑞士和德国的游客所举行的性表演的场面。

观众紧靠着床边围成一圈，兴致勃勃地欣赏着……。

埃莉安娜·奈莉一下子就被我认出来了，因为她仍旧穿着那条浅色的短裙裤，头上戴着一个模样古怪的鸟头面具。但是我一点也没发现那位"英雄"——夏尔·埃瓦里斯特的任何踪迹。我想也许他的脸孔也被假面具掩盖着。要是这样的话，我就无法加以辨认，除非仪式结束的时候，他们都会把假面具摘下来。我开始感到愤怒，我受骗了，实际也是自

己骗自己。难道这位“英雄”永远躲着我？

……。

正当表演接近高潮的时候，他进来了。我感到万分的惊奇。他作为仪式的组织者等到这个时候才露面委实是他的一大成功。我跪在廊台的地板上也开始哆嗦起来。此时此刻，我的胸脯和我的头部仿佛就要炸开似的。我怎能不大声喊叫？他出来了，弯着腰坐在一把由弗朗索瓦兹推着的轮椅里。她轻轻地抬起一下眼睛，似乎是在提醒我必须格外小心。我一眼就认出这个蜷缩在轮椅里的小老头就是他。他从两行戴着假面具的观众中间走过来。大家赶紧闪开，并且向他点头哈腰。弗朗索瓦兹一直把他带到舞台的中间，那对演员正在那里进行那些叫人精疲力竭的表演。她把他推到一个最佳的位置，以便让他充分欣赏这场表演的最后、也是最精彩的一幕。

他的身影清楚地呈现在白色的光圈里。他那张苍黄、憔悴的脸孔在一种令人难受的微笑中抽搐着。鼻梁仍然笔挺着，额头的线条歪斜着。头上连一根头发也看不到，由此可见，他的忧郁和消沉情绪是何等严重。由于他的下巴特别突出，看上去真像一个马戏团的小丑。“他就是我的父亲夏尔·埃瓦里斯特·阿歇尔。”

正当“仪式”继续进行的时候，夏尔·埃瓦里斯特的下颌拉长了。嘴一张开，一股口水流了下来。弗朗索瓦兹赶紧用一块事先准备好了的白布替他止住。当这对青年男女的表演达到高潮的时候，小老头的躯体也舒展开了，并且开始颤抖起来。这时候，那年轻女子的嗓子就像一种乐器，发出类似虎啸的吼叫声……。

弗朗索瓦兹不停地替小老头擦干流出来的口水，观众也

频频点头，赞赏不已。小提琴的声音又变得震耳欲聋，灯光在全场来回晃动。借着这强烈的灯光，我突然看到迄今尚未发现的特征：夏尔·埃瓦里斯特的右边面颊是黑色的，仿佛那块肉被烤过、咬过似的。还可以看到他那颗竭力想掩盖的黑痣和满口的黄牙。正是由于他面颊的这块伤疤，使他的口水滴哩嗒啦地流个不停。弗朗索瓦兹把轮椅原地转动半圈，朝着我抬起头。她的眼睛仿佛在告诉我："您不是想见他吗？这回您该看见了吧！"

我孤独一人在这黑暗中漫无目的地走着，这座我曾经如此喜欢的城市如今已不再是我栖身之地，它露出一副极不调和的对立的面孔。虽然我心脏依然在跳动，可再也不是生命的存在。我也再也不是我自己（我是谁？）而是另外一个人，对他，我说"您"，对他，我说"你"。

大河，你的灯光熄灭了，节日也已过去。你疏远了我。旧的时光又来临了。黑夜，茫茫的黑夜，你可记得谢芜村的俳句：

一只老鼠掉进

水桶里，

黑夜十分寒冷！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黑夜的奴仆
作者＝（法）米歇尔·奥斯特著　　徐家顺　　戴明沛译
页数＝２４０
ＳＳ号＝１０９７９１１５
出版日期＝１９８９年０４月第１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正文